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王振寰博士

從「飛地」到學習型區域：  
地方制度與外資帶動的蘇州經濟轉型

研究生：吳翰有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日

## 謝誌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睡。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如。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唐，王維，終南別業)

成為一個作家，是我從小的志願，中文系本是自己上大學的第一志願，卻陰錯陽差的考上了社會心理學系，但一接觸到社會學後，其論述讓我一時驚為天人！於是，「一輩子很短，我願意和你將錯就錯」的一路從大學念上博士班。我很幸運的來到自己的唯一志願——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在這座美麗廣闊的校園裡生活多年，並在這裡成就了許多的善良及美好。另外，在過往十二年的生命裡，中國的揚州及蘇州幾乎成為我的第二故鄉，她們成就的是這本論文的深邃情感；一路來的風光，恰似繪本“The Missing Piece”說的故事。走過了，即使曾經跌倒得那麼痛、傷得那麼慘，但是爬起來就沒事了。我是個很幸福的人，於是，我要感謝這些人、那些事。

在大乘佛法裡有所謂的「淨業三福」，第一條是「**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這麼多年下來，父母親在經濟上所給予我的龐大付出及支持，始終是最可靠的後勤司令部。然而，自己的不夠積極，造成學業上的不斷拖延，總令他們感到心憂意煩。感謝親愛的爸媽對我的付出及栽培，用他們的親情、辛苦和歲月，成全我的人生願望。

博士論文的完成，最要感謝的人，莫過於王振寰老師及師母李玉瑛老師多年來的指導和關心。王老師是台灣傑出的社會學家，在他指導的眾多學生裡，我應該是最笨的一個，但是這麼多年下來，王老師依舊不離不棄的鼓勵著我。還記得剛考進東海時，為了尋找指導教授，我曾經請教過其他老師的意見，黃崇憲老師推薦王老師，潘美玲老師更以“Mentor”來形容王老師的人格特質。於是，我決定請王老師指導。此後，白天看著王老師忙著上課及從事行政工作，到了晚上，則幾乎毫無例外的出現在他的研究室裡讀書、寫文章，然後不斷地在學術期刊上讀到他的作品。王老師如此的自律及精進，成就了他在我心中的典範。散漫成性的我，至今仍然只能望其項背。王老師從東海轉到政大服務後，雖然親近他的機會減少許多，卻依然能感受到老師心中那份對學生無私的關心。當我驚覺自己的婚姻出現危機時，我曾經慌亂地在 MSN 告訴老師，我不想讀博士了；正在線上的王老師要我立刻打電話到他家裡去，他勸我無論如何都要繼續堅持讀下去。師母更是持續地給我許多的開導、安慰及打氣：「**離開，心更寬**」；「**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沒有的**」。有一次，師母要到中國某城市開會，王老師還特地「通

風報信」，要我詢問師母可否順道在該城市與妻見面，協助我搶救婚姻；師母爽氣地答應了。王老師及李老師的關心，不僅是在論文的指導上，也在我最狼狽、難堪而灰心的低潮時刻，用他們對學生的愛，綿延不絕地灌注著我，將我拉出這場險絕的境地，使我滿是平安。

我之認識崇憲老師，完全要感謝潘美玲老師。潘老師曾經提供一份教學助理的工作，幫我解決博一的經濟問題，並帶我到奇美實業做過一次田野調查，讓我親身感受幸福企業的奧秘。在我面臨挫折困難時，電話線另一頭的潘老師，總是慷慨地給我許多充滿智慧的建議。潘老師在最近一篇《使命必達》的文章裡寫著：「台灣到印度的田野之旅，拜訪的地點或遭遇的對象，看似巧合卻又如命中注定。」果真如此。在我考上東海之後，潘老師為我延展的網絡，也是最棒的建議，就是介紹崇憲老師。

在崇憲老師進入本系服務之前，何其有幸，我能經常跑到他的家中，參觀藏書量驚人的書房，聽他講述許多的人生故事，以及如何做好學問的方法，那是一段幸福時光。崇憲老師本人的學問精妙，上他的課是我在博士班的訓練裡至高無上的智識享受，很難想像老師「如何可能」地賦予那些學術概念一股躍然紙上的生命，在層層的拆解中，卻又別有洞天。崇憲老師的溫柔、慈和、義氣、帶有藝術家的性情，以及對知識的沛然熱情，在他身上總是融合得恰到好處，似乎是渾然天成。崇憲老師也在我寫論文的最後階段，經濟上最難以為繼的時刻，慷慨地對我伸以援手。來自崇憲老師的恩典，是我的無價之寶。

感謝陳志柔老師具開創性的中國研究，幫助我掌握蘇州的地方社會特性。在口試上的建議，不僅助我破迷開悟，帶領我殺出一條血路，在這本是一盤散沙的論文裡看見一股潛力。陳老師在這個關卡上，竟給了我一個莫大的信心及感動。

感謝張家銘老師對論文方向的建議，以及提供東海別墅的房子讓我在台中安居，能在經典的「東海別墅」居住多年，實在是一份殊勝的因緣。也要感謝張老師的先驅研究，在碩士班時領我踏上蘇州的土地，引導我進入中國研究的學術領域。感謝王信賢老師在口試時對田野資料及分析架構的肯定，以及給予的寶貴意見。此外，感謝陳德昇老師贈送一系列台商研究的專書；感謝簡旭伸老師的鼓勵並分享他的文章——這都是最棒的禮物！

感謝我的好友團：翠蓮、文妮、玟娟學姐、正霖、明鋒、亦之。感謝翠蓮三不五時的電話打氣，為我帶來許多的祝福。感謝文妮教我要愛自己的道理，每以禪宗教法對我「當頭棒喝」。感謝玟娟學姐當年熱心地介紹我到科技大學兼課，也教我很多撰寫論文的寶貴經驗。正霖是「最佳損友」，那段火鍋宵夜的歲月，飽足了腸胃，也綻放了年輕的夢想，他性格中的不羈及澎湃情懷，屢屢感染著我。

明鋒學長的溫和、善解及慷慨，是一份謙虛卻堅實的力量，福至心靈地指點我的迷津。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亦之，亦之是這些年來，幫助我最深刻、最用力、也最用心的朋友了。除了攝受著我走向學佛的道路之外，他的寬大、包容及慷慨，幾乎無時無刻地容忍著我的退轉及喧嘩，並且如同觀世音菩薩一般的聞聲救苦，有求必應。這段不可思議的善因緣，每念及此，總令我深深地感恩。

感謝遠在中國大陸的好友們，張梅、陳贊、玉泉、怡芳、純華、明輝、志芳、怡然。張梅是我的「心靈捕手」，她同樣寬容著我性格中的軟弱，聽我嘮叨著雜七雜八的細碎瑣事，並且是一位堅實、可靠、敦厚又美麗的「老大」。感謝陳贊一路從香港到上海的俠義相挺，在論文上對我幫助良多。感謝怡芳和純華夫婦對我的照顧，他們不但協助我瞭解蘇州，當我有次在蘇州做田野時生病嚴重，純華還特地帶我去看中醫。感謝明輝和志芳夫婦給予我明亮的信心及愛護，把我當成自己人一樣的對待。此外，感謝怡然在 2009 年的接待，儘管後來我捨棄對溫州的研究，但在溫州的兩個星期裡，卻擴大我對中國地方社會的視野。也就在溫州，我認識了其他要感謝的人，他們是：江華老師、朱沛老師、謝健老師、方美月總經理、胡良獻董事長、金士治先生及夏雷鳴先生。感謝玉泉，我和玉泉的緣分是不可思議的，他把我當作自己兄弟，用他的熱情與成熟，以及細膩的體貼照顧著我，也因他而成全我的蘇州研究。這份來自於玉泉的深厚恩情，是我難以回報的！

感謝行政院國科會提供的「碩士論文獎」兩年的獎助金，以及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提供的「小額論文研究獎助金」。感謝系辦的妙姿姊和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的李青倩小姐，協助我處理許多的行政事宜，這本論文才能順利成辦。感謝玖龍旅行社的張瓊文小姐在這些年來，幫我處理往返台灣到中國及香港的所有票務和簽證事宜，她總能幫我找到最物超所值的機票。此外，更要感謝在蘇州辛苦打拼的台商朋友們，是這些台商朋友用自己的歲月付出，讓我明白身為台灣人是一件多麼值得驕傲的事情。感謝在蘇州的跨國公司及公共研發單位等機構服務的大陸朋友們，幫助我瞭解他們的生命與中國社會之間的關係。

感謝世新大學英語學系的黃裕惠老師，自大學時代到現在，黃老師用達觀、「**不卑不亢，可是要亢一點點**」的態度，教導我「可以這樣」去看待世界，並要我對博士論文，堅持到底！感謝慈濟基金會的慈濟委員蔡雪芬師姑（清水分會），師姑像媽媽一樣的慈愛著我這個遊子，並且用實際的行動付出，對我示現任何人都能改變自己的，對人對己要「**感恩、尊重、愛**」；凡事「**甘願做，歡喜受**」。也因為雪芬師姑的緣分，使我有大事因緣，得以在清水靜思堂頂禮證嚴上人，領取上人的福慧紅包。感謝洪松柏師兄（小金門），師兄在我當兵期間，請我吃了很好吃且是自家生產的貢糖之外，還給了我許多在地人的關懷，更因為其中的妙不可言的因緣，使我對慈濟永遠的尊敬及感動。感謝林宗明師伯（蘇州分會），讓我和慈濟蘇州分會結下善緣，使我見識慈濟人對世界那份誠正信實的關懷。

感謝馥瑋，是她使我生起「**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清朗及力量！在2010年的中秋節夜晚，當我孤單地住在中國的一間賓館裡時，收到了馥瑋隔海寄來的布農語《月光》這首曲子。那一晚，我身上所有的，除了護照、台胞證及機票之外，剩下的不過是支離破碎的心，失去了所有一切的希望及勇氣。

雖然失去了依靠，我們仍要感到快樂  
因為我們還有月亮  
雖然失去了立足的地方，我們仍要感到安慰  
因為我們仍有企盼  
在你的心中，依舊在意什麼  
在你的心中，已然遺忘什麼  
當你抬頭看著月亮，是否還有感動？  
祖先說過的話，是否還在你的心中？

馥瑋曾寫道：「**該重的重，該輕的輕**」。就在那個中秋夜裡，我抹乾眼淚，坐看雲起時。虔誠的祝福馥瑋能平安喜樂地走過留學生涯，順利地拿到博士學位。妳也加油，「互相漏氣求進步」。

我要真誠地感謝美枝這位高中同窗在我寫論文的最後階段裡，三天兩頭的電話關心及鼓勵，她教我要不斷地學習用超越的心去超越眼前的困難，從事編劇的她在今年三月份寄來一封電子郵件，上頭的話語宛如醍醐：「**最近發生這麼多的事情，我可以體會你有多難熬，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想像自己在演一部電影，男主角在最後關頭，會面臨越來越多的考驗與磨難（這樣電影才好看嘛）。其實電影也反映了人生，老天爺絕對不會把你想要的東西，好好的交給你，她總會考驗你是否值得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而我相信你絕對值得！加油！！！！**」

在攻讀博士學位的生命階段裡，田蓉，是我生命中最親密的人生伴侶，這些年下來，兩人異地讀書，相聚日少，使得她必須忍受旁人對這段婚姻裡分隔兩地的異樣眼光，以及對未來生活的徬徨無奈。但因為田蓉，促成我與揚州、蘇州結下無窮無盡的因緣；也因為她，來自江都家人的愛，使我得到了家庭的溫暖。這些年裡的點點滴滴，是甜蜜也好，是辛酸也罷，都已化為生命成長的養分。在這本博士論文裡，若有任何深邃的情感，是來自於田蓉的愛、付出及勇氣。無論如何，放下和祝福，是我此刻的承擔，深切盼望各自在此後的人生道路上，有信心能學會溫柔及謙卑，愛與感謝的生命態度，勇敢地去克服源自內心的一切困難。

翰有，東海大學  
2011/7/28

## 論文摘要

本研究以蘇州市（中國江蘇省）作為研究個案，從制度及歷史的面向，分析蘇州的技術學習體制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是否能邁向學習型區域的典範。本研究強調地方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體制之間的對偶關係，並認為地方制度與外資帶動的兩個因素導致蘇州在資訊電子業的產業發展上出現「發展，但缺乏技術學習」的經濟後果。蘇州在每一階段的經濟轉型動力來自於追求地方經濟成長的治理邏輯。在此制度慣性下，地方官員熱衷於招商引資，固然吸收大量的高科技產業外資並建立完整的產業聚落，但是在具有高度競爭力與技術能力的外資廠商主導的產業結構以及公共研發機構的角色定位等因素影響下，使得蘇州產業升級的道路佈滿荊棘，並不容易實現學習型區域所揭示的技術與知識鑲嵌在當地的模式。

1978 年之後，蘇州經歷了三個重大的經濟轉型階段。首先，在「市場轉型」的階段裡，地方黨政能人是主導集體鄉鎮企業以促進地方經濟成長的角色，但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既造成鄉鎮企業的沒落，也未能培育出本土電子業的工業基礎，導致蘇州在 1990 年代中期轉向外向型經濟之後，迅速成為台資及外資資訊電子業的生產基地。其次，在「全球在地化」的階段裡，蘇州各地方政府積極運用跨國制度學習模式，以打造經濟開發區的軟硬體建設，以及採取親商的招商引資等策略，雖然成功地發展出資訊電子業的產業聚落，並且成為全球資訊產品的重要生產基地，但是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使得蘇州成為外資的飛地，另一方面則是在地方官員追求 GDP 成長及政績主義、台資廠商生產模式的聯手下，障礙了蘇州本地民營中小企業的技術學習管道。因此，蘇州的資訊電子業幾乎完全由台資與外資主導發展。最後，在「產業升級」的階段裡，蘇州企圖採取產業後向連鎖的模式，建立面板產業與半導體產業（包括晶圓製造、IC 設計與 IC 封裝測試等），但是蘇州仍然使用吸收外資的方式進行，當地的大學與公共研發機構也未能承擔起技術研發與技術擴散給本地民營中小企業的角色。所以，蘇州邁向產業升級的方式蘊含著深刻的路徑依賴，一方面在於地方官員主導經濟事務的地方制度，包括經濟開發區的建設、招商引資策略、公共研發機構等制度，大多是地方黨政能人的經濟治理邏輯的延續，而非為了提升蘇州的技術學習能力；另一方面，則是鑲嵌在全球生產網絡的外資廠商大多視蘇州為其生產加工基地，該產業的市場、技術、知識與管理能力大多為這些外資所掌握。迄今為止，蘇州並未完成產業升級，亦即未能打造出接近於新竹科學園區的學習型區域。

關鍵字：蘇州、經濟轉型、地方制度、外資帶動、學習型區域

## **Abstract**

In this study, Suzhou City, as a case study from the institutions and the history-oriented,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system in Suzhou,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whether the region can move towards a model of learning.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study of coupling relationship loc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echnological learning system, and that the local system and driven by two factors led to foreign investment in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 industry in Suzhou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n a " development but without technological learn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Suzhou in each phas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driven by the pursuit of loc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nertia in this system, local officials interested in investment, of course, a large number of high-tech industries to absorb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stablish a complete industrial clusters, but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of foreign firms dominat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role of public R & D institutions positioning and other factors, makes the Suzhou area is not easy learning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revealed embedded in local mode.

Keywords : Suzhou, economic transition, local institutions, FDI-driven development, learning region

# 目 錄

<b>第一章</b>	<b>緒論</b>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	11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田野過程說明	24
第四節	論文章節安排	28
<b>第二章</b>	<b>文獻回顧</b>	31
第一節	全球化與中國發展模式	31
第二節	中國地方政府與技術學習	39
第三節	區域經濟與技術的創新學習	53
第四節	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體制的對偶（coupling）發展	64
第五節	分析架構	67
<b>第三章</b>	<b>市場轉型下的蘇州經濟困境</b>	70
第一節	蘇南模式的制度變遷	71
第二節	蘇南鄉鎮企業的技術學習	77
第三節	地方黨政能人的經濟治理邏輯	79
第四節	小結	85
<b>第四章</b>	<b>全球在地化的飛地經濟</b>	87
第一節	打造開發區：全球在地化的地方制度基礎	88
第二節	蘇州資訊電子業的發展	106
第三節	昆山印象：側寫 Y 總與 M 經理	114
第四節	小結	122
<b>第五章</b>	<b>追求地方產業升級的制度安排</b>	125
第一節	蘇州產業升級政策及制度環境變化	126
第二節	台灣 IT 廠商帶動的產業後向連鎖	140
第三節	公共研發中心及相關協會的角色	153
第四節	蘇州學習型區域的浮現？	163
第五節	小結	166
<b>第六章</b>	<b>結論</b>	168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68
第二節	理論反省	172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174

附錄一	蘇州中科的主要服務平台	176
附錄二	昆山清華科技園建設	180
參考文獻		183

## 圖 表 目 錄

表 1-1	蘇州市 2000-2010 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六大行業指標	14
表 1-2	蘇州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經濟指標（2007 年）	16
表 1-3	蘇州市部分年份對外經濟主要指標（2007 年）	17
表 1-4	2009 年兩岸主要 IC 封測廠商發展現況比較（前十大）	22
表 2-1	分析架構：蘇州經濟轉型階段	69
表 3-1	1999 年蘇州市鄉鎮企業改制情況	75
表 3-2	蘇州市委書記仕途升遷與時程	82
表 3-3	昆山市委書記仕途升遷與時程	82
表 3-4	蘇州與全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	84
表 4-1	蘇州的國家級、省級開發區建設發展情況（至 2009 年累計）	89
表 4-2	蘇州市工業基地建設發展重點	90
表 4-3	蘇州市產業佈局情況及其發展方向	92
表 4-4	2008 年昆山開發區外資企業投資概況（排名前十位）	94
表 4-5	蘇州工業園區與蘇州新區比較	102
表 4-6	全球前十大筆記型電腦外商委外代工比例	109
表 5-1	重慶市四大外銷網路	128
表 5-2	台資廠商投資重慶西永園主要項目	128
表 5-3	核准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江蘇省與重慶市）	129
表 5-4	江蘇省各市縣（市區）最低工資標準類別對照	130
表 5-5	蘇州工業園區電子資訊製造行業構成表	138
表 5-6	蘇州工業園區主導產業 2012 年發展目標	139
表 5-7	2009 年中國大陸主要封測廠商	148
表 5-8	台灣封裝測試廠商在中國大陸的分布	149
表 5-9	大蘇州經濟開發區與新竹科學園區的學習型區域比較	167
圖 3-1	蘇州市地圖	72

# 第一章 緒論

「成立加工出口區有一個好處，就是在該區之內進口機器和原材料零組件均免稅，這種情況使台灣和香港、新加坡的條件一樣，才能和它們互相競爭。科學園區是仿效加工出口區，但增加一個條件，就是設在有足夠科技人才的地方，包括國內培植和國外來的人才。以新竹科學園區來說，因為有從事基礎研究的兩個大學，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以及針對應用研究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可以彼此配合，進一步將工業園區和研究單位結合，再將研究的成果、技術移轉出去，提供給工業界設廠生產。」（李國鼎<sup>1</sup>，2005：356-357）

## 第一節 研究目的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長江三角洲的地方經濟表現突出。在中共中央的開放政策及全球產業體系在 1980 年代的遷徙下，長三角城市日漸擺脫農村工業化的鄉鎮企業發展模式，進而以工業開發區制度及採取積極的招商引資手段，吸引全球資訊電子業的設廠投資，並且在外資高度聚集之下，地方經濟結構在 1990 年代至 2010 年間出現朝向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經濟轉型。另一方面，中國此一對高科技產業外資的高度依賴，也使得主導中國經濟的主體並非中國企業，造成所謂「拉美化」的經濟後果<sup>2</sup>。換句話說，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沿海地區的地方政府改變了地方經濟發展的策略，在吸引全球資訊電子業的外來投資時，進一步打造出在地的科技產業體系，透過外資與全球生產網絡產生緊密的經濟鑲嵌，並企圖邁向區域的技術學習及創新，以厚實地方在國內區域及國際間的經濟競爭力。但是，這個地方經濟演化的過程，在資訊電子業的產業聚落已然建構完

---

<sup>1</sup> 李國鼎（1910-2001），江蘇省南京市人。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1934 年赴英國劍橋大學進修，研究核子物理。歷任台灣造船公司總經理、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專任委員、美援會秘書長、經合會副主任委員、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長、總統府資政等職務。李國鼎先生為台灣制訂及推動的一系列產業經濟發展策略，尤其是加工出口區及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以及相關政策法令的制訂，不僅協助台灣經濟結構的轉型，而且對台灣高科技產業在 1980 年代後的快速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其影響所及，造就了如今台灣在全球高科技產業的關鍵地位。

<sup>2</sup> 此處為黃亞生的觀點，引自吳曉波（2008-下：226-227）。

備的同時，地方是否必然內生出技術學習與創新的體制及社會文化資本，抑或是呈現出「發展，但缺乏技術學習」(development but without technological learning)的地方技術體制，則是在討論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議題中較被忽略的一個面向。因此，本研究以蘇州市（江蘇省）作為研究個案，從制度及歷史的面向，分析蘇州的地方技術體制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是否能邁向學習型區域的典範。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回答蘇州從集體鄉鎮企業的高度成功及隨後的衰落，繼而轉向外向型經濟發展後，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資訊電子業外資逐漸形成產業聚落的社會事實下，大蘇州地區透過哪些制度學習方式，逐漸朝向建構在地的學習型區域，期望進一步實現地方產業升級<sup>3</sup>的發展目標。而在這個地方經濟轉型過程裡，地方政府為了達成經濟轉型的目的，其地方制度是否能與產業的全球分工競爭、技術軌跡發展等因素產生制度接合，以將技術及知識鑲嵌在當地，進而累積其技術學習與創新的能力，這是本論文的核心關懷。因此，大蘇州地區的經濟轉型是否如希臘神話中的伊卡魯斯（Icarus）所呈現的寓言意象？在中國經濟劇烈變化三十年後，值得做此討論。

### （一）田野的啟示

去年（2010）的七月至九月間，我在蘇州進行的田野過程中，寫下如此的一個觀察：「一座亟欲翻新的古城市，可以給出什麼樣的啟示？什麼樣的土壤，種出什麼樣的花！啟示，是城市給我們的，還是我們自己的解讀和判斷呢？……老楊<sup>4</sup>問了我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老吳，你們搞學術的，做這些研究能給社會帶來什麼幫助，可以改善（中國）廣大貧苦百姓的生活嗎？蘇州搞到最後，大概也就是下一個竹科吧！『**整個蘇州，不過就是個殖民地經濟**』，老楊如是說。」（田

<sup>3</sup> 後進發展國家的生產體制或科技追趕體制的演進過程，可以統稱為「產業升級」或「經濟升級」（王振寰，2011），率皆意味著技術及生產模式的轉變，或可謂經濟結構上的轉型。本論文所用「產業升級」一詞偏重技術學習體制的演進，「經濟轉型」則指稱鉅觀面向的經濟生產體制變遷。

<sup>4</sup> 「老楊」為化名，本論文所稱的「老楊」均為同一人。老楊本籍揚州，並非蘇州本地人，他在蘇州大學畢業後，輾轉又回到蘇州工業園區的跨國企業工作多年。

野日誌，2010-8-3)

我和老楊因緣際會地在蘇州結識<sup>5</sup>，彼此是多年的好友，當我進行蘇州田野時，他大方地招待我住進他位於蘇州工業園區的住家，替我省下一大筆可觀的住宿及生活費用。老楊在蘇州工業園區的某知名歐洲跨國公司擔任中階主管，對於我所進行的蘇州田野，他非常熱心地提供各項生活協助，以及引介受訪對象的訪問，同時他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心得，也往往給予我「在地人」觀點的啟發。但在另一方面，老楊則對此次田野的資料蒐集工作及學術研究有著本質上的質疑。老楊這樣在中國社會中成長及生活的人，對於當今中國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社會現象令他感到窒息、失望及憤怒！他經常對我提起的一句話，足以反映他的心聲：「中國共產黨感冒，卻要老百姓吃藥！」

老楊也經常批評日本及台灣等跨國廠商在蘇州對勞工的剝削及造成嚴重的工業污染<sup>6</sup>，但他認為根本問題在於中國政經體制與外資的「勾結<sup>7</sup>」。這令我聯想到蘇州學者劉云柏在對晚清時期江南<sup>8</sup>近代工業資本流向的研究中，提到外國工業資本流向對江南近代化的限制與支解時，他是如此描述的（2003：340-41）：

……與其說是外國列強的商品與貨幣的直接輸入，還不如說是一種資本制度、思想、規則、價值原則的輸入。尤其是1860年以後，西方列強對江南社會的工業投資並不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產業擴張和資本輸出為主線，而主要是形成一種有利於外國工業資本流向運作的制度體系和法律保證，並折射出某種軟性的模式，以誘發、示範、矯正、調動、整合近代江南經濟發展，從中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由此構築出一個資本不斷擴張、積聚和集中的機制平台……它以一种強制的方式要

---

<sup>5</sup> 2007年春季，我和老楊首度在蘇州認識，並參加了他的大學同學聚會。

<sup>6</sup> 流行於蘇州一帶的一則傳言，即是在蘇州工業園區看不到任何一隻飛鳥，藉以嘲諷該工業區的環境污染嚴重。我在該地生活兩個月，確實經常在夜間聞到刺鼻的工廠廢氣味道。

<sup>7</sup> 老楊舉了幾個案例，說明蘇州市政府與台灣廠商的政商勾結，這些案例都與廠房排放的污染源有關。老楊曾經參與過附近居民發動的圍廠抗議，但園區廠商排放廢氣的情況並未有明顯改善。

<sup>8</sup> 晚清「江南」的地理界定，相當於現今的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京、嘉興、湖州、杭州及上海等城市，這個區域亦稱長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總面積大約4.3萬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態以及經濟聯繫等方面形成一個整體（劉云柏，2003：1）。

求社會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個系統與其對接和聯通，迫使江南經濟運作納入到外國工業資本流向的組織框架內，進行重組和再造，致使牢固的江南舊式經濟結構發生解體和消融……這些好像是在一夜間，突然從地下崛起而瞬間完成的。這種歷史現象所表現的工業資本的非凡意義以及釋放出的巨大能量是前所未有的，它使長期生活在古老社會中的人感到膽戰心驚。

若將上述的描述，置換到約一百五十年後的今天，雖然時空環境、國際政治氣氛、國內政經體制、及地方社會關係等因素已經呈現古今迥異的歷史性結構差異，但是我們若把目光投注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蘇南」地區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與地方社會在經濟生活上的制度變化，直覺上亦不免令今人感覺到「膽戰心驚」的神似。引用這段描述，在於帶出本研究的社會學想像。回到田野觀察，我認為老楊的態度及工作經驗，具體而微地表達出中國社會對該國政經趨勢發展，以及社會人文風氣走向功利現實的普遍性質疑，並且充滿著相對剝奪感的無奈及個人安身立命的高張力焦慮<sup>9</sup>。這些個人生命的煩惱與中國進行市場轉型的國內制度變遷，以及對外開放，引進大量外資，從事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有著高度的制度性關連。

## （二）三十而立：中國經濟崛起與技術追趕學習

中國大陸在 1978 年底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之前，已經由學習蘇聯模式的趕超戰略實現重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目標（林毅夫等，2001）。不過，經歷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後，造成經濟、文化及教育等層面的重大變遷，社會變遷的後果直到今日，仍深遠而劇烈地牽動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謝宇（2010：2）便認為：「中國現在正經歷著一場劃時代的社會變遷，其程度和意義堪與世界歷史上其他最重大的變遷——如早期歐洲的文藝復興、英國的工業革

---

<sup>9</sup> 我在第四章引用相關的田野資料，更具體的描述這種個人生命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衝突和焦慮。

命——相提並論。而且，事實上，中國的這場變遷涉及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口之眾、速度之快、影響之深，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更有甚者，這個改變也是根本性的、不可逆的。」

Izraelwicz (2006) 認為，在人類的經濟發展史上，還從未見過一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在如此長的時期內有如此迅猛的經濟發展，也從未見過一個國家如此依靠外部的世界，亦即國際的市場、技術和資本，來幫助自己實現經濟的起飛。在人口規模、中國歷史及改革開放的時機上，中國的例子都具備了獨特性。Izraelwicz將中國比喻為一頭大象來形容其對世界造成的「中國震撼<sup>10</sup>」(China Shock)，他是這麼說的：

「20 世紀，闖進世界經濟瓷器店的只是幾隻老鼠（日本、韓國），它們不會造成多大的損失。而今天，則是一頭可能造成慘重損失的大象進入了商店。為了給大象騰出地方，人們需要對瓷器店進行重新改造。為使大象找到自己的位置，還需要對它進行馴化。任何操之過急都是危險的。古老的富國和復興的帝國都需要重新學習。如果大象不希望商店的大門對自己的突然關閉，如果瓷器店的管理者想從這位新顧客那裡得到最大的利益，那麼他們雙方就應當攜手合作，共同引導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潮流，並掌握好這個過程的節奏。」(Ibid. : 319-320)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以「摸著石頭過河」(王小強，1996) 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對內進行計畫經濟體制轉型至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改革，特別著重在國有企業體制及經濟資源再分配的制度調整 (Nee, 1989)，同時產權制度的改革，亦為這個轉型過程中的主要制度變革的重心。對外則是開放門戶，學習東亞發展模式，成立經濟特區及經濟開發區等工業園區的建設，透過土地、勞動力及優惠政策等手段，吸引國外製造業的外商直接投資 (FDI)。中國採取出口導向策略進行加工貿易，除了因此累積龐大的外匯之外，也反轉過去的鎖國政策，積極參與

---

<sup>10</sup> 引用南方朔對該書中譯本的推薦序 (2006 : 10)。

國際經貿活動，並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sup>11</sup>（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新中國」建國至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高度戲劇化，除其市場龐大的誘因早已引發中國淘金熱潮之外，其經濟與社會的謎樣結構亦成為社會科學企圖建構不同於西方理論觀點的實驗室。張五常（2009：97）甚至指出：「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因此，中國經濟成長的發展路徑及社會關係，以及這些現象與技術學習體制之間的關係，構成了一個至今仍須解開的謎（puzzle）。

中國經濟的崛起，遂成為當今一個熱門的議題；中國之於世界經濟舞台不僅動見觀瞻，並且舉足輕重了。2010 年，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GDP）以五兆八千七百八十六億美元超越日本的五兆四千七百四十二億美元，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sup>12</sup>。但若加入人口規模換算平均個人 GDP，中國只達到日本的十分之一<sup>13</sup>。無論如何，當今中國的總體經濟實力，已經成為牽動世界經濟結構不可或缺的主角，「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商品，甚至已經關係到美國人的日常生活是否便利及便宜<sup>14</sup>（Bongiorni，2007）；甚至遠在埃及的政治革命都能歸因到中國強勁的產品競爭力，造成當地高失業率，才會導致政治變動<sup>15</sup>。

中國經濟發展路徑的引人入勝，除了該國經濟力量的增長速度之外，更在於其制度與社會關係的錯綜複雜，令人眼花撩亂。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深受其國內政經結構的約束而自成一格，謝宇（2010）認為中國經濟並不是簡單地向市場經濟及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前進，現在不是，未來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完全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體制。他的理由是，首先，中國政府角色，從中央到地方，都扮演著「強政府」的角色；其次，企業利益和政府利益相互結合，政商利益一致，私人

---

<sup>11</sup> 台灣也在同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僅晚了中國一天。

<sup>12</sup> 中國也是美國國債的最大債權國。

<sup>13</sup> 《中國時報》，〈中國 GDP 超越日，躍居全球第二〉，2011-2-15-A11。

<sup>14</sup> 中國製造的商品，粗略估計平均一年為一般的美國家庭省下五百美元（Harney，2008）。

<sup>15</sup> Thomas Friedman 就認為中國大幅提升競爭力，使得中國製產品具有更低的成本優勢，從而造成中東地區的高失業問題，危及中東國家政權的穩定，間接導致今年初的埃及革命，促使埃及總統 Hosni Mubarak 的下台（商業周刊 1213 期/2011-2：46-48）。Friedman 的這種說法除了反映中國製造的影響力外，難以證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關係也非常密切；最後，中國有多層次的家長式管理傳統，亦即中國是一個強調多層次共同屬性的社會，在「嵌套」的單位傳統下，每一個人都不是大社會的一般成員。因此，謝宇認為中國的這三項社會制度特徵，明顯與西方國家不同。

因此，我要進一步追問，在中國如此特殊的社會制度特徵下，它與技術學習體制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多大的程度上將促進或約制著產業發展的創新及學習的可能性。技術學習體制的建構是一個社會過程（Dosi et al., 2005），此一體制需要各種制度的搭配，並且還要搭配得恰到好處，才能實現；同時，經濟發展的程度也將影響著技術軌跡的方向。如今，中國在與全球展開高度國際貿易的交流中，各種新穎時尚的產品、觀念及技術的輸入，已然深刻地改變及影響了中國國民在經濟生活的活動及內容。兼之，近年來，中國消費能力大幅提升，汽車、各種電子通訊產品，以及名牌奢侈品的消費市場快速成長，從「Made in China」似乎轉移到了「Made for China」的趨勢，這是一回事。相對的，涉及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學習體制等需要政府、制度、廠商、市場等支持的制度設計及實踐，則又是另一回事。「以市場換技術」的「拿來主義」，乃至山寨手機等現象，在極度寬鬆的界定下，或許可視為某種程度的技術學習的實踐。然而，我們有必要更聚焦於特定區域及其孕生的技術學習體制，才能加以檢證中國是否已經達成轉型升級的政策目標，或者，它距離這個目標還有多遠！自 1990 年代中期起，中國採取出口及投資的雙頭馬車發展策略，這兩項帶動中國經濟成長的政策工具至今未有本質上的調整，甚至在這個經濟邏輯的長期政策主導下，中國經濟極有可能出現泡沫化的後果（謝國忠，2011）。因此，中國經濟固然快速成長，並累積龐大的外匯，但是其產業結構的調整、技術升級的緩慢，以及至今尚未出現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則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Achilles的腳跟<sup>16</sup>」。近年來，中國官方多次宣示在經濟結構方面的「轉型升級」政策，便是意識到近三十年來的發

---

<sup>16</sup> 「Achilles 的腳跟」典故源自荷馬史詩《伊里亞得》(Iliad)。Achilles 幼時，其母曾將其浸入 Styx 河中，使之成就刀槍不入的金剛之身，但其母所抓的雙腳跟處則未沾到河水。後來在托洛亞戰役中，Achilles 的腳跟被 Paris 用太陽神阿波羅的箭射中而身亡。因此，後人將這個故事比喻為一個人的弱點所在之處。

展策略已然造成其在國際經濟競爭及高科技產業發展中的「短腿」。

中共中央已經在 2011 年三月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規劃綱要》，即所謂的「十二五規劃」(2011-2015 年)。十二五規劃被視為改變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發展模式的一次大膽的戰略計畫<sup>17</sup>，規劃從出口與投資導向的經濟結構轉向內需消費的成長模式。龐大的製造業在過去三十年撐起中國的投資與出口所帶動的經濟成長，但是這種發展路徑，在廠商漸漸轉向資本密集及自動化的生產方式後，無法吸收中國大量的過剩勞動力。因此，十二五規劃採行更為勞力密集的服務業作為此後經濟發展的主要產業結構，希望發展大規模的交易密度型產業，例如批發與零售、國內運輸與物流供應鍊、健保、休閒與餐飲等，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策略，在對外經貿及匯率政策等面向，高度學習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經驗，尤其是台灣的出口導向政策是中國推動總體經濟增長的主要學習對象(吳敬璉，2009)。就本論文關懷的蘇州高科技產業的技術學習體制議題而言，中國的中央政府及蘇州等地方政府亦以東亞後進發展國家，特別是台灣的工業聚落的制度設計，以及半導體產業等發展經驗，作為其師法的對象，但不同於台灣的地方在於，中國同時展現著極高程度的外資帶動(FDI-driven)的科技學習發展路徑(王振寰，2007a)。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等各級政府，莫不積極建立高科技產業的各種政策及制度，以及通過招商引資的手段，以期改造國家和區域的創新學習體系，進行產業升級及經濟結構的調整，領導經濟生產模式從「中國製造」轉型到「中國創造」的質變。但是，在資訊產業(如筆記型電腦、手機等)、光電產業(如面板)、半導體產業(如晶圓製造、IC 設計、IC 封裝測試等)的技術、研發設計及生產管理等制度優勢，至今仍多為外資所掌握的

---

<sup>17</sup> 中國經濟學家許小年認為中國政府過度依賴投資，投資率佔國內 GDP 比重高達 47-48%，是全球最高。中國只靠量的增長，而非質的增長，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將會導致泡沫化的危機(商業周刊 1224 期/2011-5：80-84)。中國作家余華則說，「這個十二五規劃是『忽悠』老百姓的！過去八〇和九〇年代初，做規劃還是可行，當時大陸經濟體還是比較小，現在大陸經濟體太大了，今天的大陸是開放的大陸，就你一個國家搞沒用的，你要控制物價有用嗎？物價上漲是全世界的問題。你們不要當真，我們是不當真。」(商業周刊 1213 期/2011-2：74-76)。

社會事實之下，中國針對高科技產業所宣示的「自主創新」，在這幾個產業依舊處於後進追趕學習的階段，她如何可能實現？

根據東亞發展經驗，東亞國家在冷戰結構下的高度危機感驅使下，由國家機器積極主導產業發展策略，一方面透過參與國際市場發展生產力以學習技術，另一方面則利用產業政策推動產業升級與深化（瞿宛文，2000）。瞿宛文認為修正學派對東亞發展經驗的看法，關鍵在於市場是不完美的，因此市場本身需要許多必要的非市場機制，包括財產權的規範、法律體系、社會福利、教育制度等的建立，而這些機制都有待國家機器來扮演統籌推動及協調的角色。此外，為了追上先進國家，必須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以產業政策來補貼與獎懲並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業，扶植本地企業、盡快學習先進技術，才可能在全球經濟競爭激烈的局勢下，轉換並提升本國的比較利益，以持續增長國內經濟及生產力。後進國家的落後，具備相對的後發優勢，可以躍進（leapfrog）的方式採用最先進的技術進行工業化（Gerschenkron，1946）。然而，技術學習不是一蹴可及，中國在計畫經濟體制期間，國有企業內部擁有相對先進的設備機器，但是產品的品質及生產效率並不高，也並未因此累積出厚實的技術實力，特別是產品的商品化過程受到政治意識型態的嚴格控制，使其產品改良與技術積累之間缺乏「市場」的中介及回饋的迴路。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當先進國家及東亞發展國家已經在資訊電子業的全球生產網絡的各個利基位置築起「技術攔阻」<sup>18</sup>（technological hurdle）時，中國此一「後—後進國家」（王振寰，2007a：213），仍在尋覓追趕的模式和建立邁向創新的可能性路徑。因此，中國如何跨越「技術攔阻」，在外資聚落化的產業結構中，是否能走出自己的路，是本研究試圖解答的問題。

學習型區域，是在特殊的社會文化下層基礎上累積而成的「歷史產物」（蔡明璋，2005）。工業聚落固然經常形成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有其市場的內部治

---

<sup>18</sup> 此處「攔阻」一詞的使用，參考並移用了黃崇憲的用法（2010：150）。黃指出，大部分後進國家企圖在世界體系向上移動的過程中，將會遭遇資本積累的發展攔阻，他將之稱為「格遜孔攔阻」（Gerschenkroian hurdle）。本論文認為後進發展國家在高科技產業的追趕發展中，所面臨的技術學習上的各種技術及制度障礙為「技術攔阻」，欲克服此一攔阻的核心議題在於，地方如何建構一套具有競爭優勢的學習型區域，以連結全球並參與全球產業競爭。

理邏輯運轉著產業的遊戲規則。然而，在特定地理疆界之內產業聚落的發展過程、制度及社會關係的形成，以及整體社會變遷的過程，在路徑依賴的假設下，我們仍有可能判斷或預測特定經濟區域未來的發展方向。因此，蘇州是否會成為下一個新竹科學園區這樣的學習型區域（王振寰、高士欽，2000），不僅將回答老楊的疑惑，也有助於理解蘇州技術學習體制的發展過程。蘇州，當然不一定會成為下一個新竹科學園區，她甚至可能超越加州矽谷。重點在於，蘇州的技術演化路徑是否能，以及如何去跨越全球生產網絡所設下的技術攔阻，以成就其本地的技術學習體制的競爭力？或是，她能否另闢蹊徑、自成一格的建構出新的技術發展模式？不論是哪一種發展路徑，都牽涉到產業聚落的制度與社會關係必須建構出具有制度濃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Amin and Thrift，1994）的區域競爭優勢。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分析改革開放之後，蘇州地方經濟轉型的過程，尤其關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蘇州走向外向型經濟的工業化發展策略之後，藉由吸引資訊電子業的全球生產網絡的投資，並在當地形成產業聚落的外資聚落化此一社會事實中，蘇州如何藉由制度的追趕學習，實現其產業升級及經濟轉型的發展目標。中國地方政府藉由制度追趕學習的模式，並通過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空間節點，快速增進地方經濟成長，但是此一制度追趕學習策略有其限制及矛盾之處。地方應該著重於在特定的區位空間裡，創造有利於知識鑲嵌的制度及社會關係，厚實本地廠商的科技能力，將知識視為內生的生產要素<sup>19</sup>，才有可能突破由外資設下的技術攔阻，進而帶動本地經濟的轉型升級，而非持續著投資及出口的地方發展路徑。但在另一方面，由於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及消費社會的逐漸成熟，市場規模是否有可能扮演下一個重要的驅動技術知識演化的角色，反而有利於地方與外資帶動的全球生產網絡結晶出新的技術發展路徑，從而產生不同於東

---

<sup>19</sup> 美國經濟學家 Paul Romer 在 1990 年發表〈內生的科技變革〉一文（“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強調知識具有共享性，經濟成長來自於知識的內在革新，並以「人、概念、東西」的富足性取代「土地、資本、勞力」的稀缺性假設。參見 David Warsh 的介紹（中譯《知識與國富論》，台北：時報出版，2008）。

亞後進發展國家的發展模式，以及理論的分析架構，則需要時間來加以驗證。

## 第二節 問題意識

本節指出蘇州的經濟表現固然亮麗，其 2009 年的進出口總額已經位居中國第四大城市，但其經濟結構明顯的由外資大軍所組成的資訊電子業主導。在 2004 年的一場蘇州模式與溫州模式的爭辯中，由於蘇州人均收入不如溫州而被譏諷為「房東經濟」及「只長骨頭不長肉」。隨後，蘇州積極推出扶植民營中小企業的政策及引進外資的研發中心等政策，加以平衡既有的發展路徑。然而，在蘇州的台商及其他國籍的外商大多以代工生產作為其核心業務的情況下，這些外資跨國企業面臨著蘇州生產成本日漸高漲的壓力，在中國境內或往其他國家轉移其生產基地，自然也成為企業解決生產問題的方案之一。蘇州為了解決產業空洞化，以及提升產業結構的層次，則必須在當地的產業聚落中建立一套有利於技術學習的體制，將技術知識鑲嵌在蘇州。本研究由此延伸出研究問題。

### （一）以資訊電子業外資為主的經濟結構

從對外開放政策來看，蘇州市在 1984 年被國務院列為開放城市，1994 及 1995 年陸續成立蘇州工業園區（前身為新加坡工業園區）及蘇州新區，並在 2010 年 1 月 12 日被國家發改委列為第二批十六個城市的「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sup>20</sup>。另一方面，蘇州是所謂「蘇南模式」的發源地，經歷過鄉鎮企業的快速經濟成長階段，並為外向型經濟奠下財政基礎。

就時間序列來展開蘇州經濟發展的歷史分期。首先，1978 年後的蘇南鄉鎮

---

<sup>20</sup> 深圳在 2008 年成為第一個國家創新型城市的試點。2010 年第二批國家創新型城市的試點城市，包括：大連、青島、廈門、瀋陽、西安、廣州、成都、南京、杭州、濟南、合肥、鄭州、長沙、蘇州、無錫、及煙台。

企業經濟，一度成為中國市場轉型的重要樣版，並且為蘇州帶來快速的經濟成長。但是，鄉鎮企業發展到 1990 年代後期，衍生出許多的制度問題，並且產生重大的投資虧損，地方政府遂強制性地進行鄉鎮企業的產權改革（劉雅靈，2001）。直到 2004 年蘇州市政府推出扶植民營中小企業等相關政策，鼓勵社會成立民營中小企業之後，鄉鎮企業如今已成為明日黃花。其次，自 1994 年後，蘇州陸續開辦了蘇州工業園區及蘇州新區等經濟開發區，並在接受上海浦東新區的輻射下，走向以招商引資為主要發展策略的「外向型經濟」，特別著重在引進資訊電子業的全球生產網絡的在地鑲嵌（吳翰有，2001；張家銘，2006），在這些外商投資當中，台灣資本佔有相當大的比重。2008 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延緩了蘇州資訊電子業的出口之後，這才加速了蘇州政府的「二次創業」政策，亦即所謂的產業轉型升級，側重在半導體產業及面板產業等高科技產業的後向連鎖、研發人才的引進，以及公共研發單位的成立等制度面的提升及強化。

1994年，新加坡政府在蘇州與中國中央政府合資成立的新加坡工業園區對蘇州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策略產生了極為深刻的示範效應，特別是親商概念及相關配套制度的引進，如社會公積金制度、產住混合的開發區開發模式等。隔一年正式成立的蘇州新區，則與新加坡工業園區構成了蘇州市的工業園區雙翼。在蘇州市推動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初期，地方政府有意識的招商策略（如，以台引台）及台商投資行為特色（如，生產網絡式的集體投資），奠定了日後蘇州以資訊電子產業做為地方經濟火車頭的經濟結構，此一產業也持續成為蘇州吸收外資的重點項目。除了蘇州市雙翼，昆山及吳江等縣級市亦為外資的重要投資及生產的地區，尤其是昆山所聚集的台商數量龐大，該市被暱稱為「小台灣」，當地亦成立了華東地區第一家台商子弟學校，顯見台商在昆山一帶的高度聚集<sup>21</sup>。「以台引台」的招商策略及台商「母雞帶小雞」式的生產網絡投資模式（張家銘，2006），形成了跨國生產網絡—經濟開發區的空間地理鑲嵌格局，其特徵是工業園區檔次

---

<sup>21</sup> 以 2005 年為例，昆山平均每平方公里有 2.6 家台商，台灣人口約佔昆山人口的 7.8%，約有五萬多台灣人常住昆山（《遠見》，2005/12/1：208）。

高低與外（台）商企業規模大小，構成了空間鑲嵌梯度的差異性分布（Wang and Lee, 2007）；大致而言，其梯度分佈依序是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昆山－吳江等。

此後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迅速，卻使得蘇州罹患了如黃亞生所調的「外資依賴症<sup>22</sup>」。蘇州早期攔截（hold down）全球生產網絡所依賴的是土地、勞動力、租稅優惠政策等生產要素以承接跨國資本的投資，但後者的全球生產網絡佈局通常是將後段加工組裝的生產線轉移到蘇州，原材料及產品市場皆不在蘇州的地理疆域內，形成「兩頭在外」的外資生產模式。此外，外（台）資企業的主力研發中心也大多留置在母國的企業總部。不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外資及台資在蘇州成立其研發中心。

蘇州走向外向型經濟之後，對當地的經濟結構產生兩項重大的影響。第一個影響是資訊電子業成為蘇州的主導產業，構成蘇州工業經濟產值的主要組成結構。其次，則是外資成為資訊電子業的領導廠商，尤其是台灣廠商及其生產網絡所構成的生產模式，是蘇州資訊電子業重要的經濟生產特徵。本研究將此一社會事實稱之為「外資聚落化」。

根據蘇州市統計局（2010）的資料，2000-2009年這十年間，蘇州工業經濟結構形成六大主導行業，分別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器機械及器材製造業」、「紡織業」、「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以及「通用設備製造業」等。十年來，蘇州這六大行業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相對穩定，工業產值快速成長，其中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的爬升力道最猛烈，所佔經濟結構的比重也最大，從2000年的16.7%提升到2009年的33.7%。並且，自2003年起，資訊電子業在蘇州的經濟結構中穩定地維持在三成至四成的比重（見表1-1）。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份官方報告中，儘管「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在蘇州十年獨大，該產業對蘇州工業經濟也有著較大的經濟貢獻，但是蘇州市政府也意識到資訊電

---

<sup>22</sup> 見Huang, 2003（中譯，2005），中文版後記。

子業的超前發展會排擠其他產業的發展資源和空間，同時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蘇州工業經濟的衝擊也警示著經濟轉型的迫切性，亦即蘇州必須優化產業結構的佈局，以及轉變地方經濟成長的發展模式。

		規模以 上工業 總產值	六大行 業合計	(1) 通信及 計算機	(2) 黑色 金屬	(3) 電器 機械	(4) 紡織業	(5) 化學 原料	(6) 通用 設備
2010 年 上半年	工業總產值	11634	7889	<b>3883</b>	1133	882	775	644	573
	比重(%)	100.0	67.8	<b>33.4</b>	9.7	7.6	6.7	5.5	4.9
	位次	-	-	<b>1</b>	2	3	4	5	6
2009 年	工業總產值	20284	13720	<b>6845</b>	1945	1415	1453	1098	963
	比重(%)	100.0	67.6	<b>33.7</b>	9.6	7.0	7.2	5.4	4.7
	位次	-	-	<b>1</b>	2	4	3	5	6
2008 年	工業總產值	18630	12759	<b>5987</b>	1932	1407	1429	1070	935
	比重(%)	100.0	68.5	<b>32.1</b>	10.4	7.6	7.7	5.7	5.0
	位次	-	-	<b>1</b>	2	4	3	5	6
2007 年	工業總產值	15909	10682	<b>4968</b>	1566	1108	1380	931	730
	比重(%)	100.0	67.1	<b>31.2</b>	9.8	7.0	8.7	5.8	4.6
	位次	-	-	<b>1</b>	2	4	3	5	6
2006 年	工業總產值	12539	8357	<b>3999</b>	1114	808	1191	706	540
	比重(%)	100.0	66.6	<b>31.9</b>	8.9	6.4	9.5	5.6	4.3
	位次	-	-	<b>1</b>	3	4	2	5	6
2005 年	工業總產值	9909	6729	<b>3287</b>	845	613	988	581	415
	比重(%)	100.0	67.9	<b>33.2</b>	8.5	6.2	10.0	5.9	4.2

	位次	-	-	<b>1</b>	3	4	2	5	6
2004 年	工業總產值	7308	4870	<b>2561</b>	580	431	630	407	261
	比重(%)	100.0	66.6	<b>35.0</b>	4.9	5.9	8.6	5.6	3.6
	位次	-	-	<b>1</b>	3	4	2	5	6
2003 年	工業總產值	4977	3199	<b>1566</b>	339	295	486	314	200
	比重(%)	100.0	64.3	<b>31.5</b>	6.8	5.9	9.8	6.3	4.0
	位次	-	-	<b>1</b>	3	5	2	4	6
2002 年	工業總產值	3466	1982	<b>720</b>	229	256	398	229	152
	比重(%)	100.0	57.2	<b>20.8</b>	6.6	7.4	11.5	6.6	4.4
	位次	-	-	<b>1</b>	4	3	2	5	6
2001 年	工業總產值	2785	1501	<b>445</b>	185	226	331	191	123
	比重(%)	100.0	53.9	<b>16.0</b>	6.6	8.1	11.9	6.8	4.4
	位次	-	-	<b>1</b>	5	3	2	4	6
2000 年	工業總產值	2397	1286	<b>400</b>	144	172	303	158	109
	比重(%)	100.0	53.7	<b>16.7</b>	6.0	7.2	12.6	6.6	4.5
	位次	-	-	<b>1</b>	5	3	2	4	6

資料來源：蘇州市統計局網站，《蘇州主導行業十年變化簡述》，  
[http://www.sztjj.gov.cn/info\\_detail.asp?id=18966](http://www.sztjj.gov.cn/info_detail.asp?id=18966)

註 1：工業總產值的單位為「億元」人民幣。

註 2：產業別全稱，分別為(1)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2)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3)電器機械及器材製造業；(4)紡織業；(5)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6)通用設備製造業。

註 3：黑體為筆者所強調。

其次，根據蘇州市海關統計，2009 年蘇州市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 2014.5 億美元，其中出口佔 1140.9 億美元，進口佔 873.6 億美元；蘇州進出口總額佔江蘇省進出口總額的 59%，佔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 9.1%，位居全國第四位，僅次於上海、深圳和北京。在蘇州進出口主體中，外商投資企業是主力，2009 年

外資的進出口總額達到 1748.8 億美元，儘管較 2008 年下降 12.3 億美元，但外資的進出口值仍佔蘇州 2009 年的 86.8%<sup>23</sup>。我們還可以再從表 1-2 及表 1-3 看出外資對蘇州經濟結構的影響。在表 1-2 中，企業登記註冊以私營企業所佔數量最多，合計 4234 家，佔登記註冊企業總數將近一半；其次為外商及港澳台投資企業，合計 3854 家，約佔總數的 45%。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兩者合計 155 家，還不到企業總數的 2%。其次，從平均就業人員指標，可以觀察企業類別吸納就業人口的比重，外商及港澳台投資企業吸納的就業人口比例最高，合計佔了 66%；私營企業佔了約 24%；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兩者合計只佔了 1%。最後，工業總產值指標一項，外商及港澳台投資企業合計佔了 67%，私營企業約佔 17%，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所佔比重不到 1%。從表 1-2 的統計，可以觀察到外商及港澳台企業對蘇州工業經濟發展的貢獻度遠超過蘇州本地所有企業的總和。

按登記註冊類型分	企業單位數（個）	平均從業人員（人）	工業總產值（萬元）
國有企業	20(0.23%)	9,606(0.35%)	383,366(0.24%)
集體企業	135(1.56%)	17,980(0.65%)	980,522(0.61%)
股份合作企業	54(0.62%)	6,054(0.22%)	240,414(0.15%)
聯營企業	14(0.16%)	1,584(0.05%)	66,108(0.04%)
有限責任公司	273(3.16%)	159,182(5.83%)	19,998,204(12.57%)
股份有限公司	42(0.48%)	65,953(2.41%)	4,917,625(3.09%)
私營企業	4,234(49.05%)	660,397(24.19%)	26,748,225(16.81%)
其他企業	6(0.06%)	1,257(0.04%)	37,756(0.02%)
港澳台投資企業	1,493(17.29%)	548,091(20.08%)	25,185,367(15.83%)
外商投資企業	2,361(27.35%)	1,259,352(46.13%)	80,531,590(50.62%)

<sup>23</sup> 蘇州新聞網，2010-1-13，

<http://www.subaonet.com/html/importnews/2010113/10113123545987337370.html>

總計	8,632	2,729,459	159,089,177
資料來源：《2008年蘇州統計年鑑》，2008：150-51。 註：（）內數字為百分比；工業總產值的貨幣單位為人民幣。			

在表 1-3，可以看出蘇州的進出口總額在 2000 年之後急速增長，並在 2004 年突破千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在 1995 年後，出現了大量外商投資。歷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累計至 2007 年為止，已經高達 4,386,047 萬美元的規模。就出口的企業類別而言，2007 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 1064.06 億美元，佔出口總額接近 90%，私營企業出口額 68.14 億美元，僅佔 6% 左右（蘇州統計年鑑，2008：5）。

年份	進出口總額	出口	進口	實際利用外資
1990	18,816	15,524	3,292	6,954
1995	459,223	233,491	225,732	237,779
2000	2,007,036	1,048,095	958,941	288,338
2001	2,366,160	1,230,679	1,135,481	302,183
2002	3,639,008	1,852,061	1,786,947	481,398
2003	6,566,313	3,263,377	3,302,936	680,511
2004	10,320,051	5,077,384	5,242,667	503,314
2005	14,058,895	7,277,472	6,781,423	511,607
2006	17,426,360	9,468,488	7,957,872	610,462
2007	21,179,567	11,888,422	9,291,145	716,471
資料來源：《2008年蘇州統計年鑑》，2008：306-07。				

從上述的說明，可以看出蘇州經濟結構由集體鄉鎮企業及國有企業等公有制

企業，轉向外商企業（包含港澳台企業）及出口導向的結構性巨大變化。

## （二）外資帶動的技術學習體制

2008 年春天，傳出在昆山設廠投資已經十二年的仁寶電腦將從昆山撤資，準備南下越南及西進重慶設廠的消息。這項消息震驚了昆山！世界第二大筆記型電腦代工廠的仁寶對此消息的回應：一是，不否認已經在越南設廠，但強調該項投資是應客戶要求，藉以分散投資風險；二是，仁寶指出在昆山的生產成本逐年攀升，《勞動合同法》的推行及稅收優惠政策的縮減是導致仁寶之所以選擇投資越南的主因。土地空間趨於飽和，令台資企業在昆山不易取得新土地，亦將影響仁寶電腦產能的擴張<sup>24</sup>。

同年秋天，昆山舉辦第八屆「海峽兩岸產業合作發展論壇」，本屆討論主題是「台資企業轉型升級」。此屆論壇的目的，一方面企圖搭建一個兩岸合作的平台，以協助昆山台資企業的轉型和升級，包括：從加工貿易出口轉型為擴大內需市場，從代工利潤轉型為附加價值高的品牌利潤，從勞力密集的經營型態升級為技術密集，從家族式經營升級為企業化和集團化。昆山政府的具體政策是依循 2007 年修訂實施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兩個層面，一個重要原則就是推進產業優化升級，引導外資更多向現代化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高端製造業轉化。台商投資鼓勵類的項目可以享受免徵進口設備的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等優惠政策。其次，積極制定外資區域轉移的配套措施，亦即修訂中西部地區外商優勢產業目錄，在修訂過程中重點考慮中西部承接轉移的問題<sup>25</sup>。

連結這兩則蘇州新聞的脈絡，反映出蘇州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固然成功地將蘇州的部分地理空間（特別是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昆山及吳江等）建立了

---

<sup>24</sup> 引自〈觸動海峽兩岸工商界，“仁寶”撤離昆山風波調查〉，2008-04-03，  
<http://big5.huaxia.com/sw/rdtz/1/2008/00788322.html>。

<sup>25</sup> 引自〈臺企轉型，昆山論壇〉，2008-10-28，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321/2008/10/28/1766s2297190\\_1.htm](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321/2008/10/28/1766s2297190_1.htm)。

完整的高科技產業聚落，也形成了地方經濟與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高度鑲嵌。但是，另一方面，則揭開了蘇州採取外資帶動的經濟成長模式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瓶頸。因此，如昆山政府採取所謂「騰籠換鳥」政策以調整當地的產業結構，這項政策可視為一項都市更新計畫<sup>26</sup>，而非真正在技術層面上的升級。這個政策手段儼然仍是「市場換技術」的治理邏輯再現。就在 2007 年，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審議的企業所得稅法草案中提出兩稅合併政策，雖然被認為是台商在中國進行產業升級的契機，而實際上卻是地方政府欲藉此展開「騰籠換鳥」的產業結構轉型計畫，如原昆山開發區主任宣炳龍所說，將低技術含量、低增值率的外資企業轉移出去，再將高新技術、低能耗產業引進來，這個「騰籠換鳥」的過程，就是利用外資水平升級的過程<sup>27</sup>。

根據 Huang（黃亞生，2005）的研究，蘇州原有的國營企業並不缺乏電子技術，例如蘇州孔雀電器集團有限公司（蘇州孔雀）成立於 1970 年，是中國最早，也是最大的電視機生產企業之一，同時亦為最早從國外引進技術的國營電視機製造廠，它在 1979 年從日本 SONY 引進第一條生產線及技術。孔雀牌電視機曾經出口至四十多個國家，在 2100 名員工中擁有 600 名技術人員。1990 年，蘇州孔雀在國務院電子工業部公布的企業排行榜上，它排名第十五位。但是，在 1990 年代初期，蘇州孔雀與飛利浦合資後，使用「將其主要的運營資產和品牌名稱做為資產股份進行資本化」的方式，導致蘇州孔雀成為一個「被掩飾了的收購」。合資之後的情況，在此引述 Huang 的訪談記錄，蘇州孔雀的倪總經理說：

「你這裡看到的所有的桌子和椅子，都是 1994 年後購買的。它們（JV）將所有的東西都拿走了。這些東西沒有了之後，蘇州孔雀的老經理（倪的前任）用一個紙板箱做辦公桌，用另一個紙板箱做椅子。市場經濟真是無情啊。」（Ibid：236）

---

<sup>26</sup> 感謝簡旭伸老師提供這個看法（2010 年）。

<sup>27</sup> 引自〈台商：兩稅合併將促進大陸台資企業升級〉，2007-03-10，  
[http://sp.wenweipo.com/lh2007/news\\_detail.php?news\\_id=473](http://sp.wenweipo.com/lh2007/news_detail.php?news_id=473)。

另外，根據郭健倫（2005）的研究，蘇州利用吸引外資來解決城內以家電工業、民生輕工業為主的國營企業經營不善的問題，進行國營企業的資產轉置，以下引用郭健倫的訪談記錄（Ibid.：38）：

「1980 年代鄉鎮企業興起時，當時蘇州也出現了一些行業內排名靠前的全國名牌，如香雪海冰箱、孔雀電視、春花吸塵器、長城電扇等，號稱蘇州的『四大名旦』，但是這些品牌後來面對國營企業資產轉置問題時，蘇州就採取利用外資的方式，像是春雪海冰箱就與韓國三星集團合資後，三星提出讓春雪海品牌退出市場三年……孔雀電視也是與荷蘭飛利浦合資成立蘇飛，到在前幾年（2002 年）飛利浦和孔雀電器集團簽署關於蘇飛股份轉讓協議，飛利浦在合資公司中的股份從 51%增加到 80%，涉及轉讓金額達 4.2 個億人民幣。」

這是蘇州早期引進外資合資的現象之一。我缺乏詳盡的數據以說明在 1978 年之前，蘇州整體的電子產業發展情況。但是，從 Huang 提供的蘇州孔雀電視機廠的案例裡，可以看到蘇州既有的國營企業所生產的消費性電子產品應該具有一定的技術水準。不過，當外向型經濟確定為政策主軸之後，資訊電子業外資的大量投資，嚴重的壓縮了本地國有電子企業的發展空間。我們亦能由郭健倫的研究中看出這個趨勢變化。蘇州國有企業及鄉鎮企業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的生存變化，遠離了本研究的討論範圍，我在此處特意引述 Huang 及郭健倫的研究，目的在於指出，引進國外生產技術，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改善了國有企業的生產能力，但是大規模引進外資的數量卻對蘇州既有產業結構發生了深遠影響，以致於中國社會以「引狼入室」形容這種經濟發展的格局。

蘇州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搭上上海浦東新區開發的順風車，以外向型經濟做為地方經濟發展的策略導向，積極以經濟開發區的建設吸收跨國資訊電子業

的全面投資，尤以台灣資本為最主要和最積極的投資來源<sup>28</sup>，先是從個人電腦、周邊產品、電子零組件、及筆記型電腦等產品，分別在蘇州新區、昆山及吳江等地形成產業聚落，這些區域之中則以昆山為筆記型電腦的生產重鎮。全球重要的筆記型電腦代工大廠及零組件供應商，如仁寶、緯創資通、神達、富士康等公司座落於昆山；友達、大眾、志合<sup>29</sup>等則分布在蘇州工業園區；明基、華碩等公司設廠於蘇州新區；大同、台達等公司設於吳江。隨著筆記型電腦市場和生產技術的成熟，在近十年內，蘇州也積極地往上游領域展開產業鍊的延伸部屬，最明顯的例子，一個是半導體產業，包括晶圓代工、IC設計、IC封裝測試等相關產業的聚集；另一個是面板產業，如昆山龍騰光電的成立等。

蘇州一方面藉由後向連鎖以追求產業鍊的完整建構，以求將高科技產業的研發、生產及銷售等部門的活動及知識鑲嵌在蘇州，以「做大做強」蘇州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透過政策的引導及規訓，企圖透過制度和外資的技術、研發部門之間產生連結，以知識擴散的方式要求外資將企業管理、生產技術等知識外溢給本地的公共研發部門、工程師、大學及民營中小企業等經濟行動者，藉以扶植他們的學習能力，擺脫組裝加工基地的命運。例如，蘇州工業園區透過「園區企業配套協作會」的形式，建立一個平台，協助園區內的民營中小企業和大型外（台）資彼此媒合的機會，以提高產品的在地配套率，及促進民營中小企業學習外（台）資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理念<sup>30</sup>。

不過，以蘇州的半導體產業為例，在 2006 年，蘇州創造了中國半導體產業 16% 的產值，僅次於上海，是中國第二大的半導體產業聚集地；蘇州在該年的半導體產業的產值中，80% 以上是來自於 IC 封裝測試的貢獻<sup>31</sup>。

---

<sup>28</sup> 根據江蘇省台辦的統計，累計到去年（2010）為止，光是昆山，台商家數為 3738 家，投資金額高達 442 億美金，相當於新台幣 1.2 兆元。目前包括宏碁、鴻海、華碩、仁寶、緯創等台灣指標性電腦大廠，都積極往鄭州、成都及重慶等地複製「昆山模式」。經濟部投審會官員表示，在中國推動十二五規劃的效應下，預計今年遞件申請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投資案件數及金額將再創新高，台商二次西進熱潮正要開始（自由時報，2011-05-11）。

<sup>29</sup> 我在 2010 年 9 月拜訪志合電腦時，該公司已被精英電腦併購。

<sup>30</sup> 引自〈園區企業配套協作會開進唯亭，“攀親”500強〉，2009-11-05，<http://www.suzhou.gov.cn/newssz/sznews/2009/11/5/sznews-16-19-18-3797.shtml>。

<sup>31</sup> 引自 SME 電子輔料技術網，2006-09-07，

根據資策會對台灣及中國 IC 封測產業的研究發現，中國主要的 IC 封測廠商仍以外資為主，包含合資或獨資的經營型態（見表 1-4）。在中國前十大的 IC 封測廠商中，僅有兩家為中國本土公司，即江蘇新潮科技和南通華達微電子。

排名	台灣			中國		
	公司	營收	主要業務	公司	營收	主要業務
1	日月光	2,533.5	專業封測代工	飛思卡爾半導體（中國）	964.4	外資 IDM
2	矽品	1,629.7	專業封測代工	威訊聯合半導體（北京）	773.6	外資 IDM+代工
3	力成	902.3	專業封測代工	江蘇新潮科技	618.3	本土 IDM+代工
4	京元電	288.5	專業封測代工	上海松下半導體	432.3	外資 IDM
5	南茂	282.9	專業封測代工	深圳賽意法半導體	408.6	外資 IDM
6	超豐	261.4	專業封測代工	南通華達微電子	398.2	本土 IDM+代工
7	福懋	204.9	專業封測代工	三星電子（蘇州）	304.5	外資 IDM
8	華東	168.2	專業封測代工	日月光（上海）	291.6	台資專業封測代工
9	華泰電	160.5	專業封測代工	瑞薩半導體（北京）	279.6	外資 IDM
10	頤邦	157.7	專業封測代工	英飛凌科技（無錫）	272.0	外資 IDM

資料來源：MIC（2010a）。

因此，從以上的說明可以得知，蘇州資訊電子業的外資聚落化現象，起因於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與全球生產網絡的接合所產生的經濟後果。即如徐進鈺所言：

「如果地方的勞力市場與技術能力無法提供一個完整的勞力庫，那麼廠商仍然有可能進駐，但多半採取規避干擾，以及將主要技術與零組件的生產與研發，留置在區域之外，藉以利用外來廉價勞力的加工方式。相對的，當地方勞動力與技術（人力資本）較為有技能，同時創業的機制也較為完整（包括資金與相關法令）時，衍生在地的外包體系，甚至將重要的研發功能移入的可能性就會大為增加。在這個意義上，與其不斷與廠商談判要求其協助發展地方生產體系，不如就提升勞動力素質，以及增加創業的誘因上著力，要來得有效」（2008:53-4）。

但是，如何做到呢？畢竟，「不同社會由於歷史遺產或政治經濟權力的分配模式，造就了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而這個體系也就規範了和模塑了其經濟發展的方式。」（王振寰，2007a：180）因此，蘇州欲藉由高科技產業的技術升級實現地方的經濟轉型，必然涉及了技術學習體制的制度安排與知識實踐的過程，含攝了地方政府、外資廠商及社會關係等因素，才有可能建構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產體制。如同王振寰（Ibid.）指出，不同（國家）生產體制有利於某些產業而不利於另外其他產業的發展。例如，台灣儘管成功建立資訊電子產業，但卻無法成功發展硬碟機產業，即在於台灣國家體制不能有效地演化或快速進入硬碟機的技術軌跡（洪世章，2002）。

### （三）研究問題的提出

在上述的說明基礎上，我提出兩個具體的研究問題。本研究將圍繞這兩個重要的研究問題，從制度及歷史的面向進行分析。研究問題，分述如下：

#### 研究問題 I：

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裡，蘇州採取哪些制度學習機制以推動經濟轉型？這些制度學習機制具有哪些特徵？尤其在吸引外資建立資訊電子業的產業聚落以

及近年來往面板與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制度學習機制與產業的全球分工競爭及技術軌跡的鑲嵌程度是否能使得蘇州邁向學習型區域？

### 研究問題 II：

在建構資訊電子業的產業聚落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外資等經濟行動者各自扮演什麼角色？在不同的次產業裡，蘇州的制度學習機制與外資產業聚落之間的社會關係與制度鑲嵌有無不同？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田野過程說明

### (一) 研究方法

在經驗研究上，本論文採取質化研究法，透過歷史文獻分析及深度訪談等方法，蒐集相關的經驗資料。之所以捨棄社會調查的量化統計分析方式，在於有其實務操作的困難，因為欲在大蘇州地區進行普遍且完整的社會調查，以取得官方及廠商的內部數據，不論在時間、經費及操作上，均有著相當高的難度，導致研究者不容易掌控資料的品質。而且，誠如周雪光（1999）所言，對中國社會進行的大規模抽樣調查，變項的操作性定義往往難以精準地界定已然高度分化的中國社會。因此，在個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前提與缺乏足夠研究經費贊助的限制下，我採用質化研究方法，這相對於研究者，較有利於研究的執行及資料的取得。

其次，關於資料來源的說明。我透過對蘇州及台（外）資廠商的相關研究文獻及報導進行梳理，掌握蘇州的歷史和社會經濟的制度變遷過程，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田野的深度訪談。歷史文獻等二手資料蒐集，涵蓋如下的範圍：

1. 相關議題的學術論著、產業科技專書、期刊論文及媒體報導等。
2. 台灣與中國的官方出版品（如，統計年鑑等），以及公開的正式文件等。
3. 廠商公開的資訊、協會組織出版品及企業主的傳記等。

再者，透過田野訪談取得的資料，主要有兩筆：第一筆訪談資料是在 2004 年，由王振寰老師主持的國科會研究計畫，「中國的資訊產業發展：東亞模式的翻版或是獨特的模式？」，計畫編號：N92-2412-H-029-007。田野時間為 2004 年 6 月 23 日至 7 月 6 日。在兩週的時間裡，王老師與我（當時擔任研究助理）走訪中國三個城市，包括蘇州（SZ<sup>32</sup>）、上海（SH）及北京（BJ）的資通產業台商、大學教授、地方政府官員及中國本地創業家等。一共訪問 14 人次，其中蘇州 6 人次，上海 3 人次，北京 5 人次。

第二筆主要田野訪談資料的取得，進行時間是在 2010 年 7 月 30 日至 9 月 18 日。主要的田野範圍集中在蘇州工業園區（SZ）、昆山（KS）及上海（SH）等地。我一共訪問 37 人次，昆山訪問人次最多，共計 20 人次；其次為蘇州工業園區，共計 19 人次；最後，上海僅 1 人次。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當中有四個場次（蘇州一場，昆山三場）的訪談是跟隨日本東京大學園田茂人教授與台灣東吳大學張家銘教授主持的跨國研究計畫而得以順利展開，該跨國研究計畫的田野時間為 2010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8 日<sup>33</sup>。

2010 年夏季進行的田野調查主要訪談對象，包括：

1. 台籍幹部或負責人：產業涵蓋 IC 設計、晶圓製造、光電面板、筆記型電腦、電子零組件、機械業、食品業、磁磚業及精密陶瓷等產業。
2. 蘇州的官方單位：包括，蘇州市科技局下屬的蘇州市生產力促進中心、中國農業銀行分行、工商局職員等。
3. 協會組織：包括，昆山及蘇州台商協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昆山聯絡處）、蘇州市集成電路行業協會等。
4. 公共研發中心或育成中心：包括，蘇州中科集成電路設計中心、昆山清華科技園等。
5. 任職蘇州外商公司的中國籍幹部：包括，台商、美商、德商、韓商等。也包

---

<sup>32</sup> 括弧內的大寫英文字母為訪談編號的城市代碼，下同。

<sup>33</sup> 在此特別感謝園田茂人教授與張家銘老師的提攜，以及感謝王振寰老師提供此一寶貴的訊息。

括一位蘇州本地 IC 設計公司的中國籍經理。

## 6. 蘇州本地居民。

### (二) 田野過程說明

自從 2004 年夏季之後的數年間，如 2005 年、2007 年及 2009 年等，我曾經單獨前往蘇州，進行短期的訪問，每次停留各約一至兩週的時間，但是收穫有限，效果並不佳。這裡以 2010 年夏季展開的田野調查為例，說明田野資料蒐集的情況。2010 年夏季，在我出發前往蘇州之前，我事先委請系主任蔡瑞明教授為我開立介紹信。然後，我以自費的方式，單獨前往蘇州，並在老楊家中住了將近兩個月，這段期間的訪談及觀察，是第二筆田野資料的主要來源。

在訪談進行之前，通常我會主動出示介紹信，但是受訪對象並不在意介紹信，他們大多只看我的名片。除了訪談的錄音及筆記之外，我也幾乎逐日撰寫《田野日誌》，記錄我在這段期間的觀察及訪問心得。因此，《田野日誌》也是我在論文寫作上的重要參考及資料引用來源之一。這裡必須說明的是，絕大部分的受訪者出於受訪敏感的理由，婉拒我的錄音要求。

至於受訪對象的聯繫，大致分成三類過程：

第一類，跟團式的參訪：2010 年八月份的第一個禮拜，透過張家銘老師的引介，我參與由日本東京大學園田茂人教授所組成的跨國研究團隊，團隊的學者包含來自日本、台灣、南韓及中國等四國的社會學家在蘇州從事的一項關於蘇州外商投資行為的跨國比較研究計畫。我並未全程出席所有的訪問行程，在園田教授的同意下，我僅參與四家台商的訪談，這四家台灣廠商分佈在蘇州工業園區及昆山，產業則涵蓋光電、食品、機械及磁磚等公司。

第二類，是透過人脈關係的介紹：例如，我在蘇州訪問的第一家 IC 設計公司是我在台灣時，透過台中某家光電廠商的關係而聯繫上的。另外，蘇州某家 IC 設計公司的台籍經理熱心地為我介紹他在蘇州及上海的客戶，使我得以順利展開

對台灣高科技廠商的田野觀察及訪談。再者，如昆山 Y 總也透過他在當地的豐沛人脈關係，帶我拜訪昆山的許多台商及協會的負責人或台籍幹部。最後，對服務於外(台)資的中國籍專業經理人的訪問，大多是老楊透過他的個人關係引見。

第三類，則是自行聯絡：當我抵達蘇州後不久，即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聯絡欲拜訪的廠商及地方政府單位。大型規模的台商拒訪率最高，通常在總機那一關便遭到拒絕。目前台灣的海外高科技公司並不十分歡迎學界的參訪，特別像我這樣的陽春博士研究生，非常不容易接觸到企業內部的台籍經理人，必須透過正確人脈的介紹才有可能見面。其次，我對蘇州民營 IC 設計公司的聯繫，除了成功聯繫一家之外，其餘 IC 設計公司的接觸都遭到拒絕，對方多以經理正在開會為由，要我等候通知。即便過了一、兩天，我再次去電接洽訪問，就再也難以找到對口的對象。至於蘇州市的官方單位及公共研發中心、協會等機構的聯繫較為順利；但在昆山，恰好是相反的情況，除了清華科技園的中國籍經理接待我之外，其餘的接洽都不順利，甚至昆山光電園區管委會明確地向我表示，他們不接受學術界的參訪。

由於聯繫上的限制，這次蘇州田野調查涵蓋的地理範圍，集中在蘇州工業園區、昆山市及蘇州市區等地。至於蘇州新區及吳江市等地，則因為缺乏管道，未能順利成行。

值得一提的是，老楊有位同事 R 先生，R 先生的上一個公司領導，早期是在美商旭電（蘇州）服務。後來，這位領導離開旭電，輾轉在蘇州自行創業，我對此個案深感興趣。老楊也瞭解此個案對我的重要性，於是他多次委託 R 先生情商該領導出來見面吃飯，我亦以電子郵件多次委託 R 先生幫忙聯絡。經過多次的請託，直到我離開蘇州之前，仍然未能獲得這位領導的同意見面。老楊在事後帶點憤青的口吻向我透露，這些「成功人士」奉行「時間就是金錢」的原則，除非我們找他談生意，讓他有錢賺，否則根本見不到面。此外，老楊另有幾個同事曾經在明基（蘇州）及華碩（蘇州）等台商公司任職，在跳槽之後與老楊在同一家跨國公司共事。老楊多次設法邀請這幾位同事和我見面，但均遭到婉拒，這幾

位同事低調地向老楊表示，明基是一家好公司。除此之外，不願接受訪談。老楊的一位堂妹也和他同一家跨國公司服務，老楊的堂妹擔任現場生產線的領班。我們本欲邀請他的堂妹聊聊在跨國公司的勞動情況，但同樣遭到拒絕。我也聯繫過一位蘇州本地律師，她是某家知名蘇州 IT 台商委任的律師，負責該公司的法律事務。她以和公司簽有保密合同為由，婉拒接受我的拜訪。由此可知，目前要單獨進行田野調查並不容易，除非有特殊的人脈關係，才有可能進入田野場域。即便有關係，例如老楊如此熱心地幫我安排他的熟人朋友，但是這些熟人網絡仍然對台灣來訪的研究者存有防衛，增添了田野調查的困難度。

至於每場訪問的時間，短則約有四十分鐘，最長的訪問將近兩個半小時。受到自費前往蘇州做田野的經費限制，我無法替每位受訪者準備禮物，只能就部分的台商經理，以及若干蘇州的經理和政府幹部，贈送他們一些小禮物，例如書籍、茶葉、書籤等，以為感謝。

#### 第四節 論文章節安排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共分成六章：

第一章是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問題意識、以及研究方法與田野過程說明。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回答蘇州從集體鄉鎮企業的高度成功及隨後的衰落，繼而轉向外向型經濟發展後，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資訊電子業外資逐漸形成產業聚落的社會事實下，大蘇州地區透過哪些制度學習方式，逐漸朝向建構在地的學習型區域，期望進一步實現地方產業升級的發展目標。而在這個地方經濟轉型過程裡，地方政府為了達成經濟轉型的目的，其地方制度是否能與產業的全球分工競爭、技術軌跡發展等因素產生制度接合，以將技術及知識鑲嵌在當地，進而累積其技術學習與創新的能力，這是本論文的核心關懷。

第二章是文獻回顧，分別就全球化與中國發展模式、區域經濟與技術的創新學習，以及中國地方經濟與制度學習的既有文獻，展開回顧與對話。其次，提出本研究分析架構。本研究認為，蘇州的三個經濟轉型階段的地方制度機制，包括地方黨政能人、跨國學習制度及產業後向連鎖的制度追趕，分別相應地促成不同階段的經濟表現：以集體鄉鎮企業為主的蘇南模式、外資聚落化的產業生產結構及可能浮現中的學習型區域。而這三個地方制度機制亦為本研究的解釋變項，他們貫時性地辨明地方經濟行動者，特別是地方政府在不同經濟轉型階段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樣的角色轉變在與外資生產模式的互動過程中如何限制了蘇州地方技術體制的技術學習能力。

在第三章裡，我要說明蘇州在市場轉型階段（1978-1997年）中的生產體制的演化過程。這個階段的發展特色是地方黨政能人主導集體鄉鎮企業的發展，並透過鄉鎮企業進行農村工業化的過程。鄉鎮企業的生產技術、管銷知識等大多透過上海的國營企業取得，而蘇州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強政府政經體制則在鄉鎮企業發展過程中得到強化，並因為蘇州經濟成長而形成路徑依賴的效應，持續地成為此後地方政府的經濟治理的邏輯慣性。

在第四章裡，我要說明全球在地化的生產體制（1998-2008年），這個階段的發展特色是蘇州大幅度的對外經濟開放，以外商投資做為地方經濟成長的火車頭，此一發展趨勢劇烈地改變了蘇州既有的經濟結構。大蘇州的地方政府運用跨國制度學習的機制，包括個人網絡與制度聯盟等形式提升當地的投資與商業環境，並鎖定資訊電子業的台商作為其建立高科技產業的重要外資合作對象。也因為資訊電子業台商的大舉投資，使得蘇州與全球生產網絡產生高度的經濟鑲嵌。然而，此一階段所造就的經濟表現看似成功，實際上，高科技產業聚落的廠商主體仍以台商等外資為主，本地的民營企業在地方官員政績導向的路徑依賴及台商生產網絡特徵等因素的雙重限制下，並未能積極地參與全球生產網絡的分工體系，以提升本地整體的技術能力。

在第五章裡，我要說明產業升級的生產體制（2009-2010年），這個階段的發展特色是地方政府強調產業後向連鎖的制度追趕。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斷地提倡國內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在第二個階段的經濟結構與其運作模式在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突顯出其體質的脆弱與限制。因此，在極度缺乏人才、技術及知識等資源的蘇州所採取的是產業後向連鎖的制度追趕方式，它們仿效台灣的竹科發展經驗，在產業層面，持續地吸引國外重要的面板及半導體廠商的投資；並且建立若干的公共研發中心作為技術擴散的平台。這些制度追趕的學習機制，迄今為止，仍未見到顯著的成效，特別在面板與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上，仍是由外資及海外科技人才主導的經濟格局，本地的大學、民營企業等行動者並未在此一階段對蘇州的產業升級提供重要的支援。

第六章為結論，總結研究發現、理論的反省、並提出本論文的研究限制，以及對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等。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歷史是一個不斷開展的制度選擇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們沿著特定的方向來重塑並改革社會制度。在最寬廣的意義上，這其實就是一個政治過程，各擁有不同利益的團體，競相要去影響其結果。然而，這些相互競爭的團體間力量的消長，會受到社會中具有說服力的觀念所影響。也就是在這個點上，社會理論在協助人們形成對特定制度的想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不論社會中過去權力競逐的結果為何，社會理論能夠形塑人們對於不同社會制度與社會實踐之間『契合』程度的認知。……社會理論在判定某些制度的組合是否適切這件事情上，便具有很大的影響力。」(Fred Block, 2004: 64)

本章從三個面向展開文獻回顧，包括全球化與中國發展模式、中國地方政府與制度學習、區域經濟與技術的創新學習等。本研究採取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體制對偶關係的分析策略，指出過去的蘇州台商研究及蘇州經濟研究的不足，在於過去的研究大多偏重單一的因素解釋，亦即若非地方政府，即非台商的分析路徑，並且幾乎都認為蘇州經濟發展是個成功的個案。然而，本研究認為蘇州經濟轉型所出現的「發展，但缺乏技術學習」的經濟後果，是過去研究所嚴重忽略的現象。

### 第一節 全球化與中國發展模式

#### (一) 時機點的聚合

中國對外開放的時機，與經濟全球化的擴張時期有著時間點上的巧合（高柏，2008）。一方面，國際政經趨勢的演變及電腦通訊技術的日新月異等因素驅動著歐美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體制從凱因斯式福利國家演化至熊彼得式競爭國家，由過去強調國家對公共經濟政策的干預及充分就業的國家與市場關係，調整為強調創新及競爭的關係。而促成此一資本主義體制自我再生產的驅動力，來自

於西方生產體制的典範轉移，亦即從一個大量生產、規模經濟及大量消費的福特主義（Fordism）成長模式，以及相關的積累策略典範，轉移到一個以彈性生產、創新、範疇經濟、以及更加快速變化、更強調差異性的消費模式為導向的典範（Jessop，2002）。因此，強調創新與學習的知識經濟或新經濟，成為此後經濟生產體制及國家競爭力、產業競爭的重要因素（Jessop，2002；王振寰，2003）。此外，跨國公司的興起，為了開發新興國家市場與降低生產成本，跨國公司除了展開組織變革，將其部門由垂直整合轉向水平分工之外，也不斷釋出更多的生產部門至後進發展國家以降低生產成本，並透過跨國間的資源整合以尋求高獲利的營運模式。同時，在跨國公司的運籌架構下，一方面造成國家對經濟政策的淡出（hollowing out），為了克服凱因斯式福利國家的經濟危機，要求國家在金融、勞資關係、社會福利等制度上的去管制措施，以活化國家及國際間的經濟資源流動。相對的，為了承接跨國公司釋出的生產部門，若干新興工業化國家，尤其是東亞後進發展國家，及中國大陸，則大多採取工業園區的制度設計以產生聚集經濟的發展模式，用各種租稅優惠、勞動力及土地等政策手段，推動這些區域或地方成為特定新興產業與全球生產網絡產生經濟鑲嵌的空間節點，藉以帶動國家或區域的工業化發展，進而達到總體經濟成長與經濟轉型的國家發展目標。

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立基於加快發展、外部有重要機遇、國際環境基本有利的基礎上而展開。剛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政府與人民發現鄰近東亞國家的生活水準、經濟發展成就顯著高於中國，而這些鄰近國家的一項重要發展經驗即是對外開放，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吸收外資和引進技術，以及發展對外貿易，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提升本國的競爭力。因此，1978 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展開所謂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進程，並且在 1984 年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把對外開放的決定正式確定為「長期的基本國策」（江小涓，2008）。

中共在決定對外開放之後，由於是中共在經濟建設中的一項新事物，沒有前例可循，所以採取試點的方式，利用東南沿海地區接近香港、澳門的特殊地理區

位條件，在 1979 年將深圳、珠海、汕頭及廈門四個城市做為經濟特區的實驗地。這四個經濟特區實行行政特殊政策，在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外匯使用、對外經貿管理體制等方面都享有相對寬鬆的優惠政策，更授與經濟特區相當於省級的經濟管理權限。在 1978 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僅有 206.4 億美元，世界排名第 22 位，占世界貿易比重為 0.8%；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都不到 2000 萬美元。但是經過將近三十年的對外開放之後，2007 年的對外貿易總額高達 2.17 兆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提升到 8%；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分別達到 835 億美元和 187 億美元，分別位居世界的第五位及第十三位。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從 1978 年的 9.75% 上升到 2007 年的 66.6%。以 2007 年數據來看，外商投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佔全國工業增加值的 28%，外商企業的稅收佔全國稅收總額的 20.17%，同時出口佔全國出口總額的 57.1%，中國國內涉外經濟的直接就業人口超過八千萬人，佔了城鎮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Ibid.)。

中國對外開放所取得的快速經濟成長，尤其是加入 WTO 之後，不但更加整合進全球經濟架構 (Lardy, 2002)，同時也逐漸重組東亞雁行經濟結構 (flying geese)，直接挑戰了日本做為雁頭的經濟地位，正如黑田篤郎 (2002: 16) 所言：「中國的登場，使亞洲所謂的『雁行理論』開始崩解，在低成本生產、甚至某種程度的高科技本身都有優勢的中國，正在一步步大展身手。這是因為中國產業高度聚落化，在投資環境上也優於東南亞國協，同時加入 WTO 使外資對中國市場的未來有很高的期許所致。」中國打開進出口市場，並積極展開自由貿易的外交手段，除了與東協國家之外，也與亞太國家已簽署或正在談判最惠國貿易協定，中國的自由貿易外交手段已經對日本產生莫大的壓力；亞洲開發銀行更指出，亞洲區域經濟的高度擴張受惠於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 (Shirk, 2010)。此外，中國吸引海外華人的資金，以及鄰近以華人組成為主的國家及地區的高度投資，也形成了所謂「大中華經濟圈」(Naughton edit., 1997)，尤其是台灣、香港及澳門的投資。

因此，中國對外開放的時機，正好遇上經濟全球化的擴張時期，全球產業分工的變動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內部投資環境的變化，使得中國在繼東南亞國家之後，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外資投資地，並促使東亞國家跨界經濟治理結構的形成(王振寰，1997)，並讓這些對外投資後起者國家的企業有了跨國企業治理經驗以及開創品牌的機會(瞿宛文、Amsden，2003；瞿宛文，2006；王振寰，2011)。然而，中國政經體制與其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為何？以及此一制度關係形構成出哪些經濟後果？則是值得進一步細究。

## (二) 中國政經體制與工業化策略

中國以規模龐大的人口、土地優勢，及各項優惠政策，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資，促成中國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工廠」。對於中國的發展模式及其應當採取何種發展模式持續參與世界經濟體系的運作，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加以說明。

首先，是林毅夫等學者(2000、2003、2009)主張中國應該採取在漸進式改革的主軸上，展開「比較利益優勢」的方式，一方面加速農村工業化及國有企業改革，另一方面則以比較利益優勢，吸引國外的技術及資金，提升國內的技術生產水準，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及競爭。林毅夫等人(2000)認為中國傳統經濟體制的邏輯起點是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化優先發展策略的選擇，但在一個經濟發展水準低、資本極為稀缺的經濟體中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必須人為地壓低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藉此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趕超戰略是一種扭曲生產要素及產品價格的制度安排。改革開放之後，為了持續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林毅夫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資金相對稀缺、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只有依靠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產業，利用勞動力相對豐富的優勢，多採用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技術及產業，才能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競爭能力，進而增

加社會剩餘及加速資金的積累，提升資源稟賦的結構。隨著資源稟賦的改變，不斷引進技術，以從事技術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林毅夫及姚洋（2003）並以比較利益優勢的觀點，解釋中國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性結果。在計畫經濟期間，為了戰爭所做的準備前提下，中共將國家資源大量投注於中部和西部（三線建設），此一時期所成立的工廠大多為重工業領域。相對的，沿海省分擁有較多輕工業的產業結構，加上具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市場資訊等要素稟賦，從而在吸引外商投資時處於較有利的地位。正是沿海省分輕工業化的產業結構更符合中國的比較利益優勢，使得沿海地區在技術散播上，更容易往農村擴散。隨後，林毅夫及王燕（2009）指出，中國的改革歷程在與世界貿易一體化的過程中，是由於中國採取了「比較優勢戰略」，並且此一戰略符合「發展是一個學習和創新的過程邏輯」；換句話說，「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試驗模式，是中國進行制度學習的主要方式，同時在引進外資及加入國際貿易組織（特別是 WTO）後，勞動力密集型的民營部門藉由與外資的配套生產過程，累積了大量的人力資本。因此，他們強調的學習，是指應該被用來幫助一個國家專攻符合其比較優勢的產業，使其不僅能和不同稟賦結構的國家展開貿易，也能和稟賦結構類似的國家發生經濟往來。

另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2009）對中國工業化的觀點與林毅夫不同，他並不完全反對中國採取比較利益優勢的經濟發展策略，但是他更強調減少政府對經濟領域的干預，讓市場發揮效率，以實現資源的最佳化配置。這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吳敬璉認為目前中國的政經制度環境仍然高度保留著傳統經濟體制的遺產：首先，將數量的擴張作為主要目標的舊思想和老做法沒有徹底改變，亦即將 GDP 的高增長和物質生產領域產值的增長速度做為趕超發達國家，並且不惜一切代價的國家發展目標，同時把增長速度視為衡量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政績。其次，各級政府繼續保持著過多的資源配置權力和對企業微觀經濟決策的干預權力。例如，土地、礦藏、貸款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仍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各級政府官員手中，或是受黨政領導決策的影響，在這種政治體制下，誘使各級政府官員運用和支配資源的權力來實現自己政績的目標。第三，財政體制的缺

陷使得各級政府官員有動力和能力進行過度投資營建「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這是因為中央政府將財政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而後者都要積極取得更多的收入來填補日益增大的支出，包括改變城市面貌的形象工程及重化工業的政績工程等。最後，要素價格的嚴重扭曲則鼓勵高資源投入、低經濟效率項目的擴張。土地、礦藏、淡水、能源、資金、勞動、外匯等價格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導致主管機關在支持產業發展的名義下，給予這些生產要素偏低的價格，人為地壓低了外部成本，鼓勵緊缺資源的浪費及實際效益很差的產業擴張。

其他的研究及報告也支持吳敬璉的觀察。首先，就生產的缺乏效率而言，例如中國要生產一美元的 GDP，其使用能源要比世界平均值多出三倍，比美國多出四倍，比日本多出八倍（Hutton，2009）。其次，就近年來中國房地產的投機需求之所以如此的龐大且持久，謝國忠（2011）認為這是擁有強大行政權的地方政府在背後支持。地方政府將放款熱轉化為房地產價格上升的力量，是來自於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體系，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是以國內生產毛額和財政收入兩項標準評定；前者可以偽造，而後者卻要落實在銀行帳戶上，因而造成地方政府供給大量土地給開發商，然後從房地產交易及開發商利潤中徵稅的現象。最後，胡鞍鋼及鄢一龍（2010）指出，阻礙中國科學發展的最大障礙來自於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GDP 掛帥」情結。他們以十一五規劃為例，在十一五規劃期間各地區制訂的 GDP 增長率平均值為 10.1%，嚴重超出全國的 GDP 增長率 7.5%，而地市級平均值達到 13.1%，縣級平均值達到了 14.2%。形成這種層層加碼的「GDP 掛帥」情結，在於地方政府黨政官員不僅關心 GDP，更要關心排名，這不但對個別黨政官員幹部形成巨大的政治壓力，也與個人的政績掛勾，遂不得不「GDP 掛帥」。

因此，吳敬璉（2009）指出中國必須改變現行的經濟增長模式，包括通過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及發展電子通訊技術等，以提升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效率。與林毅夫觀點差異的地方在於，吳強調利用大量農村豐富的勞動力從相對低效率的農業向相對高效率的城市非農產業轉移的機會，提高國民經

濟的整體效率。而要實現這種經濟效率，關鍵則在於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亦即，讓市場取代政府以發揮其功能。

但是，體制改革並非易事，制度的路徑依賴往往使得個別行動者鑲嵌在社會化的結構中。Shirk（1993）從中國政治決策的制度結構觀點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她指出毛澤東之後的接班人華國鋒以重工業發展策略做為政策主軸，以政策利益拉攏中央重工業部門的政治支持，但是鄧小平為了突破以華為首的利益集團的封鎖，主張把中央決策的權力下放地方<sup>1</sup>，並以輕工業、農業部門為優先發展，爭取地方政府及輕工業部門對他的支持。換句話說，鄧小平的改革決策是迫於中國政治決策制度結構下的選擇<sup>2</sup>。Shirk欲強調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的利益集團參與改革決策過程的重要性，由於改革的基礎是建立在與這些利益集團進行妥協上，於是改革的進程表現出漸進性。這一過程的好處是，由於各種利益集團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地獲取利益，改革政策遂得到他們的支持。相對的，卻造成各項解決改革問題方案的延遲，導致了若干重大制度問題的積重難返。而中國在傳統條塊政經結構之中的中央與地方分權的後果，則是深化中國的「M型經濟模式」（錢穎一、許成鋼，1997）。「M型經濟模式」指出中國的「塊中有塊」的內部行政經濟結構，例如廣東省本身就是中國M型結構裡的一「塊」，但省政府之下仍有地、市、鄉、鎮、村等「塊塊」，每一「塊塊」又都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M型經濟模式」固然有利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試點實驗，也不至於造成蘇聯、東歐在改革開放後的大崩解情勢，然而中國此一政經結構特色則是形成地方保護主義及諸侯經濟的格局。因此，中國政府並非一個完整的實體，而是由許多擁有不同程度自主權的機構所組成，在這種分利結構的制度設計下，官僚部門在決策過程中基於自利及本位主義，便會以追求預算與組織規模的極大化為目標，王信賢（2006）稱此為「自利官僚競爭模式<sup>3</sup>」。

---

<sup>1</sup> 中國歷次放權讓利政策的過程及其後果的討論，請參見吳國光、鄭永年（1995）、王紹光（1997）等。

<sup>2</sup> 關於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討論，請參見鄒讜（2000）、劉雅靈（2007）等。

<sup>3</sup> 關於中共政治菁英、政治制度設計與決策的分析，請參見寇健文（2005）、徐斯儉、吳玉山主

### （三）後發劣勢與後發優勢

以 Gerschenkron (1946) 的觀點來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以及在中國的黨政體制現實條件下，中國的「後進性」在推動產業發展上理應具備著「後發優勢」。由於後進國家缺乏資本，但期望能快速追趕上發達國家的技術水準以免受制於人，因此需要強而有力的組織介入以集中有限的資本，投入發達國家已發展成熟的產業中，縮短彼此的技術差距。然而，越是晚期投入的後進國家，所將遭遇的挑戰及困難更多，銀行已不足以承擔資本集中的任務，必須由國家介入，同時控制和集中資本，以調節和指導該國的產業發展方向。

然而，楊小凱提出「後發劣勢」的觀點。他指出，後進國家由於處於落後的地點，因此可以藉由模仿的方式追趕發達國家，其中模仿技術和工業化模式比較容易，但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為改革制度會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後進國家傾向模仿技術，在短期之內，技術模仿會取得成功，但這種短期成功恰好是對「對後起者的詛咒」，它用技術模仿取代制度改革將產生很高的長期代價，留下許多的隱患。譬如，政府壟斷銀行業、保險業、汽車製造業、電信業，並且用模仿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管理方法替代了制度改革，這就是中國的後發劣勢，其主要弊病不在於國有企業效率低，而是把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國家「球員兼裁判」的後果，即是發展成一種壞的資本主義，產生官商勾結、政治壟斷及收入分配不公等現象。楊小凱主張中國應該學習台灣自由化的經驗，即是不歧視私人企業（徐斯儉，2004；吳曉波，2008 下）。林毅夫則反對楊小凱認為後進國家必須先進行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改革之後，才進行技術改革，例如新加坡及威權時代的台灣一樣能取得快速經濟成長的成果；此外，後進國家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共和憲政改革，未必都是好的，例如台灣在政治民主化後，經濟並未發展得更好。因此，林毅夫主張「技術創新」是一個國家長期發展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他認為

---

編（2007）及陳德昇主編（2008a）等。

許多後進國家，無論是市場經濟或由計畫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都會出現尋租、軟預算、裙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不公及宏觀經濟不穩定等問題，以及各種制度扭曲的「後發劣勢」。後進國家要克服這些後發劣勢，林毅夫同樣從比較利益的觀點指出，要建立一種最具有競爭力的要素稟賦結構，以引進技術與知識，發揚後發優勢，而上層建築也必須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動而發展。

楊、林兩人的這場針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辯論，並沒有太大的矛盾之處，反而突顯出中國社會對國家發展的不同願景想像。楊小凱追求的是一種「好的資本主義發展」，社會整體的公平、平衡與健康才是重要的；林毅夫追求的是「後進國家在較短的時間內超趕先進國家」。但是，若按照林毅夫的邏輯，在必要的時候，為了經濟成長速度，是否可以犧牲一些其他的價值（徐斯儉，2004）？這場對話，鮮明地挑出了中國社會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同期望與想像。正如徐斯儉（2004：14）所言，「這樣一種對話，如果牽涉到的是對不同的最終價值做出選擇，這樣的對話已經很難就表面上的邏輯判斷是非。」

本節立意在於從宏觀的角度，彰顯中國經濟之出現於全球經濟舞台的角色，及其彼此之間相互在總體經濟結構上的牽動，以及中國政經體制的獨特性。然而，上述這些研究未能突顯出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來自於地方政府經濟角色與外資的投資，及雙方在形塑產業體系的地方性資產所做出的制度設計。因此，以下的段落仍然緊扣著「全球—在地」的軸線，說明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以及區域經濟與產業體系的社會制度關係。

## 第二節 中國地方政府與制度學習

### （一）地方政府角色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地方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第一節所述，在中國獨特的歷史脈絡、行政層級制度設計、分權讓利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背景下，

「M型經濟模式」(錢穎一、許成鋼, 1997) 成為中國政經體制的重要制度特徵, 同時也彰顯出產權制度以外的另類解釋路徑可能性。費孝通(1994) 認為中國的地方鄉鎮企業發展, 除了是內發產生的, 同時也具有「因地制宜, 多種模式」的制度特徵。Tsai (蔡欣怡) 對中國地方非正式金融業的研究, 也指出這樣的制度特徵: 「承認多種政治經濟模式在基層並存, 並專注於這種多樣性是如何出現的會更有成果」(Tsai, 2007: 314)。即便中國沿海城市已經完成相當程度的經濟轉型, 在實現鄉鎮企業的農村工業化之後, 率多走向所謂的外向型經濟的地方工業化發展路徑, 但此一制度特徵並未有明顯的改變。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如何角力與呈現, 以及這一制度變遷如何推動地方經濟成長, 對此一部份的論證進行回顧, 將有助於掌握蘇州經濟轉型的歷史脈絡及變遷的主要制度因素。

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中國, 新古典經濟學意義下的「市場」交換功能幾乎完全被國家取消, 以致於國家與社會成為一體的兩面。國家透過城市的單位組織(如國營企業), 和農村人民公社制度來管理群眾的生活, 生活物資的供應通過這些單位組織進行再分配。此種再分配的機制, 也與等級制產生掛勾, 例如城市的工資制度和農村的工分制度, 並與身份體系與庇護關係構成當時社會分層的主要制度特徵。國家控制社會的手段是由政黨從上至下, 經過層層科層組織, 抵達到底層的結構, 甚至滲透到家庭之內。因此, 在這種社會分層體制裡, 政治權力菁英壟斷著各項經濟資源的分配。進入改革開放之後, 市場化的力量逐漸改變原有社會分層的結構, 市場經濟的出現究竟能否動搖政治權力菁英對經濟資源的再分配能力? 倪志偉 (Victor Nee, 1989) 從這個角度切入對中國市場轉型的研究, 開啟此後十多年的學術辯論。倪志偉指出, 國家社會主義中的再分配經濟體系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結果, 其對資源控制的權力基礎將有利於直接生產者(企業主), 相對不利於再分配者(黨政官僚幹部), 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裡, 生產者所創造的利潤不再由再分配機構所佔有, 而是可以通過市場直接由生產者所佔有與享用。換句話說, 市場將取代再分配權力, 幹部及官僚的權力將逐漸淡出, 形成市

場專業和政府權力分立的局面。同時，權力基礎的變化也反映在市場刺激和市場機會的共同作用下，權力資本的經濟回報降低，而人力資本的經濟回報上升；這種變化是因為市場認同績效而和報酬掛勾，績效的大小又與人力資本的優劣息息相關。但是，倪志偉的市場轉型論，遭到後續研究者的質疑及挑戰。他本人在 1991 年提出「部分改革」(partial reform) 的觀點以修正先前的論點，並且承認幹部的權力和資源並未隨著市場制度的日漸發展而減弱<sup>4</sup>。

戴慕珍 (Jean C. Oi, 1992、1999) 提出「地方國家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 的觀點，她認為政治再分配權力在中國制度轉型的過程中，被下放到地方政府層級的官員手中，在這個過程裡，並未出現政府官員權力的削弱或轉移到企業家及普通人民身上。在農村，地方政府與地方企業之間產生一種互相依賴的關係。在 1980 年代，中央財政權的下放，為地方政府追求地方經濟利益提供了直接的誘因，它們通過財稅包乾合同、為集體企業提供生產和行政服務等控制及激勵的手段，直接領導地方經濟的發展，同時在其行政管轄範圍內繼續實施某種程度的再分配。到了 1990 年代，由於市場已經是地方經濟的一個關鍵部分，但地方政府持續進行協調與干預。農村企業所用的大部分物資是通過市場取得，支付能力雖屬必要，但有支付能力並不意味著就能把它們弄到手。因為地方官員承擔做為企業家的新角色，有選擇分配稀缺資源以形成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行政權力。而且，工業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就越能以一個公司的方式對收入進行干預、提取與再分配。戴慕珍認為，正是實行經濟改革和追求發展，加強而非削弱地方官員權力的潛在力量。

Walder (1995) 也認為政府並沒有在市場改革過程中淡出，相反地，他們正以廠商 (firm) 的角色從事經營以參與市場活動，並通過權力運作來影響市場的發展。並且，級別低的縣鄉政府比級別高的省市政府因遠離中央權力，更有充分的物資誘惑力成為廠商。因此，Walder 認為政府的權力不可能退出市場，反而

---

<sup>4</sup> 吳敬璠 (2009) 則直指這種現象為「權貴資本主義」。

在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皆能得到控制的權力<sup>5</sup>。發展型地方主義（developmental localism），可謂是這種政治體制的直接後果。發展型地方主義借用了發展型國家的觀點，指出地方政府具有發展能力，尤其是以經濟發展作為基本取向；其次，強調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利益的自主性，因而造成地方的發展是以地方利益為導向<sup>6</sup>（吳國光、鄭永年，1995）。

Zhou（周雪光，2000）提出市場—政治互動演化模型觀點（a market-politics coevolution model），他認為政治與市場不僅只是對立而已，兩者融合的餘地很大。兩者是在衝突的過程中促使對方的演變。國家在設定市場所運作的制度性規則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一方面，市場的擴張並不是一個自我演化的過程（a self-evolving process），而是受到社會背景和歷史變遷進程所制約；另一個方面，國家總是積極地根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來主動影響市場，而不是被動地接受。支配國家和市場互生的機制有三個：首先，已有的再分配經濟制度和新興的市場制度之間的競爭，這是市場轉型理論已闡述過的；其次，政治競技場裏的利益爭鬥：任何經濟制度上的變化都取決於政治競技場中的利益分配，相對那些伴隨著市場出現的新利益而言，已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既定利益也得到了相當的回報，不止包括政治權威、政策制定和實施權力的獲得，也包括保護和發展他們利益的組織能力（organizing capacity）的提高；最後，在這個互動演化模型中，國家的角色處於中心位置：包括市場在內的經濟行動是在政治權威所設定的框架之內運作的。儘管從市場制度邏輯出發，市場制度的比較性優勢將促使國家和國家政策傾向於市場制度，以及與之相聯的利益，並最終為後者所掌控。

除了從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探討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變遷，另一支的觀點則是從財產權（產權）的角度切入，而此一解釋路徑深受制度經濟學派的影響。North 和 Thomas（1973）、North（1981）對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史的研究指出，有效率

---

<sup>5</sup> 相關的論述，請參見邊燕杰編（2002）。

<sup>6</sup> 王紹光與胡鞍綱（1994）也引用發展型國家的觀點解釋中國政府的發展性格，但其著眼的分析單位是中央政府在財政稅收的汲取能力，而非地方政府層級。他們擔心由於地方主義的發展導致中央政府權威的衰微，進而導致國家的分崩離析。相關的辯論，請參見王紹光與胡鞍綱（1994）、吳國光編（1994）。

的組織才是長期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為有效率的組織能建構出有利於經濟成長的制度和財產權，並且在條件改變時，能順利地造成制度的調整。政府在協調公私利益的差距時能發揮財產權的功能，但一旦政府的強制力量未受到節制，往往又會成為破壞財產權的主因。財產權建立的好處是人們能夠有效率地利用資源與技術。至於如何界定制度？North（1995）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這種規則是人們設定來限制他們的行為互動的約束，包括，交易成本的根源、訊息處理的能力，以及意識型態與主觀心智模型等。影響經濟行為的制度可以從三個面向加以區分，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限制與執行。首先，正式規則包含政治（與司法）規則、經濟規則，以及契約等，它們界定了財產權的結構，反映出政治與經濟的利益交換關係。其次，非正式限制存在於日常生活的習俗、傳統、觀念等社會規範中，其意義在於它影響了制度變遷的過程，是一種路徑依賴的來源，同時在文化發展之中形成的非正式限制，不會受到正式規則改變的影響而立即跟著改變。最後，執行則闡釋了契約的執行與交易成本，以及政府作為執行代理人本身的效用將會影響執行的結果。這三項因素的交互作用將使得制度的演化與組織行為產生學習效果，以及在制度結構中各種限制的自我加強效果，造成制度網絡中的報酬遞增特性，因而出現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

在制度經濟學的影響下，Walder（1997）區分產權與私有化（privatization）之間的區別。他認為鄉鎮企業部門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恰好與私有化目標的邏輯相反：因為地方政府產權極為強固，而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界線也很模糊。中國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在產權的關係，如吳介民（1998）指出的，是一種從人際關係與互惠來建構「虛假產權」（fictive ownership）的非正式私有化（informal privatization），地方官僚體系為地方「假集體」與「假三資」企業提供非正式的政治保護和各種優惠待遇，但中國法律缺乏對產權明確的規定，也為地方官員尋租腐敗的行為提供機會，因此虛假產權發揮了等同資本主義制度下產權保障的功能。另一方面，如珠江三角洲的地方政府與台商「假合資」，在虛假產權的結構之下也出現所謂「同床異夢」的情況（吳介民，1996）。

上述的各種分析路徑圍繞著制度變遷的主軸以討論中國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市場關係，由於中國黨政結構的路徑依賴而使得地方政府成為主導地方經濟的行動者。這些分析路徑共同指出了中國地方經濟的多樣性深受當地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所共同形成的路徑依賴影響，但並未指出這些地方制度的路徑依賴是否持續影響著地方在走上外向型經濟工業化之後，這些地方制度與外資的關係如何形塑出高科技產業體系與經濟轉型的動力。

## (二) 外資與蘇州外向型經濟發展

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於吸引海外的技術、資金及人才等資源來提升國內工業化的速度及程度，對外資提供大量而便宜的原料、土地、勞動力、以及優惠政策等生產要素，中國也終於成為當前全球最重要的生產基地。但是，中國國際化的過程，使其經濟改革的局勢顯得更加複雜，當然也因為外部經濟力量及資源的大量投入，加速其經濟成長的速度與提高工商業的質量。在這個國際化的過程中，連結世界與國內的「渠道代理人」(linkage agents)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於這些代理人在中間透過貨物與服務的跨國流通而增加他們從中尋租與牟利的機會，這種結構性位置促使他們驅使著中國進一步地走向國際化的道路。這些「渠道代理人」包括地方政府領袖、半官方公司、開發區、企業、大學、實驗室、行政科層代理人、海外華人、以及有海外網絡的在地中國人等 (Zweig, 2002)。

由於視FDI為經濟成長的引擎，中共中央允許地方各自進行招商引資以成立經濟開發區及從事進出口業務，中國沿海的城市動員了在地全部的資源，皆是為了追求出口導向的經濟成長及尋找FDI。在中國從事國際化的過程中，建立內部科技能力以強化出口創匯的實力，這是中共所極力實現的項目<sup>7</sup>。中國在改革開

---

<sup>7</sup> 例如，上海的資訊產業在全球化趨勢下日漸在全球產業分工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固然一方面是上海的區位優越，另一方面，若無中共中央的政治決策與相關的制度配合，上海的發展將不可能

放之後，需要進口技術，這是為了加強中國工業的發展，包括進口替代與出口部門。領導人相信，建立中國工業的上游（後向）技術基礎是重要的，因為中國在這方面的基礎非常薄弱。當時有一個廣泛的信念，就是進口技術和使用這些技術以發展科學技術能力，中國就能夠也應該成為一隻「跳蛙」，能超越數個世代的技術並使中國朝高科技產業的現代階段邁進。為了解決生產問題及提高效率，維持長期的成長，政府開始強調技術發展（Wall and Xiangshuo, 1997）。例如，在 80 年代末期，在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的指導下，制訂了幾個技術加強計畫，包括「863 計畫」（1986/3），其目的是追隨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與技術，以及擴大中國在最新領域的基礎研究。「重點任務計畫」的設計則是在科研與經濟結構之間找出重要的技術問題的計畫。「火炬計畫」（1988/8）是一個最廣泛的計畫，而且動員了許多技術人才，其目的在於整合研究成果，特別將其成果導入經濟活動以提升國家經濟活動的生產力，而許多的高科技園區也因為此計畫而成立。「火炬計畫」是指導性計畫，它是為了連結科研成果與商業活動之間的斷層所搭的橋樑。所以，「火炬計畫」的意圖即是為了使技術成果商業化、工業化與國際化。方式有二，一是制度面，「火炬計畫」在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之下成立一個特別辦公室以協調與領導該計畫，並以高科技產業為基礎在全國廣設高科技園區（可分為高科技工業開發區HTIDZs、經濟特區SEZs、經濟技術開發區ETDZs等）。二是政策面，主要是促進高科技發展的各項優惠措施。有意思的是，Wall and Xiangshuo指出，中國自從 1985 年起，其出口項目相對以技術密集為主，但很少能歸類於高科技的出口。在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不必然與高科技的技術應用相關，因為其生產過程中仍以低技術勞工密集、技術是鑲嵌在進口的半成品的製程與組裝而已。中國所生產的產品或許就是高科技產品，但是其組裝過程卻一點也不技術密集導向。值得關注的是，地方政府對特定產業的支持形式與在地政經制度的差異，往往也會影響產業發展的成敗（Segal, 2003）。

然而，為什麼在 1990 年代之後，地方政府如此的需要外資的資金投入，並如此快速（冷則剛 2002）。

高度依賴外資來帶動地方的經濟成長呢？Huang（2005）提出制度基礎論的觀點來解釋這種獨特的現象。他強調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FDI）需求的三種特殊制度特徵：首先，企業的政治性主從次序，它偏重於無效率的國有企業，而以最有效率的私人企業為代價；其次，私人企業的產權，顯著地不受法律保障；最後，中國經濟的條塊分割。中國的這些制度特徵導致各省分及地方對外資的龐大需求，至於中國企業的全面缺乏競爭力狀態，主要是因為缺乏效率的中國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及其政策的執行所造成。

如第一章已指出，蘇州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迅速地成為中國吸收外資成長最快的地方，並且吸引資訊電子業台商<sup>8</sup>與其他外資的大量進駐，在昆山、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及吳江等地區形成完整的產業聚落。劉志彪與張擘（2005a）透過對蘇州與溫州的比較，突顯出這兩個城市國際化的重大差異路徑。他們指出，溫州模式是一種以溫州在地商人為主體，以國際市場為導向，是立足在區域內本土民營企業和傳統製造業的區域國際化模式。相對地，蘇州是以強勢政府主導，以FDI帶動加工出口，透過招商引資來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區域國際化模式。因此，這兩種發展模式在區域空間的重要區別在於產業聚集的主體不同，蘇州是以外資高新技術企業為主體，溫州則是以本土傳統產業的企業為主體。前者由於是外來引進的，發展速度和結構的變動較快，但是鑲嵌性較弱；後者是內生發展的，結構變動慢，但是與本地的鑲嵌性高，發展相對較為穩定。

蘇州在外資加工貿易模式的帶動下，其產業結構出現嚴重的失衡，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首先，是產業結構虛高，升級換代困難，蘇州的出口加工業主要是由外資引入，可以相對不受原有產業結構的約束，加上外資技術較蘇州本地民營企業高，與當地原有的產業結構有較大的差距，因而出現虛高化的現象。其次，產業結構和經濟主體結構的二元化，亦即高新技術產業基本被外資企業把持，而傳統產業則是本地企業的天下，除了外資投資的部門集中在高新技術的勞動密集

---

<sup>8</sup> 台商出現的社會學意義，以及台商在東南亞國家投資的過程與生產網絡結構的討論，請參見蕭新煌、王宏仁及龔宜君主編（2002）及龔宜君（2005）等著作。至於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全球競爭力討論，請參見 Berger and Lester edit.（2005）。

生產環節外，外商獨資形式成為主要的經營型態，使得跨國公司的飛地效應及蘇州產業二元化格局更為突出。第三，則是本地企業與外資企業在技術水準上的二元化，由於本地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嚴重依賴外資的技術，但是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又並不明顯。儘管，有許多跨國公司在蘇州成立研發中心，但是它們通過獨資運作及研發分工的策略，只將輔助性的研發工作放在蘇州，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圍堵了跨國公司在蘇州技術擴散的渠道，因而減少先進技術的溢出。因此，蘇州這種外資加工貿易模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本地產業發展和升級的問題，並且會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其弊端會越形明顯（劉志彪、張擘，2005b）。

台灣資訊電子業有規模的投資蘇州，最明顯，也是最早的個案為明基集團帶領其下游十四家協力廠在 1994-1995 年間的集體投資，雖然明基在蘇州新區設廠，這十四家協力廠商座落在吳江，但由於兩地的地理位置鄰近且中小企業的投資規模有限，因此後者選擇在吳江投資，為明基提供零組件的協力生產（吳翰有，2001；張家銘，2006）。此一明基協力生產網絡個案研究的意義在於指出，台灣電腦廠商在台灣所建構的生產網絡在蘇州異地重組及再生產的過程中，社會鑲嵌機制扮演了穩定系統廠與協力廠之間的經濟交易功能。而台灣資訊電子業廠商在此後的大規模投資蘇州，除了傳統上對生產成本的尋求資源替代因素外，更多的研究指出，鑲嵌在全球生產網絡的台灣資訊電子業廠商是在國際領導廠商逐漸重視中國市場及各種電腦產品走向低價趨勢的引導下，不得不進駐中國（楊友仁、夏鑄九，2004；楊友仁，2005；張家銘，2006）。這股由全球生產網絡的領導廠商所驅動的生產網絡遷移，目前最新的情況是由惠普（HP）帶動台商前往中國內陸省分，如重慶及成都等城市成立生產基地。

這些台灣 IT 廠商在蘇州的特定地理區域（大多座落在各經濟開發區）所形成的聚集，加上原本在台灣建立的信任機制，能大幅減少在異地生產的交易成本及投機主義。由於是在華人國家投資，許多研究也從文化的觀點，指出台灣 IT 廠商的在地化策略及做為跨國公司的中介經濟行動者角色會蒙受文化因素的利益，甚至這種文化優勢為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與南韓等國家所難以企及

(張家銘, 2008; 耿曙、林瑞華, 2008)。張家銘(2008)從外派幹部使用中文的能力來說明跨國外派幹部在地化的程度, 台商幹部熟悉中文, 有助於他們主動接觸地方官員與當地員工, 因此在地化的意願較強、程度也較深。在地化意願最弱且程度最淺的是日本企業的外派幹部, 日籍幹部大多透過翻譯與中國籍員工溝通; 南韓籍企業的外派幹部則有較強的學習中文意願, 並且希望能與當地中國員工建立非正式的社會互動, 以有利於企業的經營與管理, 大型韓籍公司通常會提供中文課程, 因此外派人員在母國已接受過一段時間的語言培訓。但是, 耿曙、林瑞華(2008)卻指出, 台灣及南韓的企業儘管在地化的程度受到語言因素有所差異, 但是兩者的幹部並未融入當地社會, 更多的經濟行動仍是著演於經濟利益的獲取。即使韓商攜家帶眷進駐中國, 但傾向住在韓人社區, 屬於文化「飛地」, 正因如此的封閉與排他, 韓籍幹部非但未融入當地, 還偶見文化衝突。台籍幹部在中國的情況亦屬於低程度的融入, 因為其日常接觸的仍多為台灣飲食、台灣新聞與台灣朋友等。在中國的台籍專業工作者, 都呈現頻繁地來回跨界移動, 並透過運用兩地的物質性與社會性資源, 以及跨地域的社會網絡, 編織出多重地域連結, 他們刻意強調持續性的社會慣行、象徵體系與物質文化面的跨界實質聯繫, 鄧建邦(2009)認為這群在中國的台籍專業工作者既不是世界主義觀點下的無疆界菁英, 也不是離散觀點下無處為家的離散者, 而是持續性回家的跨境遷徙者。但在台商製造業的中層台籍幹部, 則可能是處於另一種生活世界, 一般認為跨國企業所謂的在地化經營政策, 亦即晉用本地員工為管理階層, 在昆山的台商製造業企業為了節省外派台籍幹部的成本, 以及增加當地員工的向心力, 已經不斷降低台籍幹部的人數與薪資待遇, 台幹與陸幹的薪資水準也有逐漸拉平的傾向(謝蘇祥, 2007)。

從文化面的觀點瞭解台灣企業外派到蘇州或中國其他城市工作的幹部的文化資本, 及其如何與當地社會融合的在地化過程, 有助於我們理解台籍幹部的認同意識及生活慣行與母國的社會連帶關係。但是, 這樣的集體認同意識在中國與台灣, 乃至全球性的技術及經濟競爭中, 一來這樣的文化性身份認同能否與經濟

利益持續地產生抗衡，以維持住跨國廠商在蘇州的經濟利益及技術優勢，以及這樣的文化性身份認同在兩岸持續而密集的交流下，究竟將強化或弱化了這樣的認同，則是需要進一步回答的。此外，亞太營運中心的夭折，也促使台灣喪失了做為歐美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中介者角色先機，文化及語言的優勢也未必是台商與其他國家的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展開市場競爭的必然優勢。

數量及投資金額龐大的外資，確實促進了地方經濟成長，但就蘇州而言，也為其帶來經濟結構的發展限制。此外，外資外派幹部由於文化、語言、生活慣習等因素的差異，也與地方呈現出疏離的社會連帶關係。這些外資大多聚集在特定的空間地理進行生產，與生產相關的技術、知識及管理等均與當地社會關係產生隔離。

### （三）地方制度學習與高科技產業聚落

一個後進發展區域要承接全球生產網絡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必然要透過制度學習的方式去建立一套適合外資形成產業聚落，以有利於其生產及出口的制度，然後增加當地的就業機會、相關服務業的興起、土地開發的利潤及外資投資與出口所課徵的稅收等來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刺激地方經濟的成長。相較於東亞後進發展國家由國家機器動員政策、經濟及社會資源來籌建科學園區及加工出口區的方式不同（如台灣），蘇州是由地方政府進行經濟開發區的開發，以及完備開發區內外的硬體基礎設施，兼之採取親商態度及優惠政策等軟性制度來吸引外資的投資。大蘇州地區最早進行開發區建設的地方是昆山，自 1985 年以工業小區的自費開發模式，吸引上海及西部省分的國營企業到昆山設立分廠開始。由於昆山鄰近上海，上海在 1990 年開發浦東新區時，並不想吸收中小企業台商，加上這些台商大多以製造業為主，因此在昆山政府的主動出擊下，許多中小企業台商便陸續前往昆山投資。隨後，有更多的 IT 產業台資及外資分別在昆山、蘇州新區、蘇州工業園區及吳江等地設廠，各自形成產業聚落。

昆山為了改變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率先採取自費的方式從事經濟開發區的建設，並在昆山黨政能人的主導及政策遊說下，在 2000 年成立出口加工區（張樹成，2009；鍾永一、張樹成，2009）。昆山對外開放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搶得先機和鄰近上海、蘇州的區位優勢，除了在硬體的基礎設施努力完善之外，也建立起商檢、海關、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及其他生活娛樂設施等，並積極改善行政部門的效率，為外商打造最佳的辦事環境，實行所謂「小行政、大服務、多公司」的管理模式與運行機制，例如「一個門受理、一座樓辦事、一個窗收費、一條龍服務，並且堅持「親商、安商、富商」的理念，提升外資服務的效率及品質（張樹成，2009）。而昆山能成就「昆山模式」與台商投資有密切關係（盛九元，2009）。1990 年代之後，昆山的「主攻台資」戰略，不斷透過「以台引台」的方式，吸引台資企業在昆山形成資訊電子、精密機械及化工等產業，其中筆記型電腦及其他電子產品的生產與出口，是昆山最突出的產業。而整個大蘇州地區在 IT 產業的經濟成就，Wang and Lee（2007）指出，這相當程度是「昆山模式」的擴散所造就，1990 年代之後，台灣 IT 廠商在全球生產網絡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 OEM 及 ODM 角色，而當這群 IT 台商在國際領導廠商的驅動下，以及昆山政府主動招商的制度與時間點的接合下，昆山積極地以開發區、優惠政策、親商等軟硬體建設滿足 IT 台商的營運需求，同時後者為了強化其本身在全球生產網絡的競爭力，也傳播與灌輸相關的台灣制度給昆山政府，以增進昆山整體 IT 產業的全球運籌能力，特別是在海關與出口加工區的成立上（柏蘭芝、潘毅，2003）。這套由昆山與 IT 台商共同形成的地方產業經濟發展模式，迅速地擴散給大蘇州地區的其他經濟開發區，成為其借鑑與學習的對象。

除了台灣的開發區及海關經驗通過台商的轉介在昆山及蘇州擴散之外，另一個制度學習的管道則來自於新加坡。1994 年，新加坡政府與中國政府共同在蘇州成立蘇州工業園區的前身—新加坡工業園區，試圖引進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經驗，其中親商觀念、社會公積金制度及產住混合的開發區設計等被引進到新加坡工業園區（潘云官、周志方主編，1999；廖順賢，2001；Ross，2010）。因此，

為了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大蘇州的地方政府與大批外資的政企關係遂成為一個研究的課題。耿曙、陳振偉（2005）及陳振偉（2005）認為昆山政府與當地的台資企業的互動模式是一種「合作夥伴關係」，這種關係的形成，台商協會扮演了重要的政策遊說角色。張家銘、江聖哲（2009）指出除了私人性的社會資本做為台商與地方官員之間的社會連帶之外，他們提出制度性連結的觀點，包括建立顧問制度、設置公關位置或部門、加入民間組織（如台商協會、工商聯組織等）、以及擔任政府組織的相關職位，作為政企關係這一支觀點的補充，並認為這是台商與地方政府產生制度鑲嵌的重要機制。

在經濟區域主義的影響下，大蘇州的各經濟開發區之間充滿著競爭（呂爾浩，2001；廖順賢，2001），爭相「敢為天下先」，例如昆山即不斷地要保持其「蘇州領跑」的區域內經濟領先地位（張樹成，2009）。然而，在大規模的進行開發區建設，並將開發區建設與地方官員招商引資的政績掛勾的同時，這意味著需要徵用更多的農地，並將之變更為工業用地，以持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動力。這個地方發展的經濟治理邏輯，不僅仰賴著高風險的土地開發與留住跨國資本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也將造成農地流失、農民利益損失及其他的社會經濟問題（楊友仁、王鴻楷、郭健倫，2004；郭健倫，2005）。至此可知，蘇州經濟轉型的外部動力來自於吸引大量外資的出口導向（劉雅靈，2003），但期望蘇州在資訊電子業的大量投資及聚集下，從「蘇南模式」進階到明日矽谷（呂爾浩，2003），若從以上的回顧來看，這是一個需要保留及商榷的看法。

資訊電子業台商在對蘇州投資的過程中，不僅建立起當地的高科技產業聚落，並且也累積了跨界組織治理的能力。在「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的分工模式下，大蘇州政府塑造有利於 IT 台商的營運環境，使得台商設立於大蘇州地區的分支部門功能逐漸趨於完整，並且也改變了北台灣與大蘇州的空間分工。同時，在 IT 台商本身的競爭優勢與大蘇州政府的共同合作下，一方面強化了台灣代工廠商與品牌大廠之間的策略性合作，另一方面則將促使台灣 IT 廠商有可能突破其在全球商品鍊中的結構性分工位置（楊友仁、夏鑄九，2004；楊友仁，2005）。

而台灣資通產業在與台灣國家機器進行空間尺度角力時，政治上的「國族民粹」計畫與經濟上的「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之間相互抵觸，反而加速台灣資通廠商對台灣的去鑲嵌，但日漸高度鑲嵌於中國領土之內（王振寰，2007b），而這些重要的台灣資通廠商大多集中在大蘇州地區進行投資。

Chien and Ho（2011）從跨國學習路徑（transnational learning process）的觀點，指出中國地方政府利用政策創新的方式，提升當地的商業環境以吸引外資的投資。有三種不同但互相關連的跨國制度學習機制出現在長江三角洲，第一種是個人網絡機制（personal networks），是由地方官員與熟悉全球生產網絡的國際商業標準的外資投資者所建立的個人網絡。此機制依賴於非正式的個人關係與網絡，彼此的關係基礎建立在人際信任上；第二種是制度聯盟機制（institutional alliances），亦即地方官員與外國政府的結合，共同投資開發區與利益共享。這是一種正式的，且是契約式與結構式的合作，在制度、地方或中央政府及廠商之間從事知識的移轉，彼此的關係宛如股東（stakeholders）；最後一種，則是支配論述機制（hegemonic discourse），亦即地方官員與具有必要發展知識（essential development knowledge）外國顧問的互動所帶來的知識移轉，這種知識移轉源自於制度、廠商及顧問的重要最佳實踐和國際間共通的標準之上。以上這三種不同的學習機制，分別對應昆山、蘇州及上海。他們認為當全球生產網絡在中國建立之後，地方官員及其他行動者將會開始去影響網絡的形構與佈局，而地方官員積極介入全球生產網絡的角色，並採取跨國政策學習的機制將有助於地方幹部的地方正當性，而這能讓他們具有更好的能力來與全球化交手。

這些研究指出了大蘇州地區的地方政府透過各種制度學習的方式，建立及持續地改善著當地的投資與商業環境，以吸引高科技產業台資的大規模投資，並形成了蘇州的高科技產業聚落的過程，以及地方官員與外資之間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關係如何提升大蘇州的區域競爭優勢。然而，即至 2010 年為止，蘇州的各項官方報告依然明顯表示，蘇州的高科技產業的生產技術依然高度集中在加工貿易的出口導向模式，產業升級的速度緩慢，同時高科技產業至今幾乎為外資壟斷。

相對的，本地民營企業在高科技產業的表現仍舊低迷不振。在 PC、筆記型電腦、手機等資通產業之外，蘇州也正積極的往面板與半導體產業發展，但這幾個新興策略性工業的扶植方式，依然採取招商引資的模式進行。換言之，以上的研究並未說明，為什麼蘇州的經濟轉型路徑呈現著高度路徑依賴，以及技術學習創新難以落實在地方的原因。

### 第三節 區域經濟與技術的創新學習

自 1980 年代起，在全球的生產模式及經濟結構劇烈變化的趨勢下，尤其受到資訊電子業的全球產業分工影響下，區域的經濟競爭力逐漸成為一項備受探討的課題。在一個特定的地理空間裡，廠商的生產方式及其在技術上的學習及創新活動需要透過哪些社會制度基礎的支持，以及知識對區域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性等，不斷在這些討論中獲得重視。而這些觀點有助於理解蘇州如何從一個鄉鎮企業的发源地，逐漸轉型為全球資訊電子業生產重鎮的過程及其地方產業體系的制度特徵。

#### （一）區域經濟與產業體系

發展型國家從國家機器的能力（state capacity）與自主性（state autonomy）這組分析架構，分析國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尤其聚焦於日本及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研究（Amsden，1989；Deyo，1987；Evans，1995；Gold，1986；Haggard，1990；Johnson，1982；Wade，1990；Weiss and Hobson，1995；White，1988；Woo-Cumings，1999；羅金義、王章偉編，1997）。姑且不論這些發展型國家本身在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是否退位，在全球化與國家機器的辯證關係中，對在地制度的重新審視（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Weiss，2003）以瞭解國家機器在對全球化開放的過程中，國家是否能夠在與全球經濟高度互動

之中，持續的創造財富與提供社會保護，以及國家是否必須在這個過程中放棄它們某些獨特的制度或擁抱競爭性的規範、制度及政策等。因此，回歸到地方制度的討論，可視為發展型國家這組分析架構對本研究所帶來的啟示。國家機器並非鐵板一塊，它在扶植特定新興產業的興起，並透過產業政策以強化其國際競爭力時，在不同的產業發展階段裡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陳東升，2003、2008），而在面對個別的新興產業發展時，國家機器也展現出不同的鑲嵌樣貌（王振寰，2011）。

然而，當資金、資訊、技術及人才等不斷地進行跨國流動，以及跨國公司持續地將其生產部門委外，尋找生產成本較低的海外地區為其從事加工生產或研發業務，乃至運籌管理等業務時，不僅逐漸產生全球商品鍊或全球生產網絡的全球性產業分工制度，並且促使某個區域經濟的崛起，甚至該區域可能因此建構具有高度國際競爭力的學習型區域。當全球商品鍊或全球生產網絡已經成為全球與地方之間產生經濟鑲嵌的社會事實時，國家機器在某種程度上淡出（hollowing out）產業，轉而由區域及地方（政府）繼承起經濟競爭的角色。

隨著資訊電子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Castells(1989)提出「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的概念，認為全球經濟社會體系將成為一個網絡狀的組織，每一個地點的優勢多由其所在的網絡位置所決定，而非其內在的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因此Castells認為在全球的尺度上，支配性的組織邏輯將是流動的，至於傳統在地的空間組織將屈服於這一支配性的流動力量，形成全球網絡中失落或接軌的一環，進而決定其發展機會。Storper(1997)質疑流動空間的概念，他認為地方社會既有的組織與制度安排（包括社會資本與慣息，與成員間交易的網絡等）所共同形成的「非貿易性互賴」(untraded interdependency)才是在地社會在全球競爭中動態優勢的來源，全球化的網絡與流動空間，必須藉由地方空間的實踐與接軌才有機會實現其利潤。因此，真正的動力並非來自全球化的網路形構，而是在地社會的社經地理組織。Scott(1988)從交易成本的觀點指出，區域內部的產業組織形式（包括垂直整合與垂直分工體系），會因為交易成本的考量而有所不同，進而決

定其分工的型態。廠商的聚集，在於減少交易成本的支出，因為透過地理的鄰近性、共享資訊與資源，以及口碑的作用，減少交易過程中的投機主義。換句話說，當垂直分工體系由於產品市場變動快速而被視為較有應變能力的同時，廠商之間交易頻繁所增加的交易成本，可藉由聚集的效果而減少成本的支出。任何的生產廠商都座落在既定的空間結構之中，也都需要外部條件（例如，原料、人力、交通運輸等）的配合。因此在設廠生產的初期，地區性資源因素的地理鄰近性是最重要的考量。但是，距離並非不能克服，運輸的交易成本因為數量多，商品具有同一性及常態化的特性下，將使得交易成本大量降低，而且距離越長，相對成本越低。在這種情況下，越是標準化以及能夠規格化生產的產品，廠商會傾向垂直整合的擴張，而且全球性流動生產的可能性越高。相對的，越是非標準化、市場不確定及少量多樣的產品，則越依賴地區性廠商之間的相互配合，形成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的生產網絡型態，以合作的非正式制度來降低交易成本，以面對外部的不確定性。但是，Scott 未能察覺的是，即使是標準化及模組化的產品生產，例如資訊電子業，在不同的在地社會制度基礎上，會有不同的企業空間聚集及生產體制的形式，例如日本、南韓與台灣便展現出截然不同的企業空間聚集及生產體制的發展模式（Whitley，1992；Hamilton，1996；Kanatsu，2002；王振寰，2007a）。

此外，社會鑲嵌（Grannovetter，1985）對廠商的地理聚集也扮演一定的功能。亦即，廠商之間的合作關係不是純粹的契約關係，而是包含著信任關係，包括人情信任（柯志明，1993；陳介玄，1994；潘美玲、張維安，2001），也包含在生產過程中建立的各項正式制度性信任（陳東升，2003）。不同的社會鑲嵌機制也將影響著區域經濟的全球競爭力（王振寰、高士欽，2000），例如 Storper and Walker（1989）便指出兩種區域競爭能力的型態，包括弱競爭（weak competition）和強競爭（strong competition）。「弱競爭」是指區域競爭的因素取決於外在條件，例如人力、土地、原料及生產流程等，成本上的便宜是此類區域競爭力的基礎。但是，這種資源條件的可替代性高，一旦有別的區域能提供更便宜的區位資源，

則如此的區域競爭力就容易被取代。相對的，「強競爭」是指區域本身的資源條件便是競爭力的來源，並且是內生於區域內部各種人才、制度、知識及社會關係等因素的綜效，因此難以被取代，並且能創造巨大的利潤。

Saxenian (1994) 便從產業體系內部的社會文化資本角度，進行加州矽谷與波士頓 128 公路的比較。她認為傳統經濟地理學研究區域經濟發展，經常以外部經濟的概念去解釋產業聚落 ( industrial cluster ) 或產業地方化 ( industrial localization ) 形成的原因，然後據此評估個別公司的外部優勢。但是，這樣的分析架構無法解釋矽谷與 128 公路在同樣具有技術、創業資本、專業供應商與服務、基礎建設、鄰近的大學與非正式資訊流通管道暢通的聚集經濟區，而兩者卻在 1980 年代產生不一樣的發展結果。Saxenian 認為「在地的文化」、「產業結構體系衍生的生產網絡」及「企業組織型態」等因素解釋了矽谷如何在高科技產業中取得競爭優勢。首先，是在地的機構與文化，矽谷附近的機構，包括大學、商會、各區域的地方政府，較不正式的聚會和專業社團、以及其他能夠提供當地工作人口定期或不定期聚會的論壇、酒吧、俱樂部。在這些機構或社團組織中，由於各種定期的研討會、座談會、與非正式的聚會，加上華人族裔的情感連帶，矽谷人不僅不吝於溝通交換各式各樣新的技術資訊和對產業發展趨勢的觀察，也在訊息交換的過程中，建立起矽谷人特有的世界觀與工作信仰。因此，這些組織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活動構成了維繫當地文化、共有的價值觀，以及行事準則等環環相扣的媒介，並成為企業間維持既合作又競爭的良性社會關係，此種區域文化透過成員的緊密互動而不斷地增強與再製。

其次，產業結構體系的特質，就矽谷的產業結構體系而言，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分權式企業網絡，透過專業化生產，一方面和協力網絡平均分擔風險，另一方面則藉此提升企業專業水準，從而能夠迅速適應變化快速的市場和技術。相對的，波士頓 128 公路區的大型獨立公司企圖藉由內化各種生產成本，追求規模經濟和市場控制，卻未敏感地察覺在高科技產業的市場不穩定和技術快速變動的競爭環境中，這種組織經營制度會受制於繁雜、嚴格、本位主義的科層式結構，無

法快速反映市場需求，反將自身置於不利的競爭地位。

最後，企業的內部組織型態，其中包括垂直或水平協調的程度、中央集權或組織分權，以及公司內部權責的歸屬及工作的專門化。矽谷的企業成員之間沒有嚴明的階級關係，特別是像 Intel、Sun、HP 等知名的跨國企業，是以任務導向的工作團隊作為組織的基本工作方式，從而能夠結合各部門的意見，激發解決問題的誠意和創意。相對於 128 公路區的金字塔型人事權力關係，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又自奉專業為圭臬的閉門造車性格，使得矽谷以後發先至的姿態取代 128 公路成為全球高科技產業的重鎮。

王振寰（1999）提出學習型區域（learning region）的觀點，強調區域及廠商競爭力的來源，在於持續不斷生產及進步的知識和創新。區域內部的創新活動，需要知識和經驗的長期累積，成為在地視為當然和常規化的「隱形知識」（tacit knowledge），同時也透過廠商之間的網絡關係建立信任，然後轉化既有的知識加以創新，而這個過程需要社會制度的高度配合和支持。創新乃是知識積累的過程和學習的結果，因此廠商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和「用中學」（learning by using）（Lundvall，1992），來熟悉工具設備和生產流程，以累積對既有的知識和技術的熟悉程度。進一步而言，區域內部的廠商之間必須是在一個開放的空間進行互動式的學習，但是要實踐這個過程必須要有社會制度的支持，這種支持創新活動的區域性制度也被稱為制度濃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Amin and Thrift（1994）認為它是機構之間互動和合成的效果（synergy），以及許多組織的集體再現，一個共同的工業目標，和共享的文化規範和價值等因素的結合。至於它的濃度則是建立在正當性和培育信任關係之上，同時制度濃度也會持續地激發著企業家精神和鞏固產業的地方鑲嵌性。因此，透過大學與研發機構的設立，強化研究機構，廠商之間，員工之間的互動和學習，建立信任和不斷強化知識，構成了學習型區域。學習型區域也就成為後進發展國家及地方，一方面與全球產生連結，另一方面產生區域學習的重要制度設計，其具有以下的主要特徵（王振寰，1999），包括：(1)該區域必然是全球網絡的一部份；(2)工業生產的基礎結構朝向

以知識和技術密集的廠商所形成的網絡；(3)需要公共的學習機構，如大學和法人研究機構的設立，加以轉移和研發先進技術及知識；(4)這些研發機構和廠商有經常性的人員及資訊交流，形成一套資訊回饋系統，從事新技術和知識的學習創新；(5)廠商之間具有合作關係，互派人員和相互學習的機制。

Wolfe and Gertler (2004) 亦指出，一個地方產業聚落要與全球產生連結，必須了解以下幾個重要的面向：(1)地方制度與行動者在促進更具創新性、知識密集生產的轉型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2)在這個過程中，地方與非屬於地方的行動者的互動有多重要；(3)地方廠商如何依賴當地特定的地方知識資產 (local knowledge assets)，以及知識流動在地方與非地方經濟行動者之間的相對重要性如何；(4)地方產業聚集如何隨著時間演進而達到目前的發展現狀，以及哪些關鍵事件與決策形塑其發展路徑；(5)最後，在什麼程度上，這個過程、關係及地方能力確實建構了一個真實的聚落？在這個聚落當中，其關鍵的關係、連結和過程的基礎又是什麼？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創新系統(區域的及國家的)將在更寬泛的制度架構中促進聚落的發展，以形塑廠商的行為與實踐。因此，廠商與社區層級的代理人(政府領導)的重要性便如同地方的歷史偶然性及路徑依賴一樣。以廠商為創新基礎的創新系統，是必須鑲嵌在一特定的區域，才能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用。因此，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全球資本主義進展中，在地廠商及在地條件所創造的創新系統仍然是重要的 (Cooke et al., 1998)。

廠商鑲嵌於一個特定的地方脈絡中，不同的組織面對相同的地方脈絡在技術學習及創新上亦會有不同的表現，例如 Gertler、Wolfe and Garkut (2000) 針對加拿大 Ontario 的 242 家當地廠商及跨國公司的比較分析中指出，當地廠商傾向將創新活動在地化，相較於跨國公司，這些當地廠商更加鑲嵌在 Ontario 經濟體制中，表現出更高度的 R&D 程度，雇用較高比例的科學、技術與管理人才，並且其創新的想法大多來自於當地的消費者。相對的，這些跨國企業表現出較低的 R&D 程度，同時仰賴公司內部的行銷部門開拓市場，以及持續依賴母公司的創新想法。因此，他們認為在知識經濟體系中，不論在本質上和程度上，地方脈絡

對於區域創新活動依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然而，對於處於技術追趕的後進發展國家及地方的創新與學習活動而言，由於其與先進國家的發展路徑並不相同，後進國家及地方往往必須從產品生命週期的末端進行追趕（Hobday，1995），因此在這個過程中，跨國公司等外資對地主國或區域的技術升級扮演著關鍵的作用（Fromhold-Eisebith，2002）。值得注意的是，當跨國公司在進行其生產與研發單位的地理空間的移動與設置時，尤其是研發部門的海外設置，往往並不完全取決於地主國或區域的經濟發展階段，反倒與其產業科技發展軌跡和躍進式潛能有關（陳信宏，2004），例如重要的國際資通品牌大廠在台灣與中國大陸就研發中心的設置過程中，即有明顯的差異。設置在台灣的研究中心偏重硬體開發，而在中國大陸則偏重軟體開發；跨國公司在台灣的研發單位傾向與其在台供應商共同合作，在中國大陸則傾向與大學合作等。區域的創新和學習聚落不會憑空產生，欲打造出一個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產業聚落，文化的、制度的及基礎建設等因素均會影響區域內部廠商的創新氛圍與活動（Malmberg and Maskell，2002）。

以上關於區域經濟與產業體系的說明，指出在全球經濟生產典範劇烈翻動之後，一個特定的區域或地方要培育出在地的國際經濟競爭力，必然需要從資源、交易成本、廠商生產網絡、社會文化資本及社會鑲嵌等條件中，建立一套特殊的社會制度以支持廠商集體的創新及學習活動，以將知識及資源落實在區域內部。而以上這些觀點固然幫助我們理解區域經濟和產業體系在特殊的社會制度基礎上的互動關係及過程，有可能產生區域的競爭力。然而，這些觀點大多忽視了區域或地方是鑲嵌在一個特定的行政層級之中，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及制度學習都可能影響產業體系在區域之內的生產網絡結構、地方經濟轉型與創新學習體制的是否形成。對東亞區域產業體系的分析，大多隱含著發展型國家的分析架構，這固然反映著東亞國家的政經體制現實，但是中國大陸的區域經濟發展與產業體系展現出另一種的社會事實，尤其是高科技產業體系深受地方政府的制度學習及外商投資行為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地方政府的角色是觀察中國地方

產業發展及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解釋變項。關於地方政府的經濟角色與制度學習，我將在第三節中進行回顧，以下則從微觀的角度，繼續深入說明技術體制的學習及創新機制對廠商的重要性。

## （二）技術體制的學習及創新

根據陳東升（2003）的觀點，技術體制的學習及創新可以從三個層面加以分析，首先就技術對學習機制帶來的影響層面而言，技術變遷是一個內部發展的過程，受到行動者、經濟制度、及歷史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技術創新是一種路徑依賴，不是隨機的，換句話說，過去的歷史會影響一個產業或一個社會技術學習發展的方向，而且學習的軌跡是開放且多元的。Rosenberg（1982）認為在技術創新學習過程中，技術變遷、改良的發生與技術相互依賴性（*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y*）、技術採用的預期心態（*technological expectations*）與用中學（*learning by using*）等因素有關。技術的相互依賴性，包括：(1)互補性：亦即技術創新與擴散，和成熟發展的互補技術之間是否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例如電燈的發明能否被社會接受，必須考慮到成熟配電裝置技術的出現。(2)漸進技術改善的積累效應：技術創新的模式經常是核心技術的突破，然後引導後續的修正與互補技術的發展，才能創造高經濟效益。(3)跨產業的技術關連：創新的外部效益，必須考慮到中間產品，以及工具機或與資本有關的部門。此外，技術創新的產業關連也會造成產業的分工化。因此，企業主採用新技術的決策過程，便與該新技術的經濟誘因有關。除非能夠證明一個新技術的可靠性高，且新的修正技術在短期內不會出現，否則企業主不會隨便投資。通常企業主很少在新技術一出現時就使用，因為新技術穩定性的不足。所以，創新擴散的速度，便受到經濟誘因結構的影響。一般而言，大創新反而容易因為企業主的主觀風險預期而造成擴散的遲滯。另外，對於複雜系統的技術創新，用中學比做中學更重要。用中學所彰顯的意義在於技術的創新與發展，除了需要配套的技術和產業創新之外，它還需

要從使用過程中得到資訊，以裨益後續的創新與修正。技術創新不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可以完成，諸如使用者與使用過程中所出現的數據與資料，更是技術的創新與修正的重要資訊來源。

其次，制度對技術創新過程帶來的影響，例如，國家創新系統理論（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NSI；Lundvall, 1992）指出，(1)學習是創新主要的機制，以彰顯創新並不一定是科技本身的重大突破，而是一種持續性的知識交流互動的過程，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用中學（learning by using）、互動中學（learning by interacting）等是促進創新的重要機制。以學習做為核心觀點來分析創新，則意味著研究創新，不但是討論創新的如何發生，也要討論創新知識的擴散和新知識的商品化過程。所以，透過學習而發生的創新是常態，因為大多數的創新都是漸進的。此外，NSI除了強調路徑依賴的效應外，並指出(1)國家制度的安排對技術學習與創新的影響；(2)制度是創新過程核心的基礎；(3)強調歷史經驗對於創新學習有重要的影響；(4)強調創新系統內部的集體行動者是相互依賴與非線性的創新學習過程；(5)整體（holistic）與科技整合的理論觀點；(6)各國創新系統差異的強調和非最適狀態的預設。然而，國家創新系統很少考慮到國家邊界內所產生的技術跨國流動的現象，以及過於強調國家機器在技術創新中所扮演的角色，強調制度對科技創新的重要性，但忽略其他行動者在創新過程的主體性。因此，學習型區域的出現，一方面將尺度置放在區域的層級以回應全球化下的區域發展現實，另一方面則修正了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在這方面的觀點。

再者，技術學習的歷史軌跡對技術學習及創新造成的影響，並非單向的因果關係，而是依循著歷史變化的互動過程。因為一個國家或區域的技術創新體系，或者產業網絡創新體系的發展，通常具有高度的路徑依賴。然而，技術和制度對整個技術創新軌跡的影響，除了受到兩者本身變動性的影響外，也受到產業網絡的特徵影響。如果，產業網絡的在地與全球技術合作關係的訊息來源有較高的多樣性，社會鑲嵌高但知識重複性低，網路成員既有的技術知識庫廣度夠大，以及網路成員對不同類型的技術認知能力好，那麼技術創新的路徑依賴就會比較低。

因此，一旦技術創新的外在需求大，亦即要求新技術的期望高時，這個產業網絡就比較可能成功地發展出新技術。同時，廠商所處的不同技術階段，它所採取的發展技術策略就會不同。例如，當廠商處於起步階段時，它會積極從國外企業爭取新的知識；進入技術發展的階段之後，它會盡量與國內廠商交換各種生產及商業資訊，以建立廠商本身在地化的技術能力。等到進入商品化的階段之後，它會積極地與國外企業交換訊息。

最後，在不同的產業或國家，政府政策和廠商生產網絡對技術創新的軌跡，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Estades and Ramani (1998) 將技術的競爭力發展軌跡分為兩個類型，一個是被動的學習軌跡 (passive learning trajectory)，亦即廠商不投資任何的研發活動，只專注於做中學的模式。第二種是積極的學習軌跡 (active learning trajectory)，它包括擴大的軌跡，深入的軌跡以及縮小化的模式。擴大的軌跡意味著透過新的研發活動以創造出新的產品；深入的軌跡所指的是廠商專注於既存技術競爭力的革新；縮小化的軌跡所指的是廠商放棄新的研究計畫，固著在既有技術或產品的修正上。至於一個高科技產業網絡會依循哪一種類型的軌跡發展，端視產業生產網絡、政府政策與科技研發社群等因素的交互影響。

互動式的學習是創新的來源，強調廠商透過與顧客、研發與製造，製造與銷售之間的整合，將學習與創新變成系統性的活動。當然，廠商內部的人員或部門之間的技術學習，亦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假如創新反映學習，以及假如學習是從例行性的活動中延伸出來的話，那麼創新必然是立基於既存的經濟結構中。所以，在以科學為基礎的資訊科技發展過程中，重要的創新皆是建立在常規化的學習、搜尋、和研發中，而非大型的實驗室 (Lundvall, 1992)。對區域經濟的發展而言，互動式的學習和創新，構成了所謂的創新氛圍 (milieux of innovation)。它是在一個既定的地理區位內，主要透過非正式社會關係所構成的複雜網絡，並且經常產生區域內部的社會集體意識，決定其對外的形象和對內的歸屬感，進而強化了地區性的創新能力 (Camagni, 1991)。創新氛圍強調的是地區性的非正式關係和網絡所構成的學習和支持機制；亦即，持續的創新活動被視為在既有制

度之上所產生的集體學習效果，此一社會制度慣習，包括區域內代際知識的傳遞、管理技巧和科技創新的成功模仿、人際之間的面對面接觸、公司間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隱性的商業規則、財務或技術訊息的流通等因素所融合而成。

此外，區域內工程師的非正式互動（Saxenian，1994）亦是資訊擴散與學習的重要管道，而這是在虛擬溝通的空間中難以實現的。例如，新竹科學園區與矽谷的高科技廠商之間的互動，則呈現全球化的可能衍生形式，以及此一形式對技術學習與控制所產生的張力與解決。Saxenian and Hsu（2001）的研究指出，這兩個高科技區域都是以產業垂直分工的網絡型態為主，彼此之間存在著互補合作的產業結構關係，而形構這些廠商合作關係的動力來自於頻繁的技術與人才的流動和關連性，仲介於這一關連性的因素則是在兩地之間存在著一種綿密的社會與技術社群網絡，亦即所謂的「跨國企業家」。這些技術社群的非正式社會與技術網絡，促進了矽谷與新竹兩地之間在技術、資金、技能與資訊的雙向流動，支持兩地的創業精神，同時也帶動兩地較正式的商业關係，例如合資與研發合同。而這些歸國學人網絡及跨國技術人員的知識網絡對母國在高科技產業的追趕學習上具有重要的知識及技術的擴散效果，而不同國家產業結構的開放或封閉性格在進行跨國的技術交流時，也將產生不同的產業技術學習方式（Saxenian，2008；田島真弓，2007）。

不同的產業具有不同的技術演化特性及市場趨勢，而國家或地方採取什麼組織結構、制度環境或社會文化資本去擷取其競爭優勢，更是區域經濟及技術體制發展的重中之重（Saxenian，1994；田島真弓，2007；陳東升，2008；王振寰，2011）。如何建立適合在地的技術學習機制，遂成為區域經濟與技術發展路徑的一體成型的關鍵。尤其，後進發展國家及地方的技術學習路徑，大多是從產品生命週期的末端切入，先從成熟產品的模仿製造，再往研發、設計等部門向前追趕（Hobday，1995），而掌握技術領先的廠商也大多在產業內部築起「專利攔阻」，以延緩或阻礙競爭對手的追趕。換句話說，地方必須採取某些技術學習機制，才能克服全球生產網絡所設下的重重「技術攔阻」。東亞後進發展國家採取出口導

向工業化的策略，透過跨國公司的當地投資或尋求代工，逐漸展開其技術學習的階段。降低成本，是跨國公司將產品最末端的標準化生產外移到這些後進發展國家生產，以增強市場競爭力的企業策略。然而，也在這個階段，促使後進國家的廠商逐漸摸索及學習產品的生產技術，進而逐漸沈澱累積（王振寰，1999）。後進國家的 OEM 代工模式，亦為重要的技術學習機制（何彩滿，2005），進一步在此基礎上展開 ODM 的代工升級（瞿宛文，2006）。以台灣資訊電子業為例，台灣資訊電子業的系統廠商在 ODM 的生產模式中建立起「協商式升級」（upgrading by negotiation）的產品研發模式，使得台灣代工系統廠商、品牌客戶及關鍵零組件供應商等之間產生綿密的技術互動與互賴關係（楊友仁、蘇一志，2010）。因此，處於後進發展的區域經濟，除了與全球產生鑲嵌，也必須透過學習機制的建構，成為全球產業分工的中間重要環節。

#### 第四節 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體制的對偶（coupling）發展

從上述的回顧中，針對改革開放後的蘇州經濟發展研究，大致可以歸納成兩大類觀點。第一類觀點是從國家中心論衍生的發展型地方主義（developmental localism，吳國光、鄭永年，1995），或可稱之為「地方政府中心論」（local state-centered）。地方政府中心論的主要關懷在於市場機制與地方經濟的社會鑲嵌關係，此一鑲嵌關係在此姑且稱為「Polanyi命題」，將此命題安置在中國國家轉型的歷史背景裡，則表現出「計畫理性」的運作邏輯。第二類觀點是「廠商中心論」（firm-centered），其主要關懷在於廠商、生產網絡、工業聚落等以廠商為中心的交易治理模式的變化，在此姑且稱為「Granovetter命題」，亦即強調信任機制對廠商內部與廠商之間的不同交易治理模式的制度安排，強調此一制度安排對廠商生產效率及創新學習的影響，地方政府則扮演一個輔助廠商提升生產效率的角色。若將之安置在全球在地化的脈絡裡，表現出來的是「市場理性」的運作邏

輯。這兩大陣營的理論對話對象，或隱約或顯著的挑戰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和「私有化」的觀點，其自身卻有著不同的理論傳承系譜，地方政府中心論繼承了歷史制度主義的傳統，而廠商中心論則偏向組織社會學制度主義的傳統。

地方政府中心論的主要限制在於，分權化政策並未根本改變中央和地方的黨政關係結構和利益結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經常出現不一致的狀況，各自的發展性格導致中國的雙重發展型國家的治理架構。如同蔡欣怡（2007）提出「經濟可能性的地方邏輯」（local logics of economic possibility）觀點，她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趨勢，使其在中國各地的政治經濟策略一直是各式各樣，在地方邏輯上五花八門，並且出現許多非預期的經濟組織形式。在這麼多樣化的地方經濟治理機制中，蘇州經濟發展的地方政經邏輯偏向「地方政府中心論」這一端。

廠商中心論則大多聚焦於分析蘇州外向型經濟與外商投資的現象，相關的研究包括：關注跨國生產網絡的跨界投資動向，以及不同外資廠商和地區的投資比較（張家銘，2006；陳德昇主編，2008b、2008c、2009；楊友仁，2005），而且這些經驗研究相對集中在台商資訊產業的投資行為分析。另一方面，則是關心地方政府如何進行制度安排，建立工業園區的區位優勢，改善跨國生產網絡在當地的投資環境，以增進跨國廠商在全球商品鍊的競爭力或如何增進地方官僚自身的利益（柏蘭芝、潘毅，2003；楊友仁、夏鑄九，2004；Wang and Lee，2007；Chien，2007；殷存毅，2009），以及資訊電子產業的跨國生產分工網絡及人才的跨國流動等（Borras et al.，2000；Steinfeld，2005；Saxenian，2005；Saxenian，2008）。跨國廠商的經濟行動及蘇州工業聚落的區位優勢分析是上述經驗研究的核心主題，在經濟社會學與經濟地理學的跨科際合作下，大多採用全球生產網絡或全球商品鍊的分析觀點，討論跨國生產網絡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間的制度關係。

廠商中心論的研究取向幫助我們理解全球在地化供應面的主要議題，包括：跨國生產網絡在組織治理上的多重信任機制與交易成本／規則之間的制度關係；兩岸產業分工及三角貿易結構的全球商品鍊運作機制；台商生產網絡與地方官員政商關係的信任機制等。這些經驗研究，拓展了我們對跨國生產網絡的全球

在地化策略，以及，以代工業務為核心競爭力的台商生產網絡如何利用蘇州的政經及文化等在地制度優勢，強化了台商生產網絡在全球商品鍊的附加價值，台商及跨國品牌大廠在全球商品鍊權力領域的相互依賴結構，以及技術創新學習的知識流動和擴散如何被滯留在台商生產網絡內部等面向的認識。可以這麼說，廠商中心論的分析，聚焦在由跨國生產網絡和地方政府所構築的市場「場域」的解釋（Fligstein，2001），而此一市場場域的控制概念，實際上是為了實現跨國生產網絡及地方政府的共同目標：透過制度安排及社會鑲嵌機制以降低交易成本，極大化生產效率及招商引資的幹部利益。

然而，廠商中心論往往過度偏重全球生產網絡與工業聚落（工業園區）之間的單一因果關係，而忽略了在地社會如何動員資源的過程以支持工業聚落的發展（如人力資源及勞動力市場、金融體制、地方社會對外資經濟的認同感、產官學合作機制等），以及中央政府調整經濟政策的趨勢對地方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衝擊，乃至地方與中央兩者發展意志彼此之間的政治妥協或對抗。這些現象與過程，都將影響著地方經濟政策的盤整與地方政府執行手段的運用，進一步模塑其地方的政經資源分配與技術學習體制的發展路徑。

在蘇州產業升級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可看出明顯傾向東亞發展模式的模仿及學習，例如昆山在 2007 年的市委十一屆全體（擴大）會議上，提出所謂「三學」的發展目標，即「整體發展學新加坡，產業提升學韓國，自主創新學台灣」。「三學」目標是昆山市委「……對現代化發展規律的認識，是對昆山發展趨勢的把握，也是對中等國家和地區發展水平進行分析比較後提出的切合昆山新一輪發展的宏觀思路……是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動力和具體參照，是提升昆山綜合競爭力的迫切需要<sup>9</sup>」。其具體策略，包括昆山市政府與外資合資成立龍騰光電，企圖發展光電產業以整合當地資通產業的上下游供應鍊<sup>10</sup>；其次，重視產官學的合

---

<sup>9</sup> 引自〈昆山：樹立“三學”目標，推進創新發展〉，2007-07-11，

[http://www.js.xinhuanet.com/xin\\_wen\\_zhong\\_xin/2007-07/11/content\\_10544012.htm](http://www.js.xinhuanet.com/xin_wen_zhong_xin/2007-07/11/content_10544012.htm)。

<sup>10</sup> 值得注意的是，昆山市政府建立光電產業的動機，因為在鄰近的蘇州工業園區已經有友達光電等大型台資面板企業設廠投資。根據台灣媒體報導，友達與昆山市政府私下達成協議，將以技

作機制，例如在 2008 年成立昆山工業技術研究院，促進企業與研發機構之間的技術合作與擴散，並掌握自主技術研發；最後，推動生產者服務業及服務外包等政策，鼓勵外資和民營企業成立與製造業相關的服務業，並欲藉此提高服務業在昆山經濟結構中的比重。

本研究認為，不論是「地方政府中心論」或「廠商中心論」的研究路徑，均無法解釋蘇州「發展，但缺乏技術學習」的經濟發展趨勢。本研究從歷史與制度的面向，強調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體制的對偶關係，指出昆山及蘇州的經濟成長，迄今為止，仍未能形成學習型區域所需的技術學習能力與制度濃度的原因，在於地方官員與外資廠商各自的制度路徑依賴建構出蘇州的此種發展態勢與結構。此一分析策略的優勢在於，透過動態的分析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體制的對偶關係，才能理解蘇州是否邁向學習型區域，以及為什麼未能產生制度綜效的原因。

## 第五節 分析架構

在以上文獻回顧的基礎上，首先，我將蘇州的經濟轉型區分成三個階段的理念型，以不同的年份來劃分其階段，並突出該階段的發展特色。這三個經濟轉型的階段分期，依序如下（見表 2-1）：

第一個階段：是市場轉型的生產體制（1978-1997 年）。這個階段的發展特色是地方黨政能人主導集體鄉鎮企業的發展，並透過鄉鎮企業進行農村工業化的過程。鄉鎮企業的生產技術、管銷知識等大多透過上海的國營企業取得，而蘇州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強政府政經體制則在鄉鎮企業發展過程中得到強化，並因為蘇州經濟成長而形成路徑依賴的效應，持續地成為此後地方政府的經濟治理的邏輯慣性。此外，中國中央政府在此一階段推動的科技體制改革，在地方自我利益的追求下，並未能深刻地改變蘇州的科技體制。

---

術協助的方式幫助昆山市政府設立八·五代的生產線（《財訊雙週刊》，2009/11/12-25：162-65）。

第二個階段：是全球在地化的生產體制（1998-2008年）。這個階段的發展特色是蘇州大幅度的對外經濟開放，以外商投資做為地方經濟成長的火車頭，此一發展趨勢劇烈地改變了蘇州既有的經濟結構。大蘇州的地方政府運用跨國制度學習的機制，包括個人網絡與制度聯盟等形式提升當地的投資與商業環境，並鎖定資訊電子業的台商作為其建立高科技產業的重要外資合作對象。也因為資訊電子業台商的大舉投資，使得蘇州與全球生產網絡產生高度的經濟鑲嵌。然而，此一階段所造就的經濟表現看似成功，實際上，高科技產業聚落的廠商主體仍以台商等外資為主，本地的民營企業在地方官員政績導向的路徑依賴及台商生產網絡特徵等因素的雙重限制下，並未能積極地參與全球生產網絡的分工體系，以提升本地整體的技術能力。

第三個階段：是產業升級的生產體制（2009-2010年）。這個階段的發展特色是地方政府強調產業後向連鎖的制度追趕。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斷地提倡國內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在第二個階段的經濟結構與其運作模式在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突顯出其體質的脆弱與限制。因此，在極度缺乏人才、技術及知識等資源的蘇州所採取的是產業後向連鎖的制度追趕方式，在產業層面，持續地吸引國外重要的面板及半導體廠商的投資；而在技術學習體制上，則建立若干的公共研發中心作為技術擴散的平台。這些制度追趕的學習機制，迄今為止，仍未見到顯著的成效，在面板與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上，仍是外資主導的經濟格局，本地的大學、民營企業等行動者並未在此一階段對蘇州的產業升級提供重要的支援。

本研究認為，在這三個經濟轉型階段的地方制度機制，包括地方黨政能人、跨國學習制度及產業後向連鎖的制度追趕，分別相應地促成不同階段的經濟表現：以集體鄉鎮企業為主的蘇南模式、外資聚落化的產業生產結構及可能浮現中的學習型區域。而這三個地方制度機制亦為本研究的解釋變項，他們貫時性地辨明地方經濟行動者，特別是地方政府在不同經濟轉型階段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

樣的角色轉變在與外資生產模式的互動過程中如何限制了蘇州地方技術體制的技術學習能力。

表 2-1 分析架構：蘇州經濟轉型階段

生產體制 地方制度機制	市場轉型 (1978-1997)	全球在地化 (1998-2008)	產業升級 (2009-2010)
地方黨政能人	蘇南模式： 鄉鎮企業經濟		
跨國學習制度： 個人網絡與制度聯盟		外資聚落化的 產業生產結構	
產業後向連鎖的 制度追趕			浮現中的 學習型區域？

### 第三章 市場轉型下的蘇州經濟困境

「世界上一些國家都在制訂高科技發展計畫，中國也制訂了高科技發展計畫。下一個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現在世界的發展，特別是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一日千里，中國不能安於落後，必須一開始就參與這個領域的發展。……都不要失掉時機，都要開始接觸，這個線不能斷了，要不然我們很難趕上世界的發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005：279-280）

1990 年代結束之前，蘇州在中國市場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經濟成就是集體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帶動了蘇南地區的農村工業化與地方經濟快速的成長。對蘇南模式的研究，大多透過產權制度變遷的角度切入（陳志柔，2001；劉雅靈，2001；方孝謙，2002；李友梅等，2004；周其仁，2005；Whiting，2001），討論地方政府、地方社會網絡與鄉鎮企業在產權制度變革上的社會關係，分析方式大多集中在財稅改革所帶給地方的經濟誘因，以之作為蘇南地區經濟成長的重要解釋。就蘇南的經濟現實而言，以上的這些觀點提供一個關鍵的啟發，亦即地方黨政能人對地方經濟的主導能力及其治理邏輯，已經成為一項足供辨識的路徑依賴，它不但在蘇南鄉鎮企業的發展階段裡主導著地方經濟的投資活動與財稅收入的再分配，其所建構的以地方黨政能人利益集團作為蘇南經濟發展主要經濟行動者的治理邏輯，也延續到了 1990 年代中期逐漸展開的外向型經濟，至今並未有太大的本質改變。

本章指出，蘇南模式對當地此後經濟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制度危機，並不在於產權制度的制度變遷。相反地，其在此一階段取得的經濟成長，反而使得蘇州出現一個難以接合由高科技產業作為其外向型經濟主導產業的「斷裂」式經濟結構，不僅導致外資「飛地」的出口導向，失去建構本地技術學習體制的先機，並

且也奠定其二元式經濟結構的地方經濟特徵，亦即本地廠商集中在傳統產業，而外資集中在高科技產業的加工貿易，兩者之間並未有著密切互動的經濟與社會關係。政府是技術學習的推動者（Amsden，1989；Kim，2000），蘇南地區跨足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動力來自於中央政策的推動，而非地方自發形成的經濟轉型。加上在蘇南地區的制度環境裡，由強勢地方幹部所建構的路徑依賴因素，使得蘇南地區的集體鄉鎮企業的產權改革，不僅未能釐清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產權關係，反倒是在 1990 年代後期開始，依然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產權的改制民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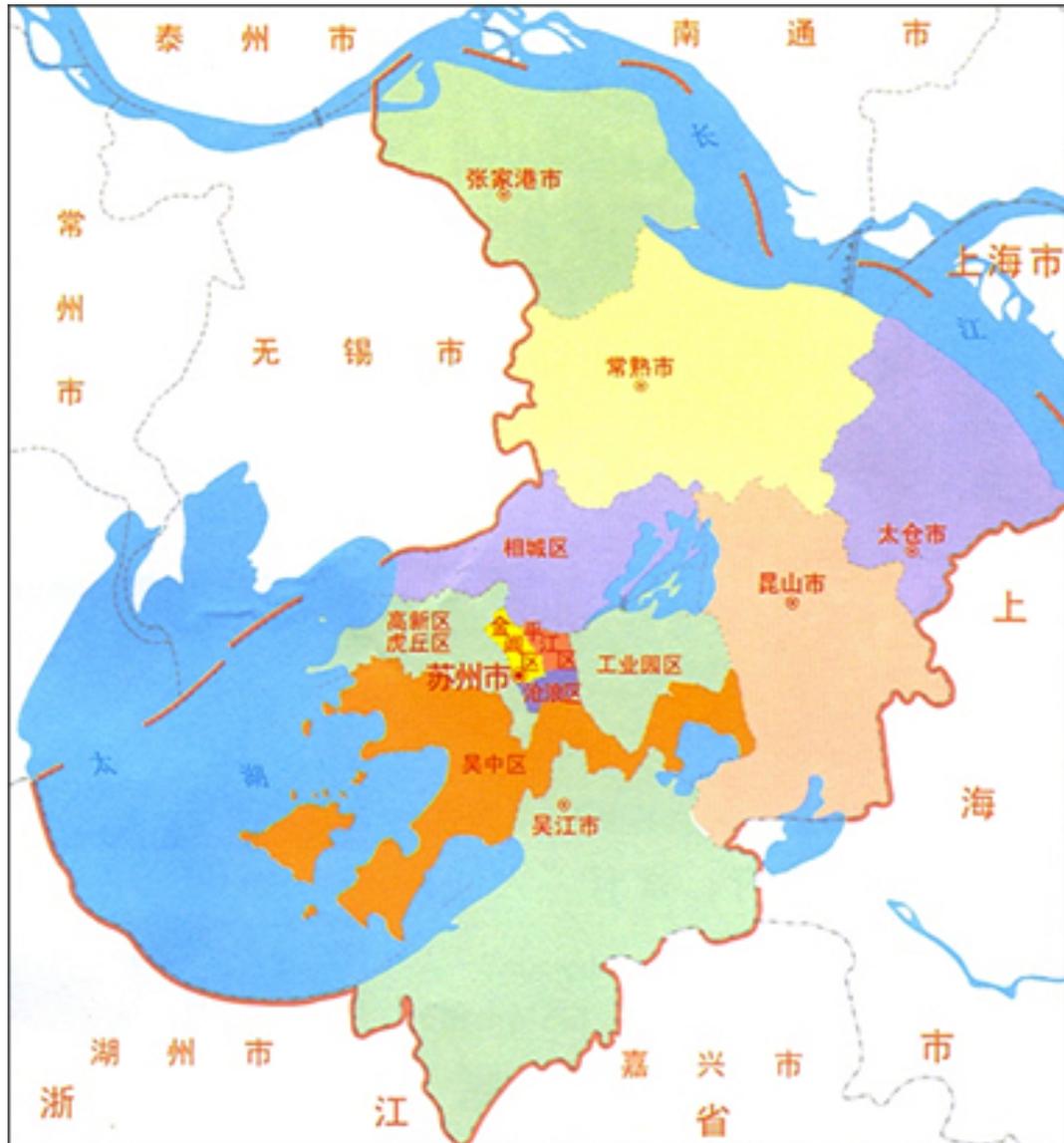
## 第一節 蘇南模式的制度變遷

搭乘火車進入蘇州火車站前的列車廣播，通常有著這麼一段介紹蘇州的話：「我們即將抵達蘇州市。蘇州，是一個擁有兩千五百年歷史的文化古城。」而這座歷史古城在過去將近三十年間的經濟表現，令人不得不側目以對。

蘇州市位於江蘇省南部，東鄰上海市，南連浙江省嘉興、湖州兩市，西傍太湖，與無錫相接，北接長江。全市地形以平原為主。蘇州的行政層級為地級市，下轄五個縣級市，分別是：常熟、張家港、昆山、吳江及太倉。市區劃分出七個行政區：滄浪、平江、金閘、吳中、相城、高新區和虎丘區，以及工業園區（圖 3-1）。蘇州市擁有五個國家級開發區，十二個省級開發區。全市總面積 8488.42 平方公里，2009 年總人口數達 633.29 萬人（蘇州統計年鑑，2010）。

蘇州的經濟表現亮麗，2009 年的地區生產總值（GDP）排名中國第五位，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排名中國第五位，進出口總額排名中國第四位。以上三項指標在江蘇省的排名皆位居第一位（Ibid.）。

圖 3-1 蘇州市地圖



蘇州是蘇南模式的原型<sup>1</sup>。所謂「蘇南模式」，簡單地說，即是地方政府（特別是鎮級和村級）官僚參與集體鄉鎮企業（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的經營而帶動地方經濟成長的發展模式。蘇南，通常是指蘇州、無錫及常州這三個地級市，但是蘇州的吳江才是費孝通作為其對蘇南模式起源的主要概念原型。蘇南模式的基礎來自於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其所有制為集體經濟。人民公社取消之後，農業與工業分離，農業經營者儘管承包到戶，但是

<sup>1</sup>「蘇南模式」一詞是由費孝通提出（參見吳大聲、居福田，1994）。

鄉鎮工業並沒有劃清界限，反而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鄉辦鄉有，鄉辦鄉管；村辦村有，村辦村管。因此，費孝通認為這是「地方幹部經營的社區所有制」(吳大聲、居福田，1994)。

其次，鄉鎮工業的興辦是為了解決當時的人口問題(費孝通，1994；周其仁，2005)。由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動，使得農村產生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囿於戶籍制度的限制，中央政府為了控制住中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遂使得農民受到「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限制，因此讓剩餘勞動力的農民人口進入鄉鎮企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主要之道。同時，在分權改革及地方財政包乾制度的誘因下，刺激了地方政府興辦工商企業的慾望，一方面有助於緩解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發展地方經濟所需的財政收入。鄉鎮工業大多由鄉村政府創辦，並且直接管理的企業，形成由地方政府扮演推動角色的鄉鎮經濟格局(周其仁，2005)。這也正是 Oi (1992、1999) 所指出的「地方國家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以及 Walder (1995) 所說的「政府即廠商」的現象。

到了 1980 年代，這些鄉鎮企業普遍推行承包制，企業負責人由鄉鎮黨委任命，一年簽約一次。每年考核包括產值、銷售、利潤等三大指標，超出的利潤，則按比例給承包者分成。這個制度促進了承包者的積極性(馬力誠，2006；陳佳貴主編，2008)。1984 年，鄉鎮企業工業收入已經佔農村經濟總收入的 62.57%，到了 1989 年提高到 76.53%。機械、化工、建材及紡織是蘇南地區鄉鎮經濟的四大產業，也被稱做「四大名旦」(吳大聲，居福田，1994)。1990 年代初期，蘇州市鄉鎮企業佔全市的經濟總量高達 60%；並且吸納了全市農村勞動力的 50% (王榮主編，2008)。

但是，鄉鎮企業的經濟成長到了 1990 年代初期，逐漸遭遇瓶頸。在 1996 年上半年，蘇州市鄉村兩級工業企業銷售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7%，企業的銷售利潤率在 1995 年也只有 3.27%。於是，從 1996 年起，蘇州市開始發動鄉鎮企業進行產權制度改革(陳志柔，2001)。新望(2005)則以「蘇南模式的歷史終結」為蘇南鄉鎮企業敲下喪鐘。吳曉波(2008 下：93)歸納出蘇南集體經濟的弊端，

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是政企不分。蘇南模式的特點就是黨、政、經、社四合一，很多著名的企業都是由一個行政村整體翻牌過來的行政性公司，廠長經理與鎮長、鄉長是可以相互兼任的。這導致企業經營目標的多元化……。二是“產權空心化”。“人人所有，人人沒有”的產權特徵使得原本靈活的企業漸漸染上了“國企病”，出現了“廠長負贏不負虧”、“窮廟富和尚”等現象。…“說白了，蘇南模式就是二國營”。三是企業“政績化”。“幹部經濟”直接導致了“政績經濟”，蘇南各地為了拉抬國內生產總值，大規模地搞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四是效益大幅下滑，業績作假成風。多年以來，蘇南模式以根正苗紅而成為全國典範，其改革效應關乎諸多官員的升遷烏紗帽。於是，為了讓“經濟數字”年年上升，作假之風盛行蘇南。上海《文匯報》……建議，應該向那些吹牛的蘇南幹部徵收“牛皮稅”。

1997年10月，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在江蘇省委九屆七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批評蘇南模式「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突出表現為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政企權責不分，企業產權不明確，原有的機制活力逐步減弱。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已漸為舊體制所“同化”，活力銳減，而且許多地方領導仍抱住蘇南模式不放，片面強調集體性質的公有制，阻礙發展非公有制經濟。」(Ibid.：94)。在陳煥友的公開批評蘇南模式之後，從此環繞在蘇南模式上的政治光環逐漸消逝。蘇州市統計局在1999年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全市已經有11301家鄉鎮企業進行了產權制度改革，涉及總資產435.4億元，佔全市鄉鎮內資企業總數的81.6%，資產總額的64.6%（張建華，2008）。蘇州市鄉鎮企業改制情況，見表3-1。周其仁（2005）指出，蘇南模式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內含一個內在的緊張關係，亦即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會將市場原則傳導到企業的內部關係裡，從而影響企業控制模式和產權模式的改變。到2002年底，蘇南地區已經有93%的鄉鎮集體企業

通過各種方式改制成私營企業<sup>2</sup>。改制以來，完成私有化的企業固然落實各種財產權的掌握，但是大型的股份制企業仍然是由地方幹部掌控集體股，享有企業的控制權、收入分配權及處分權（陳志柔，2001）。

改制形式	改制企業		涉及淨資產	
	數量（個）	佔比（%）	金額（億元）	佔比（%）
股份有限公司	13	0.12	14.94	11.12
有限責任公司	1215	10.75	29.25	21.77
股份合作制	3259	28.84	45.89	34.16
混合型企業	1435	12.70	16.28	12.12
拍賣轉讓	4877	43.16	28.81	21.45
兼併破產	502	4.43	0.82	0.58
合計	11301	100	435.4	100

資料來源：引自張建華（2008：338）。

劉雅靈（2001）對吳江鄉鎮企業產權私有化的過程分析，強調吳江在 1980 年代的經濟成長，是建立在原有的地方經濟制度特性，短缺經濟所提供的市場契機，以及鑲嵌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下的投資飢渴慣性使然。所謂「原有的地方經濟制度特性」，她指出了三項，包括相對富裕的農村集體積累、廉價勞動力、與城鎮國營企業的外包生產關係。由於吳江的起步早，並且掌握住短缺經濟的市場機會，使得吳江成為蘇南模式的領頭羊。但是，當上述這些地方性優勢已經不能滿足生產與市場的需求時，企業效益的黃河日下，指日可待。因此，劉雅靈認為吳江鄉鎮企業的產權改革是在吳江「不敵上級政府下達產權改革的行政命令，

<sup>2</sup> 無錫的華西村是個例外。但是，華西村的後集體主義是建立在當地黨政能人的家族網絡基礎上的經營。參見周怡（2006），《中國第一村：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後集體主義》。香港：Oxford。

強制於世紀之初完成企業產權私有化」，她將此稱為「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失去了集體鄉鎮經濟成長的吳江，則接著積極建立經濟開發區以吸引外資，欲借重外資來替代本土資金，推動地方產業技術升級，創造就業機會，以及帶動本土周邊產業的發展（劉雅靈，2003）。

蘇州集體鄉鎮企業的經濟成長一直維持到 1997 年左右，此後才逐漸由外資和台資等跨國資本扮演帶動地方經濟成長的火車頭角色（陳志柔，2001），全球生產網絡日漸將蘇州整合進全球產業分工架構內。

改制後的蘇州民營企業似乎為世人遺忘，直到2004年初，蘇州市政府推出所謂「一號工程」，即《關於促進民營經濟騰飛的決定》，同年亦陸續推出一系列指導性文件，如《關於做大做好做優民營經濟的意見》、《關於全面提升民營經濟發展載體功能的意見》、《關於加快構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共性服務平台的意見》等，試圖扶植及促進蘇州民營企業的發展<sup>3</sup>。就這個時間點而言，蘇州政府已經意識到過度依賴外向型經濟可能帶給地方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危機（如外資遷移所導致的產業空洞化<sup>4</sup>）。改制後的民營企業在紡織業、重化工業等既有的在地產業中，仍然佔有較強的經濟組成及表現。不過，根據江蘇省統計局在2008年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整體而言，蘇州市民營科技企業的競爭力並不特別突出，到2007年底，蘇州市民營企業家數已超過13萬戶，但民營科技企業僅佔其中的3%左右，這個比例遠低於深圳、南京和無錫等城市。此外，蘇州民營科技企業的產出規模和對蘇州經濟的推動作用亦遠不如外資，蘇州經濟結構中的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分別約佔1/3和2/3；而民營科技企業無論在企業數量、工業總產值或稅收，又僅佔民營經濟的1/3左右<sup>5</sup>。

相較於其他沿海區域，如浙江、福建等地，蘇州及其周邊城市（上海、無錫、

---

<sup>3</sup> 《2005 蘇州市民營經濟發展報告》，2006：15。

<sup>4</sup> 此外，蘇州市政府亦認為欲強化蘇州經濟競爭力必須扶植其他支柱產業，尤其是當時正在推動的汽車產業。產業結構的全面化，而非集中在資訊電子業，如此蘇州才配稱為一個現代工業城市。這是 2005 年，我在蘇州造訪時，蘇州大學 L 教授提供的資訊。但這也極有可能是受到中央政府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政策的影響。

<sup>5</sup> 江蘇省統計局，《蘇州市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現狀研究》，2008/05/30。

常州等)為傳統計畫經濟體制管制較嚴格的區域，國有經濟及集體經濟成分濃厚，地方通過預算資金及銀行貸款等行政措施，直接與間接的納入國家計畫中，並且透過地方幹部的作為，使地方得到國家實質性的支持(Whiting, 2001)。這項毛主義時期的制度遺產，在中央政府逐漸市場化國有企業產權及改革生產管理結構，以試圖提振國有企業生產效率的時機，卻相對提供了農村社隊企業有足夠的經濟資源及發展空間轉向集體鄉鎮企業發展。換句話說，蘇南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政治保障，迴避掉在1992年之前「姓社姓資」的官方意識型態爭論<sup>6</sup>與來自中央政治力量的干預和打擊<sup>7</sup>，因而在政治正確的政經環境中得到較為穩定及快速的成長。地方政府與社隊工業的政經關係延續到1978年後的集體鄉鎮企業崛起的階段，強化並鞏固了市場轉型過程中，地方幹部菁英主導的地方社會網絡結構的經濟治理模式(陳志柔, 2001)。這也是蘇州經常被視為一個「強政府領導」的關鍵制度遺產。

## 第二節 蘇南鄉鎮企業的技術學習

蘇南鄉鎮企業從開創之初，即處於市場的競爭之中，本身缺乏資金、技術不足、缺乏原材料，產品不包銷。因此，不少鄉鎮企業在創立時，大多採取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及就地銷售的經營方式(三個就地)。在此一制度環境中，若干鄰近大中城市的鄉鎮企業便開始與城市裡(如上海)的國營企業建立行政性、經濟性及依靠人際關係為媒介的橫向聯合，在產品生產及銷售、市場開發、原材料供應、技術、設備、資金及人才等方面進行合作，這是蘇南鄉鎮企業在生產上的重要技術學習路徑。蘇州鄉鎮企業較諸其他地區更早實行這種由「三個就地」轉向

---

<sup>6</sup> 鄧小平南巡，擴大了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程度，並在中共十四大修改黨章，列入鄧小平理論，至此終結官方「姓社姓資」的爭論。1997年的十五大，進一步將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的國家目標正式合法化(Zheng, 2004; 中譯, 2009)。

<sup>7</sup> 與蘇南鄉鎮企業發展的同一時期，溫州私營企業則深陷在中央官方姓社姓資的意識型態的政治力量攻擊，並且發生多次私營企業主被捕的政治事件(如八大王事件)。因此，溫州逐漸衍生出掛靠、股份合作制等針對私營企業產權保護的制度創新(吳曉波, 2008上; 胡宏偉, 2008)。

到「橫向聯合」的企業生產模式。從 1983 年到 1985 年，在三年內，蘇州市鄉鎮企業與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建立的各種層級與形式的橫向經濟聯合就高達三千多項，其中跨地區聯合達到一千四百多項，透過這種橫向聯合產生的企業集團達到 34 個。到 1985 年為止，蘇州全市各種聯合企業已經達到 2187 個，產值達到 34.2 億元，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 17.7%（陳佳貴主編，2008）。

蘇州鄉鎮工業的興起，特別就其技術學習的面向而言，並非完全屬於地方自發，更多的是依賴上海國營企業的技術及人才的知識擴散。根據費孝通（1994）對吳江鄉鎮工業的觀察，其技術大多來自於吳江與上海的橫向聯繫。他描述了幾個觀察的個案，第一個例子是吳江連勝皮鞋廠。連勝皮鞋廠的經理蕭水根在 1975 年之前只是農村裡的一個小木匠，幫人製作家具、造船和蓋房子。曾經因為帶了七個學徒承包工程，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犯下社會主義的錯誤而回到生產隊務農。但是，在生產隊務農的蕭水根不滿足於農民的收入，於是牽頭開辦布傘廠，因利潤收入不好，轉而成立皮件加工廠，並從上海請來一位老師傅傳授技藝，從此開始生產女用高跟鞋。在上海老師傅的指導下，學習技術生產及市場銷售的知識，1987 年連勝皮鞋廠的總產值達到 2000 萬元，1990 年則達到 5000 萬元，其中 40% 的產品外銷。費孝通描述當他在 1985 年參觀該廠時，皮鞋的製造全部採手工作業，用木槌敲釘製鞋；但約在 1991 年再次參訪時，全廠已經引進機械化生產線。

第二個例子是平望鎮的縫紉機廠。1980 年代初期，因為該鎮有公路和上海相通，所以承包上海縫紉機廠部分的翻砂鑄件的業務，然後逐漸為上海廠製造零件，最後則通過聯營方式，進一步成為上海廠的分廠。上海廠利用平望較低廉的土地及勞動力成本，提供原料、技術、銷售，並協助企業經營的聯營方式，在吳江鄉鎮工業的發展過程中，帶來相當大的效益。1984 年之後，吳江鼓勵此種聯營方式，並給予政策優惠，根據費孝通的資料，在聯營股份制的企業中，吳江有 54% 的鄉鎮企業是和上海聯營的。

在費孝通的描述裡，我們可以了解當時吳江鄉鎮企業的工藝技術、企業管理

及商品流通的知識，相當程度上是依賴中大城市，特別是上海的技術擴散，即便在現在看來當時的製造技術或顯得低階，但對農村的工業化卻是重要的技術學習機制。「鄉鎮企業必需有現代工業的製造技術和工廠管理的知識以及市場的消息，而這些在農業傳統裡是得不到的，必須要向工商業中心的城市中去引進。所以，靠近城市的鄉村比較容易發展工業」（費孝通，1994：260）。

蘇南模式的成功，外貿出口佔了相當程度的比重，在蘇州地區的集體鄉鎮企業銷售產值中，外貿出口佔了約 40%（萬解秋，1999）。儘管，蘇州有著較高程度的外貿，但它並不如廣東、福建及溫州等地有著眾多海外華僑的優勢，可以在改革開放之後，由華僑帶入資金、技術及海外市場（Zweig，2002）。至於蘇州鄉鎮企業的資金來源，也不如溫州的地下金融活躍或透過各種人際連帶的「會」來募集設廠所需的資金（Tsai，2007）。因此，蘇州在地方黨政能人一面倒的主導下，鄉鎮企業並未意識到在下一個經濟發展階段裡，大蘇州地區將轉往資訊電子業的招商引資發展，因而未能事先培育本地鄉鎮企業在電子業的相關技術能力。

### 第三節 地方黨政能人的經濟治理邏輯

在蘇南地區的鄉鎮集體經濟及外向型經濟的兩個發展時期，都是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方式配置資源和利用行政力量動員區域內外資源，以培育區域經濟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其目的和運作機制，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吳柏均、錢世超等，2006）。地方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使其自身成為區域經濟的特殊經營者，亦即「運動員兼裁判」的雙重角色（沈晗耀、錢世超、吳柏均，2006）：地方政府在區域之內的「運動員」角色，展現在區域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下，主導區域內的各類經濟活動，支持或直接參與區際或國際的競爭與合作；其「裁判」角色，則在區域之內實行管理和協調，以實現公平和正義。地方政府的區域管理者身份是從屬於市場主體身份的，而相對的，市場主體身份又需要強化區域管理者

身份，兩者出現既統一又對立的關係。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討論是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分析架構之一，這些分析大多從財稅制度的改革下手（王紹光、胡鞍綱，1994；吳國光編，1994；吳國光、鄭永年，1995；王紹光，1997）。中央政府的放權讓利政策，顯然忽略了地方政府的偏好，王紹光（1997）即指出，地方政府在本質上既不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也不是當地利益的保護者，而是它本身具有獨立的利益。197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以擴大地方權力為中心的行政管理權的轉移，以地方政府這個婆婆代替了中央政府那個婆婆，以地方分散計畫代替中央集中計畫，遂造成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封閉式地方經濟，同時造成了宏觀失控。放權讓利政策在1980年代之後，更進一步增強地方政府追求預算外資金的動機，強化地方政府「藏富於企業」的努力。但是，地方政府的「藏富於企業」並非完全為了企業著想，這個作法等於是把一部份本來屬於中央財政收入的資金留在本地，而錢只要能留在本地就對地方政府有利。王紹光認為，留在地方企業上的資金越多，就能減少地方政府進行技術更新固定資產投資等方面的開支；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企業的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地方政府支配的，這是因為地方政府的特殊行政地位及權威性，使得它對當地的企業行為具有強大的行政約束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干預企業行為。因此，在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多次改革之中，並沒有導致傳統命令經濟體制的消失，反而是造成傳統體制小型化，出現了「諸侯經濟」。

在蘇州體制基礎上所興起的大量村級經濟現象，有兩個特點：首先，一個人、一個廠、一個村所成長而起的村莊公司，亦被稱做「莊主經濟」，亦即這個莊主往往是「老支書」，也就是村裡的「頭號能人」。其次，這種「莊主經濟」的特點是「級別最低，權力最大」，而其所有制層次也低，基本上，此種類型的企業屬於合夥經營或家族經營，使其具有體制外的優勢，具有明顯的民營性。但也正因為如此，官方對蘇南模式的宣傳中，這兩個特點被刻意低調地處理，甚至感到忌諱（新望，2005）。例如，張家港的江蘇永鋼集團董事長是永聯村黨委書記吳棟材兼任，他在當地是一位「部落酋長」、「現代莊主」的社區領袖。但是，吳棟材

在當時的行政科層等級制度中只是一個副科級的地方幹部，身為一個大型冶金企業的董事長，他卻擁有實在而巨大的權力，亦即稅源及就業。更進一步而言，他的職權大小與企業效益、利潤沒有直接的關係，他此一權力所牽涉的主要層面是可利用和支配的各種經濟、社會及人事資源。而蘇州鄉鎮企業的政績主義也源自於此。鄉鎮企業的級別是由該企業的創辦者的官級作為本位來衡量的，蘇州的鄉鎮企業與縣（市）屬大集團企業有一項功能，就是向鄉鎮和縣（市）機關輸送同級別的幹部。因此，即使一個大企業越辦越糟，甚至瀕臨破產，但是這個縣裡有很多重要的領導幹部是由該廠廠長提拔而來，遂造成政府與企業這種同「級別」間的幹部交換關係。幹部搞企業的目的，就是為了撈政績、謀位子<sup>8</sup>（Ibid.）

蘇州這種地方黨政能人的治理邏輯持續在往後的不同經濟階段，陳德昇（2010）認為蘇州的地方幹部在經濟上的表現，使其主要幹部在仕途上扶搖直上，同時也形成「蘇州經驗」的國內輸出現象。陳指出，蘇州地方官員的仕途，明顯和其任內的經濟表現產生聯繫。一方面，蘇南地區長期以來政治色彩相對淡薄，從政大多抱持著「為官一任、造福四方」的使命感與企圖心；其次，地方幹部的素質相對較高，市場意識相對較強；最後，蘇南地區地方官員的任命與權力來源是上級中共組織部門，而非公民投票選舉產生，地方官員與首長優先考量的偏好是上級領導的意志、施政行為是否有助於升遷、以及階段性政經成長目標的訴求。而這幾項因素是蘇州地方政府在 1990 年代經濟轉型後，出現較佳的績效，以及地方幹部仕途發展較為平順的原因。我們從陳德昇提供的資料裡，可以看出蘇州及昆山兩地的市委書記仕途升遷的過程（見表 3-2 及表 3-3）。

---

<sup>8</sup> 「有些企業雖成了典型，紙糊燈籠樣樣好，但人一走，窟窿很大，有的能放進一個牛，有的甚至能放進一座小山。讓外面來的同志仔細地一個村、一個鎮的算算，哪來那麼大的 GDP！」（新望，2005：59）。

表 3-2 蘇州市委書記仕途升遷與時程

任期	姓名	升遷／時程					
1998/06 ~ 2000/12	梁保華	2000/12		2003/02		2007/10	
		江蘇省副省長		江蘇省省長		江蘇省委書記	
2000/12 ~ 2002/05	陳德銘	2002/05	2004/10	2005/02	2006/05	2007/11	2007/12
		陝西省副省長	陝西省代省長	陝西省省長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商務部黨組書記	商務部黨組書記、部長
2002/05 ~ 2004/10	王珉	2004/10		2005/01		2006/12	
		吉林省副省長		吉林省省長		吉林省委書記	
						遼寧省委書記	
2004/10 ~ 2009/06	王榮	2003/02		2004/10		2009/06	
		無錫市委書記		蘇州市委書記		深圳市委書記、深圳市代市長	
2009/06 至今	蔣宏坤	2001/11		2003/04		2004/01	
		南京市委副書記、副市長		南京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	
						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	

資料來源：引自陳德昇（2010：16）。

表 3-3 昆山市委書記仕途升遷與時程

任期	姓名	升遷／時程				
1996/01 ~ 2000/08	張衛國	2000/08	2000/11	2001/01	2001/06	2003/02
		蘇州市委副書記	鎮江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鎮江市委副書記、市長	鎮江市委副書記	江蘇省副省長

2000/08 ~ 2001/07	季 建 業	2001/07 揚州市委副 書記、代市長	2003/01 揚州市委副 書記、市長	2004/07 揚州市委書 記	2009/08 南京市委 副書記	2010/01 南京市市 長
2001/08 ~ 2003/04	張 雷	2003/04 江蘇省對外貿易經濟合 作聽廳長、黨組書記		2007/05 江蘇省對外貿易經濟 合作聽廳長、黨組書記		2008/03 泰州市委書記
2003/04 ~ 2006/06	曹 新 平	2003/12 昆山市委書記、昆 山經濟技術開發區 黨工委書記	2006/06 徐州市委副 書記、代市長	2007/01 徐州市市長	2009/07 徐州市委書記	
2006/06 至今	張 國 華	2005/12 昆山市委副書 記、市長、昆山經 濟技術開發區管 委會主任	2006/06 昆山市委書記、昆 山經濟技術開發 區黨工委書記	2006/12 昆山市委書記、昆山經濟 技術開發區黨工委書記、 昆山花橋經濟開發區黨工 委書記		
資料來源：引自陳德昇（2010：16）。						

陳志柔從地方社會網絡的觀點出發，考察蘇南模式產權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時，發現蘇南鄉鎮企業產權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是建立在蘇州地方社會制度的非正式限制，亦即以地方官僚為核心的權力網絡（陳志柔，2001：255）：

……「地方菁英壟斷制」的產權模式。這種「地方菁英壟斷制」與從前集體制的最大不同在於，從前地方菁英就是政治菁英，即鄉或村幹部，他們的任免和權力來自國家黨官僚系統，90年代後期興起的地方菁英卻具備強烈的「地方性」，他們未必是官僚體系的一員，他們往往與企業經理人合而為一，更加鞏固他們在農

村社區的權力基礎。集體資產股份化之後，形成一種新的產權制度模式，但卻未必符合私有化、自由化市場經濟的理想類型。

在蘇州地方幹部菁英的領導下，蘇州的人均 GDP 在 2007 年突破九萬元人民幣，是該年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倍；同年的蘇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21260 元，農民人均收入 10300 元，城鄉收入差距為 2.06：1，亦較全國平均的 3.33：1 為低。同年的外貿依存度達到 279.4%，是全國平均 66.3% 的 4.2 倍（洪銀興、陳寶敏，2008；見表 3-4）。

年份	人均 GDP (元)			人均收入(元)		城鄉收入差距		外貿依存度	
	全國	蘇州	比值	城市	農村	全國	蘇州	全國	蘇州
1978	381	634	1.66	-	-	2.57	-	9.7	-
1980	463	787	1.70	-	-	2.50	-	12.5	-
1985	858	1714	2.00	1.24	1.86	1.86	1.24	22.9	-
1990	1644	3617	2.20	1.42	2.42	2.20	1.29	29.8	44.8
1995	5046	15784	3.13	1.35	2.82	2.71	1.30	38.7	42.5
2000	7858	26692	3.40	1.48	2.42	2.79	1.70	39.6	107.9
2005	14103	66766	4.73	1.55	2.58	3.22	1.94	63.6	287.1
2006	16084	78802	4.90	1.58	2.59	3.28	2.00	66.9	289.5
2007	18665	91346	4.89	1.54	2.49	3.33	2.06	66.3	279.4

資料來源：引自洪銀興、陳寶敏（2008：3）。

如同現任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2008）在《改革開放三十年：蘇州經驗》一書的〈序〉對蘇州經驗的總結：

「蘇州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也是改革開放的一方熱土。30 年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引下，**蘇州市委、市政府帶領全市人民群眾**（按：黑體字為筆者所加），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搶抓發展機遇，不斷取得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成就；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使這座歷史悠久的美麗城市充滿活力和魅力；始終堅持協調發展，全面推進各項事業繁榮發展，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率先實現了全面小康的目標。」

在本節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瞭解蘇州黨政能人對地方經濟具有高度的行政管理權及威權性格，其治理邏輯以其地方利益，以及個人的經濟及政治利益為優先考量。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在鄉鎮企業發展階段，蘇南模式是符合國家的政經發展目標：它不僅維持了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政治意識型態，而且帶動地方經濟成長。到了外向型經濟的階段，吸引外資的投資，以及晚近推動產業升級等政策，都是同樣的治理邏輯展現。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指出蘇州在第一個經濟轉型的階段裡，大多是由地方鄉鎮村級的黨政能人兼任鄉鎮企業的廠長，在中國正在進行市場轉型的試驗階段裡，這些地方黨政能人由於掌握了行政、經濟與社會的權力，遂能夠高度行使其對資源的再分配權力，以主導地方經濟的投資活動。

本研究認為，蘇州鄉鎮企業由於其具有政企不分等的產權問題，最後所導致的產權改制，乃至鄉鎮企業被私人收購等社會正義問題，屬於另一個層面的社會

議題。造成蘇州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的飛地經濟格局，實際上，肇因於在市場轉型階段裡，這群缺乏遠見的地方黨政能人欠缺技術能力及政策自主性，無法藉以培育本地的鄉鎮企業養成電子業的技術能力。反而是在中央政府指示開發上海浦東新區之後，整個蘇州經濟發展的方向才轉向對外的大幅開放，並以資訊電子業外資為其重要的招商引資項目。從這個角度來看，此一階段蘇州經濟轉型的動力是被動的，並且奠定了其在第二個階段以外資資訊電子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此外，蘇州也因而失去了中共中央宣示在科技體制上建立自主性的機會。或許，這也正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市場轉型過程中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 第四章 全球在地化的飛地經濟

「社會學對市場制度的研究，讓我們了解下列事實：說哪一組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能夠最有效分配社會資源，根本沒那一回事。創造市場的真正議題，其實就在於怎樣營造出能夠創造穩定性以吸引投資的政治和社會條件。一旦這些制度創造出來了，就會有許多能夠賺錢的組織公司和市場的方式。由於整個社會深陷在市場創造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很合理地推論，為了創造公正公平的社會而進行的許多干預，事實上和利潤的創造是相容的。這些干預的成果之一，誠然也就是強化了市場制度的正當性。」(Neil Fligstein, 2007: 27)

蘇州正式展開外向型經濟的經濟轉型，是從新加坡工業園區（蘇州工業園區前身）成立之後開始，並且以引進外資的資訊電子業作為各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重點工業。不過，在蘇州首先以工業區吸引外商投資的地方是昆山，也因為昆山的地理區位更靠近上海，吸引了許多台灣中小企業前往設廠投資。蘇州從 1990 年代之後進行的經濟轉型所運用的地方制度，乃是透過兩種主要的跨國學習模式（Chien and Ho, 2011），包括地方幹部的個人網絡，以及跨國間的制度聯盟等模式來完善當地的各項軟硬體投資環境以承接全球生產網絡的移動，包括由華南地區北移到長江三角洲的台灣資本，以及其他海外國家及地區的投資。蘇州採用的跨國制度學習，主要是為了服務外商的生產及提升出口的效率，特別是針對講求出貨速度的資訊電子業，這些跨國制度學習確實提升蘇州整體的投資環境。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經濟區域主義的中國政經治理方式，導致蘇州內部的各個不同行政層級的地方政府為了本地經濟利益及經濟成長，莫不競相投入經濟開發區的投資與建設，而土地開發與招商引資也產生官商利益掛勾，因此在招商引資成效與地方 GDP 做為地方幹部政績指標的制度設計下，持續地吸收外資，遂成為蘇州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儘管，蘇州的經濟表現在中國城市排行中屢屢名列前茅，然而其所呈現的「發展，但缺乏技術學習」的經濟結構尤其明顯地表現在資訊電子業，形成所謂的「飛地經濟」。

本章以筆記型電腦產業為例，指出蘇州在第二階段的經濟轉型，主要表現在透過經濟開發區的密集開發，以及招商引資的手段，最終形成由外資領導的資訊電子業構成蘇州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產業組成，並且是蘇州的主力出口部門。不過，在蘇州資訊電子業的高度全球在地化過程中，產業聚落內部的社會鑲嵌機制，地方官員的跨國制度學習模式，以及蘇州本地對民營中小企業的制度性歧視等因素，使得蘇州再次錯過了培育本地技術學習體制的時機，在亮麗的出口及經濟成長的數字背後，我們可以見識到一個社會主義體制的地方城市如何運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手段打造出一個新興產業，但弔詭的是，這個新興產業卻與本地的技術學習體制出現斷裂，無法帶動蘇州整體的技術學習能力獲得進步。

## 第一節 打造開發區：全球在地化的地方制度基礎

本節指出，蘇州及昆山等地的全球在地化過程是透過經濟開發區的制度基礎，吸收資訊電子業的外商投資所促成。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其所形成的經濟與社會後果，一方面是造成了飛地經濟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是民間社會的經濟動能無法在這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充分的展現，地方政府的經濟治理邏輯是壓縮此一動能難以出頭的主要因素。

### （一）蘇州的開發區發展概況

昆山是蘇州市內最早籌建經濟開發區的縣級市，她在 1985 年自費興辦開發區，昆山在開發區建設的超前發展，一開始並未得到上級政府的認可，反而認為昆山不過是「小打小鬧」。但是，隨著昆山若干招商引資的作法逐漸成功的吸引台灣企業的密集進駐之後，也影響了蘇州其他地方在開發區與招商引資策略的學習。截至 2009 年為止，蘇州的國家級開發區共有五個，包括蘇州工業園區、蘇

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蘇州新區，下同）、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張家港保稅區、蘇州太湖旅遊度假區等。省級開發區則有十二個，分別是：常熟經濟開發區、太倉港經濟開發區、吳中經濟開發區、相城經濟開發區、吳江經濟開發區、張家港經濟開發區、滄墅關經濟開發區、昆山旅遊度假區、吳江汾湖經濟開發區、常熟東南經濟開發區、昆山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及昆山花橋經濟開發區。累計至2009年為止，蘇州國家級開發區的已開發面積為249.93平方公里，省級開發區的已開發面積為306.85平方公里（見表4-1）。

開發區名稱	已開發面積 (平方公里)	全社會固定資 產投資(億元)	基礎設施投 入(億元)	實際到帳外資 額(億美元)
<b>國家級開發區</b>	<b>249.93</b>	<b>5436.87</b>	<b>988.89</b>	<b>276.84</b>
蘇州工業園區	143.32	2766.30	508.59	127.48
蘇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36.00	1222.60	203.60	66.10
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	45.00	1022.88	172.35	59.12
張家港保稅區	5.61	304.82	82.66	21.48
蘇州太湖旅遊度假區	20.00	120.54	21.69	2.67
<b>省級開發區</b>	<b>306.85</b>	<b>4952.71</b>	<b>975.22</b>	<b>253.59</b>
常熟經濟開發區	41.00	752.40	116.37	42.79
太倉港經濟開發區	51.00	904.08	114.13	36.39
吳中經濟開發區	26.65	479.21	126.78	27.47
相城經濟開發區	13.50	212.72	49.29	7.47
吳江經濟開發區	34.00	625.02	115.33	41.34
張家港經濟開發區	31.20	360.32	95.03	20.28
滄墅關經濟開發區	14.13	195.28	67.58	7.26

昆山旅遊度假區	21.95	124.83	31.05	2.55
吳江汾湖經濟開發區	16.00	410.85	71.08	13.80
常熟東南經濟開發區	24.00	320.97	54.58	14.28
昆山高新技術產業園區	10.32	329.97	56.74	32.31
昆山花橋經濟開發區	23.10	237.06	77.26	7.64
資料來源：《蘇州統計年鑑 2010》，2010：318-319。				

蘇州通過開發區的制度安排，在全市形成不同的工業基地分布（見表 4-2），包括國家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國家軟件基地、中國紡織產業基地、常熟高分子新材料、吳中醫藥、吳江光電纜、太倉特種材料、張家港精細化工、昆山精密模具、特種鋼及製品、汽車零部件、特種化纖紡織品等。

地區	產業載體	基地建設
蘇州工業園區	信息產業園、國際科技園、生命科技園、出口加工區、軟件園	江蘇省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國內最大的軟件研發和創業孵化基地之一（國際科技園）。
蘇州新區	出口加工區、軟件園、環保產業園、新藥創製中心、大學科技園、“333”科技成果轉化基地	江蘇省電子信息產業基地。
蘇州市區	蘇州軟件園（由蘇州工業園區、高新區和昆山軟件園組成）	國家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國家軟件基地。
吳中	省級經濟開發區、國家級太湖旅遊區	吳中新醫藥產業基地。
相城	東橋工業區	全國重要的特種化纖紡織品產業基

		地。
昆山	昆山開發區、出口加工區、華揚高科技工業園、軟件園、宏碁集團（緯創）科技園	昆山傳感器、精密模具產業基地、江蘇省電子信息產業基地。
吳江	省級開發區	江蘇省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國家光電纜產業基地。
太倉	省級開發區、德資小區、日資小區、同濟科技園、中化國際高新科技產業園	太倉高科技新材料產業基地、中國紡織產業基地。
張家港	江蘇揚子江國際化學工業園、張家港保稅區、省級開發區、歐洲工業園、冶金工業園、糧油食品工業園、汽車工業園	張家港精細化工產業基地、張家港特種鋼及製品產業基地、中國紡織產業基地。
常熟	省級開發區、東南開發區、江蘇高科技氟化學工業園、沿江工業園及生態園	國家火炬計畫高分子材料產業基地、中國紡織產業基地、中國休閒服裝名城。
資料來源：修改自金碚、劉戒驕（2008：108-109）。		

蘇州市的產業佈局也搭配著城市地理空間的規劃，實施工業退城進區工程，這個工程的目的是在於使產業結構能相應於蘇州市的地理區位條件，調節出合理的產業聚落分布，並使之具有在地特色（見表 4-3）。目前，蘇州市正朝向所謂「兩軸三帶」的方向，調整全市的產業結構佈局。兩軸，包括沿滬寧東西發展軸，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昆山開發區等分佈其中，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要產業結構；其次，蘇嘉杭南北發展軸，以發展物流產業和輕紡產業為主。三帶，包括沿江基礎產業帶，集中發展鋼鐵、化工、電力及造紙等工業，以發揮臨港的地理區位優勢；其次，沿滬寧浙現代加工產業帶，集中發展汽車零配件、精密機械、光

電纜和絲綢產業，以成為上海及浙江的產業配套生產區域；最後，沿湖休閒度假旅遊帶，主要發展研發設計、傳統工藝及現代服務業等（金碚、劉戒驕，2008：110-111）。

表 4-3 蘇州市產業佈局情況及其發展方向

地區	現有產業佈局	未來發展方向
蘇州工業園區	電子、機械	電子信息（光電、半導體）、精密機械、機電一體化。
蘇州新區	電子、機械	電子信息（電子通信、電汽器材）、機電一體化。
吳中	醫藥、電子、建材、機械、輕紡	生物醫藥、電子資訊、精密機械。
相城	汽車零配件、電子、建材、化纖	汽車零配件、特種化紡織。
昆山	電子、機械、化工、特種汽車及汽車零配件	電子信息（PC 及 NB 製造、計算機及周邊）、精密機械、精細化工。
吳江	絲綢紡織、電纜光纜、電子	絲綢紡織、電纜光纜、電子信息（計算機及周邊、通訊）
太倉	輕紡、食品、機械	精密機械、電力能源。
張家港	冶金、紡織、機電、輕工、化醫、 建材	冶金、新型紡織、精細化工。
常熟	紡織、冶金、化工、高分子材料及 製品	紡織服裝、機械冶金、高檔造紙。
蘇州大市	機械、電子、化工、輕工、建材、 工藝、鋼鐵、醫藥、紡織、絲綢、 汽車及零配件	電子信息（半導體、光電、電子零組件、PC 及 NB 製造、計算機及周邊、通訊）、精細化工、冶金、高檔造紙、生物醫藥、新型紡織、精密

	機械、汽車及零配件。
資料來源：修改自金碚、劉戒驕（2008：110-111）。	

## （二）開發區的制度學習

### 1. 昆山就是開發區：地方官員個人網絡的制度學習模式

「**昆山就是開發區，開發區就是昆山，昆山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就是通過開發區來帶動的<sup>1</sup>**。」這是昆山市委書記兼昆山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的張國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所言。作為縣級市的昆山，在地方GDP的表現上，經常名列中國百大縣級市排行之首。張國華的話，具體而微地點出了昆山在改革開放之後，透過開發區的發展策略及制度設計，促使昆山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重要節點。

當蘇南模式如火如荼展開時，1980年代的昆山經濟總量在蘇州市下轄的六個縣中墊底，被戲稱為「小六子」。1984年，蘇州市被國務院列為開放城市，同年昆山籌建「工業小區」。昆山縣委及縣政府在縣城老城區劃出3.75平方公里做為開發區的用地。昆山此一時期的發展，在當時三線軍工企業實行軍轉民的生產時，昆山適時地引進這些三線企業的進駐，同時承接上海老城區轉移出來的工業企業，打下了工業基礎，也培育出最早的技術工人和企業管理者。

根據宣炳龍的回憶錄（鍾永一、張樹成，2009），昆山在缺乏工業基礎的情況下，採取「東依上海，西托三線」的發展策略。首先，引進上海的加工廠，例如引進上海金星電視機廠在昆山成立分廠，昆山為其從事加工。其次，引進江西、四川、貴州及陝西等地的三線企業及工業人才，最早到昆山投資的電子業三線企業是江西三線廠，897廠及999廠，其中897廠在昆山設廠，更名為萬平電子，從事電子零配件製造。昆山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是1985年成立的「中國蘇旺你有限公司」，由中日合資，中方佔51%股份，日方佔49%股份，從事工藝手套的

<sup>1</sup> 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全球資訊網，〈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產業載體健全產業體系〉，2009-07-28。

加工。昆山自費籌建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則在 1992 年由國務院批准為國家級開發區，開發區面積持續擴張到 6.18 平方公里。到 2008 年為止，昆山經濟開發區的三大主導產業，分別為電子信息、經濟機械及民生用品，工業生產總值 3317 億元人民幣，其中電子信息產業的產值高達 2300 多億元人民幣，佔開發區工業總產值的 70%。

在招商引資的策略上，吸收台資廠商是昆山的主要工作。從 1990 年 10 月第一家台資企業<sup>2</sup>投資昆山至 2010 年 6 月為止，累計投資昆山的台商投資已經有 3738 家，註冊資金 207.7 億美元，增資項目 1686 個，總投資金額高達 442.5 億美元。台商在昆山的投資總額佔蘇州的一半，江蘇省的四分之一，中國的九分之一。以 2008 年統計來看（表 4-4），台商在昆山的投資金額排名外商投資的第三名，但累計的投資項目排名首位（吳瑟致，2011）。由此可見，台商對昆山產業經濟發展的角色與貢獻，非常重要。

國別	2008 年投資項目數	2008 年投資金額	歷年累計投資項目數	歷年累計投資金額
英屬維京群島	32	67,580	283	474,143
香港	18	35,925	228	286,958
<b>台灣</b>	<b>17</b>	<b>1,473</b>	<b>357</b>	<b>105,510</b>
日本	6	2,016	132	100,473
開曼群島	3	8,481	35	81,251
薩摩亞	11	12,068	86	70,320
新加坡	2	1,866	72	49,015
美國	8	2,479	116	42,407
百慕達群島	-	-	3	12,350

<sup>2</sup> 順昌紡織有限公司，引自吳瑟致（2011）。

韓國	3	1,668	48	12,086
資料來源：引自吳瑟致（2011：17）。				

最早大規模進駐昆山的台商資訊大廠是仁寶電腦。1990年，仁寶要進入中國大陸設廠，但是需要中國當地的映像管供應商配合生產。仁寶原先計畫在上海市寶山區設廠，由陝西咸陽的彩虹集團供應映像管。昆山政府派人到陝西彩虹集團，欲說服該廠到昆山成立分廠，以引進仁寶到昆山的投資。起初未獲得彩虹集團的同意。經過多次的溝通協調後，彩虹集團才在昆山成立銷售公司。昆山政府接著與仁寶接觸，希望仁寶到昆山投資（鍾永一、張樹成，2009）。隨後，仁寶電腦決定在昆山設廠。仁寶在1996年設廠，以視訊產品為主，到目前為止，共計設有三個廠房，員工人數約三千多人。此外，仁寶昆山廠則以生產筆記型電腦為主，2000年成立於昆山出口加工區，員工人數大約三萬多人<sup>3</sup>。

隨著仁寶的進駐，帶動其生產網絡在昆山的投資，複製其在台灣的生產模式。仁寶的個案，與蘇州明基的投資過程類似，亦是將其原先的供應商網絡帶往蘇州，進而形成蘇州資訊電子業的產業聚落（吳翰有，2001；張家銘，2006）。全球生產網絡在成本驅動下的遷徙中，以台灣為例，1980年代末期，往東南亞的投資，是所謂第一波的對外投資；資訊產業台商第二波的大規模遷徙，始自1990年代，他們往中國的珠江三角洲及長江三角洲複製台灣生產網絡。約2000年之後，產業別出現技術及資金密集的轉變，最明顯的結構變化即是面板產業及半導體產業展開其對大陸的投資活動。2009年之後，台商在惠普公司的招手下，則又展開另一波往四川省及重慶市設廠的趨勢。

昆山資訊電子業的發展，以筆記型電腦及其相關的零組件供應商為主<sup>4</sup>，構成一個龐大而完整的筆記型電腦產業聚落。昆山市的角色，則是為這些筆記型電腦代工大廠提供開發區的土地、勞動力，以及稅收優惠政策等。昆山為外資進行

<sup>3</sup> 參考仁寶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sup>4</sup> 蘇州台商的印刷電路板產業分析，可參見李順騫（2004）。

組裝加工及出口的生產模式，在 2000 年昆山出口加工區得到國務院批准之後，更加形成一個制度慣性。

昆山出口加工區如何形成的過程，目前有兩個版本的詮釋，這兩個版本的細微差別，在於第一個版本是從地方政府角度出發的解釋，強調地方黨政能人的自發行動，目的在於解決資訊電子產業產品的通關效率問題，以及藉由出口加工區的成立吸引更多外商投資。至於另一個版本，則是所謂「跨界治理」的解釋（柏蘭芝、潘毅，2003），強調資訊電子業台商與昆山地方政府在該產業聚落內的制度設計上的共同治理，而昆山政府在這些制度上的追趕學習高度參考台灣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園區的制度。但是，這兩個版本在在說明了昆山地方官員的個人網絡關係是促成出口加工區得以形成並落實為中央政府決策的主要因素，此一個人網絡關係，除了地方官員從跨國投資的台商那裡得到出口加工區的相關實務知識之外（Chien and Ho，2011），地方官員與上級政府幹部之間的個人關係，也對政策的決策過程帶來影響，而這個微細的地方是 Chien and Ho 所忽略的。

第一個版本的詮釋，建立在宣炳龍回憶錄（鍾永一、張樹成，2009）的說法。他觀察到資訊電子業越來越朝向及時（Just in time）的生產及銷售方式的改變。產品的生產速度不僅要跟上市場的變化，產品的出口時間也必須儘量縮短。後者涉及了海關通關的效率。宣炳龍為此曾到台灣考察加工出口區的實際運作，及相關的法令和制度，回到昆山後，從 1997 年開始，宣炳龍著手規劃兩個多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區。但是，時值亞洲發生金融風暴，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要求整頓開發區，令他的構想平添許多的阻礙。首先，昆山政府詢問國家特區辦公室有無申辦出口加工區的可能性？國家特區辦的回覆是「想都不要想」（Ibid.：56）。後來，宣炳龍找上與他同是浙江人的國家特區辦的常務副主任陳順桓，陳建議直接寫信給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三個月之後，李嵐清回覆，並批示請特區辦和海關總署拿出方案。由於出口加工區的成立涉及稅收、海關及商檢等政策問題，因此需要八個部委會商。但是不久後，國家特區辦在中央機構改革中被撤銷，會商的事情等於落空了。不過，事情的轉機在於，八個部委在國家特區辦撤銷之前，

曾經開過一次會議，各部委的相關處長都參加了，會議之後留下一份紀要，也有與會者的名單。宣炳龍透過關係取得這份紀要，於是親自跑八個部委，請各單位的第一把手簽字。這個過程高度依賴著中國官場上的社會網絡關係：

「這個會商都要一把手簽字，從財政部開始，跑了一年多時間，最後是國家稅務總局，他們什麼人都不肯接待。怎麼辦？後來我們找到與國家稅務總局有業務關係的蘇州市財政局，請他們幫助聯繫。一個月後，國家稅務總局的一個負責人同意接待。跑到那裡說，我們有關出口加工區的會商的文件已經寄出兩個多月了，是不是能請領導快一點簽下來。答覆是：『可以啊，快一點，快一點，無非就是同意和不同意。我現在給你快一點：不同意！你們蘇州那麼多開發區了，還辦什麼出口加工區！』這個領導個性跟我一樣，很乾脆，這樣一句話就否決了。頓時，我想來想去，這位領導以前在化工局當副部長，是我們江蘇省老省長顧秀蓮的同事。我說『陳局長，我今天找你也是沒辦法了，顧省長臨離開江蘇時到昆山來，對我們講，你們要建設好江蘇的東大門。搞出口加工區就是想完成老省長交代的任務。辦不成，沒辦法交代啊』。他聽了我的話就冷靜下來，再聽我慢慢講了……就這樣，蓋了八個部委的最後一個章。八個部委簽好了，牽頭的特區辦沒有了，誰幫你行文送到國務院去呢？問題又來了。」(Ibid.: 58)

國家特區辦在裁撤之前，有位趙光華副主任，江蘇人，後來調往海關總署當常務副署長。宣炳龍透過他的關係，尋求關長的同意送件。

「我回來向（昆山）市委張衛國書記匯報，請他出面。當時全國正在打擊走私，海關也『砸』進去一些幹部，關長情緒不好，加上身體不好，在家休息。後來總算約好，晚上9點到他家，我和張書記兩個人去，秘書講好了10分鐘。後來一弄兩弄講了一個多小時，因為聽我們談想法，他來勁了。我說，原來搞出口加工區的形式是遍地開花，山頭上、海裡面到處都有，監管很難，走私損失的可能性

很大。搞出口加工區，全在網裡面，2 平方公里放它 20 個探頭，全在你海關眼皮底下，不能走私……（趙）光華副署長原來在特區辦，知道這件事也願意做這件事，但需要您點個頭。他後來就打電話給趙光華叫他辦。趙光華副署長就重新組織這件事，開了幾次會，座談會上我們也講。最後形成的文件是由海關總署打報告送國務院的。」（Ibid.：59）

自 1997 年底，昆山向國務院申請創辦出口加工區，2000 年四月，全國批准了十五個出口加工區，昆山是首批十五個城市中唯一的縣級市。到了 2000 年十月，2.86 平方公里的昆山出口加工區完成七通一平，海關及商檢系統全面進駐，成為中國第一個封關運作的出口加工區，引進了台灣重要的筆記型電腦廠商，包括仁寶、緯創資通、神達等六家。「出口加工區的進出口總量從幾千萬美元到 10 億美元，現在做到了 500 多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出口加工區幫我們引進了一大批高新技術企業，昆山高新技術產業逐漸形成聚集效應。」（鍾永一、張樹成，2009：59）

第二個版本由柏蘭芝及潘毅提出的「跨界治理」（transborder governance）的觀點。他們在 2003 年發表的文章〈跨界治理：台資參與昆山制度創新的個案研究〉一文中，對「跨界治理」的界定：「政府透過和跨界的、不同利益主體的行動者互相協商，形成一組制度規範，以利於跨界生產體系的運用。」（Ibid.：69）在這篇文章中提到，昆山出口加工區的形成，和來自楠梓加工出口區及新竹科學園區的眾多台灣廠商息息相關。昆山台商與昆山政府的頻繁交流，介紹台灣保稅特區如何減少海關監管的難度，同時提高企業通關的效率。於是，昆山政府委託台商協助蒐集相關資料，其後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曾經六度造訪台灣，參觀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區及新竹科學園區：

「由於當時根本還沒有關於出口加工區的政策，所以所謂的申報，其實是一個說服中央進行制度創新的過程。該主任表示在報批的六七個月間，跑了北京 84 次，

穿梭海關總署、國家計委、財政部、稅務總局、國台辦、外匯管理局，總共見了 8 個部長。而在這個過程中，昆山沿用了從前先自費辦開發區再申請“國批”的路子……一邊跑，一邊建。昆山迅速的完成加工區的規劃，馬不停蹄的開始基礎設施建設和招商。」(柏蘭芝、潘毅，2003：75)

對 IT 產業而言，他們之所以青睞出口加工區，並不在於優惠政策的誘因，而在於出口加工區具有的通關便捷的優勢。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欲凸顯的重點在於台商從早期的靠關係、走後門，到後來藉由台商協會的集體協商力量直接參與昆山制度創新的制度變遷過程，其意義在於地方政府與台商協會雙方創造出一組制度規範：

「以加工出口區為例，它的**邊界**(黑體字為原文所加，下同)清楚，甚至有警衛，但出入的規則(表現在關稅上)有彈性的執行方式。由於台資直接間接參與了這個地方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的程度上台商瞭解這個邊界的建立和劃定，同時也瞭解它的**出入規則**。甚至於瞭解**建立這個邊界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打破它**。如此，在加強通關效率的同時，也降低了台商誤觸法網的風險，起碼不至於輕易被查封工廠或銀鐺入獄。我們把這個過程叫做“跨界治理”的形成。」(2003：84)

2006 年 12 月，經國務院批准，昆山出口加工區在保稅加工的基礎上試點拓展保稅物流功能。功能的拓展，解決了出口加工區功能單一的問題，為出口加工區從單純的保稅加工向保稅加工、保稅物流、研發、檢測、維修、售後服務等領域發展創造了條件。出口加工區也邁出了從加工製造業向現代服務業轉型的第一步。目前，區內擁有 24 家售後服務機構、8 家研發機構、8 家維修機構；在 2009 年，三項營業收入總額超過了 13 億美元。截至 2009 年為止，出口加工區累計引進入區註冊項目 116 個。引進專案總投資 20.5 億美元，註冊資本 10 億美元。已投產企業 110 家，其中工業企業 90 家，物流企業 20 家。累計完成工業產值 7543

億元，進出口 1714 億美元，實現稅收收入 30.7 億元。截至 2009 年為止，區內筆記型電腦的年產量超過 6000 萬台，增長了 20%，並且佔全球總量的一半。昆山出口加工區內已集聚了仁寶、緯創資通、昆達、彩晶等一批重要的台灣IT企業，成為電子資訊、光電、精密機械和保稅物流產業發展集聚區。2010 年的一至四月，昆山出口加工區實現保稅出入庫金額 182 億美元，同比增長 124.42%，預計全年（2010）可實現保稅出入庫金額 450 億美元<sup>5</sup>。

上述兩個昆山出口加工區成立過程版本的互文對照之下，可以看出宣炳龍凸顯的是他及地方黨委書記身為政府領導班子的政治能人形象，而刻意不提及台商協會對其決策的建議角色。至於柏蘭芝及潘毅的文章，則揭露了台商協會在昆山加工出口區的建議角色，並將昆山的個案安置在全球生產網絡的脈絡下，凸顯台灣IT產業生產網絡在昆山的跨界治理。台商對昆山領導幹部的觀念創新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貢獻，亦即把昆山市政府由傳統官僚型政府轉型成服務型政府<sup>6</sup>。

隨著外資企業的增多，昆山建立了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聽取外商的政策意見及作為外資之間聯誼交流的平台。在昆山市政府的服務理念裡，例如 1999 年提出優化投資環境的三條新措施，包括：(1)誠信服務：政府承諾的一定要辦到及辦好；(2)規範行政：對投資者一定要講法制及規範服務；(3)降本增效：制止不規範的收費行為，降低服務收費的幅度。2001 年又推出所謂「團隊合作、效率效能、國際慣例」等三條服務準則。昆山市政府往服務型政府的轉向，目的是為了營造出「親商、安商、富商」的投資環境（黃承圯，2003）。

## 2. 跨國聯盟的開發區模式

---

<sup>5</sup> 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全球資訊網，〈昆山出口加工區：“後危機時代”的“華麗轉身”〉，2010-07-09。

<sup>6</sup> 一位 C 教授回應這兩個版本，他的觀點質疑跨界治理的政治性，但肯定台商對地方官員觀念創新的貢獻。C 教授（2009）認為，「跨界治理」是否可以延伸為涉及兩岸政府行為？言下之意，他認為台灣學者對此概念並未清楚界定，也缺乏明確概念與共識。但是，C 教授認為昆山地方領導幹部的觀念創新才是對當地跨界治理的一大創新，昆山市政府能由傳統官僚型政府轉型至服務型政府，主要就是台商的貢獻。

蘇州市區內的開發區「雙翼」，亦即蘇州工業園區與蘇州新區，分別在 1994 年及 1995 年正式成立。1994 年，中國政府與新加坡政府在北京簽署《中新兩國政府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協議的內容包括中新雙方合作開發蘇州工業園區的基礎建設，以及中國政府同意蘇州工業園區在緊密結合中國國情下，自主地及有選擇地借鑒、學習新加坡經濟和公共管理的經驗。開發初期，兩國計畫利用十年時間，分三期完全開發園區約 70 平方公里的土地，為此成立了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以負責基礎建設的籌建。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與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共同擔任蘇州工業園區聯合協調理事會主席。不過，中新雙方的合作在蘇州新區成立之後，漸漸產生嫌隙，1999 年中新聯合協調理事會在新加坡舉行第四次會議，簽署《諒解備忘錄》，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中新雙方在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進行調整，新加坡持股比例由原來的 65% 調降為 35%，中方持股比例則調高到 65%，成為最大股東（廖順賢，2001）。

蘇州新區則在楓橋鎮經濟開發區的基礎上擴張而成，並指派當時的副市長王金華出任管委會主任，並成立蘇州新區經濟發展集團總公司（簡稱，蘇新集團），所有權歸地方政府，是一個專業開發企業，董事長由王金華兼任。蘇新集團的目的在於籌資，由於蘇州新區管委會沒有權限向銀行貸款，也不可能發行股票，於是關於蘇州新區的融資業務均歸蘇新集團負責。1997 年，蘇新集團以蘇州新區高新技術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義在上海股市成功上市，上市三年以來，公司資產翻了四倍，達到 24 億人民幣，並且成功向銀行借貸 14 億人民幣。再加上母公司資產，合計高達 55 億人民幣，使得蘇新集團的蘇州高新區有了充裕資金投入各項基礎建設（Ibid.）。

蘇州這兩個國家級開發區的比較，請見表 4-5。蘇州新區由於是「一套人馬，兩塊招牌」，較蘇州工業園區更容易取得資源及訊息。為了解決兩個工業園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省裡指示把兩個園區的管委會主任及相關管理人員互調，透過

管理階層人員輪換的方式，這才漸漸平衡了兩個園區發展不平衡的情況<sup>7</sup>。

蘇州工業園區的成立，對蘇州開發區制度最關鍵的跨國制度學習影響，在於成立「蘇州工業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辦公室」，這項制度安排促使蘇州工業園區自 1994 年四月份起，陸續選派年輕的管理人員赴新加坡，接受新加坡政府的培訓（潘云官、周志方編，1999）。這項制度對蘇州後來的招商引資政策、開發區的開發模式，及所謂的親商政策<sup>8</sup>，帶來了相當重要的制度學習<sup>9</sup>（吳敬璉，2009）。

項目	中新蘇州業園區	蘇州新區
政企關係	政企分離	政企合一
與行政區關係	管委會與蘇州市政府之間缺乏政經網絡之聯繫。	管委會與蘇州市政府之間有密切的政經網絡聯繫。
政府職能	園區與地方政府之間職能未能配合，必須花費較多的成本（費用）。	新區管理職能、機構與蘇州市政府密合度較高，效率較高和彈性較高。
法律定位與管理權限	許多引介新加坡的法規仍需要蘇州市政府和市人大的審	蘇州新區管委會享有副市級待遇，相關法規獲得

<sup>7</sup> 訪談記錄 SZ1014。

<sup>8</sup> 鄭永年指出，新加坡提出「親商」的概念，其目的是為了「親民」，而非如中國將之做為發展本身的目的：「就我所知，新加坡發明了“親商”的概念。中國的“親商”概念就是從新加坡借用過來的，首先出現在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然後擴展到全國各地。…新加坡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是政治人才主導的，這就提出了政府要“親商”的問題。就是說，政府要為商人和資本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讓他們發揮很大的作用，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新加坡的工業園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但是，“親商”和發展本身不是目的，它們的目的是“親民”。就是說，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在中國，“親商”和“親民”之間的關係一直沒有理順。從新加坡的經驗看，這不是矛盾的。要發展就要“親商”；但要可持續地發展，要建設和諧社會，要長期執政，也同時必須“親民”。」（2010：230）

<sup>9</sup> 例如，1994 年級的蘇州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本科生，在校期間，經常接受新加坡籍教師的工商課程培訓。蘇州為了因應蘇州工業園區成立之後，大量工商專業人才的需求，不僅在蘇大新增相關科系，並與新加坡借鑒辦合作開設相關課程，希望本科生在畢業之後能到蘇州工業園區服務。

	<p>批和立法。對於周邊地區的管理仍需要蘇州市政府的配合。</p>	<p>蘇州市政府的支持。</p>
<p>資料來源：引自廖順賢（2001：61-62）。</p>		

### （三）開發區高度建設的代價

「**昆山就是開發區**」的現實問題在於土地不足，無法持續供給外資擴廠的土地需求。其次，則是早期的招商引資政策，吸引了大量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造成當地生態污染的環保問題，以及工業用電用水不足等。再者，當地生活水準提高之後，對城市生活空間的重新規劃有新的期待，因此原先座落在鄰近市區的開發區廠商在都市更新規劃之下，面臨遷廠問題，而這對地方政府而言，更是進行所謂的產業升級的一個斧底抽薪方法。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昆山採取招商選資的方式，不再普遍歡迎各種產業的外商投資，同時採取所謂「騰籠換鳥」的政策，欲將高污染、高耗能及規模小的台資廠商遷出昆山。

其次，大蘇州在開發區的土地開發上與招商引資的經濟發展邏輯有著密切的關連，地方幹部著眼的仍在於地方 **GDP** 的成長與個人政績的好壞。在此一治理邏輯下，在農地轉換成工業用地的過程中，農地不斷大量流失，至於農民的抗爭事件則是屢見不鮮。

#### 1. 昆山的「騰籠換鳥」

由於昆山的都市更新規劃、交通道路，以及市區與生產區域的調整，並且在中央政府促進節約集約用地政策的要求下，招商必須符合低耗能、低污染、高產能、高產值、佔用土地面積少的產業為主要招攬對象。以下則以昆山某知名磁磚

專業製造公司B公司<sup>10</sup>為例，說明昆山的「騰籠換鳥」政策的執行過程。

B公司在1997年投資昆山，這項投資案使得公司成為東南亞地區規模最大的磁磚製造廠，並一舉成為全球重要的磁磚專業製造廠之一。由於昆山在2000年進行都市重劃，導致B公司原先設廠的地區，面臨土地科目的變更，於是B公司被迫展開遷廠。一方面，B公司在昆山另覓土地重設新廠，另一方面，則在2003年前往山東蓬萊地區繼續擴大生產經營。B公司屬於高耗能產業，佔用較多的土地面積，生產的是產值不高的磁磚及衛浴設備。但在2000年，昆山要將該區域土地變更為生活住宅區、文教區及商業活動區等，凡是座落在都市計畫區域的廠商都必須遷移廠房，並且在2003年7月開始執行。在這個過程中，昆山台商協會的會長與公共關係委員會不斷地與昆山政府開會，協調遷廠的共識及其他可能解決的替代方案。昆山政府要求廠商遷廠，涉及了尋覓新的生產用地及設備變賣或遷移，以及補償金額等問題。面臨遷廠的B公司，除了將老舊設備變賣及淘汰之外，也將昆山政府的補償金投入山東新廠，同時在昆山其他區域以土地換土地的方式取得生產用地，另建新廠。就昆山這次較大規模的台商遷廠處理過程中，廠商並沒有真正獲利，由於昆山政府的行政作業、地區的人際關係複雜，以及各種行政法規的限制等因素，面臨必須拆遷的廠商想在昆山取得另建廠房的土地變得非常困難。即使能順利地在昆山覓地建廠，由於交通路線及廠房位置較之前的地點偏僻等因素，反而造成招工上的困難，因此新遷移的廠房都有員工招募不足等生產上的問題（葉政武，2008）。

昆山政府採取所謂「騰籠換鳥」政策以調整當地的產業結構，實際上這項政策可視為一項都市更新計畫，而非真正在技術層面上的升級。如原昆山開發區主任宣炳龍所說，將低技術含量、低增值率的外資企業轉移出去，再將高新技術、低能耗產業引進來，這個「騰籠換鳥」的過程，就是利用外資水平升級的過程。

---

<sup>10</sup> 我在2010年8月隨同東京大學園田茂人教授與東吳大學張家銘教授的研究團隊，參訪過B公司。

## 2.蘇州圈地運動與招商引資

當我在 2010 年 7 月下旬抵達蘇州，進行田野的資料蒐集時，就在該月份，於蘇州新區的虎丘一帶發生所謂的「通安事件」。事件起因於七月中旬，蘇州市虎丘區（高新區）通安鎮的村民們向鎮委、鎮政府領導索要「被克扣的」的拆遷補償款遭到官員拒絕，於是聚眾於鎮政府門口，挾持鎮委書記王軍，並且封堵 312 國道。聚眾人數超過萬人，群眾與防暴警察之間發生言語和肢體衝突，部分群眾被警察打傷。7 月 21 日，虎丘區政府緊急宣佈通安鎮暫停拆遷作業，並且將鎮黨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免職，欲藉此安撫民心。不過，「通安事件」引發連鎖效應，通安鎮領導被撤職之後，在 21 日當晚，滄墅關鎮數千名村民聚集在滄墅關鎮政府門口，警民再次發生衝突，導致數人受傷。此外，東渚鎮亦出現數千群眾聚集的現象。到了 7 月 28 日，蘇州市委宣佈，蘇州新區黨工委書記、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就地免職<sup>11</sup>。「在地方政府設想中，蘇州高新區的『通安產業園』南部形成以電子資訊產業為主的『日本工業村』，北部是汽車零部件及精密機械項目，西部以輕工業項目為主，重點引進『專案體量大、科技含量高、投資密度強、行業帶動性好』的專案。<sup>12</sup>」

蘇州此次的「通安事件」所反映的，首先是與地方政府的拆遷補償費有關，因為補償金額的同市落差，引起通安鎮居民的反彈，以及對地方幹部貪腐的質疑。其次，鎮政府徵用農地的目的是為了開發工業區，以進行招商引資，這是蘇州各級地方政府普遍的作法。楊友仁、王鴻楷、郭健倫（2004），楊友仁（2005）及郭健倫（2005）均指出，蘇州各級地方政府積極開發工業區的目的，就是為了招商引資，自 1990 年代中期之後，台商資訊電子業的投資帶動了土地龐大的需求。蘇州的重點開發區集中在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及吳江經濟開發區等縣級市及蘇州市區，但是部分的鎮級政府也加入這場外資爭奪

---

<sup>11</sup> 《南風窗》，〈蘇州“通安事件”善後〉，2010 年第 17 期。

<sup>12</sup> 資料來源，同註 11。

戰中，這些鎮級政府批租土地的速度和數量都相當可觀，造成開發區遍地開花的現象。楊友仁等人對蘇州土地產權體制轉化的分析，指出了地方政經制度在招商引資的主導政策之下如何進行「圈地」，以及各級地方政府競相「流血輸出」批地，以吸引外商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

在中國大陸，近年來如蘇州通安事件層出不窮，劉雅靈（2010）提出的「中國準計畫行政體制」（semi-planned administration）觀點，可以作為另一個補充。劉雅靈認為中國鄉鎮級政府財政赤字與債務的原因，來自於「中國準計畫行政體制」的制度安排所造成。所謂的「中國準計畫行政體制」，由三個面向所構成，分別是幹部目標責任制、上級政府支出責任下移，以及國家父權主義。這三個面向導致農村幹部為了如期完成上級下達的年度政策指標，不惜犧牲財政紀律及背負債務以追求個人政績和晉升的利益最大化。此一制度約束，一方面犧牲了地方長遠發展與稅源培養，另一方面迫使地方基層政府轉變為資源掠奪的收租者，甚至是負債者，一旦當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危機，社會主義的國家父權制才會伸出援手，進行紓困，因而更加惡化及複製農村基層財政的軟預算弊病。

地方政府將農地變更為非農地的土地開發目的，除了提供外資所需的建廠用地之外，進行房地產開發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不論是城市土地的國家所有或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裡，地方政府出於謀利的動機和財政收入的壓力，同時為了政績和形象工程，因此熱衷於招商引資，以極低廉的價格從農民手上取得土地，然後將土地出讓給地產資本，在這個交易之中，政府和地產資本是「雙贏」的（潘毅等，2010）。

## 第二節 蘇州資訊電子業的發展

### （一）台商帶動發展的筆記型電腦產業

1990年代中期之後，蘇州的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發展迅猛，1985年佔蘇

州整體製造業的比重為 5.9%，1990 年為 7.3%，1994 年為 14.1%，到了 2002 年上升到 21.3%。此一態勢的發展與外資的投資有著高度關連，1999 年蘇州的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產值為 264.22 億元，其中外資貢獻了 239.56 億元，比重為 90.7%；到了 2002 年，該項產業的產值為 719.67 億元，外資的貢獻達 689.75 億元，外資所佔的比重進一步達到 95.8%。因此，蘇州的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的新增生產能力，基本上是由外資製造業提供的（當代上海研究所編，2005）。

另一方面，資訊電子產業在 1990 年代產生重大的技術變遷，生產技術的模組化和數位化，改變了資訊電子業的全球生產架構。Sturgeon（2002）提出所謂的「模組化生產網絡」，亦即不同資訊產品可以共用相同的程序，促使產業結構產生垂直分化的改變。因應技術變遷而產生的產業結構變化，使得一個產品能分解成不同的模組，得以在不同的地方、時區生產，然後運送到特定的地方組裝成為最終產品。此一全球產業分工方式也進一步演變成全球生產網絡（Ernst and Kim，2002），資訊產業的跨國公司逐漸形成全球網絡的旗艦公司，整合分散的供應商、知識及消費者，將之構成全球的生產網絡。處於全球生產網絡中心的旗艦廠商掌握了產品研發與行銷等策略，生產流程則外包給關鍵契約供應商，後者又領導其下游的零組件供應商，專注於特定產品的製程改良，提升網絡組織的生產力。換句話說，關鍵契約供應商及其下游供應商所建構的生產網絡必須發展出能符合旗艦廠商所要求的技術能力與組織能力，包括產品的數量、品質，以及生產過程的彈性與速度等。而在全球筆記型電腦產業裡，台灣的電腦製造廠商是主要的關鍵契約供應商。

蘇州筆記型電腦產業是由台灣廠商的大量投資所帶動，至 2010 年為止，蘇州官方宣布台灣前十大筆記型電腦廠商均在蘇州落戶，同年蘇州市的台資企業數量約有 9024 家，其中三成以上為資訊電子業，蘇州已經是台灣資訊電子業聚集密度最高的中國城市。在受到生產成本、國際品牌客戶、中國市場等因素的帶動下，台灣筆記型電腦在 2001 年後加速其在中國大陸的設廠投資活動。蘇州在筆記型電腦產量的大幅成長，與台灣政府開放相關產業赴中國大陸投資有關。

台灣政府在開放探親之後，部分台商以在第三地成立公司的方式間接投資中國大陸，1992 年至 2000 年這段時間，赴中國投資的台灣廠商以中大企業為主，例如宏碁、大眾及神達等企業，中國對投資資金的需求以一百萬美元作為招商引資的主要對象。2000 年之後，台灣股票上市公司大量進入中國投資，台灣政府規定上市公司投資中國大陸的金額上限以公司資本額的 40% 為限，中國對投資資金的需求則以五百萬美元以上的企業為主要對象。同時，為了調整產業結構，中國政府的招商方式也從招商引資轉變為招商選資的策略<sup>13</sup>（葉政武，2008）。

在 2001 年時，台灣宣布開放包括筆記型電腦、手機等資訊電子業赴中國投資之後，到 2005 年大眾電腦關閉其在台灣的最後一條筆記型電腦生產線為止，台灣的筆記型電腦生產線已經全部外移到中國大陸。筆記型電腦的「Made in China」產品結構宣告成形！蘇州承接大量台灣筆記型電腦生產線之後，在 2003 年起即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筆記型電腦生產基地，此前的年產量約一千萬台，佔世界筆記型電腦總產量的 25%。到了 2009 年，光是昆山一地，筆記型電腦年產量已經突破 6500 萬台，佔世界總產量的 50%。

台灣主要的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約在 2003 年之前已經在中國大陸完成生產線的佈局，並且幾乎集中在蘇州及上海等長江三角洲地區。全球筆記型電腦的品牌委外代工情況，在 2004 年左右，其主要的代工合作廠商已經大多為台灣電腦製造商（見表 4-6）。在 90 年代中期之後，在低價策略的市場競爭下，國際品牌大廠康柏首開委外代工的先例，同時主導「零庫存」的概念，逼使得台灣代工廠商延伸出「接單生產」、「BTO」及「CTO」等產銷模式。國際大廠所釋出的訂單也成為台灣資訊系統廠商重要的營收來源，雙方的合作關係從早期的 OEM，隨著台灣資訊廠商的技術升級而跨入 ODM 的階段，除了品牌及行銷由國際大廠掌

---

<sup>13</sup> 在稅率方面，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依據投資項目與種類區分為鼓勵類、一般類、傳統產業類、特別類、其他國防科技類等，產業適用的法規並不完全相同。大蘇州地區台商以加工出口類型公司佔絕大多數，內銷稅率統一是 17%，但由於個別公司產品別不同，是以退稅率核算稅率，因此各公司的稅率未必相同。在中國實施兩稅合一政策之後，合併後兩稅的稅率均為 33%，外資企業所得稅，為 30% 的企業所得稅率，加上 3% 的地方所得稅稅率。由於產業類別不同，企業所得稅又可分為 15% 和 24% 兩種稅率（葉政武，2008）。

握之外，台灣資訊系統廠商則負責設計、採購、製造與服務等環節，並且能做到全球交貨與全球服務的全球運籌能力（楊友仁，2005）。因此，台灣資訊產業的生產網絡展現的是一張橫跨兩岸的組織複雜但是具備高度彈性和效率的生產特徵，而這一向是台灣製造業的鮮明特色。

廠商	委外代工比重	國內代工廠商
DELL	90%	廣達、仁寶、緯創
HP	90%	英業達、華宇、廣達
Toshiba	15%	仁寶、英業達
IBM	90%	緯創、廣達
SONY	20%	華宇、華碩
NEC	80%	華宇、大眾、緯創（日系）、神基（歐系）
Fujitsu-Siemens	15%	廣達、仁寶、緯創，主要代工訂單來自歐洲
APPLE	100%	廣達、精英（致勝）
SHARP	50%	廣達、神基、倫飛

資料來源：引自楊友仁、夏鑄九（2004：45）。

## （二）台商 IT 產業聚落的制度特徵

台灣筆記型電腦等資訊電子業在全球生產網絡的分工架構下，幾乎以生產網絡的生產模式前往海外設廠投資，並且在當地形成產業聚落，即便在蘇州、昆山、吳江等地的台灣資訊電子業廠商也不例外（吳翰有，2001；楊友仁、夏鑄九，2004；楊友仁，2005；張家銘，2006）。形成資訊電子業高度集中的產業聚落，除了系統廠商與零組件供應商之間的內部市場所建立的社會鑲嵌機制帶來相對穩定而

長期的合作關係之外，另一個因素則來自組織同形的合法性基礎（王信賢，2008）。

王信賢從組織社會學的角度指出，蘇州此類由台灣資訊廠商打造的產業聚落是建立在組織同形的合法性基礎上。他認為台灣資訊廠商集聚在中國的特定地理區域，如蘇州、上海等地，這本身即是組織同形的具體表現。因為各家廠商面對的是變動快速而且不確定的市場環境，除了風險與競爭的考量因素之外，廠商聚集的產業網絡也有助於廠商在組織場域中取得合法性，使得同業彼此依據共同的準則進而採取類似的經濟行動，以取得制度環境中的各種經濟與非經濟資源。這些形成組織同形的力量，包括：

(1)競爭：指外部競爭環境為驅力所造成的組織結構與行為的同質化，因此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商，只有整合上中下游廠商才能在中國的投資生產過程中，避開風險，強化競爭力。

(2)強制：是指當一個組織依賴另一個組織，而且彼此存在著權力關係時，或者，具有規範與法律的懲戒力時，就會出現強制同形化，如「母雞帶小雞」的生產網絡遷移模式，或如「以台引台」等各種政治行政力量作用的強制同形化。

(3)模仿：亦即當企業組織面臨制度環境變動過大與訊息不充分時，廠商會複製其他成功廠商的組織型態或行為。因此，台灣資訊廠商的產業聚落在蘇州依然高度模仿原先在台灣生產模式。

(4)規範：這是指企業的領導人或管理人員的教育及訓練具有同質性，一旦面對同樣的狀況時會出現不約而同的選擇，而這種同形化的力量不只來自於組織內部的規範，尚且包括了其他組織的認知壓力，進而形成制度力量。這也是為什麼台商所形成的產業聚落鮮少出現其他外商或大陸廠商參與的原因之一。

因此，蘇州資訊電子業的產業聚落呈現著明顯的「外向但封閉」的產業特徵。以昆山的W公司為例，這家台灣重要的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的零組件供應商都是台灣廠商，除了中國品牌（如聯想）指定本土的民營供應商之外，其他國際品牌筆記型電腦的零組件供應商都是台商。根據我拜訪的W公司中國籍M經理的說

法，他提到W公司位於昆山出口加工區內，共有六個廠房，每個廠房各約有一萬名員工。主要的客戶包括惠普、宏碁、聯想和東芝等。這些品牌筆記型電腦公司會指定一線的供應商提供零配件，這些供應商通常都是台商。只有聯想指定大陸民營企業提供零配件。M經理認為這些國際品牌大廠委託W公司代工的指定供應商網絡是該公司的業務機密，因此不便向我具體透露。另外，M經理的另一個說法倒是挺令我感到驚訝的發現，亦即直到目前為止，即使連包材（如各種紙箱）也是W公司指定由台灣供應商就地供貨。基本上，昆山本地的民營供應商很難打進W公司的生產網絡<sup>14</sup>。除此之外，系統廠商與零組件供應商之間進行交叉持股，以鞏固產量、交貨及品質等的經濟行動，也普遍存在於台灣筆記型電腦廠商的生產網絡<sup>15</sup>。

再者，筆記型電腦產業強調速度、彈性生產及零庫存等實務運作的方式，例如「98-3」的操作模式，國際品牌大廠要求關鍵供應商在接單後三天之內備妥98%生產所需的零組件，並在六天之內完成最終產品出貨。M經理提及W公司的「26小時」運作機制，也就是：「『26小時』是指少量的訂單，從客戶端下單給W公司，組裝好到出貨，是26小時。基本上，W公司是29小時。<sup>16</sup>」如此強調速度及彈性生產的生產模式，在台灣資訊電子業界是習以為常的運作，但昆山、蘇州等本地民營企業便難以適應如此快速的生產節奏，並且要在生產過程中維持產品的良率，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曾經在蘇州大學任教的L教授即指出，蘇州的資訊電子業「基本上，依賴外資，本地能夠進入高科技產業的很少，研發能力也有限。包括蘇州大學本身都沒有太多的研發能力<sup>17</sup>。」

信任的社會鑲嵌機制，除了人情信任（陳介玄，1994；張家銘，2006），源自於生產過程中的各項流程的認證制度、交易行動等所建構的制度性信任（潘美玲、張維安，2001；陳東升，2003）鞏固了台灣資訊電子業廠商在台灣與海外的

---

<sup>14</sup> 訪談記錄 KS1012。

<sup>15</sup> 訪談記錄 KS1017。

<sup>16</sup> 訪談記錄 KS1026。

<sup>17</sup> 訪談記錄 SZ0401。

生產網絡關係，使得在生產網絡外部的供應商難以進入網絡內部參與生產。我在昆山拜訪W公司的L廠長時，他則提供一個「國族」概念來說明為什麼W公司的一線零組件供應商網絡都以昆山、蘇州的台資供應商為主的原因：「我們是台灣公司，為什麼要照顧大陸廠商？我們和大陸廠商有競爭關係，當然要以自己人為主要的往來對象。所以，除非品牌客戶指定，不然W公司絕大多數採用台灣供應商的零組件<sup>18</sup>。」另外，校友關係等社會資本對於台灣零組件供應商打入W公司的供應鍊，至今仍有相當程度的助益<sup>19</sup>。例如，昆山Y總在經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試圖東山再起，而W公司是他選擇重新進入供應鍊的系統廠商之一。之所以會有這個契機，原因在於W公司的L廠長是Y總的研究所學長。當Y總表明供貨的意向之後，L廠長當場交代H經理要照顧Y總，H經理則是Y總的研究所學弟；甚至他們的碩士論文都是由同一位指導教授指導的。

### （三）封閉式生產網絡：中國學者的研究觀點

台資主導下的筆記型電腦產業固然迅速改變了中國資訊產品的出口結構，也促進了地方GDP增長及就業機會，但是外資所形成的封閉式生產網絡與當地的零組件供應商有著基本的斷裂（于明超、劉志彪、江靜，2006；劉志彪、江靜等，2009）。這種生產模式導致台資在全球生產網絡的分工下，在中國的投資生產因為利用成本的優勢而獲得產業內部的升級，但是當地民營企業卻面臨較高的升級障礙。即使有當地供應商加入台資生產網絡，往往也是提供低端的產品，例如友達光電（蘇州）在2003年1-10月的加工貿易總額為16.18億美元，其中中國生

---

<sup>18</sup> 訪談記錄KS1027。

<sup>19</sup> 我之能順利拜訪W公司，必須感謝Y總的託福。「當台商電腦公司化身為跨國企業之後，『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也成為能否進入如W公司這類跨國台商的準則。我曾經打電話給若干知名跨國台商，表達拜訪之意，毫無例外地，在總機這一關就被拒絕。葉總和W公司的L廠長（共有六個廠）是研究所的學長學弟關係，因此Y總直接向L廠長打聲招呼，Y總再以電子郵件填寫入訪單，便取得進入工廠的『入訪編號』。我們到了工廠門口，Y總再度打電話給廠長，廠長一聲令下，保安直接放行，連換證都免了，偌大廠區，就只有Y總和我兩人免掛識別證，很搖擺的進入W公司。」（田野日誌，2010-08-31）

產的原材料僅有 0.6 億美元，且幾乎都是些技術層次較低的包裝輔材，僅佔出口總額的 3.8%，這個現象充分反映出蘇州本地民營企業的技术窘境。于明超等人（2006：111-112）的研究發現，認為形成蘇州此一封閉型生產網絡的原因，包括：

(1)當地企業技術能力差：缺乏技術能力是阻礙蘇州本地民營企業參與台商主導的筆記型電腦生產網絡的關鍵因素。由於台商大多為國際品牌大廠從事代工，零組件產品的品質攸關著系統廠商能否持續獲得訂單，因此一級供應商對次級供應商的技術能力要求也就極其嚴格，假如台資系統廠商從頭開始輔導蘇州本地民營企業，在技術快速進展的筆記型電腦產業勢必要承擔巨大的成本和風險。

(2)當地企業規模小：筆記型電腦產品的專業化程度高，需要規模經濟以降低生產成本，所以成本優勢是供應商的主要利潤來源。蘇州當地的電子企業多為民營中小企業，一方面這些民營中小企業普遍缺乏政府資金的支持，又因其規模小更難以獲得銀行貸款，風險投資行業發展不足，同時資本進入退出的管道不完善，導致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管道有限，無法擴大企業規模。因此，在金融體制的限制下，民營中小企業無法取得足夠資金擴張規模以增加自身產能的能力，配合台灣資訊系統廠商的生產需求。

(3)外部治理不足：這包括了政府機構、行業協會等的監督與法則的制訂和實施。當蘇州的制度環境難以保證有效的外部治理時，主導企業和一級供應商就需要耗費更多的成本進行內部治理，嚴格控制下級供應商的產品品質及交期等。為了節省內部治理成本，台灣資訊廠商更願意維持以前供應商的治理關係。

(4)產品特性：筆記型電腦零組件的客製化傾向，為了提高產品品質及性能的穩定性，需要各級供應商之間的緊密長期合作關係。台資配套廠商與一級供應商在過去已經形成一套穩定的信任關係，通過各種正式及非正式的協議維持其生產體系的效率且彈性的運作，以及維持廠商之間的信任關係和商譽。如果轉換供應商，就需要更多明確的協議及認證的過程來保障交易的順利進行，必然造成治理成本的增加。

(5)台資企業之間形成的社會網絡：亦即，台灣發展成熟的產業聚落促使台商之間形成穩定的社會網絡關係，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社會規範、行為準則等作為非正式契約，這有助於降低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以往交易中形成的企業聲譽使得企業避免違約等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而可以降低風險。

王緝慈等學者（2010）對蘇州 IT 產業聚落的研究，指出台商 IT 產業聚落對本土民營企業的技術擴散效益不明顯，並且嚴重壓縮了蘇州本地民營中小企業的市場生存空間。隨著蘇州本土配套企業的成長，外資代工企業逐漸增加向當地採購零組件的比例，但總體而言，外資代工模式下的蘇州本土企業的從屬地位並未得到改變，民營中小企業的產值比例和產業層次都相對偏低。此外，外資代工企業對於本土的配套企業具有強勢的市場勢力，能夠將風險和成本移轉到本土廠商，導致蘇州本地企業的收益率下降。但是，令蘇州更加擔憂的情況是外資及台資的集體遷移，本土民營企業往往難以跟進而有滅頂的危機。儘管，台商在蘇州設廠的人力成本較之蘇州本土民營企業要高 10% 左右，但是兩免三減半等稅收優惠，足以彌補成本上的增加，加上台商技術水準領先蘇州本土民營企業，競爭力也高於後者，使得蘇州本地民營企業不得不在為台商配套時，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拼命降價，因而出現嚴重的虧損和倒閉，以致於在昆山「數量多、規模小、倒閉快」成為蘇州本土配套企業的三大特色。

### 第三節 昆山印象：側寫 Y 總與 M 經理

Y 總與 M 經理是我在田野過程中認識的朋友，透過個人傳記式的描寫，我企圖從微觀的角度連結起他們個人的生命遭遇與昆山經濟轉型之間的關係，尤其他們的職業都與筆記型電腦產業高度相關。

由昆山台商協會出資籌建的慧聚寺天后宮在 2010 年 9 月 19 日，舉行了媽祖安座大典。昆山天后宮的媽祖分靈自彰化鹿港的天后宮，建築亦仿造鹿港天后

宮，安座大典成為昆山台商界的年度盛事<sup>20</sup>。從昆山有了全中國第一座從台灣分靈過去的媽祖廟這件事情來看，可見昆山台商在當地的政經影響力。本節介紹昆山Y總和在台資筆記型電腦大廠W公司服務的中國籍M經理的故事。他們兩位在昆山的歷程，反映了昆山與台灣資訊電子業的經濟關係，以及中國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他們對自己的家庭、生活處境及前程的規劃。透過這個認識，我詮釋了在大蘇州的飛地經濟結構下，Y總如何在逃過 2009 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的事業轉型，以及M經理如何在W公司的台灣企業文化中尋求認同與安身立命。

### （一）Y 總的故事

我在 2010 年八月下旬（8/24-31）赴昆山進行為期一週的田野調查，許多的訪談都是由 Y 總透過他的人脈關係促成，乃至親自帶領我登門拜訪各家台商。Y 總是昆山一家中小企業的總經理，專門生產各種電子連接線材，例如 USB 連接線，供應昆山、蘇州及上海的筆記型電腦大廠，如 W 公司、仁寶、廣達等。一般消費者使用的 USB 連接線，實際上也應用在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的產品測試製程之中，每一條 USB 連接線有其測試次數的標準，例如測試一百次之後，為了維持測試的品質，該條 USB 連接線便必須報廢，換上另一條新的連接線。昆山 Y 總生產的各種連接線材均以供應各筆記型電腦代工廠為主，而非終端的電腦消費者。

## 1.逃難：全球金融海嘯席捲老台商

---

<sup>20</sup> 這個訊息是在 9 月 18 日，我在蘇州打電話向昆山 Y 總道別時，由他所提供。他並竭誠邀請我「立刻」前往昆山，參觀隔日的媽祖安座大典，以作此「歷史性的見證」。儘管，Y 總在電話中不斷向我強調這是四百年來，第一次由台灣媽祖分靈到中國的大事，不去參觀必定遺憾。可惜，我接下來另有行程，必須離開蘇州前往中國其他城市而未能成行。

我第一次在昆山見到 Y 總，時間是在 2010 年 8 月 7 日，隨同張家銘老師的跨國合作團隊的出訪。在同一天內，Y 總安排了三家傳統產業（包括機械、食品及磁磚）的台商接受我們的訪問，並由他招待午餐。當天最後一場的拜訪行程結束之後，Y 總和我交換名片時，特別在名片上寫下他的手機號碼，希望未來能有互相交流合作的機會。當時，我感覺 Y 總是個熱情、事業成功的台商。然而，實情卻是 2009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幾乎吞噬了 Y 總在昆山經營的事業，也因此，Y 總積極思考及進行他在中國的事業轉型計畫。

Y 總原本在昆山某鎮擁有一家員工超過兩百多人的中小企業，同時長期在昆山台商協會擔任某委員會的組長（目前已卸任），並且負責代表台商協會出面接待各地到昆山從事台商研究的學者及研究生。

Y 總出身自鴻海富士康，是最早隨著富士康到深圳設廠的台籍員工之一。我看 Y 總每次遇見他的台商朋友們，他很喜歡和他們比賽誰辦過的台胞證最多。或許，在我面前，他想透過這樣的攀比讓我明白他在中國的資歷有多長久，是個值得信任的長者吧！Y 總說自己辦過五本台胞證（有效期為五年），他在中國二十八年的資歷，昆山很少有其他台商能打破他的紀錄。他說當公司處在全盛時期的時候，昆山的工廠每天一開門，賺一萬多塊人民幣根本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但是，「昆山 Y 總去年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差點成為昆山 158 家倒閉台商的其中一員。他用『逃難』一詞形容他遷廠的過程，若非昆山好友的收留，租借廠房給他，恐怕他已在昆山無立錐之地。Y 總在這段期間所受到的屈辱，也曾經親口吐露給我；理智上，任何人應該都會認為 Y 總行走江湖這麼多年，怎麼還會對朋友有著一份近似天真的信任？可是，我看到的是上一代台灣中小企業主的純樸和打拼精神在影響著這塊土地。即使影響力薄弱，也難以用成敗來論斷 Y 總。原本有上百位員工的 Y 總，到了現址後，只剩下不到二十個員工，其中有一位小張<sup>21</sup>，是業務兼秘書。我曾經私下問過小張，Y 總這種情況，為什麼妳還願意留在 Y 總的

---

<sup>21</sup> 小張為化名，下同。

公司，而不另謀他就？小張說，Y總對待員工很好，不像部分台商那般的苛刻。他現在困難，我們也不好丟下他不管，Y總做人不錯的。」（田野日誌，2010-9-5）

## 2.Y 總的轉型計畫

部分如 Y 總這般長期在大陸經商的台商，已經展開企業經營型態的轉型計畫。依照 Y 總的構想，他會持續維持本業的運作，目前的電子連接線材的生產仍是他主要的資金來源，同時他也期望在台灣子女在大學畢業之後，到昆山來承接昆山廠的經營業務。而令他興致勃勃的轉型計畫，則是「開發大西部」。

Y 總的轉型計畫，是打算與自己信任的少數幾位台商朋友協助內陸省分的地方政府進行土地開發及招商。這些內陸省分的地方政府撥出一塊土地，批給台商規劃使用，包括進行招商引資。實際上，Y 總已經有了一個「台灣精品商貿工業園區」的藍圖。我在昆山期間，Y 總安排了一個行程，要到安徽省蕪湖市參觀，全程費用由該市政府贊助，後來因故未能成行。

吳經理是一位建築開發商，我和Y總在拜訪完一家台商後，在該公司大門口巧遇，吳經理隨即送了一箱昆山產的葡萄給Y總。隨後，Y總邀請吳經理到麥當勞商談轉型計畫。吳經理拿出一本天津市某地方政府的土地開發案說明書，他曾經到當地考察過，認為計畫可行，天津的地方政府也歡迎台商一起合作開發。Y 總則提及吳江的某電子廠總經理<sup>22</sup>也正在從事轉型計畫，或許雙方可以共同合作。事業轉型的下一個夢，依然讓這些老台商們熱血沸騰！

我在昆山親自參與了一場由 Y 總主持的小型開發計畫說明會：

「晚上，安徽省某市的地方招商局長來拜會 Y 總及一位洪顧問，我也被 Y 總拉進去冒充『社會學博士』。目前台商中小企業正在進行轉型，有的台商到處承包大

---

<sup>22</sup> 多年前，我也拜訪過這家電子廠的總經理，該家台資公司以電阻、電容等零組件為主要的產品。

陸官方的園區建設工程，而內陸省市為了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也積極吸引各地的台商前往投資，但是投資模式已經有了重大的變化。Y總向招商局做的簡報上，他負責主題規劃，洪顧問就是企業諮詢，我在今晚就成了行政及經濟論壇的負責人。安徽地方官員一行五人，風塵僕僕地到昆山和上海等地拜會台商，我深刻地感受到他們急切想建設地方的神情。Y總的本業在金融風暴襲擊下，固然造成大虧損，但雄心不減，考慮到退休及接班問題，他正努力地轉型到其他事業。真像是一隻神通廣大的九命怪貓！他安排利用這個週末假期，帶團到安徽的另一個城市考察，約我一道前往，我在猶豫中。隱約感覺到Y總想吸收我成為他的『班底』，我故意開玩笑地問他，Y總，等我畢業之後，來你這裡打工？他竟然說我可以做什麼什麼，委以重任啊！」（田野日誌，2010-8-31）

在這段田野日誌裡提到的招商局官員，來自安徽省天長市。我觀察到許局長等人一臉殷切的神情，盼望著能盡快和昆山、蘇州及上海等地的台商談妥開發計畫，以承接這幾個經濟發達城市的外資前往投資。但是，許局長等官員所表現出來的招商引資的態度及觀念則顯得生澀。即便我在1999-2000年，連續兩年到蘇州、昆山及吳江等地接觸過的招商局等政府部門的主管官員，當時那批蘇州大小官員對招商引資的態度及觀念，展現出相當的熟練、自信及親切的招商能力。

根據許局長帶來的投資手冊，安徽省天長市被中國國務院列為「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首選地」。天長市緊鄰江蘇省省會南京市，該市位於長江以北，與揚州、淮安等市交界，面積1770平方公里，現轄14個鎮和一個街道辦事處，總人口數67萬人。天長市的產業概況，包含現有或規劃中的儀表電纜、電子、機械製造、醫藥醫療器械、玩具、食品、光伏（光電）、汽車零部件、特型鋼管、及綠色照明（LED）等十大產業。其優惠政策，包含三大類別，首先為「享受國家級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政策<sup>23</sup>」，其次為「享受天長招商引資財政

---

<sup>23</sup> 包含：1.在省級以上開發區中成立合作園區，吸引海內外地區政府、開發園區、跨國公司、中央企業、戰略投資者，以及省內各縣市、企業等對其進行整體開發。2010年起連續6年，合作

扶持政策<sup>24</sup>」，最後為「享受天長企業獎扶政策<sup>25</sup>」。

從 Y 總的故事裡，可以得知中國東部沿海的中小型台商，在中央政府亟欲平衡東西部的經濟發展結構，以及實現產業升級政策的政經制度環境的變遷下，這些台商主動或被動的改變既有的企業經營型態，以繼續追求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生存。

## （二）M 經理的故事

M 經理的年紀和我相仿，是老楊的大學同班同學，與 M 經理的認識便是透過老楊的關係。M 經理起初並不答應與我見面，原因是他對台灣人沒有好感。但在老楊鏗而不捨的聯繫下，在一個週末下午，我和老楊搭著計程車到昆山 M 經理家裡和他見面。我一共與 M 經理見過兩次面，第一次見面是在他的家中，第二次則是我在昆山做田野時，他利用週末下午到我下榻的賓館見面。以下為兩次見面的情景及觀察的綜合記錄。

---

園區新增增值稅、所得稅市、縣留成部分，全額補貼給合作園區。2.對新建物流園區、道路運輸站場和物流配送中心等現代物流項目，減半徵收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人防易地建設費和道路臨時佔用費，免收徵地管理費。3.對外省已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轉帶到示範區落戶的，有效期內不再重新認定，減按 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4.鼓勵企業發行股票、企業債券、短期融資卷、中期票據，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設立財務公司。鼓勵企業上市，企業因上市而補繳的稅費，省及以下留成部分獎補原企業股東。5.整體搬遷的企業在沿海評定的管理類別，來示範區後予以辦理相應的工商、海關、外匯管理類別。允許轉移到示範區內的企業將原進口設備轉到符合國家鼓勵政策的新企業繼續使用，監管期限可以連續計算。

<sup>24</sup> 包含：1.土地價格：執行國家現行的工業土地用地標準（天長工業用地為十三等，每平方米最低出讓價為 96 元，每畝最低出讓價為 6.4 萬元）。對投資規模較大，科技含量高的項目，我市將在不違反國家政策的前提下，在土地出讓價格方面實行「一事一議」，並給予投資者最大的財政支持。2.稅收優惠：實行「三免三減半」，即：入園項目自投產之日起，前三年，由市財政按其繳納的增值稅、所得稅地方留成部分給予全額返還；後三年給予減半返還，每年兌現一次。3.規費減免：除繳納國家、省、滁州市收取的有關規費外，所有地方行政事業性規費一律免收。經營、中介服務性收費，按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最低標準三分之一收取。

<sup>25</sup> 包含：1.招商引資企業享受六年優惠政策期滿後，進入天長市前十強、二十強、三十強企業分別頒發市十強企業、市二十強企業、市三十強企業獎牌。2.對當年被評為 30 強的重點骨幹企業，按單個納稅主體當年入庫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與上年相比新增的地方留成部分的 60%、50%、40% 分別獎勵給前十強、二十強、三十強企業。被評為 30 強的企業當年實際入庫的土地使用稅與上年相比新增部分按 50% 獎勵企業。3.對於上市或買賣土地，並把上市公司註冊地（指稅務關係）遷到我市的，政府給予一次性獎勵 100 萬元。

昆山的市容稱得上樸實，是一種小鎮的格局，對照著昆山市政府的若干政策宣示，從市容來看，其實有著不小的反差。我和老楊來到 M 經理所居住的小區裡，熱浪侵襲的酷暑，是一個非常炎熱的週末。M 經理是鹽城人，蘇州大學畢業後，來到昆山尋找工作，輾轉進入台資筆記型電腦代工大廠 W 公司，算是 W 公司的資深中國籍員工。M 經理提到他之所以不喜歡台灣人，主要是因為他在台資企業上班的緣故。對 M 經理而言：

「在台資企業上班，並不是一件賞心悅目、光耀祖宗的事情。台資公司被大陸員工詬病最多的首先是薪資待遇普遍較低<sup>26</sup>，以及台灣和昆山兩地公司的差別待遇，例如台灣總公司會組織員工旅遊活動，乃至分配股票，大陸員工則只能夢想。其次，台幹未能信任陸幹及融入大陸的環境，所謂的本土化，只是為了降低台幹的人事成本而做的策略調整。本土化政策，實際上並未相應地提高陸幹在台資企業的地位，『玻璃天花板』始終存在。M 經理認為在這種企業文化中，就算他對公司有高度認同及忠誠，也是枉然。因為他希望能在台資企業發展，台商卻不提供對等的發展機會給他。而台幹的優越感，時常造成彼此的隔閡。大陸物價飛漲、薪水調整幅度低，加上台商隨時可能往大陸內陸遷移，這些因素在在加深了 M 經理的不安全感。不過，M 經理認為自己任職的 NB 台資大廠對待員工的態度算是很好的，不像韓國企業的韓籍幹部會對大陸作業員施暴、罰跪等體罰。此外，他是個性情敦厚的人，身為中層主管，他自認為很幸運，因為他眼中的底層作業員是非常邊緣，值得悲憫的一群人。」（田野日誌，2010-8-29）

M 經理深知台灣這些筆記型電腦代工公司的發展瓶頸，但在個人的生涯規

---

<sup>26</sup> 同樣是中高層的跨國企業管理幹部，在 2010 年，M 經理在 W 公司的月薪介於 8000-9000 元人民幣之間；老楊在歐洲跨國公司的月薪介於 16000-17000 元之間，並且每年固定調薪 10%。老楊得經常出國開會，M 經理則抱怨 W 公司的待遇不夠好，其中包括台灣總公司不讓陸籍幹部到台灣接受進修培訓。作業員的薪資，各企業基本上按照地方政府公告的最低工資規定，蘇州工業園區及昆山等地的作業員薪資大多介於 2000-3000 元人民幣之間，同時有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實施派遣人力的制度。

劃與在公司內部升遷的矛盾中，有種難以平衡的心理衝突。囿限於英語能力的不足，不然 M 經理也想跳槽到蘇州的歐美跨國公司。根據 M 經理的說法，他所服務的 W 公司的作業員及中國籍中級幹部，約三年就大洗牌一次，流動率挺高的。

W公司及仁寶是昆山前兩大筆記型電腦的代工大廠，更是昆山的創稅大戶，昆山市政府不會輕易將這兩家公司遷走。不過，M經理透露W公司正在規劃前往泰州設廠，之所以有此計畫的原因之一，是泰州現任黨委書記即是當年招進W公司的昆山黨委書記，為了這名書記的地方政績，W公司在泰州投資的方式，可能有兩種：第一種方式就是複製昆山的投資模式，在泰州成立分廠，亦即零組件的供應鍊必須一同到泰州設廠，就近供貨。第二種方式則是在泰州成立倉庫，做為產品的組裝中心<sup>27</sup>。

對 M 經理而言，不論 W 公司採取哪一種對泰州的投資方式，都可能造成他現在生活上的不確定性。假如，公司確定前往泰州投資，那麼他可能得在公司要求下，派往泰州以協助建廠事宜，這對於已經在昆山落戶的他而言，勢必得與家人兩地分隔。另一種可能，則是 M 經理在公司擴張之餘，反而因為人事成本較高的緣故而遭到資遣。這些都是 M 經理個人職場生涯上的擔憂，但是他認為造成他這種心理焦慮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對外資的態度。

「M 經理工作繁重，即使假日休息，也得隨時處理公司的事情，在四個多小時的聊天裡，公司陸續打了五、六通電話給他，他習以為常的說，在台資企業上班就是這樣，連台灣幹部也得隨時待命，這一點沒什麼好計較的。……記得老楊在我抵達蘇州之後，多次邀請 M 經理接受我的訪問，但他在台資廠受了委屈，對『台灣佬』的印象不佳，多次拒絕了老楊的邀請。等到實際見了面，特別是今天下午的二度會面，他似乎改變了對台灣人的印象，說我的態度真誠，他很喜歡我這個人，不然不會一聊四個多鐘頭。我也喜歡 M 經理的性情中人。在這次田野中，他

---

<sup>27</sup> 訪談記錄 KS1012。

是對台資企業抱著持平觀點的代表，既說缺點，也說優點，甚至台商的缺點之所以產生，更多的是大陸體制所造成的問題。」（田野日誌，2010-8-29）

Y 總這位台籍中小企業家，以及 M 經理這位中國籍幹部，同樣置身在昆山的資訊電子產業裡，面對著相同的時代變局，展現著不同的角色認知及行動。而他們的故事縮影，反映著昆山成為筆記型電腦在全球製造地位的社會結構變遷過程。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認為大蘇州之所以成為全球資訊電子業的重要生產基地，是因為地方官員採取的跨國制度學習模式，包括個人網絡與跨國聯盟的模式，透過這些制度學習以完善昆山及蘇州等地的經濟開發區在軟硬體的各项設施，其中昆山地方官員從台商學習出口加工區的制度，以及蘇州工業園區在與新加坡政府的合資聯盟中學習親商的知識等，儘管昆山與蘇州展現出兩種不同形態的跨國制度學習，但這些從國外引進的制度與知識對於大蘇州的開發區建設，則有著重要的擴散學習效應。也因為這些制度有利於資訊電子業的全球市場競爭，因而吸引了更多的相關台外資廠商前往大蘇州設廠投資。

然而，本章也指出，大蘇州的開發區建設是建立在地方官員招商引資及政績主義的治理邏輯基礎上，在這個過程中，固然由於外資的投資促進本地的經濟成長及形成資訊電子業的產業聚落，相對的，過度的開發區開發已經形成社會問題，而對經濟結構的深刻影響則在於地方官員的治理邏輯形成蘇州的飛地經濟結構，這並不利於創造出技術學習的制度濃度。正如蘇州大學的L教授指出，在第二階段的蘇州經濟轉型過程中，這是「賣方市場，而且由於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一旦有太多對外資的不方便，就不容易吸引外資。因此，對技術移轉的要求很難

達成。地方政府對技術移轉也不積極，因為技術移轉是長期和不容易見到效果的，但是政府官員要升官，主要的政績是繳稅和吸引投資的項目與數字，因此結果就是不積極也不重要。<sup>28</sup>」一位蘇州工業園區經濟貿易發展局的副局長更明白地指出，「政府沒有要求要外資技術擴散或移轉，台商仍以自己的生產網絡為主。不過這部分園區不管，這是企業自己的事。<sup>29</sup>」其次，在蘇州設廠的台資筆記型電腦廠商大多採取獨資的經營型態，獨資的經營方式迴避了地方政府行政權力對廠商經營業務的干預，維護了台商的經營自主權。

因此，在路徑依賴的作用下，大蘇州地區地方官員的經濟治理邏輯與資訊電子業台商的生產模式，聯手障礙了蘇州本地民營中小企業「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機制。這道無形但堅固的「技術攔阻」，使得蘇州的本地民營企業難以參與全球生產網絡的生產分工，學習相關的生產能力、組織能力及國際市場運作等實務經驗。而此一由地方政府與台灣廠商關係對蘇州經濟轉型所造成的影響，是過去採取政企關係路徑的研究者所忽略的。

1990 年代的中後期開始，蘇州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全球生產網絡的遷移及鑲嵌，有著密切的關係。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全球化的擴張，在時間上有著偶然的機遇。為了快速經濟成長，中國注重釋放市場力量的需要，因此吸收外資成為主要的手段，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具有一個鮮明的特徵，亦即追求徹底的資源配置效率的原則，同時外資與合資企業依靠國外合作方提供一系列相關的制度性支持（高柏，2008）。當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生產基地時，參與國際分工的制度基礎在於以生產要素符合外資的需求，只需要以低廉的勞動力負擔勞動力密集的製程任務，如此便減低了發展國內創新體系的壓力。此外，地方政府之間為了當地的經濟發展，除了競相投入基礎建設的投資，對吸引外資的競爭也相當激烈，即便是同一行政區內的各級地方政府，這樣的經濟競爭亦是暗潮洶湧。全球生產網絡的鑲嵌，促使蘇州的資訊電子業成為其重要的經濟結構組成，

---

<sup>28</sup> 訪談記錄 SZ0401。

<sup>29</sup> 訪談記錄 SZ0403。

並促成其地方產業結構的經濟轉型。但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任何能促進地方經濟成長的手段，便成了地方政府與外資共享的市場正當性。

## 第五章 追求地方產業升級的制度安排

「長期的經濟變遷是無數個政治與經濟企業家短期決策累積的結果。這些決策直接與間接（經由外部效果）決定經濟成就。所作出的決策反映了企業家理解環境的主觀模型。因此，結果和意圖相符的程度，反映企業家所持之模型接近真實模型的程度。因為模型反映了觀念、意識型態和信仰，真正施政結果回饋之訊息對它們造成的澄清和改進相當有限，所以特定政策的效果不僅難以確定，而且相當程度也不可預測。即使隨意瀏覽從古至今的政治與經濟決策，也可以清楚發現意圖與結果之間差距極大。……這指出雖然特定之短期路徑無法預見，但是長期的整體方向則既更為可以預期，又更為難以扭轉。」（Douglass C. North，1995：123-124）

儘管，蘇州在經過將近十五年的資訊電子業的外資帶動發展，以及經濟開發區及出口加工區的跨國制度學習機制下，蘇州本地的高科技產業已經與全球生產網絡產生高度的在地連結。但也同時呈現危機，一方面蘇州資訊電子產品的出口與國際市場景氣緊密聯繫，深受全球經濟景氣的連動影響，這種情況在 2008 年底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之中顯露無遺<sup>1</sup>。尤其在以組裝加工為主要參與全球生產網絡分工形式的「飛地」經濟下，蘇州地方政府意識到此一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面臨著海外的競爭，並且也遭遇到中國內陸城市的後進追趕競爭，例如重慶、成都、鄭州等內陸城市正積極地打造下一個資訊電子產品（如，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的生產基地，而且已經進駐的主要國際代工大廠仍然以台灣IT廠商為主，例如鴻海富士康、仁寶、緯創資通、英業達等，及其各自的供應商生產網絡，儼然將長三角的成功經驗再次移轉及複製到中國的內陸城市。兼之，蘇州當地的生產成本升高、工業用地、勞動力等生產條件的日漸稀缺，使得蘇州不得不展開「二次創業」的轉型升級計畫，以持續維持其區位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宣示之下，地方產業的轉型升級及技術自主創新的政

---

<sup>1</sup> 這種情況不單發生在蘇州，是一次全球性的經濟景氣危機。即便在新竹科學園區，當時的台灣高科技廠商若非裁員，即以無薪假等方式調節人力需求來度過這一次的經濟危機。

策方向越顯明確，欲藉此改變過去以加工出口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亦鼓勵地方政府展開產業升級的行動；這對地方政府的「經濟形象」，亦有提升的作用。

本章指出，蘇州在第三階段的經濟轉型裡，各地方政府除了持續的、且更針對性的「選資」招商之外，更鼓勵赴大蘇州地區投資的跨國廠商設置研發部門，以培養中國本地的技術人才；並且成立若干的公共研發中心以做為地方政府、外資廠商及本地民營中小廠商之間的技術交流合作平台。這些制度追趕學習機制，大多承襲自台灣的發展經驗，並且在蘇州「遍地開花」。換句話說，蘇州在高科技產業的場域裡，仿造台灣等東亞國家的發展典範，以焊接（welding）的方式持續引進這些成就東亞國家的高科技產業制度。但是，蘇州並非積極地創造適合本地民營企業生存的制度環境，而是依然高度依賴著外資的資源，藉以展開產業的後向連鎖以之做為蘇州高科技產業的升級動力。因此，蘇州看來具備學習型區域的框架，但至今並未產生內生知識及技術學習創新的制度綜效，其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來源仍是來自於外資廠商的貢獻。

## 第一節 蘇州產業升級政策及制度環境變化

本節指出，蘇州在 2008 年之後，面臨西部省市（如重慶市）在資訊電子業的急起直追，以及本地在工資調漲與人力資源變化等制度環境的影響，蘇州如何因應這些結構變化。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新興的西部省市並未威脅到蘇州的資訊電子業地位，就台商的投資偏好而言，江蘇省仍然是台商最主要的投資地點。另一方面，蘇州產業升級政策則承認其「飛地經濟」的產業發展格局，並提出其產業升級的政策作法，然而就高科技產業的面向來看，儘管蘇州重視產官學的合作機制，但在技術學習創新上的突破依然強調引進外資的資源。

### （一）西部省市仍未構成威脅

自 2008 年以來，一方面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造成蘇州筆記型電腦的出口量減少，並且造成許多電子中小企業倒閉，如昆山倒閉了 158 家台商中小企業<sup>2</sup>；其次，開發大西部的政策，使得重慶市成為下一波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的投資熱點。

重慶市在 1997 年升格為直轄市，經過十年，在 2007 年，重慶成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同時成立兩路寸灘保稅港區，這是中國第一個內陸保稅港區，亦是第一個水港和空港結合的雙功能保稅港區。另外，重慶又成立西永綜合保稅區，使得重慶成為中國唯一擁有兩個保稅區的城市。在 2010 年，國務院批准重慶設立「兩江新區」，成為繼上海浦東新區及天津濱海新區之後的第三個國家級新區<sup>3</sup>。

但是，大部分的台資筆記型電腦代工廠並未考慮到重慶設廠投資，他們是在國際品牌大廠的要求下，才跟隨設廠。例如，英業達董事長李詩欽過去從未考慮過到重慶設廠，直到 2008 年，英業達在其重要客戶惠普（HP）的要求下，英業達才決定到重慶設廠。英業達原先打算在上海浦東新區以外的第二個城市打造生產基地，首先是考慮福州市，因為該市附近有港口，產品運至歐洲可以節省三天的海運；另一個是合肥市，因為距離上海較近。重慶則始終不在英業達的佈局藍圖之中。2009 年底，英業達跟著惠普，和重慶市簽約建廠，2010 年動土，並將在同年 11 月底試產<sup>4</sup>。

目前重慶市規劃出四大外銷的物流通道，以配合外資在此成立筆記型電腦等產品的出口管道。見表 5-1。

---

<sup>2</sup> 訪談記錄 KS1017。

<sup>3</sup> 《遠見》第 293 期（2010-11）。

<sup>4</sup> 同註 3。

方式	路線	建設情況	所需時間
江海聯運	沿長江經上海出海。	萬噸級船隊已可直航重慶，通過寸灘兩路保稅港區，出海不必卸貨報關。	30 天到歐洲。
鐵海聯運	從重慶到深圳出海，運往各大洲。	已於今年四月開行。	28 天到歐洲。
	從蘭渝鐵路連接歐亞大陸橋，至鹿特丹通往大西洋。	2010 年 11 月試車。	14 天到鹿特丹。
	經渝昆鐵路連接泛亞鐵路，至緬甸出海通往印度洋。	計畫 2013 年完工。	—
航空外運	重慶—比利時列日貨運航班	2010 年 9 月開通。	12 小時。
	台北—重慶貨運航班。	2010 年 11 月開通。	2 小時 15 分鐘。
	新加坡—廈門—重慶—阿姆斯特丹貨運航班。	近期開通。	—
公海聯運	走高速公路，至上海或廣州出海。	已建成，另有 17 條高速公路在興建中。	—
資料來源：《遠見》第 293 期（2010-11）：245。			

跟隨惠普到重慶西永微電子產業園區的台灣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包括鴻海、富士康、英業達及廣達等，並帶動上游供應商，如全球第一大電腦鍵盤廠精元、台灣第一大表面黏著科技製造廠台表科、全球第一大電腦電池廠新普科技等一起進駐重慶。台灣筆記型電腦廠商及上游供應商在重慶的投資項目，請見表 5-2。

公司	投資額 (億美元)	面積(平 方公里)	預估未來 員工人數	預估未來年產值 (億美元)	預估投產時間
富士康	10	2	10 萬人	100	2010 年底
廣達	10	1.5	10 萬人	200	2010 第四季
英業達	8	1	4.5 萬人	100	2010 年底
新普	0.9001	0.13	—	每年生產 2000 萬顆電池	2011 年 8 月
茂德	9.6	0.17	3200 人	3.9	2008 年 4 月投產
資料來源：《遠見》第 293 期（2010-11）：262。					

世界第二大筆記型電腦品牌公司宏碁（Acer）亦選擇到重慶設廠，其主要代工廠商緯創資通一同跟隨宏碁前往投資。仁寶則在Dell帶領下，選擇到成都設廠。台灣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的中國國內「西進」投資行為，主要是因應國際品牌客戶的要求下所做的決策，然而中國沿海城市的工資高漲，招工不易，加上土地資源稀缺，難再擴張企業生產規模。國際品牌客戶深耕中國的內需市場，台資筆記型電腦廠商為了配合客戶展開的「西進」投資，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sup>5</sup>。

不過，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顯示，2009年及2010年核准台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當中，江蘇省所佔的比重均大幅領先重慶市，分別是38.45%：0.94%、37.64%：3.74%（見表5-3）。1991-2010年，台商對江蘇省的投資比重為34.30%，排名為中國各省市第一位，其次為廣東省（22.65%）及上海市（14.53%），重慶市僅佔1.32%。以台商投資總金額的倍數來看，2009年，台商對江蘇省的投資總金額為對重慶市投資的41倍，2010年兩者差距縮短為10倍，1991-2010年，兩者的倍數差距是26倍。從這幾項統計來看，儘管重慶市大張旗鼓地招商引資，要在該市複製筆記型電腦的生產基地，目前看來，要追上江蘇省的地位依然需要一段時間。

表 5-3 核准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江蘇省與重慶市）

年份	江蘇省			重慶市		
	件數	金額	佔總金額比重	件數	金額	佔總金額比重
1991-2010年	6,164	33,382.31	34.30	209	1,281.40	1.32
2009年	158	2,746.63	38.45	4	66.91	0.94
2010年	230	5,501.83	37.64	22	547.21	3.74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引自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217期。

<sup>5</sup> 同註3。

## (二) 工資的調漲

企業的缺工現象，是目前中國製造業所面臨的普遍問題，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法定最低工資的調漲。就以蘇州所在的江蘇省為例，自 2010 年初以來，已經調整過兩次最低工資。江蘇省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廳根據《江蘇省企業最低工資暫行規定》和《最低工資規定》，在 2010 年一月份發出一份調整省內企業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一類地區從原先的每月 850 元上調到 960 元，二類地區從 700 元上調到 790 元，三類地區從 590 元上調到 670 元。每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一類地區從 7.2 元調整到 7.8 元，二類地區從 5.9 元調整到 6.4 元，三類地區從 5.0 元調整到 5.4 元。就月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幅度而言，一類、二類及三類地區分別增加了 12.95%、12.86% 及 13.56%。但是，最低工資標準不包括：(1) 加班加點的工資；(2) 中班、夜班、高溫、低溫、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條件下的津貼；以及(3) 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的勞動者福利待遇等。三類地區的劃分，見表 5-4。

地 區		類別
南京	市區	一類
	溧水縣、高淳縣	二類
無錫	市區、江陰市、宜興市	一類
徐州	市區	二類
	新沂市、銅山縣、豐縣、沛縣、邳州市、睢寧縣	三類
常州	市區	一類
	金壇市、溧陽市	二類
蘇州	市區、吳江市、張家港市、常熟市、昆山市、太倉市	一類
南通	市區、啟東市、通州市、海門市	一類
	海安縣、如東縣、如皋市	二類
連雲港	市區	二類
	灌南縣、灌雲縣、東海縣、贛榆縣	三類
淮安	市區（不含楚州區、懷陰區）	二類

	楚州區、懷陰區、漣水縣、洪澤縣、盱眙縣、金湖縣	三類
鹽城	市區、大豐市、東台市	二類
	建湖縣、射陽縣、阜寧縣、濱海縣、响水縣	三類
揚州	市區	二類
	江都市、儀徵市、高郵市、寶應縣	三類
鎮江	市區	一類
	丹陽市、揚中市、句容市	二類
泰州	市區	二類
	靖江市、姜堰市、興化市、泰興市	三類
宿遷	市區、宿豫縣、沭陽縣、泗陽縣、泗洪縣	三類
資料來源：《揚子晚報》，〈江蘇省上調最低工資標準〉，2010-01-24。		

今年（2011 年）一月份，江蘇省政府再次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屬於一類地區的蘇州市，最低工資標準從 960 元上漲到 1140 元，漲幅為 18%，並自 2 月 1 日起實施。經過調整之後，江蘇將超過上海、廣東及浙江，成為中國大陸最低工資標準的第二高省分。去年的加薪潮與鴻海富士康事件有關，今年啟動的加薪潮則與中國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預期嚴重，以及十二五規劃的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由過去的出口拉動轉向內需拉動有關。江蘇是台灣企業高度集中的大陸投資省分，在該省投資的台商已經超過兩萬家，其中資訊電子業更集中在蘇州、昆山等地，在連續兩年的最低工資標準上漲之後，對企業經營的人事成本將因此大幅增加，也使得企業的營運方式受到衝擊<sup>6</sup>。

### （三）人力資源的變化與流動

2010 年七月間，蘇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人力資源市場供求分析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指出，蘇州在 2010 年第二季度的人力資源市場總需求為 681073 人，進場求職總人數為 702137 人，其中增加的十萬人為外來求職者。就產業結構的人力需求來看，製造業的缺工情況最嚴重，其中電子裝配、

<sup>6</sup> 《聯合報》，〈台商重鎮，江蘇最低工資漲 18%〉，2011-01-06-A15。

機械製造和紡織印染為前三名。就職業專長來看，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最旺盛。求職缺口數排名前三位的是：機動車駕駛員、儲備幹部及行政辦公人員。這反映出求職人員的求職觀念在發生變化，趨向於從事相對穩定的工作。此外，說明了高校畢業生缺乏工作經驗和社會閱歷，依舊是就業工作的難題<sup>7</sup>。

Ross (2010) 從美國的角度討論在蘇州工業園區內的外資企業與人力資源的問題。在他的研究中，他指出了幾點現象：

第一、蘇州工業園區引進新加坡的社會公積金制度 (social Provident Fund, SPF)，園區的職工可以透過這項計畫購買或租賃園區裡的房子。這套制度的基本原則是雇主和職工均向社會公積金繳納 22% 的薪資，然後將之分別記入統一的公共帳戶和個人帳戶。一旦職工失業、生病或生育的保險由公共帳戶提供，個別職工則是以個人帳戶參加住房保險，並且可以自行選擇退休或醫療保險。除此之外，雇主還需要向社會公積金繳納和工作有關的小額傷害和疾病保險金 (Ibid. : 189-190)。這項制度直接鼓勵了園區的員工在園區內置產，而園區又能從中獲取鉅額的利潤，但是員工不能用個人帳戶購買園區外的房子；此外，員工一旦離開蘇州工業園區，就會失去個人帳戶基金的一部份。這套制度固然為員工提供留在蘇州工業園區工作的經濟誘因，同時也舒緩了企業雇主對員工流動率的憂慮。但是，對於非技術或低薪作業員而言，這套社會公積金制度並不受到他們的歡迎，因為以他們的薪資根本不可能在園區內買房子，同時他們也是最有可能離開園區的人。此外，這些外資企業是否會長期留在園區之內而不會撤資，也受到員工的猜疑。「社會公積金之類的福利模式若是建立在受高壓的勞動力與自由移動的跨國公司之間的互信之上，不大可能成為最可行的發展方向 (Ibid. : 192)。因此，蘇州工業園區的員工跳槽情況相當嚴重，特別是擁有一年以上經驗的技師或工程師等人才。較高的員工流動率也和園區內的外資企業以高薪挖角有關。

第二，隨著跨國公司的大量設廠，人力需求也大幅增加，吸引了許多來自外

---

<sup>7</sup> 蘇州新聞網，〈二季度人力資源市場供求分析報告出爐，外來求職者增 10 萬〉，2010-07-23。

地的求職工人及工程師。而園區內的勞動條件，根據 Ross 的資料，大多數廠商是二十四小時生產，通常採取兩班制，亦即工人連續上三個白天的十二個小時輪班，然後休息兩天，再連續參加三個夜班的十二小時輪班。這種生產時間的制度設計，Ross 認為是為了確保作業員無法跳槽到更好輪班方式的公司。對於跨國公司而言，能否留住技術工人或優秀的工程師，「企業文化」這類的軟因素是影響員工忠誠度的關鍵。尤其是歐美企業的文化對中國員工產生極大的吸引力。在我的田野觀察中，老楊也多次向我提及他喜歡自己所任職的歐洲籍公司，這家公司尊重員工，幾乎不怎麼管理員工，而且每年固定加薪 10%。而這家跨國公司給予老楊的薪資待遇，是非常優渥的。

但是，這仍然無法阻止中國本地的作業員或工程師跳槽的慾望。這裡需要指出一點，跳槽現象除了金錢誘因之外，另有一個因素是和工程師嚮往學習較高的技術知識有關。蘇州及昆山等地的台灣籍專業經理大多指出，大陸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不高，IC設計公司的H經理<sup>8</sup>提到他們有一位工程師為了一萬塊人民幣的月薪跳槽到蘇州超微半導體。過了一年，H經理問起這位離職的工程師在新公司過得如何？這位工程師說他去了超微一年，但是什麼也沒學到，因為美國人根本不把技術教給他們，每天只是重複做一些例行性的事情，這位工程師覺得在超微的工作很無聊。老楊也提及自己的某位同事，從其他公司被挖角過來，當初以為能在這家歐洲跨國公司學到什麼新技術，但是老楊的這位同事很失望，因為該跨國公司的重要資料庫數據建立在歐洲總部，並沒有放在中國，這家跨國公司寧願花錢讓員工出差到公司的歐洲總部，也不願意把關鍵的技術落實在蘇州。因此，老楊的這位同事也做得不開心。

根據對H經理的訪談，台灣高科技公司對技術移轉給中國籍工程師，表現得較為「熱情」，因此他們經常自嘲台灣公司是「幹訓班」，好不容易培養好的中國籍工程師為了多幾百塊錢人民幣的收入就跳槽到歐美日等大型跨國公司。相較於台灣公司，歐美日等跨國公司則對技術移轉給中國籍工程師有著更高度的防範

---

<sup>8</sup> 訪談記錄 SZ1013。

<sup>9</sup>。中國的IC設計、製造和軟體能力遠遠落後於美國科技公司，如英特爾、思科和微軟等美國科技公司的研發中心並不把中國同業當作可能一起進行研究或生產的伙伴，至於他們與中國各大學的合作，主要是為了尋覓技術人才、提高聲譽，並且拉近與政府官員的關係（Saxenian，2008）。

另外，台灣高科技產業的「趕工現象」（王振寰，2011），也帶進蘇州、昆山的勞動環境之中。這一方面使得本就懷抱著藉由大陸投資以壓低人事成本的台灣廠商更難找到優秀的中國人才，另一方面台灣高科技廠商的「趕工現象」也逼使著中國員工難以忍受其勞動條件而頻頻跳槽。根據昆山 Y 總提供的資料，昆山的人員流動率介於 20-30% 之間。這項數據和 Ross 在蘇州工業園區所得到的數據差不多。

在我的田野經驗裡，也觀察到從外省流動到蘇州工業園區的工程師移動的情況：

「昨晚，老楊透過公司同事（四川老王）的引薦，介紹了另一位在希捷公司服務的生產部主管，四個人一起來一家『彰化肉圓』的店吃飯。兩位都姓王，姑且分別稱為四川老王和內蒙古老王。四川老王高考上南京的大學，畢業之後，輾轉來到蘇州外資公司上班。內蒙古老王則在東北念的大學，畢業之後，流動於蘇州工業園區的外資公司之間（目前任職蘇州三星電子）。目前兩位老王都在蘇州落戶買房，也都當了爸爸。這次的飯局，受訪者是內蒙古老王，他給我的感覺是技術取向，熟稔高科技產業的製程技術；此外，讓我及老楊驚訝的是，他對國家及園區的產業政策也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田野日誌，2010-08-16）

蘇州各級地方政府為了促進技術升級，近年來透過「招商引資」的方式，企圖吸引外地具有產業技術的人才到蘇州落戶<sup>10</sup>。例如，蘇州工業園區自 2007 年

---

<sup>9</sup> 訪談記錄 SZ1013。

<sup>10</sup> 新竹科學園區的人力流動研究，及歸國學人對台灣及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影響，可分別參見徐

開始實施「領軍人才創業工程」，目的是為了吸引高層次和緊缺人才，除了推出多項優惠政策，為優秀人才的薪酬待遇、社會保障、戶籍管理、子女入學及住房等開通「綠色通道」，並設立 5000 萬元人才發展基金，建立人才創新及創業的平台；並且建立校園招聘、異地招聘、海外招聘的三個管道，在商務部 2008 年國家級開發區投資環境調查中，蘇州工業園區的大專以上人才達 15.5 萬人，總量名列第一。目前，蘇州工業園區每年新增各類人才超過 1 萬名，園區還有 8 人成功入選國家「千人計畫」，累計引進碩士以上的高學歷人才已經超過 1 萬名。此外，目前有 2000 多名海外歸國人才在園區工作，各類留學生創辦企業將近 300 家。在 2009 年 10 月時，蘇州工業園區被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授予了「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的稱號<sup>11</sup>。

再以吳江為例，吳江市政府在 2010 年七月舉行「吳江全市人才工作會議」，制定了「十二五」人才發展規劃綱要，計畫到 2015 年，吳江的人才總量要達到 20 萬人。在該次會議上並且推出吳江市人才創新創業「55352」工程，亦即到 2015 年，引進和培養 5 名國家「千人計畫」人才、15 名省「雙創人才計畫」人才，300 名科技領軍人才，500 名創新型科技人才，以及 2000 名重點產業緊缺人才。吳江市政府制定一系列的扶持人才創新創業的政策，目的是為了引導社會資本的投資，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重點的創新戰略。主要的措施包括：實施吳江市重點產業緊缺人才計畫，修訂出台《吳江市重點產業高層次緊缺人才資助辦法》、《吳江市企業緊缺人才購房資助實施辦法》、《吳江市人才柔性引進與人才工作證規定》、《吳江市人才公寓租房補助辦法》等配套政策，以加大對緊缺人才引進和培養的資助力度。以及，定期制定發佈《吳江市緊缺人才專業目錄》，加強對產業人才發展的統籌規劃和分類指導，以企業為依託，建設一批產業人才基地、培訓基地，鼓勵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與企業開展科研、人才全方位合作<sup>12</sup>。

---

進鈺（1999）及 Saxenian（2006；中譯本 2008）。

<sup>11</sup> 蘇州工業園區全球資訊網，〈構築“人才金字塔” 啟動創新動力〉，2010-04-29。

<sup>12</sup> 《城市商報》，〈吳江制定人才發展五年規劃，到 2015 年人才數量翻番〉，2010-07-29。

#### (四) 6+4 和 3+5 產業政策

為了讓蘇州的「優勢產業」繼續保持成長，進一步提高產業集聚程度，以加速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然後形成新的競爭優勢，2009 年蘇州推出了「6+4」產業振興發展計劃，規劃電子信息、裝備製造、紡織化纖服裝、冶金、輕工、石化等六大年產值超千億元的主導產業，藉由「鞏固、整合、提升、擴展」的方式，計畫到 2011 年，這六大主導產業要實現產值達 26,960 億元，年均增長為 13%；另外，進行新能源、新醫藥、新材料以及服務外包等四個新興產業的培育以增加產業附加值。在人才引進政策方面，蘇州市委、市政府已經先後制定了《實施姑蘇創新創業領軍人才計劃意見》、《蘇州市高層次人才培養資助實施辦法》等一系列政策，對高層次人才的創新創業工作給予重點資助。目前，蘇州工業園區已經成為中國對科技創新人才扶持力度最大的區域之一，近兩年來共投入四億多元的獎勵，資助 34 位科技領軍人才。這些科技領軍人才的創新項目主要集中在生物醫藥、集成電路、軟體通訊和納米新材料等領域。至於昆山，由於是中國國內台資企業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昆山在 2008 年 10 月推出《關於推進台資企業轉型升級的若干政策》共二十八條，並設立「昆山市台資企業轉型升級引導資金」，企圖為台資企業在科技創新、技術改造、發展服務貿易等轉型升級方面提供專項扶持。蘇州市政府將陸續投入 10 億元，用於引導和資助企業科技創新<sup>13</sup>。

在「6+4」產業振興發展計劃的推波助瀾下，2009 年 11 月 11 日，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轉發一份政策文件《蘇州工業園區 3+5 產業發展報告》，行文園區內的各局辦、各大公司、各派駐機構、各直屬單位及各鎮，其主旨是「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落實黨中央、國務院『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總體要求，

---

<sup>13</sup> 《光明日報》，〈蘇州 6+4 產業振興計劃加快經濟轉型〉，2009-05-27。

根據市委十屆十次全體(擴大)會議精神，圍繞把蘇州建設成科學發展的樣板區、開放創新的先行區、城鄉一體的示範區，成為以現代經濟為特徵的高端產業城市…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促進電子資訊製造、機械製造、現代服務業 3 大主導產業，生物醫藥、納米光電新能源、軟體與動漫、融合通信、生態環保 5 大新興產業跨越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一步提升區域經濟整體素質和抵禦風險能力。」

所謂的「3+5 產業」，是由三大主導產業（電子資訊製造、機械製造、現代服務業），及五大新興產業（生物醫藥、納米光電新能源、軟體與動漫、融合通信、生態環保）構成。在蘇州市政府推出「6+4 產業振興發展計劃」的政策指導下，蘇州工業園區緊接著提出「3+5 產業」計劃。之所以要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在於工業園區內部的產業結構在經過十五年的發展之後，呈現結構失衡的狀態，其中以電子資訊製造及機械製造等兩個產業所佔比重最高，電子資訊製造佔 56%、機械製造佔 31%、化學製品及醫藥製造佔 5.8%、造紙及紙製品製造佔 2.9%、金屬及非金屬製品製造佔了 3.1%。其中電子資訊製造和機械製造兩大產業以高度產業聚落的規模，成為園區工業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產業。兩大產業合計佔規模以上工業產值 87%，吸納就業人口約佔全區的 78%。

以 2008 年為例，電子資訊製造（不含軟體）實現規模以上產值達到 1384 億元，佔全區規模以上工業產值的 56%，同時佔蘇州市規模以上電子資訊製造業產值的 19.2%，已經成為園區工業經濟的第一大產業。並且構成以集成電路、液晶面板、電腦及外設、通信設備製造等四大行業，吸引三星、超微、日立、和艦、志合、大眾、方正等電子製造企業入駐，形成從 IC 設計、晶圓製造、封裝測試及相關原材料、設備於一體的完整產業鏈，以及以中游面板模組製造為主的，包含上游材料及相關電子材料製造的產業聚落（表 5-5）。

表 5-5 蘇州工業園區電子資訊製造行業構成表

行業	產值（億元）	家數（個）	產值規模企業
集成電路	232	32	三星半導體
			瑞薩半導體
			和艦科技
液晶面板	315	35	日立顯示器
			聯建科技
			日東電工
電腦及外設	499	53	三星電子電腦
			志合電腦
			方正科技
通信設備	162	24	偉創力電子
			安德魯電信器
			中怡科技

資料來源：蘇州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文件，蘇園管（2009）54 號，〈關於印發《蘇州工業園區 3+5 產業發展報告》的通知〉。

備註：1.表格中產值和企業均為規模以上資料；2.集成電路不含軟體產值和軟體企業家數。

根據這份報告，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認為該園區的產業發展，存在著幾個主要問題。蘇州工業園區主導的產業發展路徑，主要是透過引進而逐漸形成產業規模，造成產業發展的外向度偏高，首先是產業聚落以外資廠商為主，規模以上的企業產值中，外資廠商的產值比重達到 99%；其次，則是市場以出口外銷為主，規模以上企業出口收入佔全部銷售收入比重達到 72.5%。這個發展現象，亦即園區的主導產業從無到有的過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直接結果，在這段時間內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以及園區的土地資源日益緊缺<sup>14</sup>，低成本和政策優勢不斷弱化的背景之下，產業發展外向度偏高所產生的一些問題，已成為制約主導產業持續發展的主要障礙，急需轉型升級。

因此，蘇州工業園區計畫利用「新一輪國際產業調整和新技術轉移為契機，

<sup>14</sup> 根據老楊的說法，以及我在蘇州工業園區的觀察，園區內仍有大片未開發的閒置土地，但是住宅大樓則是成片的開發興建中，甚至有部分的大樓因為地產商的資金不足形成所謂的「爛尾樓」。住宅大樓的密集度多過於工業廠房，是我對蘇州工業園區感景觀到好奇的印象。但這或許也正符合了目前中國房地產熱的情況。

以主導產業做大做強和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主導產業轉型升級為核心，突破和改善兩頭在外的車間式生產經營模式，提升主導產業技術發展水準和規模能級，引導和推動產業向產業鏈和價值鏈兩端延伸，努力打造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內外銷相對均衡、可持續發展能力強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2009：7）。就電子資訊製造的發展目標而言，具體計畫，包括(1)到 2012 年時，園區的電子資訊製造業產值年均要增長 10%左右，規模突破 2000 億元；(2)重點突破集成電路、液晶面板關鍵技術，引進 1-2 條 TFT-LCD 第七代以上高世代面板生產線、1-2 條 12 英寸及以上的集成電路生產線；(3)企業創新能力要顯著增強，經認定國家級高新企業要達到 70 家，企業的研發支出佔銷售收入的比重要超過 3%；(4)經營模式加快轉變，鼓勵企業積極開拓國內外市場，實現內外銷的均衡發展，在行業中擁有分銷與採購權的外資生產企業總數要超過 90 家；(5)骨幹企業穩定增長，要培育年銷售收入超 100 億元的企業集團 3-4 家，其中力爭培育 1 家超 300 億元大型企業集團，年銷售收入超 50 億元企業集團 7-8 家，年銷售收入超 10 億元企業集團 40 家左右。（表 5-6）

表 5-6 蘇州工業園區主導產業 2012 年發展目標

產業		電子資訊製造業	
年份		2008 年	2012 年
產業規模	產值（億元）	1384	2000
技術創新	高新技術企業家數	29	70
	企業研發支出佔銷售收入比重	1.78%	3%
經營模式	擁有分銷與採購權的規模以上外資生產企業家數	46	90
	年銷售超 100 億企業（家）	1	3-4
	年銷售超 50 億企業（家）	4	7-8
	年銷售超 10 億企業（家）	24	40

資料來源：蘇州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文件，蘇園管（2009）54 號，〈關於印發《蘇州工業園區 3+5 產業發展報告》的通知〉。

備註：「行業研發支出佔銷售收入的比重」，根據統計部門提供的 2008 年度經濟普查資料，2008 年度電子資訊製造企業的研發支出佔銷售比重為 1.78%。

在電子資訊製造業的主要執行任務上，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除了針對技術引進及技術移轉提出規劃之外，也提出「多層次的技術研發合作」，亦即透過完善科技創新政策的扶持，保護知識產權，鼓勵企業引進和設立研發機構，並與科研院所進行產學研合作，藉以增強自主創新的能力，要「搭建企業與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產學研互動平臺…將園區科技資源融入主導產業轉型升級中，促進企業設立研發機構，特別是鼓勵外資企業設立研發機構，探索適合園區的對引進技術的吸收、消化和再創新道路，培育出更多具有核心競爭力高科技企業，使主導產業發展與科技發展兩利雙贏。此項工作建議由科技局負責，招商部門配合，制定方案，推進落實。」

## 第二節 台灣 IT 廠商帶動的產業後向連鎖

蘇州為了完整其在筆記型電腦等資訊產品以外的產業鍊，掌握上游原材料的來源，因此往面板產業、半導體產業等進行投資設廠，同時引進跨國筆記型電腦廠商成立研發部門，以及對台商中小企業展開輔導。儘管，地方政府參與部分投資，但是這些產業後向連鎖的經濟行動大多是採取「招商引資」的方式，由台灣 IT 廠商或台灣民間協會的資源所促成。

### （一）電電公會的台商輔導課程

在昆山Y總的介紹之下，我們來到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電電公會）在昆山的聯絡處辦公室拜訪。電電公會的負責人為S主任，另有二至三位台籍經理，以及兩位中國籍女性秘書，維持聯絡處的日常業務運作。這一天下午，Y總簡單向S主任說明來意，以及介紹我此行在蘇州、昆山從事田野研究

的目的。之後，我們則和該公會副秘書長交流。副秘書長正在推行一項業務，即協助台商生產綠能產品及碳足跡標章認證的工作。得知隔天在昆山中信酒店<sup>15</sup>將有一場電電公會主辦的台商輔導課程，於是我報名參加。

隔一天上午，我從下榻的賓館步行至附近約三百公尺的中信酒店參加台商輔導課程。這一場的課程是「統計過程控制」(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SPC)，主要介紹如何運用統計軟體計算及控制生產製程中的良率等統計軟體及技術的課程。課程為期兩天，經費是由昆山市政府贊助。主講人是 K 講師，他擁有新竹中華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碩士學位，曾經輔導過兩岸知名的大型企業，例如中國移動等公司。根據 K 講師講課的內容，任何產品由打樣、小批量生產到正式量產的過程中，正式量產往往是最容易出現品質瑕疵的階段。因此，導入 SPC 的統計軟體，有助於企業控管產品的生產狀況，以及協助品保部門找出問題所在。

參與的學員大約兩百人，擠滿了演講廳。他們多來自昆山的台資中小企業的陸籍幹部。如此的台商輔導課程是由昆山市政府與電電公會簽約，定期在昆山舉辦，課程的費用則由昆山市政府出資贊助，目的是協助台資中小企業在昆山的轉型升級。我問 Y 總，昆山的員工平均流動率約 20%，在大陸籍員工容易跳槽的情況之下，電電公會主辦的這些輔導課程有用嗎？Y 總認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企業自己要想辦法留住人才，要去調整經營的策略，台商在昆山的轉型升級還是要進行，因為員工幾乎都是大陸員工，你不訓練他們、不去提升他們的素質不行啊！反正，上課的經費是昆山市政府出的<sup>16</sup>。

## (二) 台灣 IT 廠商研發部門的成立

台資筆記型電腦廠商在歷經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一方面為了節省母國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為了開發中國市場及提升在蘇州的生產品質，大型筆記型電腦代

---

<sup>15</sup> 中信酒店原為台資及陸資合資經營的酒店，但後來該酒店的所有權為陸資併吞。目前中信酒店已經全部歸陸資經營。

<sup>16</sup> 訪談記錄 KS1017。

工廠商加速在蘇州、昆山等地設置研發部門，從過去單純的加工組裝，移轉了更多的研發設計業務到大蘇州地區。在台資筆記型電腦公司服務的M經理即表示，W公司已經成立研發中心，從OEM轉型成ODM，並且對培養中國的筆記型電腦人才有很大的幫助<sup>17</sup>。

在昆山，除了W公司之外，其競爭對手<sup>18</sup>台灣仁寶集團在2009年8月31日與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簽訂協定，投資了1.8億美元新建區域總部、研發中心和四個廠房。這六個項目專案將在2012年全部建成，產出將達到1000億元人民幣。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昆山市委書記張國華，以及顧劍玉、黃健等昆山市、昆山開發區工委、管委會等領導特別重視這項投資，共同與仁寶集團總經理陳瑞聰出席簽約儀式。仁寶自1995年投資昆山至今，經過10多年的發展，在昆山的投資總額已經超過2.4億美元（註冊資本達1億多美元）。仁寶在2009年的前七個月，銷售額高達82.44億美元，出口額位居江蘇省第一，全年生產筆記型電腦3400萬台。在這次簽約的六個專案裡，昆山區域總部是以內銷為主，規劃在三年內達到內銷總額300億元；研發中心則在現有1000多名研發人員的基礎上再進行擴充，預計在三年內達到2500名左右。至於四座新建的廠房將年產筆記型電腦3000萬台<sup>19</sup>。根據仁寶的估計，這六個專案全部完成之後，仁寶集團將成為全球最大筆記型電腦製造企業。仁寶總經理陳瑞聰表示，仁寶再次於昆山投資建設六個專案，主要是因為昆山有著比較完善的資訊電子產業規劃，同時在應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仁寶集團感受到昆山優質、高效和個性化的服務<sup>20</sup>。

2009年12月19日，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與仁寶集團再次正式簽訂合作協議，欲建設產能達到1000萬台的液晶電視整機生產專案，並且成立仁寶中國大

---

<sup>17</sup> 訪談記錄 KS1012。

<sup>18</sup> 「目前昆山最大的筆記型電腦 ODM 廠商是仁寶及 W 公司，神達已經不行了。這兩家台灣公司是昆山的創稅大戶，昆山政府不會輕易地把他們遷走。至於鴻海富士康（昆山）是以電腦週邊產品為主，也是 W 公司的主要供應商之一。」（訪談記錄 KS1012）

<sup>19</sup> 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全球資訊網，〈仁寶集團投資 1.8 億美元再造一個新“仁寶”〉，2009-09-01。

<sup>20</sup> 至於仁寶在 2008 年傳出要撤離昆山的新聞，昆山當地台商大多認為這是『會吵的小孩有糖吃』的策略。

陸區域總部及人才培訓基地，積極推動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的IT產業轉型升級。仁寶集團投資的液晶電視整機專案項目，是仁寶在該年第二次大規模的投資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與此同時，仁寶也進行了人才培訓計畫。在 2007 年時，仁寶集團即與西安交通大學蘇州研究院聯合開設西交仁寶大學班，這是昆山仁寶首次與中國的大學合作，第一批共有 98 位學員，經過兩年多的培訓後已順利畢業。至於這一次，仁寶集團則與山西藍天學院等來自中國的十一所大、中、專院校簽訂了校企合作協議，計畫在 2010 年選取 5000 名學生到昆山仁寶人才培訓中心受訓學習。新建的仁寶人才培訓中心佔地 3800 平方公尺，投資超過 500 萬元，可以同時容納 1500 名學生實習培訓<sup>21</sup>。

到了 2010 年 4 月 20 日，昆山仁寶研發中心正式啟用，這座研發中心擁有研發人員超過 1000 人，主要從事高階筆記型電腦的設計，計畫在 2010 年完成十款可供量產的筆記型電腦機種，並在三年內設計出七十款筆記型電腦機種。仁寶集團總經理陳瑞聰在這次的簽約儀式中表示，仁寶研發中心的成立，是仁寶在昆山發展的另一個里程碑，意味著昆山仁寶已經從加工製造邁向了研發設計，因此仁寶此後在昆山將持續加強研發部門的投資，以期在昆山設計出更多高階筆記型電腦的機種<sup>22</sup>。

除了台資筆記型電腦廠商設置研發部門之外，昆山市政府也成立「昆山盃」的筆記型電腦設計評比大賽，2010 年已經舉辦了第二屆。昆山政府籌辦「昆山盃」的目的，在於通過工業設計，以增加IT產品的附加價值，形成企業獨特的競爭優勢，進而推動整個地區的產業升級。工業設計已經成為筆記型電腦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元素，但是根據賽迪傳媒發佈的《中國筆記本電腦工業設計競爭力白皮書》的調查<sup>23</sup>，在筆記型電腦的設計成果及商用轉化方面，這一直是中國大陸目前得分最低的一個指標。在產品的研發上，中國的工業設計現在最欠缺的是綜合能力，也就是在從事筆記型電腦設計時，應該同時考慮到市場的多元化和普適

<sup>21</sup> 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全球資訊網，〈仁寶集團佈局電視生產與人才培養“雙基地”〉，2009-12-20。

<sup>22</sup> 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全球資訊網，〈仁寶研發中心正式啟用〉，2010-04-20。

<sup>23</sup> EDN 消費電子設計，〈工業設計提升筆記本電腦價值〉，2010-10-27。

性，並且在兩者之間達到一個平衡。第二屆「昆山盃」的評審認為部分參賽設計者對筆記型電腦仍然缺乏深層的認識，大多著重在外觀設計的改良，但是對筆記型電腦的功能、人機界面、便於攜帶等設計元素的理解及設計能力，還有待提升。

在 2004 年的田野訪談中，一位蘇州工業園區的經貿發展局副局長提到，在稅收之後，其實每年都有提撥 2-3% 的資金做為研發的基金，供廠商申請研發經費，不論外資或內資都能申請，但是以外資的申請案較多。不過，儘管蘇州工業園區的許多外資在園區內設立研發中心，但並不是新的產品研發，而是以製程改良為主。地方政府也沒有要求外資必須進行技術擴散或移轉<sup>24</sup>。

### （三）面板產業：昆山龍騰光電的成立

昆山在 2004 年提出成立龍騰光電的構想，直到 2005 年 6 月，經國家發改委批准，龍騰光電有限公司正式在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這項投資案，是由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資產經營公司與台灣寶成集團共同投資，總投資額達六億美元，註冊資本兩億美元，其中中方出資 10200 萬元，佔 51%，外方出資 9800 萬美元，佔 49%，由中方控股。龍騰光電主要從事筆記型電腦、液晶電視(TFT-LCD)顯示器的研發、生產及銷售，這是繼北京京東方及上海上廣電之後，中國第三條第五代 TFT-LCD 生產線。龍騰光電在 2006 年 7 月投產。2008 年 2 月，國家商務部批准二期增資，增資後的總投資金額達到 15.69 億美元，註冊資本 8.15 億美元，月投入玻璃基片生產能力從四萬片增加到十一萬片，目前是中國最大的液晶面板生產製造商（鍾永一、張樹成，2009）。

除了成立龍騰光電之外，昆山也同時成立光電產業園，總面積廣達 11.7 平方公里。昆山光電產業園側重光電產業的完整供應鍊的佈局，設立了生產液晶面板的核心區，生產半導體、玻璃基片的上游配套區和生產電視、手機、液晶電視

---

<sup>24</sup> 訪談編號 SZ0403。

的下游配套區。並且成立兩個綜合服務區，為光電產業園的科技開發、人才引進、教育培訓、生活配套、娛樂休閒等提供相關設施。至 2008 年為止，該園區吸引了德芯電子、琉明光電、康佳電視等中外廠商進駐。昆山又成立平版顯示技術研究院，從事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開發。目前昆山光電產業園已列為江蘇省級重點光電產業園（Ibid.）。

中國三大面板廠京東方、上廣電與具有台資色彩的龍騰光電在 2006 年已簽署意向書，擬以各自擁有的TFT-LCD業務（包括TFT-LCD大尺寸面板及上下游資產和現金），共同組建新的或選擇目前已存在的公司為專業化公司，成為三方TFT-LCD業務的統一平台。中國已經將顯示產業作為國家重點產業扶持，一方面大陸擁有全球增長最快的終端市場，在 2010 年中國的液晶電視市場年複合增長率將達 82%。另一方面，中國已經形成若干液晶產業聚集區域。重要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皆對液晶產業的發展有著很高的熱情。平板顯示產業在十一五規劃中，也被列為重點發展產業，因此中國三大面板廠的合作或合併會是中國TFT-LCD產業的重要政策決定（黃巧億，2007）。然而，由於三大面板廠分屬北京、上海及昆山政府所有，在地方各自發展的利益考量下，以及受到上海市長陳良宇下台事件的影響，合併案最後無疾而終<sup>25</sup>。

根據我對昆山龍騰光電台籍C經理的訪談資料，確認龍騰光電是由台灣寶成集團與昆山市政府合資成立，該公司董事長是由昆山政府官派<sup>26</sup>。龍騰光電的前後任總經理分別為台籍盧博彥及日籍人士出任。盧博彥在接受《中國電子報》的訪問（2009-06-26）中指出，龍騰光電是中國第三家第五代線液晶面板生產廠商，整體規劃面積為 143 萬平方米，一廠使用面積為 26.7 萬平方米，而江蘇省（龍騰）平板顯示技術研究院也已經完工。龍騰光電在昆山成立的第一個因素是昆山市政府出資 51%，這種政府和企業共同承擔風險的模式很好；其次，上游材料的支持很到位，因為昆山市政府非常積極，不僅打造光電產業園，而且切實為企業

---

<sup>25</sup> 訪談記錄 KS1016。

<sup>26</sup> 訪談記錄 KS1016。

著想，將配套企業引進過來。龍騰光電從成立至今，在三年的時間之內，已經先後在國內外申請發明專利超過百項，也自行開發多款顯示器、筆記型電腦及液晶電視用面板。同時，龍騰光電搭上了中國推行「家電下鄉」政策的機會，鎖定國內市場，產品也接近大眾消費者。目前產能很緊，差不多每月生產 8 萬片，在 2009 年第三季將達到每月 11 萬片的產能，生產的產品包括 19 英寸的液晶顯示器用面板，23.6 英寸及 26 英寸的電視用面板，10.1 英寸、14.1 英寸及 15.6 英寸筆記型電腦面板等。

龍騰光電現有員工數大約三千多人，約有兩千多人為現場作業員，高層管理人員幾乎從日本及台灣延聘，陸籍幹部的最高職位則是廠長或經理，目前總經理為日籍人士。在龍騰光電服務四年的台籍 C 經理認為，昆山政府之所以成立龍騰光電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產業的轉型升級，因為昆山雖然已經成為筆記型電腦的重要生產基地，但是仍然集中在勞力密集的組裝加工製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引進面板產業可以慢慢提升本地的生產技術水準。固然目前龍騰光電在 LCM 製程也需要大量的人力進行組裝，但是有昆山市政府的強力支持，在生產上較不受缺工因素的干擾。但是，昆山本身並不具備在地的面板生產及管理的條件和能力，所以在成立之後，大量從海外招聘人才。在台灣面板產業的整併過程中，特別是群創合併奇美電子之後，流失了一批優秀工程師，這些工程師在中國大陸本地面板廠商的重金禮遇下，部分工程師及管理階層已經在中國面板公司（如 TCL 等）擔任重要職務<sup>27</sup>。

截至 2009 年，昆山光電產業園已引進光電產業項目近 20 個，總投資額超過 55 億美元，形成一條較為完備的光電產業鏈。龍騰光電身為光電產業園的龍頭項目，在 2009 年成功開發出 26 英寸液晶電視面板，順利成為康佳、海爾等中國國內六大家電企業的供應商。2009 年，龍騰光電對康佳的供貨量，達到每月近 20 萬片。2010 年底，康佳將在其昆山基地投產，兩家公司將會出現「門對門」

---

<sup>27</sup> 訪談記錄 KS1016。

的供貨模式<sup>28</sup>，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昆山光電產業園將會繼續加大產業鏈的招商引資，在積極吸引背光源、驅動晶片、偏光板等核心零組件項目的同時，更將全力引進電視機整機項目，以向平板電視下游整機方向拓展，打造出全球平板電視機產業基地。

相較於台灣面板產業的技術路徑是奠基在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基礎上，隨著技術設備的進步，昆山龍騰光電可以在海外人才的技術支援之下，跳過半導體產業的學習經驗，直接進入較先進的製程展開技術學習。但在相關技術人才的養成上，昆山一如其他中國地方政府一般，為了產業的速成，寧願重金從海外招募人才，因為這樣比自己培養人才還來得快。昆山政府固然叮囑這些海外延聘的技術及管理幹部將技術落實在昆山，但是C經理觀察其中國同事的心態大多較為浮躁及功利，在技術學習上較不願如台灣人才那般任勞任怨地投入時間及精神<sup>29</sup>。

#### （四）半導體產業的變化

蘇州半導體產業自 2001 年之後，日漸形成晶圓製造、IC封裝及IC設計等三大次產業的分布格局。聯電的「友好企業」蘇州和艦在 2001 年成立之後，成為蘇州第一座專業晶圓代工廠，並帶動IC設計產業的高度聚集，這些IC設計公司大多集中在蘇州工業園區的國際科技園<sup>30</sup>。IC封裝測試的產值是蘇州半導體產值最高的產業。先就中國主要封裝測試廠商的分布而言，依然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包含上海、蘇州、無錫及南通等城市（見表 5-7）。

---

<sup>28</sup> 亦即，兩家公司僅相隔一條馬路。

<sup>29</sup> 訪談記錄 KS1016。

<sup>30</sup> 請見本章第二節的介紹。

區域	長三角	京津環渤海	珠三角	中西部及其他
家數 比重	59	10	9	11
歐美 廠商	IBM (上海) NXP (蘇州) ●Inficon (無錫)	●Freescale (天津) ●RFMD (北京)	● ST 深圳賽意 法 NXP	Micron (西安) Intel (成都) Psi (成都) MPS (成都) 樂山費尼克斯 (樂山)
日韓 廠商	●Samsung (蘇州) ●Panasonic (上海) ●南通華達 (富士通) 日立半導體 東芝半導體	● Renesas (北 京) 首鋼 NEC	—	—
台資 廠商	●日月光 (上海) 宏茂 (南茂) 巨豐 (超豐) 矽品 (蘇州) 力成 (蘇州)	—	傑群科技/東莞 杰群電子 珠海南科電子/ 南科集團	—
中資 廠商	●江蘇新潮(長電科技 /長電先進) 華潤安盛 芯電科技	濟南晶桓	閩航電子 佛山藍箭	芯電科技 樂山無線電廠 西谷微電子 艾爾微電子
其他	紀元微科	—	—	—

資料來源：MIC (2010a)。  
註：●指為中國 2009 年前十大封裝測試業者。

台灣封裝測試廠商在中國的投資集中在沿海地區，其中以蘇州的數量最多，包括矽品、力成、京隆、頤邦、華東科技、華禕科技、日月光、飛信電子、巨豐微電子等（見表 5-8）。

區域	蘇州市	上海市	山東省	廣東省	浙江省
家數 比重	9	4	1	2	1
廠商	矽品、力成 京隆(京元電轉 投資)、頡邦、 華東科技、華 禕科技、日月 光、飛信電子 巨豐微電子 (超豐轉投資)	日月光 威宇科技 勤益電子 宏茂微電子	日月光威海 (2008/05 併購)	傑群電子 珠海南科電子	力源(菱生轉投 資)
資料來源：MIC (2010a)。					

蘇州的封裝測試產業高度聚集在蘇州工業園區，其中日月光在昆山設廠，巨豐則在吳江。2009 年蘇州工業園區的封裝測試產值接近一百億人民幣。最近歐美外資則相繼撤資，包括美國 National Semiconductor 及德國 Qimonda 等公司關閉蘇州生產基地，Spansion 半導體蘇州廠出售給力成科技。以封裝測試的製程來看，蘇州工業園區的廠商以 SOP、PLCC、TSOP、QFP 等中階封裝形式為主，至於是否往高端的封裝測試技術發展，端視外資的發展策略而定 (MIC, 2010a)。

成立於蘇州國際科技園的台資IC設計公司的台籍H經理，曾經在中國各地尋找合適的本土IC封裝測試廠商合作，他最南跑到深圳，最遠曾跑到甘肅。他提到曾經下單給無錫某家大型的民營封裝測試廠商，該廠商雖然是民營企業，但具有解放軍的軍方背景。有次下單給這家民營封測廠，在生產過程中遇到問題，不過這家民營封測廠束手無策，結果還是H經理自己前往該公司，幫他們重寫程式，才克服生產問題<sup>31</sup>。

在對蘇州和艦的訪談裡，台籍P經理表示，在晶圓代工領域裡，蘇州本地的IC設計業者下單給蘇州和艦後，和艦對他們提供所謂Turnkey服務，因為本地的IC設計業者的設計能力還不是很強，有很多的細節只好由和艦代勞。透過和艦的帶

<sup>31</sup> 訪談記錄 SZ1013。

領，培養IC人才及帶動蘇州半導體產業發展，這也是蘇州市政府希望和艦投資之後，能幫助扶植蘇州本地半導體產業成長的主要原因<sup>32</sup>。

上一段提到的台資 IC 設計公司 H 經理，曾以 E-mail (2010-08-17) 回覆我的提問，我將他的回覆內容綜合整理如下：

「前段的 Array 製程與半導體製程相似，但不同的是將薄膜電晶體製作於玻璃上，而非矽晶圓上。Array 製程確實與晶圓製程相同，只是 Array 製程相對來說技術門檻較低，而 Array 製程僅是面板製程的一部份。至於在晶圓製程技術方面，台灣確實仍然佔有很大的技術優勢。但是，近年來，陸資面板廠也大舉重金聘請台灣眾家高手，雙方的技術距離在台灣人才的扶植下已經慢慢拉近中。缺工和工資飆漲問題不解決，提再多的政策都只是口號，所以我們公司已經慢慢將產品拉回台灣代工。陸資封裝廠幾乎都是兵工廠轉型，前身的整體組織就是政府機關，官僚問題頗深，官位比能力更重要。陸資的封裝測試廠商肯花錢添購機台和設備，規模相當大，但在技術上卻相當缺乏，研發能力落後台資廠頗大，尤其在高階產品上更能看出差距。而且，陸資的客服服務一般都相當差。當然，他們也會分客戶，一級客戶幾乎可以向陸資封裝測廠商索求無度；但面對其他客戶的服務品質就很明顯的差，要來就來，不來拉倒。台資廠在產品的管理上，相對較為嚴格，品質較佳，開發產品和分析產品的能力也較佳，但是台資廠因為成本考量，大舉晉用陸幹，品質當然已經大不如前，但還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在我的田野裡，拜訪過一家蘇州本地的IC設計公司，這家民營IC設計公司成立於 2003 年，總部在北京，主要產品是設計智能電網裡的MCU晶片。這家公司的B經理主要從事採購業務，公司的研發部門設在北京，採購部門在蘇州，北京研發部門的工程師大約四十人。至於該公司的主要晶片代工廠是華虹NEC及意法

---

<sup>32</sup> 訪談記錄 SZ1036B。

半導體。中國大陸正在積極推動智能電網的建構，因此在電表裡的晶片是一個龐大的商機，一年的電表需求大約在六千至七千萬台，而每個電表裡需要二至六個MCU晶片，因此電表整機市場的晶片需求量將近六十億個。該公司因為只從事晶片設計，因此通常是與電表製造商聯合參與各地方政府的競標，以爭取訂單，但該公司在2003-2006年處於虧損狀態。智能電網涉及中國國家的電力政策及供電系統，因此大多數能參與投標的廠商大多是中國國內的廠商，外資參與競標的規模並不大。在節能減碳的綠能政策指導下，中國正透過智能電網的全面建構，要改變家戶消費者的用電習慣。就產業政策的層面而言，B經理表示，雖然政府非常重視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但對於民營IC設計公司的資金支持是很少的，大多要靠業者自己集資創業，這家公司便是由創辦人與民間投資機構合資成立<sup>33</sup>。

#### （五）台籍專業經理們對蘇州「轉型升級」的觀察

C經理服務於蘇州工業園區的某家台資筆記型電腦公司，這家公司的規模在台灣筆記型電腦代工產業裡不大。該公司的蘇州廠區員工人數大約在兩千多人。C經理認為蘇州轉型升級的政策對該公司的營運沒有什麼影響<sup>34</sup>，因為獨資經營的關係，地方政府也難以插手公司的經營型態。反倒令C經理感到困擾的日常業務是必須經常處理大陸員工的問題。他認為大陸九〇後的這些年輕員工，大多是獨生子女，因此對製造業的生產較不能配合。他也提到和許多中國的銀行經理們接觸的經驗，令他感到「羨慕」，如C經理這一個世代的人才在台灣無法爬升到相當於這些中國年輕銀行經理的中高階職位。但像他這樣年齡介於四、五十歲的台幹，還得離鄉背井、拋妻棄子的到中國工作。在看似嘲諷的評價裡，C經理想表達的是他認為這批年輕銀行經理們的專業能力與他們的職位並不相稱，他們所擁有的成就只是中國市場「水漲船高」的現象。換句話說，以C經理的角度來看

---

<sup>33</sup> 訪談記錄 SZ1009。

<sup>34</sup> 另一家同樣設立於蘇州工業園區的台資光電公司總經理，亦表達類似的看法（訪談記錄 SZ1003）。

中國產業與經濟的趨勢是「浮躁、功利」的；而這種對中國經濟社會做出「浮躁、功利」的評論，不斷地出現在我的整個蘇州田野訪談裡。此外，C經理提到，該公司的出口會遇到海關的刁難，但這種刁難來自於海關本身的「出口指標」被上級單位要求必須年年增長，因此在數字上就得動手腳。換言之，海關會要求台資廠商在產品出口報關時，盡量在數字上配合海關人員，好讓海關相關作業人員的業績能夠「達標<sup>35</sup>」。

在我對蘇州和艦的兩位專業經理訪談中，他們從半導體產業的角度，提到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亦即台灣從新竹科學園區訓練出來的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及管理人才，在近幾年內大量地輸出到南韓、新加坡及中國等國家，協助這些國家發展半導體及面板等產業<sup>36</sup>。而他們認為中國對半導體產業的態度，依舊存有IDM型態的迷思，在規模上什麼都要「做大做強」，這種心態一方面無法深入技術的本質，因為目前半導體產業的專業分工是整個行業競爭力的來源；另一方面，技術人員的浮躁心態，不能靜下心來蹲好馬步，學到一招半式就想跳槽，只想一夜致富的社會心理，使得他們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不是那麼樂觀。同時，設備機器的投資佔了晶圓製造廠最大的資金比重<sup>37</sup>，人力成本相較之下的比重並不高。因此，這兩位台籍專業經理認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儘管在中國設廠投資，但在技術及管理方面依然佔有極大的優勢<sup>38</sup>。

### 第三節 公共研發中心及相關協會的角色

---

<sup>35</sup> 訪談記錄 SZ1033。

<sup>36</sup> 如台積電前資深研發部主管梁孟松二進二出南韓三星，並確定在今年七月底結束新竹清華大學教職後，轉任三星晶圓代工首席研發副總，協助三星展開 28 奈米製程的研發，業界認為三星再次挖角梁孟松，將縮短三星的學習曲線（工商時報，2011-07-05）。

<sup>37</sup> P 經理提到蘇州政府希望該公司能投資 12 吋晶圓廠。但是，蓋一座晶圓廠大約需要 80 億美金，除非蘇州政府自己跳下來投資。目前該晶圓代工廠仍以 8 吋晶圓製程為主，暫無擴廠的計畫。（訪談記錄 SZ1036B）

<sup>38</sup> 訪談記錄 SZ1036A、SZ1036B。

除了第二節描述的台資筆記型電腦廠商陸續在昆山成立研發部門之外，蘇州及昆山等地方政府也成立許多的公共研發中心及人才培育機構等單位，以養成相關的產業技術人才，同時吸引海外歸國學人的加入。但是，在經濟區域主義的影響下，大蘇州地區是各自成立這些公共研發中心，例如仿造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的設置，在蘇州就出現了蘇州科技城、蘇南工業技術研究院及昆山工業技術研究院<sup>39</sup>等機構。另外，如蘇州工業園區的國際科技園、昆山的清華科技園等機構的設置，其角色定位大多傾向於企業育成中心的性質，而不是以技術引進與技術擴散為其日常業務。

### （一）蘇州市生產力促進中心

蘇州市生產力促進中心隸屬於蘇州市科技局，辦公地點位於蘇州市區飲馬橋的鬧區，該中心主任介紹生產力促進中心的主要任務是作為將大學的研發成果轉移給企業的平台，但是較少高科技產業的技術，目前該中心最重要的技轉項目是智能電網的相關技術。在科技人才的培育上，蘇州本地最重要的大學是蘇州大學，但蘇州大學正要開始從師範型大學轉型到研究型大學，在理工方面的研究能力不強，還需要一段時間去提升理工科系的研究實力。現在就是在蘇州工業園區邊上搞個大學城，引進蘇州地區以外的理工大學進駐，如南京東南大學、北京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九所大學來幫忙培養理工科系的本科生。一般來講，大陸的大學研發成果要交給廠商生產時，會出現很多的問題，因為大學缺乏試產的過程。假如是企業內部自行研發的成果，就比較少出現這個問題，所以企業的研發實力目前是強過大學的。蘇州市政府為了產業的轉型升級，非常需要科技人才，但是本地和國內又不夠，那怎麼辦？現在蘇州推出的人才引進計畫，就是政府組團，直接到海外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去舉辦說明會，

---

<sup>39</sup> 蘇州科技城成立於 2002 年，蘇南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於 2005 年，昆山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於 2008 年。前兩個機構位於蘇州新區。在田野調查期間，因缺乏管道進入這三個機構進行訪問，所以本研究未能針對這三個機構的角色及功能提供務實的分析。

吸引華人到蘇州來創業。假如歸國華人要來蘇州創業，他建議到蘇州工業園區，因為工業園區的條件比蘇州高新區要好得多。至於蘇州本地人的創業意願很低，因為創業條件差，假如要新創製造業，也只能做零配件的代工生產，蘇州畢竟是江南地區，有士大夫的傳統，所以蘇州人的創業風氣不如溫州。這兩年，蘇州政府積極推動產業的轉型升級，就是要培養本地民營企業，落實技術上的自主能力。另外，這位主任也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APEC）技術移轉中心，協助移轉亞太國家的高新技術到蘇州<sup>40</sup>。

## （二）蘇州工業園區國際科技園

蘇州國際科技園成立於 2000 年 4 月，總規劃建築面積為 108 萬平方米，分為六期建設。蘇州國際科技園最初被定位為科技企業的孵化器，後來為了配套服務蘇州工業園區內的電子資訊企業，聚集高端人才，因此轉而重點發展軟體和集成電路企業。國際科技園在二期建設完成後，園區內的 60%-70% 的企業都是軟體和集成電路設計企業。以 2007 年為例，蘇州國際科技園的總產值為 29 億元，到 2008 年六月底，國際科技園累計註冊企業達到 630 家，實際入駐的辦公企業為 271 家。其中，省級軟體企業為 103 家，高新技術企業 94 家，通過 CMMI 認定的企業達到 13 家。目前，軟體外包是國際科技園的特色產業，並且通過了「中國軟體歐美出口工程」基地評審，2005 年成為七大「中國軟體歐美出口工程」基地之一。蘇州國際科技園在 2007 年的軟體出口總額為 21.7 億元，占園區總產值的 74.86%，約占蘇州市軟體出口總額的 90%，同時佔江蘇全省軟體出口總額的 40% 左右。在 2008 年，蘇州國際科技園園區內有 30 多家企業從事軟體外包業務，其中有 7 家為「中國歐美軟體出口工程」的試點企業，佔江蘇省的 78%；有 64 家企業通過江蘇省技術先進服務企業認證，佔全省的 54%；共有 13 家企業通

---

<sup>40</sup> 訪談記錄 SZ1008。

過CMMI認證，佔蘇州市的 56%。蘇州國際科技園先後獲得「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國家級軟體園」、「中國軟體歐美出口工程試點基地」及「國家動漫產業基地」等稱號。除了軟體外包佔了江蘇省近一半的市場之外，2005 年 6 月，國家廣電總局授予蘇州國際科技園「國家動畫產業基地」稱號，近年來以動漫遊戲為代表的數位娛樂產業在蘇州國際科技園異軍突起，截至 2007 年為止，園區的動漫遊戲產值將近三億元。到 2008 年為止，國際科技園已經聚集了 30 多家以神遊科技、蝸牛電子等為代表的遊戲研發領導企業，和以泰山動畫為代表的動畫設計領導企業。此外，蘇州國際科技園還是蘇州市IC設計企業的重要集聚地，匯集了蘇州全市 90%的IC設計企業及 60%的設計銷售收入。2007 年的IC設計業，銷售收入已經突破 2 億元<sup>41</sup>。

針對 IC 設計產業的發展而成立的「蘇州中科集成電路設計中心」（以下簡稱蘇州中科），是目前蘇州市最重要的 IC 設計產業的重鎮。蘇州中科成立於 2003 年 8 月，位於國際科技園之內，是由中國科學院與蘇州市聯合創辦的大型院地合作項目，受到中國科學院、江蘇省科技廳、蘇州市政府的委託，由中科院計算所、蘇州市科技局及蘇州工業園區承建。員工一百多人，其中 70%以上的員工擁有博士或是碩士學位，重要的幹部大多來自北京或海外。並在 2007 年得到國家信息產業部電子發展基金的支持，成為國家（蘇州）集成電路產業技術服務平台，由省級平台進階到國家級平台。蘇州中科的宗旨是利用中國科學院的技術和人才，服務及引導整個蘇州市，乃至江蘇省的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同時整合地方與企業資源，實現龍芯及其他重要的科技成果產業化。蘇州中科是一個提供產業界 IC 設計平台的機構。在軟體方面，有 EDA 軟體，可以滿足 90nm 製程以上的設計需求；在硬體方面，擁有十個 EDA 機房和中心機房，配備先進的 SUN 工作站和伺服器、DELL Linux 伺服器、PC 工作站及伺服器、網絡存取磁盤陣列，以及四通道 4G 採樣率的存儲示波器和 IC 設計驗證專業邏輯分析儀等。此外，另有蘇

---

<sup>41</sup> 《中國電子報》，〈蘇州國際科技園：中國軟件出口歐美工程基地〉，2008-09-19。

州中科測試平台，此為蘇州市和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共同支持的院省重點合作項目，提供包括超大規模數字電路、SoC、AMS 電路、模擬電路、高頻電路、射頻電路的專業測試服務。測試平台目前是與惠瑞捷公司合作，在配備大型測試儀器 V93000 的基礎上，展開測試人才方面的培訓。蘇州中科的主要服務平台有七種項目，包括 EDA 平台、IC 測試平台、人才培養平台、物理設計平台、產品工程研發服務平台、產業化平台及創業孵化平台（見附錄一）。

在 2004 年夏季的田野訪談中，我們訪問到一位任職蘇州中科的 S 經理。S 經理畢業於南京東南大學，曾經在 Motorola 設計中心工作三年之後，才轉到蘇州中科服務。他以 Motorola 設計中心的經驗為例，Motorola 派遣該公司的中國籍工程師到國外受訓，如新加坡及印度等國家學習 IC 設計的技術。經過幾年的訓練之後，就逐漸學習到最新的技術能力。他的大學同班同學幾乎都被 Motorola 設計中心吸引去任職，幾年下來，因為跳槽或離職的因素，IC 設計的技術便擴散了出來。他們學習到的技術主要是以手機晶片設計為主。當時蘇州中科剛在 2003 年八月份成立，到我們於 2004 年六月份進行訪談時，S 經理表示已經孵化出兩家 IC 設計公司。蘇州中科提供企業平台，自己有機台設備進行晶片的測試，性質上類似開放實驗室，希望透過中心把設計與製造結合，把科研成果商業化。蘇州中科有中科院的背景，人才為金字塔型，有在美國工作八年經驗的海歸派，中層幹部大多是曾經在集成電路企業工作過的人，而最多的為大學畢業生<sup>42</sup>。

S 經理提到，當時外資 IC 設計公司的訂單都來自國外，外資的技術能力也比較高，在 2004 年時，台商的 IC 設計業到中國投資的仍然相對較少。就中國的晶片設計而言，高階產品幾乎都送給外資廠商代工，至於一般的電器產品 IC 則在國內的集成電路公司生產。整體而言，蘇州的 IC 設計人才不夠多，一年才生產 2000 餘人，還要中科院幫忙培育人才。S 經理也提到上海的優勢是人才較多，而且與國際的交流機會較廣泛及密集；但是，在蘇州生活有生活機能方便的優

---

<sup>42</sup> 訪談記錄 SZ0402。

勢，尤其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在交通上，不過流動率還是很大，蘇州人才很容易流動到上海去。若就整體 IC 產業而言，S 經理認為蘇州比上海還有優勢，因為產業聚落較為完整。至於無錫的 IC 生產，基本上都是國防工業，一些轉成民營的集成電路企業是準軍事單位，例如華越、華晶、上華等。這些單位的技術人員，他們的設計思路比較傾向國防，而缺乏商業取向的頭腦。S 經理認為中國對集成電路的發展思維有些偏，因為技術與市場分離，他認為應該由市場來驅動，而非以技術來驅動中國集成電路的發展。此外，中國大陸的 IC 設計產業還無法建立核心技術，這與中國本身的人力資本在產業開始發展時的技術能力不高有關。

時隔六年之後，我在 2010 年八月份再訪蘇州中科，接待我的是一位 Z 經理，我問起 S 經理是否仍在蘇州中科任職，Z 經理答曰他已經離開，轉往民間公司服務。在這次的訪談中，Z 經理指出，蘇州中科是目前整個大蘇州地區最重要的 IC 設計公司聚集地，全市將近 80% 的 IC 設計公司都設在蘇州中科；蘇州市在 2009 年約有 90 家 IC 設計公司，2010 年則約有 100 家。蘇州本地的 IC 設計人才依然不足，而且民營 IC 設計公司的市場訊息不順暢，彼此之間也缺乏交流溝通，現有產品也大多集中在非常低階的電子產品的晶片設計，如手錶、玩具、電視機遙控器等。至於蘇州中科提供的 MPW 服務平台，合作的晶圓代工廠商包括蘇州和艦、華虹 NEC 及中芯國際等。龍芯的專案項目則是交給常熟的夢蘭集團生產。Z 經理指出，台灣集成電路公司對蘇州 IC 設計人才擴散效應影響最大的公司是旺宏半導體公司，該公司被業界稱為「旺宏大學」，但因為旺宏當時是以「偷跑」的方式投資蘇州<sup>43</sup>，所以旺宏在蘇州非常低調。

### （三）蘇州集成電路行業協會

蘇州也成立「蘇州集成電路行業協會」。根據該協會副秘書長的說法，這個

---

<sup>43</sup> 我在拜訪完 Z 經理之後，打過電話至蘇州旺宏，欲拜訪台籍經理。但是，總機在徵求主管意見後，回覆我說，因為旺宏是偷跑來蘇州投資的，所以不方便接受我的拜訪。

協會是在 2003 年由蘇州和艦總經理建議之下成立的。協會是由蘇州政府出資設立，會員採自願性參加，提供蘇州半導體產業的相關業者一個交流的平台。副秘書長指出，工業園區內的封裝測試大廠以日本及南韓的廠商為主。蘇州本地的 IC 設計業者的技術水平仍然較低，做的大多是低階電子產品的晶片設計。市場上對 IC 設計人才的需求很大，不過人才供給出現嚴重的短缺。蘇州的生活環境對海歸派有吸引力，但是歸國學人的同質性又過高，因此形成產品市場的激烈競爭。至於未來的三至五年會是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關鍵時刻<sup>44</sup>。

#### （四）昆山清華科技園

根據昆山清華科技園 A 經理提供的資料<sup>45</sup>，2003 年 9 月，北京清華大學與昆山市政府合作成立昆山清華科技園，啟迪控股公司佔股權 51%，上海同進置產公司佔 39%，昆山政府佔 10%。2006 年 10 月，園區第一棟建築——科技大廈竣工，園區開園。2007 年 4 月，清華科技園昆山成立先進製造創新中心。2008 年 7 月，被認定為「江蘇省級科技創業園」；同年 8 月，「江蘇省中小企業國內技術轉移平臺」專案正式立項；舉辦「2008 年 IASP-ASPA 聯合年會昆山會議」；10 月，昆山小核酸產業基地奠基；2009 年 3 月，昆山先進製造裝備產業基地揭牌；12 月，被認定為國家級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清華科技園成立的原因在於中國產業的技術轉移路徑不暢，資源缺乏；產學研結合有效機制、模式缺失；中國的大學擁有大量研發成果未能產業化；中國企業創新能力較弱；大學和企業之間、國際高科技技術和國內企業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管道。A 經理指出，昆山清華科技園以孵化具有創新技術的中小企業為主要功能<sup>46</sup>。

---

<sup>44</sup> 訪談記錄 SZ1031。

<sup>45</sup> 這位經理提到，昆山工業技術研究院就在清華科技園的對面，兩個園區的主管單位不同，昆山工研院新成立不久，所以它能發揮什麼作用，目前還看不出來。倒是昆山清華科技園的孵化企業能力較好。訪談記錄 KS1025。

<sup>46</sup> 訪談記錄 KS1025。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了解到蘇州的半導體產業高度集中在蘇州工業園區，其產業聚落的形成，除了本地民營的IC設計公司之外，隨著蘇州和艦的成立，引進了一批台灣IC設計業者的進駐。並且，地方政府與中國科學院成立的蘇州中科及其所在地的蘇州國際科技園，是個重要的產官學的合作平台。不過，在田野訪談中，並未發現半導體產業的技術是透過蘇州中科研發之後，擴散給民營企業的現象，仍然需要藉助外資及台資的半導體製造廠商及IC設計、IC封裝測試等外資廠商的資源，提升蘇州本地的技術及工程師人才的學習能力。另一個趨勢，則是中國企業重金禮聘台灣的面板及半導體產業人才，借用挖角的方式協助中國廠商建立企業制度，提升生產技術與管理能力<sup>47</sup>。

中國政府大力的推動半導體產業的成長，其「芯片情結」帶著濃厚的科技民族主義，中國認為掌握住 CPU 的研發及生產技術，即能證明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固然這當中有著成功的故事，但是一樁晶片造假事件則不僅凸顯了社會的個別行動者與政府的急功近利及機會主義，同時也反映出中國在發展關鍵技術的技術能力尚不足以追趕上鄰近的東亞國家。

「看起來，我們有必要給“中國芯”更多的時間，更少的期待。」(凌志軍，2007：362)。中國在半導體產業的追趕過程中，對「CPU」(中央處理器)有著濃厚的技術民族主義情結。若干中國的歸國學人投入 CPU 這個資訊電子業裡最關鍵的零組件設計及研發，展開了積極的追趕。但是，這整個過程看起來，竟宛如一場華麗喧騰的「CPU 大躍進」鬧劇。

根據凌志軍(2007)的記載，2002年可說是中國的「晶片年」，是「中國芯工程」突飛猛進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裡，中國誕生了所謂的「方舟二號」、「星光二號」及「龍芯一號」等中國設計的CPU。「方舟之父」李德磊，曾經是加拿大約克大學的終身教授，也曾經先後在美國摩托羅拉公司擔任工程師，於日立美國半導體公司擔任微處理器設計總監。回到中國之後，他在北京中關村成立中芯

---

<sup>47</sup> 台灣半導體人才如何協助無錫半導體產業發展的研究，可參見金家禾、周志龍(2009)。

微系統公司，從事 CPU 的研發。「星光」的主導者是鄧中翰，他是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經濟管理學和物理學的雙料碩士，也是電子工程學博士。他曾經在矽谷太陽微電子公司參與中央處理器的設計，此後又轉往 IBM 參與超大規模量子計算機的研究。「龍芯」的主導者是李國傑，他是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所長，以及中國工程院的院士。

中國國務院在 2000 年頒佈《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之後，宣示要利用五至十年的時間，讓中國國產集成電路產品能夠滿足國內市場的大部分需求，並要有一定數量的出口，同時還要縮小與先進國家的研發及技術差距。因此，當 2002 年，李德磊領導的中芯微系統公司發佈「方舟二號」之後，立即引發了中國全國上下的一片「中國芯情結」（凌志軍，2007）。媒體輿論瘋狂報導中國終於結束了「無芯時代」：「中關村製造出中國芯」、「一個值得中國人自豪的日子」、「中國告別無芯時代」、「中國結束洋芯時代」、「中關村摘取 IT 皇冠上的明珠」，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也報導此事，說「這一微電子與計算機領域的重大突破，改寫了我國資訊產業無“芯”的歷史。……在嵌入式 CPU 領域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中國人確實設計出 CPU，但是不論是方舟、星光或龍芯，其技術水準都未能達到「國際先進水準」。

根據凌志軍的報導，因為這幾個中國設計的 CPU 採取的都是「嵌入式晶片」的設計，它是一種「專用晶片」，由於線路都是事先編好的，不論其用途是汽車、電視、手機等等，不需要再修改它的線路設計。另外一種設計是所謂的「通用式晶片」，是應用在計算機上的。就晶片的技術路徑而言，通用式晶片的技術位階高於嵌入式晶片，前者的價格也遠高於後者。因此，這幾個「中國芯」所採取的技術路徑都是從最低階的晶片設計下手。不過，除了「星光」的市場表現較好之外，「方舟」及「龍芯」大多得依賴政府的採購才能勉強維持公司營運。「星光」的鄧中翰對市場有較深刻的認識，他知道市場具有喜新厭舊、變化迅速的特性，但是研發 CPU 的技術成本和資金成本的投入都相對高昂，一旦研發出來，若無法順利銷售，產品及技術也將很快地被取代，因此關鍵仍在於市場應用。鄧中翰

當時選擇了「多媒體晶片」作為晶片的發展策略，一方面這是晶片技術最低階而容易入手的，另一方面是中國市場對此有龐大的需求。「星光」在中國市場取得一定程度的市場成功，並且也取得國際客戶的訂單，如荷蘭飛利浦、韓國三星、日本富士通等。但是，緊接著發生的「漢芯造假事件」，則不免令人對中國政府發展半導體產業的能力及態度產生疑問。

2006年發生的「漢芯造假事件」，成為中國追求CPU自主創新過程中的一場最大規模的騙局。「漢芯造假事件」的主角是陳進，他是一名海歸派，回到中國之前曾經在美國摩托羅拉公司做過工程師，並且在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完成博士學位。他進入上海交通大學之後，宣稱要研發一個「DSP晶片」（數字信號處理器），並在四年之內實現此一計畫。「DSP晶片」是美國德州儀器的主力產品，在技術上和Intel的微處理器並列為集成電路工業的兩大高端技術。上海交通大學聽信了陳進的計畫，除了成立一個「晶片與系統研究中心」，由陳進擔任主任，並賦予他眾多的頭銜，包括：上海交大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大微電子學院院長、上海市計算機和集成電路設計主題專家、上海市資訊委員會專家庫成員等等，以及送給他一大筆錢。但陳進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成立公司，他自己投資9.5萬元，便佔了這家公司95%的股權。然後他拿出先前高調宣傳的「四年計畫」，以及兩個搭檔及一群實習大學生投入「DSP晶片」的研究工作。陳進的「研究工作」是直接複製了摩托羅拉公司的「dsp56800E」晶片的全套設計源代碼，但即便有了設計源代碼，他也無法設計出一款晶片。於是，他想到一條捷徑，就是直接從美國買回現成的晶片，用一張200號的砂紙磨去晶片上的「MOTO」字樣，然後印上「漢芯一號」的標誌。這裡還有個插曲，由於陳進打磨的手法過於拙劣，於是委託部屬找來一個手巧的民工，請他打磨及打印標誌。一開始，陳進的員工對此大惑不解，但是他解釋這片晶片上原來印著「上海創奇」，他只是想將之改為「上海交大」，當時陳進依然兼任上海交大創奇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因此就被他這樣蒙混過去。這位協助陳進的民工，並未留下姓名，後來被戲稱為「中國第一農民工」。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打磨技術高超，也因為他而讓陳進「大功告成」。

(凌志軍，2007)，進而使得陳進展開一連串的詐欺及「圈錢」<sup>48</sup>。

陳進只花了兩年時間，就讓「漢芯」誕生了，不但提早完成他的「四年計畫」，並為他個人帶來空前的名利。上海市政府為他舉行記者會，高調宣佈「漢芯一號」的誕生使得上海成為撼動全球半導體行業的中國力量。陳進也在這場記者會中，公開展示「漢芯一號」，並請來專家小組做技術鑑定。專家們在鑑定過後，在鑑定報告上做出一致的結論：「“漢芯一號”及其相關設計和應用開發平台，屬於國內首創，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是中國晶片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Ibid.：414)。接著，陳進成立上海交大漢芯科技有限公司，擔任總裁，公司資本額達到 5091.44 萬元。2004 年及 2005 年，陳進以「漢芯」及「上海交大」的招牌，接連發表「漢芯二號」和「漢芯三號」。實際上，漢芯沒有任何銷售收入，陳進卻到處宣揚漢芯已經打入國際市場。陳進的謊言，讓上海市政府也信以為真，於是上海市政府繼續錦上添花地頒給他一堆頭銜，包括上海交大校長獎、上海市科技創業領軍人物、上海市IT十大新銳、上海市十大傑出青年、長江學者等等。離譜的是，陳進憑著他的冒牌貨竟然從政府那裡得到 12 項國家專利，以及上海市科技進步一等獎。除了上海市政府禮遇他，國家級部委亦請他指導，包括國家科技部、國家信息產業部、國家發改委等。據稱，陳進一共從政府單位騙得 11408.25 萬元人民幣。2006 年 5 月 12 日，調查漢芯造假的官方報告出爐，調查組認定「陳進在負責研製“漢芯”系列晶片過程中存在嚴重的造假和欺騙行為」(Ibid.：416)。在這篇調查報告中，並且指責陳進上瞞下騙，欺騙了鑑定專家、上海交大、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媒體和公眾等等。但是，並無任何專家和官員為此事承擔責任，司法單位也未曾介入調查。媒體編輯也大多接到了「指示」，要求不准再報導此一造假事件。這件轟動一時的晶片造假事件，令人不禁懷疑中國還能成為一個創新國家嗎<sup>49</sup>？(凌志軍，2007：417)

---

<sup>48</sup> 一位蘇州晶圓代工廠的高階台籍幹部在接受訪談時曾表示，蘇州這邊的一些政府幹部經常拿一些產業計畫要來請我們幫忙，本來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要去向省裡或國務院「圈錢」的。後來，知道了，我們公司都會想辦法推掉。(訪談編號：SZ1034A)

<sup>49</sup> 蘇州老楊對於我欲了解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研究，深不以為然，他當時即對我提出陳進的

以上這些以個人傳記為主的個案，見證了近十年來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一頁歷史。中國政府及有識之士確實能意識和追蹤高科技產業的技術發展趨勢，並試圖透過產業政策進行技術追趕，但是這些產業政策及制度設計在追求經濟成長的治理邏輯影響下，反倒使得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及產品的生產非但難以鑲嵌在技術軌跡以進行突破，積極引進外資的技術及資金的產業政策更使得中國本地的廠商難以透過 OEM 的形式進行技術學習，或者只能在國內市場接受政府的採購以維持企業的營運。

#### 第四節 蘇州學習型區域的浮現？

以學習型區域的分析架構衡量蘇州的技術學習體制，首先可以發現蘇州的地理區域已經成為全球高科技產業的重要生產基地，並與全球生產網絡具有高度的分工與鑲嵌。其次，在外資的高度投資下，蘇州高科技產業的後向連鎖越來越朝向以知識與技術密集的外資廠商所形成的網絡，不過其基礎研究仍顯得薄弱，且大多集中在組裝加工，然後進行出口的生產模式。第三，蘇州已有的公共學習機構，包括蘇州中科院的國際科技園、昆山清華科技園等公共研發中心在轉移和研發先進技術與知識的能力仍然不足，大多淪為中小企業的育成中心（孵化器），其功能不同於新竹科學園區的工研院電子所。再者，延續第三點，蘇州這些研發中心固然與外資廠商及本地企業之間有經常性的資訊交流及合作，但某種程度，這些公共研發中心並未有足夠的能力從事新技術和知識的學習創新，僅是提供機器設備和相關訓練課程等資源供本地工程師及在裡頭孵化的中小企業使用；當地的大學也未能承擔起技術研發與創新，並將之擴散給本地企業的功能。最後，外資廠商之間具有合作關係，就近服務客戶的現象所在多有。由於這些外資廠商在蘇

---

晶片造假事件。去年，中國掀起一波學歷打假風潮，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任微軟中國區總裁唐駿。老楊認為像唐駿這種造假行為在中國盛行，中國哪有可能造就什麼高科技？

州著重於代工業務，生產流程所產生的問題可由廠商內部的工程師解決，加上產品成熟，互派人員駐廠的現象並不多見。在田野中亦發現，台資IC設計公司下單給本地的封裝測試廠商，一旦碰上生產問題，還需要由委託代工的台資IC公司上門處理問題，顯見本地高科技廠商的技術能力仍然處於落後<sup>50</sup>。

蘇州、昆山等地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儘管高度學習台灣的發展經驗，但在國情及歷史的差異性之下，其技術學習軌跡的次第並不相同。大蘇州地區與新竹科學園區的學習型區域比較，請見表 5-9。

竹科隸屬於國科會，在 1973 年選定清大及交大匯聚的新竹成立工研院，然後在 1980 年進而正式成立竹科。在一開始選擇 ASIC 晶片及 CMOS 技術作為園區主要學習及發展的半導體技術，並派員赴美國 RCA 公司學習半導體生產技術，當時這些赴美學習的工程師後來也多成為台灣重要的半導體公司創辦人。在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機器角色歷經從積極干預，隨著廠商技術能力的提升，而漸至淡出的過程（陳東升，2003）。

竹科的外資比重不高，因為台灣政府採取和其他東亞後進發展國家非常不同的科技發展策略，對科技業的投資絕大部分來自台灣民間資本（佔 83%），政府投資僅佔 5%，12% 來自外國投資者，但其中有許多投資來自台灣人（Saxenian，2008）。瞿宛文和 Amsden（2003）也指出，1999 年竹科共有 284 家公司，其中 110 家是受過美國教育的工程師創辦的，即使大部分新成立的公司是美籍華人創辦，資金仍然是台灣人提供的。竹科的外資佔實收資本額的比例在 1990 年代逐漸滑落，從超過兩成，跌落至一成以下；僑資比例同樣呈現下滑的趨勢。因此，她們認為台灣電子業的歷史，從 1950 年代後期的草創期至今，是一部本國公司

---

<sup>50</sup> 張家銘（2006）曾以學習型區域的分析架構，做出蘇州各經濟開發區的發展，儘管多以新竹科學園區為其學習典範，但實際運作方式較類似台灣出口加工區的結論。他認為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在於蘇州缺乏可以與跨國廠商進行知識和技術移轉的學習機構，包括當地的學術研究單位及公民營企業廠商，以及產官學之間缺乏合作的基礎。但是，他的分析強調地方政府在經濟開發區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以蘇州的技術學習體制為主題，因此缺乏技術學習體制的資料蒐集，但他做出這樣的結論不僅過於直觀，也無法揭露為什麼蘇州的產官學之間缺乏合作基礎的原因。

逐漸取得領導地位，並且逐走外國直接投資者的歷史。

此外，台灣較具開放性格的產業結構，也有利於半導體產業及面板產業的技術擴散（田島真弓，2007）。而晶圓製造廠商不斷自主創新的生產技術，如台積電在 2004 年開發出 193 奈米浸潤式微影技術（Immersion Lithography），改寫全球半導體的微影藍圖，也因為這項技術，使得台積電與 IBM、Intel 等公司並列一線晶圓製造大廠；2010 年，台積電選擇直接發展 20nm 製程，並將在 2013 年量產，這是台積電先進製程首次超越 Intel（林亦之，2010）。台積電的技術創新日漸擺脫美日國際大廠的專利攔阻，並與 IC 設計等次產業在產業內部形成關係緊密的虛擬整合組織型態（王振寰，2011）。

工研院電子所在竹科早期的發展上扮演著重要的技術引進及技術移轉擴散的角色，在 1970、1980 年代，經由台灣本地的工程師進行 R&D 的還原及複製過程，轉移 IC 技術，並從而催生出本土的 IC 產業，隨著本土 IC 公司的壯大，工研院電子所才逐漸淡出。除此之外，工研院對台灣經濟最大的貢獻，在於它也是個進階訓練中心，在 1973 年至 1998 年，約有一萬名工研院研究人員帶著他們在工研院累積的知識和技能轉人民間企業，而出身自工研院，目前擔任上市公司執行長的人超過五十位（Saxenian，2008）。

新竹科學園區與矽谷的高科技廠商之間的互動，彼此之間存在著互補合作的產業結構關係，而形構這些廠商合作關係的動力來自於頻繁的技術與人才的流動和關連性，仲介於這一關連性的因素則是在兩地之間存在著一種綿密的社會與技術社群網絡，亦即所謂的「跨國企業家」。這些技術社群的非正式社會與技術網絡，促進了矽谷與新竹兩地之間在技術、資金、技能與資訊的雙向流動，支持兩地的創業精神，同時也帶動兩地較正式的商業關係，例如合資與研發合同。而這些歸國學人的知識網絡對台灣在高科技產業的追趕學習上具有重要的知識及技術的擴散效果（Saxenian and Hsu，2001；Saxenian，2005、2008；田島真弓，2007）。

新竹科學園區不僅與全球高科技產業緊密連結，也在當地形成重要的知識及

人才等地方性資產，形成一個具有強競爭力的學習型區域（王振寰、高士欽，2000）。蘇州則是以地方經濟成長做為核心的發展策略，截至目前為止，尚未能整合出一套系統性的技術學習模式。尤其，許多公共研發中心的設置，大多成為企業的培育中心，而非技術研發及擴散的機構，這一點與新竹工研院在台灣高科技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不同。蘇州高度依賴外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模式，使得其地方經濟競爭力非常依賴於當地的各項生產成本，而非知識、技術及人才等的優勢。此外，蘇州各級地方政府大多以「焊接」（welding）的方式進行制度追趕學習，亦即透過行政權力拼貼出技術學習體制的組織框架，而非以追求技術創新學習作為其政策目標，兼之凡事要求速成與政績的執政心態，使其本地的廠商難以切入高科技產業的生產網絡，其 OEM 學習機制便在此種地方經濟治理邏輯中被剝奪了，從而無法產生具有強競爭力的制度綜效。

蘇州，正如王振寰與高士欽（2000：213）所說：「設立了高科技園區並不意味它一定會成功。」

## 第五節 小結

2008 年出現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促使蘇州決定推動地方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一方面透過產業後向連鎖的方式，加速引進面板產業、半導體製造、IC 設計與 IC 封裝測試等產業，以及引進台資筆記型電腦的研發部門。另一方面，以優惠政策引進外地科技人才，成立各種公共研發中心培育 IC 設計企業等。但是，這些政策並未能突破外資高科技廠商的技術攔阻，反而可視為地方官員招商引資的手段或是「拿來主義」的速成思維。蘇州在高科技產業的場域裡，仿造台灣等東亞國家的發展典範，以焊接的方式持續引進這些成就東亞國家的高科技產業制度。但是，蘇州並非積極地創造適合本地民營企業生存的制度環境，而是依然高

度依賴著外資的資源，藉以展開產業的後向連鎖以之做為蘇州高科技產業的升級動力。因此，蘇州看來具備學習型區域的框架，但至今並未產生內生知識及技術學習創新的制度綜效，其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來源仍是來自於外資廠商的貢獻。

表 5-9 大蘇州經濟開發區與新竹科學園區的學習型區域比較

制度特徵	地理區域	
	大蘇州（蘇州市、昆山市）	新竹科學園區
產業類型	筆記型電腦、面板製造、晶圓製造、IC 設計、IC 封測等。	晶圓製造、IC 設計、光罩、DRAM 等以半導體相關產業為主。
產業聚落的形成	地方政府及外資創造。	國家機器創造。
社會文化資本	外資領導發展，並且壟斷技術、知識、管理及出口市場。聚集的外資廠商網絡。	跳槽文化、企業網絡/聚集。
學習機制	外資獨大。由各地方政府制訂政策，持續引進高科技外資及國內外科技人才，並由蘇州國際科技園與昆山清華科技園等學習機構提供技術平台以培育本地中小企業及工程師等。	人員流動、技術擴散、網絡學習、工研院技術移轉、海外學人、外資。
競爭區域類型	弱競爭	強競爭
外資投資結構	外資佔絕大多數。	外資少，以本地企業網絡為主。
學習型區域特色	焊接式的制度追趕學習。	快速追趕的學習型區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新竹科學園區部分，整理並修改自王振寰、高士欽（2000）及王振寰（2011）。

## 第六章 結論

「全球化引發了中國的國家轉型。同樣地，中國的全球化可以理解為西方國家的國際化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導致了中國國家與國際的融合，因為領導人必須輸入西方國家產品來應對西方資本主義和西方國家推動的全球化。在這樣做的時候，中國國家也已經審慎地擴大了它的差異，以便容納全球化及其後果並在其中生存。全球化使得中國社會更加複雜並且更加難以統治，常常導致民族主義的興起。而對這些挑戰和大量的實際難題，領導人不能隨意地使國家西化；相反，必須藉助傳統手段來克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結果，全球化在使中國國家變得更現代化的同時，又維持了它的中國性。」(Zheng<sup>1</sup>，2009：34)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所採取的經濟發展模式，高度從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經驗中進行學習及修正。東亞模式包含的制度特徵，包括：廉價的勞動力、壓低價格的幣值、為了確保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由國家提供高額補貼；高水準的國內儲蓄，為國家在產業發展所需提供充足的資金；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注重教育，提升國民教育水準；以及高度重視保護國內市場等。中國則是從這些走在前頭的東亞國家發展經驗加以修正而已（Halper，2010）。因此，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就，相當程度上是透過模仿、透過引進非常成熟的技術，使得中國能夠比改革開放之前更加充分地利用廉價勞動力，變成世界工廠而取得。中國利用人力上的優勢，搭上全球化的列車<sup>2</sup>，產生林毅夫所說的「後發優勢」，但同時也讓中國產生錯覺，感覺所有的成就都是來自於自己的功勞，而非外面提供的，不是因為別人做了很多基礎性的發展，也不

---

<sup>1</sup>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sup>2</sup> 蔡宏政（2007）亦認為中國的崛起是植根於全球化的結構轉型，尤其是 1980 年代之後，美元本位所造成的「美元循環」是帶動中國出口導向的重要因素。蔡認為中國要逆轉目前的出口擴張的發展，除了必須進行高速度的產業升級以進一步提升資本積累外，也牽涉到更深層的社會與政治改革，才能將過高的儲蓄轉為消費力，而最終目標是要走出以「美元循環」為動力的出口帶動成長模式，使中國的長期發展不再受限於美元本位的基本結構，進而能改變世界經濟規則，使之有利於中國自身發展所需。

是世界貿易秩序上的逐漸建立貢獻給中國的結果，所以中國經濟學家陳志武（2010）認為「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

中國高度的經濟成長是否帶來相應的技術升級？根據資策會（2010b）的資料，中國本土IC自給率不到一成，汽車電子、工業控制、網路通訊及消費電子等IC均由外商控制，同時中國IC產業以封測及製造為主，其中多數的主要廠商是由外商投資或合資，外商投資的封裝測試廠在規模及技術水準上，均遠高於中國本土廠商。此外，中國的整體技術發展是以進口替代國內研發，60%的高科技技術進口集中於外國投資企業之中，國有企業佔37%，其他企業只佔3%。儘管，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後，藉由大量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且在長期貿易順差中累積了數量龐大的外匯<sup>3</sup>，但在全球生產體系中，中國依然嚴重依賴外國的技術進口（蔡宏政，2007）。而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過程，具體而微地出現在蘇州的經濟轉型及其對待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態度上。

自1978年以來至今，蘇州的經濟轉型歷經三個重大的階段變化，產業結構也由集體鄉鎮企業的傳統產業，逐漸演化為如今的二元經濟結構，亦即蘇州本地廠商集中於傳統產業，而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則由外資與台資主導發展及出口的經濟格局。蘇州朝向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經濟轉型，並未形成具有制度濃度的技術學習體制，產生有利於將高科技產業的知識、技術、管理等制度鑲嵌在本地的學習氛圍，且在外資的技術攔阻之下，蘇州的高科技產業嚴重依賴外資的技術、資金、人才與管理等投資、生產及出口，形成了「發展，但缺乏技術學習」(development but without technological learning)的發展模式與趨勢。

蘇州的經濟轉型力量從何而來？首先是改革開放之後的市場轉型，在原本所謂「強政府」領導的制度遺產裡，蘇州地方黨政能人不斷地透過投資集體鄉鎮企業的方式，利用行政權力調節生產與市場，乃至技術學習的管道，使得蘇南模式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取得重要的經濟成長。這段時間，地方黨政能人主導蘇州

---

<sup>3</sup> 截至2011年3月底為止，中國的外匯存底高達3.0447兆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台灣的外匯存底到2011年7月底為止，為4007.66億美元，世界排名第四，次於中國、日本與俄羅斯之後（中央社，2011-08-05）。

的經濟發展方向，也更加深與鞏固地方領導幹部對經濟事務的干預程度，同時，這些干預經濟事務的背後意圖，是為了地方官員的個人政績與升遷。當中所產生的問題，不僅導致了蘇南模式的難以為繼，也造成一旦在轉向外向型經濟發展之後，大量湧入的外資與台資，運用他們更具有生產效率，技術能力與人力資本更高，資金更加充裕，且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競爭的優勢時，蘇州只能成為外資的生產基地（第三章）。

那麼，蘇州各級地方官員又是如何建立地方制度優勢以承接資訊電子業的台灣廠商呢？昆山與蘇州等地的地方官員採用的跨國制度學習模式，包括地方官員的個人網絡及制度聯盟等，透過親商的態度取得台資廠商的青睞，並且不斷地完善經濟開發區的軟硬體設施等方式，積極地協助台灣 IT 廠商解決生產、通關、用地、用工等生產問題，成功地發展出蘇州資訊電子業，並且成為筆記型電腦的全球重量級生產基地。但是，台灣 IT 廠商帶動前往蘇州的投資，是在其既有網絡式生產模式的路徑依賴下進行各項生產活動，使其產業聚落呈現高度外向但結構封閉的制度特徵。由於整體的投資環境對其本地民營廠商並不友善，因此蘇州資訊電子業的主要經濟行動者是由台資與外資廠商所扮演，而非本地廠商。蘇州各級地方幹部與台外資 IT 廠商合力追求各自的「成長」，導致資訊電子業在地理空間上是鑲嵌在主要的經濟開發區內，但外資廠商與蘇州本地的技術學習體制則是斷裂的結構（第四章）。

2008 年出現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促使蘇州決定推動地方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一方面透過產業後向連鎖的方式，加速引進面板產業、半導體製造、IC 設計與 IC 封裝測試等產業，以及引進台資筆記型電腦的研發部門。另一方面，以優惠政策引進外地科技人才，成立各種公共研發中心培育 IC 設計企業等。但是，這些政策並未能突破外資高科技廠商的技術攔阻，反而可視為地方官員招商引資的手段或是「拿來主義」的速成思維。截至目前為止，以學習型區域的分析架構衡量蘇州的技術學習體制，首先可以發現蘇州的地理區域已經成為全球高科技產業的重要生產基地，並與全球生產網絡具有高度的分工與鑲嵌。其次，在外資的

高度投資下，蘇州高科技產業的後向連鎖越來越朝向以知識與技術密集的外資廠商所形成的網絡，不過其基礎研究仍顯得薄弱，且大多集中在組裝加工，然後進行出口的生產模式。第三，蘇州已有的公共學習機構，包括蘇州中科院的國際科技園、昆山清華科技園等公共研發中心在轉移和研發先進技術與知識的能力仍然不足，大多淪為中小企業的育成中心（孵化器），其功能不同於新竹科學園區的工研院電子所。再者，延續第三點，蘇州這些研發中心固然與外資廠商及本地企業之間有經常性的資訊交流及合作，但某種程度，這些公共研發中心並未有足夠的能力從事新技術和知識的學習創新，僅是提供機器設備和相關訓練課程等資源供本地工程師及在裡頭孵化的中小企業使用；當地的大學也未能承擔起技術研發與創新，並將之擴散給本地企業的功能。最後，外資廠商之間具有合作關係，就近服務客戶的現象所在多有。由於這些外資廠商在蘇州著重於代工業務，生產流程所產生的問題可由廠商內部的工程師解決，加上產品成熟，互派人員駐廠的現象並不多見。在田野中亦發現，台資 IC 設計公司下單給本地的封裝測試廠商，一旦碰上生產問題，還需要由委託代工的台資 IC 公司上門處理問題，顯見本地高科技廠商的技術能力仍然處於落後。因此，蘇州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及其技術學習體制，至今並未成為如老楊及蘇州工業園區官員口中的「下一個竹科」(第五章)。

蘇州在每一階段的經濟轉型動力來自於追求地方經濟成長的治理邏輯。在此制度慣性下，地方官員熱衷於招商引資，固然吸收大量的高科技產業外資並建立完整的產業聚落，但是在具有高度競爭力與技術能力的外資廠商主導的產業結構下，以及公共研發中心的角色定位等因素影響，使得蘇州產業升級的道路佈滿荊棘，並不容易實現學習型區域所揭示的技術、知識鑲嵌在當地的運作。蘇州的這個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體制的對偶發展過程，也呼應了王振寰（2007a：180）所說的：「不同社會由於歷史遺產或政治經濟權力的分配模式，造就了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而這個體系也就規範了和模塑了其經濟發展的方式。」

新中國的成立是與群眾站在一起，並且以消滅資本主義體制的階級對立做為群眾的幸福理想。但是，一旦當地方黨政幹部自成利益集團，擁抱權與錢，也已

然不再「親民」時，蘇州的外資廠商既與各級地方政府站在一起，卻又在背後藐視著地方政府，在高科技產業技術變化快速，與其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環境裡，蘇州理應得到「飛地經濟」的結果。

## 第二節 理論反省

如同第二章的文獻回顧所指出，針對改革開放後的蘇州經濟發展研究，本研究將之歸納成兩大類觀點。第一類觀點是所謂「地方政府中心論」(local state-centered)，此論的主要關懷在於市場機制與地方經濟的社會鑲嵌關係，並且強調地方政府對地方經濟成長的能力與自主性。第二類觀點是「廠商中心論」(firm-centered)，其主要關懷在於廠商、生產網絡、工業聚落等以廠商為中心的交易治理模式的變化，亦即強調信任機制對廠商內部與廠商之間的不同交易治理模式的制度安排，強調此一制度安排對廠商生產效率及創新學習的影響，地方政府則扮演一個輔助廠商提升生產效率的角色。

全球化的經濟體制典範轉移，一方面既造成高科技產業出現全球生產網絡的跨國及跨區域的產業分工，此一全球性的產業分工使得後進發展國家的科技學習與創新成為可能，因此，另一方面，後進發展國家為了追趕先進國家的技術，大多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利用策略性工業的扶植及帶動，強化大學與公共研發機構的技術研發能力，產業網絡之間並展現出鑲嵌在此一地理疆界內的特殊社會文化制度，構成所謂的學習型區域以從事技術的學習創新，並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使其產品與服務能在全球高科技產業中具有強競爭力，也因而凸顯出區域或地方成為經濟體的角色與功能。

本研究對昆山及蘇州的分析指出，不論是「地方政府中心論」或「廠商中心論」的研究路徑，均無法解釋蘇州「發展，但缺乏技術學習」的經濟發展趨勢。本研究從歷史與制度的面向，強調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體制的對偶關係，指出昆

山及蘇州的經濟成長，迄今為止，仍未能形成學習型區域所需的技術學習能力與制度濃度的原因，在於地方官員與外資廠商各自的制度路徑依賴建構出蘇州的此種發展態勢與結構。

徐斯儉與呂爾浩（2009）以「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sup>4</sup>」的概念，認定此概念為蘇州與東莞兩個地級市政府在主導地方經濟發展的行動者特徵，並認為此一概念充分捕捉了「中國特有的一種發展模式」。然而，就修辭而言，「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本身便是矛盾的一個組合。我認為他們所欲表達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市場化」，但這並非「發展型國家」界定下的「發展」，相反地，「中國特有的一種發展模式」會不會就是國家對資本的某種掠奪形式展現？同時，他們的這組概念並未脫離Oi、Walder等學者的看法太遠，若以中國通俗的用語「國進民退」來形容他們所指涉的現象，反倒更貼近現實，也更容易理解現實。誠如蔡欣怡（2007：308-314）對採取發展型國家此一分析路徑進行中國「國家機器」研究的批評：「…把中國定位成一個發展型國家的主要限制，在於『國家』在實踐中並不做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我並不同意為中國的中央國家和地方國家貼上越來越多的分類標籤，或偏好單一的解釋。」

除了香港之外，東亞模式的經濟發展大多伴隨著高科技產業的科技學習與創新，並且各自在不同的產品市場及研發、生產上佔據利基位置，也各自具有強勢的國際品牌或代工生產的競爭優勢。因此，在蘇州的個案分析中，我們所能學習到的意義（learn from the case）便顯得可貴。

首先，技術的學習創新與經濟成長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促進經濟成長的政策選擇方式會影響技術的學習創新<sup>5</sup>。地方制度的正式與非正式限制，尤其是中國此一社會主義國家依然保持「強政府」的集體黨政領導的決策模式，

---

<sup>4</sup> 所謂的「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是指中國的「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在進行發展型國家角色時，不僅只是藉助公部門的資源挹注，而是直接汲取市場資本來投入公共財的建設；另一方面，公部門也直接或間接成立企業，進入市場運作並牟取利潤，形成依托在公部門的一種市場化資本積累機制，為公部門提供公共財政預算以外的一種資源和資本積累，為公部門從事發展型國家提供了資本基礎（徐斯儉、呂爾浩，2009：128）。

<sup>5</sup> 亦可參考王振寰（2007a）對台灣、南韓與中國邁向科技學習創新體制的跨國分析。

對促進經濟成長的政策選擇方式有其內在的限制。因為中國的政府決策在於如何追求經濟成長，而非追求技術的學習創新，從而改變國家經濟結構的體質。這是中國與東亞模式最大的制度差異。

其次，外資所帶入的全球生產網絡有其自身的治理邏輯及自主性，尤其在中國的經濟區域主義下，反而更強化外資的集體自主性，且非地方政府所能加以規訓。因此，外資的生產模式與地方政府的經濟成長模式之間的親和性，只會更加鞏固飛地經濟的全球在地化方式，卻難以產生產業升級的效應。此外，外資廠商為什麼要替蘇州進行產業升級呢？這似乎也是蘇州各級地方政府的決策盲點。

最後，則是學習型區域的分析架構固然是一套衡量區域在技術學習創新體制的指標，但其分析架構顯得過於靜態，無法呈現出一個區域或地方技術學習體制的形成過程。除非加入經濟轉型的動態分析，才能理解一個地方在邁向學習型區域的過程與成敗，以及為什麼產生或不產生制度綜效的原因。

因此，本研究採取的地方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體制的對偶分析策略，指出蘇州的「發展，但缺乏技術學習」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是對蘇州研究最主要的研究貢獻。

###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從演化的角度出發，把蘇州作為一個區位經濟的分析個案，可以預見其未來的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仍然是持續不斷地變動中，同時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國內的產業政策、政經制度環境與外資帶動的全球生產網絡等因素的影響。本研究指出，至 2010 年為止，蘇州的產業升級並不成功。但是，此後蘇州是否能邁向學習型區域的發展，產生具有創新學習氛圍的社會制度基礎以提升整體區域的技術創新學習能力，端視地方政府的經濟治理邏輯能否從追求地方 GDP 成長與政績主義的政經制度結構及思維中做出改變，以及能否從外資與台資廠商中落實人才

的培育，同時當地的大學與公共研發中心是否能承擔起技術擴散的功能，藉以扶植本地廠商的生產與研發能力等因素而定。就目前的條件而言，蘇州持續以「招商引資」的作法，引進海外的資金、技術與人才，企圖藉以改變當地的產業環境與技術能力的政策與作法，就長期而言，並不利於掌握技術自主，特別是研發及製造環節均掌握在外資及台資手中，而 IC 設計所需要的人才數量與素質又不如上海時，在這些區位條件與制度的限制下，蘇州難以真正實現產業升級的目標。

然而，從這裡也看出本研究的限制所在。由於進入蘇州本地民營企業與公共研發中心、歸國學人創業園區等機構的困難，使得本研究無法蒐集相關田野資料以呈現蘇州在面板產業及半導體產業的人才培育及流動的過程，進一步分析蘇州本地高科技產業人力資本的社會網絡及其制度特徵。對此一人力資本的社會網絡研究，將有助於更深入地認識外資與本地工程師、以及本地工程師與大學、公共研發中心之間的社會關係，從而掌握人力資本與高科技產業的技術學習在蘇州如何進行互動學習的過程與機制。特別是 IC 設計產業強調晶片設計人才的創意與能力，而這些創意與設計能力的養成，以及相關社會制度的支持，是影響蘇州後續在產業升級及技術是否自主發展的關鍵。

因此，在未來的研究方向上，可以採取社會網絡的分析架構，蒐集從半導體製造、IC 設計、IC 封裝測試等台外資廠商的人力流動，從流動的範圍與過程當中來了解技術、知識的擴散效應是否產生，及其機制的變化。如此能更細緻而精確地掌握蘇州在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學習軌跡。其次，亦能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切入，藉由分析南韓、台灣、日本及美國等世界重要的高科技產業國家的產業發展變化、國際市場競爭及合作的動態過程中，透過這組全球產業分工的架構掌握蘇州欲往半導體產業發展以提升本地技術能力的地方經濟發展目標，如何在這些產業核心國家的高度競合過程中獲得利益，或是反而限制其進一步的技術提升。

## 附錄一：蘇州中科的主要服務平台

服務平台	服務內容
一、EDA 平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主要職責：一是負責接待 EDA 平台用戶、維護和管理中心集成電路設計硬見和軟件環境；二是為平台用戶提供集成電路設計服務和行業諮詢。</li> <li>• 提供兩種 EDA 軟件使用模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現場使用模式：針對小規模的集成電路設計公司，尤其是初創企業。中心現有 10 個 EDA 機房，每個機房可以滿足 4-15 人的設計工程師在中科內部現場使用。對於這些客戶，中心除了提供 EDA 軟件租賃服務之外，還提供網絡技術支持、數據備份服務，利用已經建設調適好的數據儲存、備份機制為客戶提供安全穩定的數據儲存服務。根據客戶需求，中心還可以提供會議室、投影機、傳真機等其他設施。</li> <li>2.VPN 遠程申請 license 模式：客戶可以通過 VPN 連結在自己的公司內部非常方便地使用中心的軟件工具。客戶自己處理數據、文檔的儲存和備份。</li> </ol> </li> <li>• MPW 服務：針對多條工藝線開展大規模的 MPW 計畫，建立和運作 MPW（多項目晶圓）公共投片平台、服務體系，幫助企業進行小批量的生產投片服務。提供多家 Foundry 合作夥伴的設計接口服務。協助客戶為其提供各種工藝的設計庫、設計規則、設計模型、IP 庫和 Design Kit。建立 Foundry 工藝的 Shuttle 投片服務體系以及獨立開展 MPW 投片服務。目前主要合作夥伴包括：和艦科技、中芯國際以及上海華虹 NEC 等 Foundry 廠商。</li> <li>• IT 外包服務：蘇州中科作為專業的 IC 及 IT 服務提供商，幫助企業簡化 IT 管理、提升 IT 服務品質，節省 IT 投入成本，為用戶提供專業的服務，進而滿足用戶深層次個性化服務需求。</li> <li>• IP 技術服務：協助開發商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以及更有效率的方式縮短產品開發週期，連結硅知識產權中的滿賣雙方，幫助半導體技術研發投資的收益最大化。具體服務項目包括：IP/SoC 評估驗證服務；建立 IP 核庫；按 IP/IC 的設計服務（協助開發）；IP 核的交換交易服務。</li> </ul>
二、IC 測試平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通過與東南大學、蘇州大學、Verigy 公司等集成電路測試資源，服務於廣大的中小企業。成立以來，測試平台已經建設成具有以 IC 芯片工程驗證測試為主，兼顧小量 IC 成品測試的能力，可覆蓋各種數</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設有三個實驗室：測試實驗室、電路分析實驗室、CAD 實驗室。</li> <li>• 擁有一批豐富經驗的測試工程師，其中研究員一名，副研究員一名，測試工程師六名。</li> </ul>
<p>三、人才培養平台</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蘇州中科全額投資成立「蘇州市中科職業培訓學校」，通過項目實訓的方式培養各類產業急需的人才。2008 年底，建設培養實用型和複合型集成電路人才公共實訓基地，包括利用蘇州中科已有的 EDA 設計平台、IC 設計平台、IC 人才培養平台、嵌入式系統設計平台以及相配套的技術服務團隊。</li> <li>• 基地可為企業提供的服務方式，包括：企業直接派遣學員到基地內參加各類項目實訓；企業直接從基地參加實訓的高校學員中挑選合適人才；企業或區內培訓機構自行組織培訓課程、培訓師資，使用實訓基地免費的硬件資源。</li> <li>• 另外，也提供學歷教育、工程師職業實訓、集成電路高階技術培訓、公開課、專題講座等人才實訓項目。</li> </ul>
<p>四、物理設計平台</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蘇州中科物理設計平台是為了充分發揮 EDA 平台的潛能而專門組建的一個部門，它同時也是蘇州地區唯一由政府支持建立的 IC 物理設計公共服務平台。平台建立五年來已經承擔過鳳芯一號 AVS 音視頻解碼芯片、CMOS Therefore 零中頻前端芯片、WLAN SoC 芯片、硬盤加密芯片、KSMC 標準單元和 IO 單元設計等的物理設計任務，並以不同形式參加了多家公司的不同設計階段的芯片設計工作。</li> <li>• 芯片設計服務：包括，數字大規模集成電路、系統芯片（SoC）從網表到流片的全流程設計服務；模擬電路全定制版圖設計服務；IP 單元硬核版圖設計服務；標準單元時序模型和功耗模型開發。</li> <li>• 技術諮詢服務：包括，協助客戶解決使用我公司 EDA 軟件過程中遇到的技術問題；產品設計中的工藝選擇、IP 單元使用、設計流程選擇等相關技術的諮詢服務；中小企業起步階段的技術諮詢服務。</li> <li>• 物理設計平台不僅與 ARM Artisan、Faraday、Synopsys、中科院 EDA 中心、信息產業部軟件與集成電路促進中心、上海硅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等單位和組織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繫，可以提供 IP 諮詢和檢索服務，幫助客戶快速選定所需的 IP，而且同中芯國際、和艦科技、上海華虹 NEC、台積電（TSMC）、台灣勤德 KSMC 等芯片製造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可以為客戶提供多種工藝的設計諮詢服務和</li> </ul>

<p>五、產品工程研發服務平台</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產品工程研發服務平台依托蘇州中科集成電路設計中心，依據國家《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的「推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精神，並且充分利用中科的技術、人才的優勢，服務於長三角以及蘇州地方企業，通過與企業溝通設計服務要求，共同建立產品科研機構和技術開發中心，即「產品虛擬研發團隊」，從而實現科研成果的產業化。並將逐步採用會員服務制度。</li> <li>• 服務內容：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IP 核設計驗證服務：為客戶定製專有領域的數字 IP 核，並提供相應的軟件仿真、FPGA 等驗證服務。目前已經擁有豐富的 IP 核驗證設計經驗和 Cadence、Synopsys 等公司的 IP/SoC 軟件平台。並已設計驗證多款 IP 核，現已成功地集成到相應的 IC 中。</li> <li>2. IC 設計服務：為客戶提供從前端的邏輯網表設計到後端物理設計到最終芯片封裝測是的 Turnkey 式服務，讓我們成為系統廠商的 IC 虛擬研發團隊。</li> <li>3. 板級設計服務：與用戶合作研製具體應用領域（如娛樂、通信、安全、工業控制等），基於 FPGA、DSP、通用 SoC（如以 MIPS、ARM、POWERPC 等為 CPU 的 SoC 芯片）、MCU 為控制器的系統級產品電路。</li> </ol> </li> </ul>
<p>六、產業化平台</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促進科學院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蘇州中科開創院地企結合的新模式。發起成立了江蘇夢蘭龍芯產業化基地，在全國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建立了龍芯產業化應用示範基地，完成國家重大科技成果的龍芯 CPU 與企業和市場的對接工作，夢蘭龍芯產業化項目得到江蘇省重大科技成果產業化項目 3000 多萬經費的支持。</li> <li>• 另外，蘇州中科獨力完成了「IDE 加解密專用芯片產業化」項目，並通過專家組的驗收。「IDE 加解密專用芯片產業化」項目旨在研製在 IDE-IDE 橋接芯片中內嵌加解密模塊。</li> </ul>
<p>七、創業孵化平台</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蘇州中科作為一個院地合作的科技成果轉化平台，在吸收、培養人才的基礎上，還組織推動創業服務，為創業、市場、科研、產業化人員提供創業啟動資金、優良的辦公環境、強大的政府支持、廣闊的市場開發以及最佳的融資環境。</li> <li>• 創業服務平台結合多方面的綜合優勢，包括蘇州工業園區給予的政策優惠以及園區專門設立的軟件與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基金支持。其中，科技領軍人才創業可享受包括「項目啟動資金、風險創業投資、跟進風險投資、項目貸款擔保、統貸平台支持」共五個專項資金支持。對</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蘇州中科已經完成建設了近 2000 平米的創業孵化基地。</li></ul>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蘇州中科集成電路設計中心」簡介手冊。	

## 附錄二：昆山清華科技園建設

昆山優越的區位條件及中國百強縣級市的經濟地位，吸引北京清華科技園在昆山成立分部，該科技園的建設分成三期：

- 建設起步期（2004 年—2007 年）
  - A 地塊 13.7 萬平方米土地規劃及基礎設施建設
  - 完成 A 地塊 6 萬平方米建設
  - 成立昆山先進製造創新中心
- 初步成型期（2008 年—2009 年）
  - A 地塊 13.7 萬平方米土地的開發建設完畢
  - B 地塊 17.5 萬平方米土地規劃及基礎設施建設
  - 新開工 B 地塊 6 萬平方米建設
  - 創建省級科技創業服務中心、技術轉移中心
- 發展完善期（2010—2011 年）
  - 完成整個園區 36 萬平方米土地的開發建設
  - 創建國家級科技創業服務中心、技術轉移中心
  - 實現服務輻射整個江蘇地區
  - 成為清華大學等院校的成果轉化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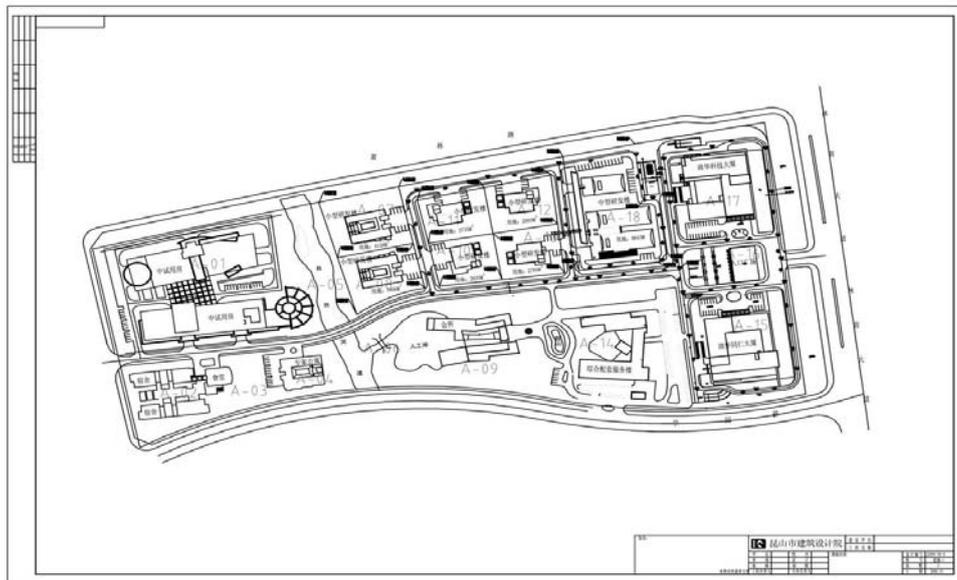
昆山清華科技園分為 10 個獨立功能的子平台進行建設，包括：

- 一個技術轉移相關資訊資源的資料庫；
- 一個提供技術轉移一站式服務的技術交易平台；
- 一個由技術專家與技術轉移專業人才組成的專家組；
- 一個由多個專業化公共服務平臺構成的公共創新服務中心；
- 一個以昆山分園「清華大學研究生實習基地」為基礎的人才基地；

- 一個總體協調技術轉移工作及培養技術轉移專業人才的虛擬研究院；
- 一個「江蘇省中小企業國內技術轉移中心」的門戶網站；
- 一個為創新科技成果進行產業化準備的孵化器；
- 一個由技術轉移相關機構組成的行業聯盟；
- 一個為技術轉移保駕護航的增值服務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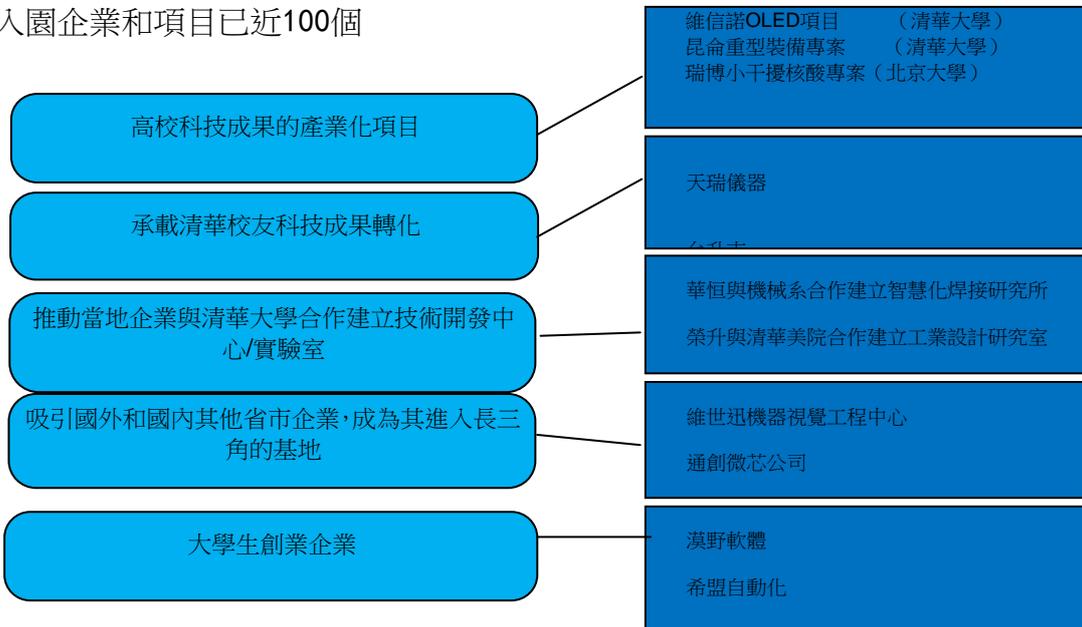
目前，北京清華大學共有十一個重大產業化專案，有 2 個專案落戶昆山，包括：維信諾 OLED 項目及昆侖大型模鍛壓機項目。

### A 地塊總體規劃



## 昆山清華科技園發展項目

入園企業和項目已近100個



## 參考文獻

### 中文書目：

- 于明超、劉志彪、江靜，2006，〈外來資本主導代工生產模式下當地企業升級困境與突破〉。《中國工業經濟》，2006(11)：108-116。
- 王小強，1996，《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對薩克斯和科爾奈的批評》。香港：牛津大學。
- 王信賢，2006，《爭辯中的中國社會組織研究：「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台北：韋伯文化。
- 王信賢，2008，〈物以類聚：台灣 IT 產業大陸投資群聚現象與理論辯析〉，頁 89-126，收錄於陳德昇主編，《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策略、佈局與比較》（修訂版）。台北：INK 印刻文學。
- 王振寰，1997，〈跨國界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以台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7:1-36。
- 王振寰，1999，〈全球化，在地化與學習型區域：理論反省與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4：69-112。
- 王振寰、高士欽，2000，〈全球化與在地化：新竹與台中的學習型區域比較〉。《台灣社會刊》，24：179-237。
- 王振寰，2003，〈全球化與後進國家：兼論東亞的發展路徑與轉型〉。《台灣社會刊》，34：1-45。
- 王振寰，2007a，〈從科技追趕到創新的經濟轉型：南韓、台灣與中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8：177-226。
- 王振寰，2007b，〈空間再尺度化的角力：全球化下的台灣資通產業與國家機器〉。《地理學報》，49：39-54。
- 王振寰，2011，《追趕的極限：台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台北：巨流。
- 王紹光，1997，《挑戰市場神話：國家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香港：牛津大學。
- 王紹光、胡鞍鋼，1994，《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香港：牛津大學。
- 王榮主編，2008，《蘇州精神：“三大法寶”的價值與昇華》。蘇州：蘇州大學。
- 王緝慈等，2010，《超越集群：中國產業集群的理論探索》。北京：科學。
- 方孝謙，2002，〈解釋鄉鎮企業變遷的制度與關係理論？社會學的利基何在？〉。《台灣社會學刊》，29:191-212。
- 田島真弓，2007，《台灣高科技產業的跨國技術學習創新網絡機制：積體電路與液晶顯示器產業的比較》。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江蘇省統計局，2008，《蘇州市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現狀研究》。
- 江小涓，2008，〈中國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中國社會科學》第 6 期。
- 冷則剛，2002，《資訊產業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以上海市發展為例》。台北：INK

- 印刻文學。
- 呂爾浩，2001，《市場化地方統合主義：蘇州開發區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爾浩，2003，〈從「蘇南模式」到明日矽谷：1979年以後的蘇州經濟發展過程〉。《東亞季刊》，34(3)：51-62。
- 何彩滿，2005，《代工組織的轉型與超越：寶成集團的世界》。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李友梅等，2004，《制度變遷的實踐邏輯：改革以來中國城市化近程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李順騫，2004，《企業經營策略與產業群聚關係之研究：以蘇州地區台商印刷電路板產業為例》。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李國鼎，2005，李國鼎口述，劉素芬編著，陳怡如整理，《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李國鼎談台灣財經決策的制訂與思考》。台北：遠流。
- 沈晗耀、錢世超、吳柏均，2006，〈強力政府與高效市場：長三角經濟高速增長之謎〉，頁 17-40，收錄於吳柏均、錢世超等著，2006，《政府主導下的區域經濟發展》。上海：華東理工大學。
- 林亦之，2010，《台灣 IC 產業技術的追趕到創新：組織間網絡的分析》。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毅夫、蔡昉、李周，2000，《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北：聯經。
- 林毅夫、姚洋，2003，〈東亞奇蹟中的中國農村工業化〉，頁 103-138，收錄於 Stiglitz, Joseph E. and Shahid Yusuf edit., 2000,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中譯：王玉清、朱文暉，《東亞奇蹟的反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林毅夫、王燕，2009，〈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一個學習、積累和升級的發展過程〉，頁 173-207，收錄於蔡昉主編，《中國經濟轉型 30 年(197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吳大聲、居福田，1994，〈蘇南模式〉，頁 24-67。收錄於周爾鑾、張雨林編，《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香港：牛津大學。
- 吳介民，1996，〈同床異夢：珠江三角洲外商與地方之間假合資關係的個案研究〉，李思名等主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面面觀》，頁 175-218。台北、香港：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與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聯合出版。
- 吳介民，1998，〈中國鄉村快速工業化的制度動力：地方產權體制與非正式私有化〉。《台灣政治學刊》3：3-63。
- 吳柏均、錢世超等，2006，《政府主導下的區域經濟發展》。上海：華東理工大學。
- 吳瑟致，2011，〈中國大陸地方經濟治理模式對台商投資影響之研究：以昆山地區為例〉，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舉辦「第七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2011年1月5-8日。
- 吳國光、鄭永年，1995，《論中央—地方關係：中國制度轉型中的一個軸心問題》。

- 香港：牛津大學。
- 吳國光編，1994，《國家、市場與社會：中國改革的考察與研究 1993 至今》。香港：牛津大學。
- 吳敬璉，2009，《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增訂版）。上海：上海遠東。
- 吳曉波，2008，《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 1978-2008（上、下）》。北京：中信。
- 吳翰有，2001，《全球產業與在地鑲嵌：台商資訊產業在蘇州生產協力網絡之建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周怡，2006，《中國第一村——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後集體主義》。香港：牛津大學。
- 周其仁，2005，《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周雪光，1999，〈西方社會學關於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狀況述評〉，收錄於涂肇慶、林益民主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大學。
- 南方朔，2006，〈一本會改變我們的著作〉（推薦序），頁 4-14，收於 Izraelwicz, E., 2005, *Quand La Chine Change Le Monde*. 中譯：姚海星、裴曉亮（2006），《當中國改變世界》，台北：高寶國際。
- 金碚、劉戒驕，2008，〈蘇州的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頁 81-128，收錄於洪銀興、王榮主編，《改革開放三十年：蘇州經驗》，蘇州：古吳軒。
- 金家禾、周志龍，2009，〈技術自主型之科技產業群聚發展模式：以中國無錫半導體產業群聚發展為例〉，發表於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2009 年 11 月 28-29 日。
- 洪世章，2002，〈結構衝突與產業劣勢：台灣硬碟機工業之發展〉。《管理學報》，19（2）：273-302。
- 洪銀興、陳寶敏，2008，〈蘇南模式的演進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頁 1-14，收錄於洪銀興、王榮主編，《改革開放三十年：蘇州經驗》，蘇州：古吳軒。
- 柏蘭芝、潘毅，2003，〈跨界治理：台資參與昆山制度創新的個案研究〉。《城市與設計學報》，15/16：59-92。
- 柯志明，1993，《五分埔：台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 胡宏偉，2008，《中國模範生：浙江改革開放三十年全記錄》。杭州：浙江人民。
- 胡鞍鋼、鄆一龍，2010，《紅色中國綠色錢潮：十二五規劃的大翻轉》。台北：天下雜誌。
- 高柏，2008，〈中文版序言：新發展主義與古典發展主義的比較分析〉，頁 1-18，收錄於高柏（中譯：安佳），《經濟意識型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 年的發展主義》，上海：上海人民。
- 徐進鈺，1999，〈流動的鑲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勞動力與高科技發展〉。《台

- 灣社會研究季刊》，35：75-118。
- 徐進鈺，2008，〈從移植到混血：台商大陸投資電子業的區域網絡化〉，頁 41-60，收錄於陳德昇主編，《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策略、佈局與比較》（修訂版）。台北：INK 印刻文學。
- 徐斯儉，2004，〈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爭議：一個文獻的回顧〉。《中國大陸研究》，47(1)：1-40。
- 徐斯儉、吳玉山主編，2007，《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
- 徐斯儉、呂爾浩，2009，〈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 1990-2005：中國兩個地級市個案研究〉。《中國大陸研究》，52(2)：97-136。
- 馬力誠，2006，《大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雲錄》。北京：中華工商聯合。
- 凌志軍，2007，《中國的新革命》。北京：新華。
- 梁保華，2008，〈序〉，收錄於洪銀興、王榮主編，《改革開放三十年：蘇州經驗》，蘇州：古吳軒。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0a，《半導體產業推動計畫：我國 IC 封測產業與中國科技園區之合作與挑戰分析座談會》，經濟部工業局半導體產業推動辦公室主辦，2010 年 11 月 26 日於新竹科學園區。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0b，《半導體產業推動計畫：我國 IC 設計產業與中國科技園區之合作與挑戰分析座談會》，經濟部工業局半導體產業推動辦公室主辦，2010 年 11 月 26 日於新竹科學園區。
- 耿曙、林瑞華，2008，〈經濟利益與認同轉變：台商與韓商個案〉，頁 123-154，收錄於陳德昇主編，《台日韓商大陸投資策略與佈局：跨國比較與效應》。台北：INK 印刻文學。
- 耿曙、陳振偉，2005，〈揮別發展型國家？昆山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轉型〉，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四所，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主辦之「中國經濟轉型與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2005 年 4 月。
- 殷存毅，2009，〈大陸經濟轉型與昆山台商投資演變趨勢〉，頁 165-195，收錄於陳德昇主編，《昆山與東莞台商投資經驗、治理與轉型》。台北：INK 印刻文學。
- 寇健文，2005，《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台北：五南。
- 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
- 陳志柔，2001，〈中國大陸農村財產權制度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閩南與蘇南的地區差異〉。《台灣社會學》，2：219-262。
- 陳志武，2010，《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台北：八旗文化。
- 陳佳貴主編，2008，《中國非國有經濟改革與發展 30 週年研究》。北京：經濟管理。
- 陳東升，2003，《積體網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社會學分析》。台北：群學。

- 陳東升，2008，《積體網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社會學分析（增訂版）》。台北：群學。
- 陳信宏，2004，〈研發國際化與地主國區位優勢：旗艦級跨國企業在兩岸研發中心之比較〉。《台灣管理學刊》，4(3)：289-316。
- 陳振偉，2005，《經濟全球化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轉型：昆山地方政府與台資企業互動模式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德昇主編，2008a，《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INK 印刻文學。
- 陳德昇主編，2008b，《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策略、佈局與比較》（修訂版）。台北：INK 印刻文學。
- 陳德昇主編，2008c，《台日韓商大陸投資策略與佈局：跨國比較與效應》。台北：INK 印刻文學。
- 陳德昇主編，2009，《昆山與東莞台商投資經驗、治理與轉型》。台北：INK 印刻文學
- 陳德昇，2010，〈蘇南地方治理、運作與職能轉變〉，發表於「中國地方治理：變遷、趨勢與挑戰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2010年3月20日。
- 郭健倫，2005，《土地非農化與地方經濟發展下的中國大陸都市治理：大蘇州地區開發區案例》。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盛九元，2009，〈昆山模式與區域經濟聯動研究〉，頁 197-222，收錄於陳德昇主編，《昆山與東莞台商投資經驗、治理與轉型》。台北：INK 印刻文學。
- 黃巧億，2007，〈京東方、上廣電、龍騰合併，大陸有機會成為面板生產新星〉。《電工資訊雜誌》，196：64-66。
- 黃承圯，2003，〈外商看中昆山什麼〉，頁 78-79，收錄於國家信息中心編，《2002 中國開發區年鑑》，北京：中國物價。
- 黃崇憲，2010，〈從開港到加入 WTO：當代台灣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結構轉型〉，頁 137-170，收錄於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台北：群學。
- 張五常，2009，《中國的經濟制度》。香港：花千樹。
- 張家銘，2006，《台商在蘇州：全球化與在地化考察》。台北：桂冠。
- 張家銘，2008，〈跨界投資中國及社會適應：台商、日商與韓商比較〉，頁 103-122，收錄於陳德昇主編，《台日韓商大陸投資策略與佈局：跨國比較與效應》。台北：INK 印刻文學。
- 張家銘、江聖哲，2009，〈蘇州台商的政企關係：制度鑲嵌觀點的考察〉，頁 31-68，收錄於陳德昇主編，《昆山與東莞台商投資經驗、治理與轉型》。台北：INK 印刻文學。
- 張建華，2008，〈蘇南模式演進中的政府作用〉，頁 334-363，收錄於洪銀興、王榮主編，《改革開放三十年：蘇州經驗》，蘇州：古吳軒。
- 張樹成，2009，〈昆山對外開放的實踐探索與經驗〉，頁 143-164，收錄於陳德昇

- 主編，《昆山與東莞台商投資經驗、治理與轉型》。台北：INK 印刻文學。
- 楊友仁、王鴻楷、郭健倫，2004，〈快速工業化下的中國大陸區域治理：以蘇州地區土地產權體制轉化為例〉。《中國大陸研究》，47(3)：111-141。
- 楊友仁、夏鑄九，2004，〈跨界生產網絡的在地化聚集與組織治理模式：以大蘇州地區資訊電子業台商為例〉。《地理學報》，36：23-54。
- 楊友仁，2005，《電子業台商之跨界生產網絡與中國大陸地方發展研究：蘇州與東莞的比較》。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楊友仁、蘇一志，2010，〈不僅僅是模組化：台灣資訊電子業 ODM 製造商的研發地理學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9：51-89。
- 萬解秋，1999，《鄉鎮企業結構調整與集約化經營研究》。蘇州：蘇州大學。
- 新望，2005，《蘇南模式的終結》。北京：三聯書店。
- 鄒讜，2000，《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
- 費孝通，1994，《鄉土重建與鄉鎮發展》，香港：牛津大學。
- 當代上海研究所編，2005，《長江三角洲發展報告 2005：經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上海：上海人民。
- 葉政武，2008，《政策及土地法規影響大陸台商競爭力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碩士論文。
- 劉云柏，2003，《近代江南工業資本流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劉志彪、江靜等，2009，《長三角製造業向產業鍊高端攀升路徑與機制》。北京：經濟科學。
- 劉志彪、張擘，2005a，〈蘇州與溫州：國際化模式的比較及展望〉。《溫州論壇》，第 6 期。
- 劉志彪、張擘，2005b，〈中國沿海地區外資加工貿易模式與本土產業升級：蘇州地區的案例研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第 8 期。
- 劉雅靈，2001，〈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歷史過程〉。《台灣社會學刊》，26：1-54。
- 劉雅靈，2003，〈經濟轉型的外在動力：蘇南吳江從本土進口替代到外資出口導向〉。《台灣社會學刊》，30：89-133。
- 劉雅靈，2007，〈國家／社會關係研究途徑：理論與實例〉，頁 45-72，收錄於李英明、關向光編著，《中國研究的多元思考》，台北：巨流。
- 劉雅靈，2010，〈中國準計畫行政體制：鄉鎮政府從企業經營到土地收租的軟預算財政〉。《台灣社會學刊》，45：163-212。
- 潘云官、周志方編，1999，《蘇州工業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初探》。南京：南京大學。
- 潘美玲、張維安，2001，〈彈性生產與協力網絡：協力廠觀點的個案研究〉。《台灣社會學刊》，25：201-242。
- 潘毅、盧暉臨、張慧鵬，2010，《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香港：商務印書館。

- 蔡明璋，2005，〈台灣的新經濟：文獻的回顧與評述〉。《台灣社會學刊》，34：211-247。
- 蔡宏政，2007，〈全球化、區域整合與中國崛起的條件〉。《思與言》，45(2)：13-59。
- 鄧小平，200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鄧建邦，2009，〈持續地回家：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移居生活〉。《台灣社會學》，18：139-179。
- 鄭永年，2010，《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杭州：浙江人民。
- 錢穎一、許成鋼，1997，〈中國非國有制經濟出現和成長的制度背景〉，頁41-78，收錄於甘陽、崔之元編《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香港：牛津大學。
- 蕭新煌、王宏仁、龔宜君主編，2002，《台商在東南亞：網絡、認同與全球化》。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
- 鍾永一、張樹成編著，2009，《見證中國第一個自費開發區：宣炳龍印象》。南京：江蘇人民。
- 謝宇，2010，《認識中國的不平等》，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所，2010年7月2日。
- 謝蘇祥，2007，《台商赴大陸投資之海外派遣人員制度及本土化策略分析：以大陸昆山地區台商製造業為例》。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碩士論文。
- 謝國忠，2011，《謝國忠的下一個中國經濟預言》。台北：高寶國際。
- 瞿宛文，2000，〈全球化與後進國之經濟發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7：91-117。
- 瞿宛文、Amsden, A. H. (安士敦)，2003，《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台北：聯經。
- 瞿宛文，2006，〈台灣後起者能藉自創品牌升級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3:1-52。
- 羅金義、王章偉編，1997，《奇跡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
- 邊燕杰主編，2002，《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 蘇州市工商業聯合會等編，2006，《2005 蘇州市民營經濟發展報告》。蘇州：古吳軒出版社。
- 蘇州市統計局編，2008，《蘇州統計年鑑 200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蘇州市統計局編，2010，《蘇州統計年鑑 201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蘇州市統計局，2010，《蘇州主導行業十年變化簡述》。  
[http://www.sztjj.gov.cn/info\\_detail.asp?id=18966](http://www.sztjj.gov.cn/info_detail.asp?id=18966)。
- 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2009，《關於印發“蘇州工業園區 3+5 產業發展報告”的通知》。
- 龔宜君，2005，《出路：台商在東南亞的社會形構》。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
- C 教授，2009，〈台商大陸投資跨域治理與互動〉，頁273-286，收錄於徐斯勤與

陳德昇主編，《台商大陸投資名人訪談錄》，台北：INK 印刻文學。

- 中央社，〈台灣外匯存底，仍居全球第四〉，2011-08-05，  
<http://www2.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1108050231>
- 中國時報，〈中國 GDP 超越日，躍進全球第 2〉，2011-2-15-A11。
- 仁寶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compal.com/>
- 工商時報，〈前臺積大將投奔三星〉，2011-07-05。
- 光明日報，〈蘇州 6+4 產業振興計劃加快經濟轉型〉，2009-05-27。
- 南風窗，〈蘇州“通安事件”善後〉，2010 年第 17 期。
- 城市商報，〈吳江制定人才發展五年規劃，到 2015 年人才數量翻番〉，2010-07-29。
- 商業週刊 1213 期/2011-2：46-48。
- 商業週刊 1213 期/2011-2：74-76。
- 商業週刊 1224 期/2011-5：80-84。
- 財訊雙週刊，2009/11/12-25：162-65。
- 揚子晚報，〈江蘇省上調最低工資標準〉，2010-01-24。
- 遠見，2005 年 12 月（第 208 期）。
- 遠見，2010 年 11 月（第 293 期）。
- 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217 期，  
<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153011253970.pdf>
- 聯合報，〈台商重鎮，江蘇最低工資漲 18%〉，2011-01-06-A15
- 蘇州新聞網，2010-1-13，  
<http://www.subaonet.com/html/importnews/2010113/10113123545987337370.html>
- 〈觸動海峽兩岸工商界，“仁寶”撤離昆山風波調查〉，2008-04-03，  
<http://big5.huaxia.com/sw/rdtz/1/2008/00788322.html>。
- 〈臺企轉型，昆山論壇〉，2008-10-28，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321/2008/10/28/1766s2297190\\_1.htm](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321/2008/10/28/1766s2297190_1.htm)。
- 〈台商：兩稅合併將促進大陸台資企業升級〉，2007-03-10，  
[http://sp.wenweipo.com/lh2007/news\\_detail.php?news\\_id=473](http://sp.wenweipo.com/lh2007/news_detail.php?news_id=473)。
- 〈園區企業配套協作會開進唯亭，“攀親”500 強〉，2009-11-05，  
<http://www.suzhou.gov.cn/newssz/sznews/2009/11/5/sznews-16-19-18-3797.shtml>。
- SME 電子輔料技術網，2006-09-07，  
<http://sme-t.cn/Html/fuwupingtai/dianzixinxituiguang/0870789.html>
- 〈昆山：樹立“三學”目標，推進創新發展〉，2007-07-11，  
[http://www.js.xinhuanet.com/xin\\_wen\\_zhong\\_xin/2007-07/11/content\\_10544012.htm](http://www.js.xinhuanet.com/xin_wen_zhong_xin/2007-07/11/content_10544012.htm)。
- 中國開發區網，〈昆山出口加工區：“後危機時代”的“華麗轉身”〉，2010-07-09  
<http://www.cadz.org.cn/Content.jsp?ItemID=753&ContentID=83207>
- 蘇州新聞網，<http://www.subaonet.com/html/importnews/2010723/4AGBE6FE673G0CJ.html>
- 〈二季度人力資源市場供求分析報告出爐，外來求職者增 10 萬〉，2010-07-23

蘇州工業園區全球資訊網，〈構築“人才金字塔” 啟動創新動力〉，2010-04-29，  
[http://www.sipac.gov.cn/sipnews/yqzt/eccyxky/sxzx/201004/t20100429\\_63482.htm](http://www.sipac.gov.cn/sipnews/yqzt/eccyxky/sxzx/201004/t20100429_63482.htm)。

昆山經濟開發區全球資訊網，<http://www.ketd.gov.cn/>：

〈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產業載體健全產業體系〉，2009-07-28。

〈仁寶集團投資 1.8 億美元再造一個新“仁寶”〉，2009-09-01。

〈仁寶集團佈局電視生產與人才培養“雙基地”〉，2009-12-20。

〈仁寶研發中心正式啟用〉，2010-04-20。

〈昆山出口加工區：“後危機時代”的“華麗轉身”〉，2010-07-09。

EDN 消費電子設計，〈工業設計提升筆記本電腦價值〉，2010-10-27，  
[http://article.ednchina.com/ce/industrial\\_design\\_to\\_enhance\\_the\\_value\\_of\\_notebook\\_computers.htm](http://article.ednchina.com/ce/industrial_design_to_enhance_the_value_of_notebook_computers.htm)

中國電子報，〈蘇州國際科技園：中國軟件出口歐美工程基地〉，2008-09-19，  
<http://it.cena.cn/ruanjianyufuwu/2008-09-19/122180436923931.shtml>

#### 英文書目：

- Amin, A. and Thrift, N., 1994, “Living in the Global.”, Pp.1-22. In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Edited by Amin, A. and Thrift, N..
- Amsden, Alice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ger, Suzanne and Richard K. Lester, 2005, *Global Taiwan: building competitive strength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y*. M.E. Sharpe.
- Block, Fred,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譯：鄭陸霖、吳泉源(2004)，《後工業社會：一個批判性的經濟社會學論述》。台北：群學。
- Bongiorni, S., 2007, *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 One family's true life adventure in the global economy*. 中譯，黃治頻(2007)，《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台北：早安財經文化。
- Borras, Michael; Ernst, Dieter; Haggard Stephan edited, 2000,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Rivalry or rich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amagni, Roberto, 1991, “Introduction: from Local ‘Milieu’ to Innovation through Cooperation Networks,” Pp.1-9 in *Innovation Networks: Spati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Roberto Camagni. London: Belhaven Press.
- Castells, Manuel,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UK: B.Blackwell.
- Chien, Shiuh-Shen, 2007.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and

-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Case of post-Mao Kunsha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5(2): 269-290.
- Chien, S. S. and Ho, B., 2011,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s Learning in post-Mao China-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Global Networks: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ffairs*, 11 (3) , 315-333.
- Cooke, P.; Uranga, M. G.; Etxebarria, 1998,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30:1563-1584.
- Deyo, Frederic C.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osi, G., Orsenigo, L. and Labini, M. S., 2005,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Smeler N. and Swedberg R. Pp.678-702,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ligstein, Neil, 2001,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譯：鄭力軒（2007），《市場的構造：21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學》，台北：群學。
- Formhold-Eisebith, Martina, 2002, "Regional cycles of learning: foreign multinationals as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34, Pp.2155-2173.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46,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rtler, Meric S.; David A. Wolfe and David Garkut, 2000, "No place like home?: The embeddedness of innovation in a region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7:4 Winter. Pp.688-718.
- Gold, Thomas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 M.E. Sharpe.
- Gran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 Haggard, Stephan, ed.,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lper, Stefan, 2010,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中譯：王鑫、李俊宏等（2010），《北京說了算？：中國的威權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台北：八旗文化。
- Hamilton, G. 1996,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edited by G. Hamilton. NY: Walter de Gruyter.
- Harney, A. 2008, *The China Price: True Cost of Chinese Competitive Advantage*. 中譯：洪懿妍（2008），台北：天下雜誌。

- Hobday, Michael, 1995, *Innovation in East Asia: the Challenge to Japan*. Aldershot, UK: Edward Elgar.
- Hutton, Will, 2007,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21<sup>st</sup> Century*. 中譯：林添貴 (2009), 《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台北：遠流。
- Hung, Y. (黃亞生), 2003,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譯：錢勇、王潤亮 (2005), 《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北京：新星出版社。
- Ernst, Dieter, and Kim, L.,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 *Research Policy*, 31:1417-1429.
- Estades, Jacqueline and Ramani V. Shyama, 1998,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ew Biotechnology Firms in France and Britain."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10:483-495.
- Evans, B.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zraelewicz, E., 2005, *Quand La Chine Change Le Monde*. 中譯：姚海星、裴曉亮 (2006), 《當中國改變世界》，台北：高寶國際。
- Jessop, Bob, 2002,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Malden, MA: Polity.
- Johnson, C.,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natsu, Takashi, 2002, *Technology,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Industrial Policy: Governments of South Korea & Taiwa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h.D. Dissertatio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Columbia University, NY.
- Kim, Linsu., 2000,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e Dynamics of Korea'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中譯：劉小梅、劉鴻基 (2000), 《模仿是為了創新：南韓經驗：技術學習的典範》，台北：遠流。
- Kuroda, Atsuo (黑田篤郎), 2001, *Made in China*. Tokyo: TOYO KEIZAI INC. 中譯：宋昭儀、李弘元 (2002), 《中國製造：揭開「世界工廠」的真相》，台北：經濟新潮社。
- Lardy, Nicholas R., 2002,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undvall, Bengt-Ake, 1992,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London: Pinter.
- Malmberg, Anders and Peter Maskell, 2002, "The elusiv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economies: towards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spatial cluster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34, Pp.429-449.
- Naughton, Barry, 1997,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

-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Nee, Victor. 1989. "The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663-81.
- North, Douglass C. and Robert Paul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譯：劉瑞華（1995），《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北：時報文化。
- Oi, Jean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99-126(October).
- Oi, Jean C. 1999. *Rural China Take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senberg, Nathan, 1982, *Inside the Black Box :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xenian, AnnaLee,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xenian, A. and Hsu, Jinn-yuh, 2001, "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 Connection: technical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0 (4): 893-920.
- Saxenian, AnnaLee, 2005, "Brain Circulation and Capitalist Dynamics: Chinese Chipmaking and 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Shanghai Triangle." Pp.323-351,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ited by Victor Nee and Richard Swedberg. U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xenian, AnnaLee, 2006,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譯：顧淑馨（2008），《新世代科技冒險家：歸國創業家的網絡競爭力》。台北：天下雜誌。
- Scott, Allen, 1988, *Metropolis: 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 to Urban For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gal, Adam, 2003, *Digital Dragon: High-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 Chin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hirk, Susan L.,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rk, Susan L., 2007,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中譯：溫洽溢（2010），《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
- Steinfeld, Edward S., 2005, "Cross-Straits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Catch-Up: How

- Vulnerable Is the Taiwan Miracle to an Ascendant Mainland?”, in *Global Taiwan: Building Competitive Strength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y*, edited by Suzanne Berger and Richard K. Lester. N.Y.: M. E. Sharpe.
- Storper, Michael,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Storper, Michael and Richard Walker, 1989, *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 Territory,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Growth*. Oxford, UK: B. Blackwell.
- Sturgeon, T. J., 2002,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 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1(3): 451-496.
- Tsai, Kellee S. (蔡欣怡), 2002,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中譯：何大明 (2007), 《後街金融：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台北：巨流。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ndrew.,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22(Sept.), 263-301.
- Walder, Andrew., 1997, “Corporate Organ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An Alternative to Privatization.”, 頁 79-98, 中譯：沈原, 收錄於甘陽、崔之元編, 《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香港：牛津大學。
- Wall, David and Yin Xiangshuo, 1997,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xport performance: is China a frog or a goose?”, in *Chinese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1990s: Current Experience, Historical Problems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Charles Feinstein and Christopher Howe. Pp.169-192, US: Lyme Press.
- Wang, Jenn-Hwan; Lee, Chuan-Kai, 2007,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local institution 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technology industry in Suzhou,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8), pp.1873-88.
- Warsh, David., 2008, *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tory of economic discovery*. 中譯：周曉琪 (2008), 《知識與國富論》，台北：時報文化。
- Weiss, Linda and John M. Hobson, 1995, *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Weiss, Linda, ed., 2003,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G., ed., 1988, *Developmental State in East Asia*. NY: St. Martin.
- Whiting, Susan H., 2001,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itley, Richard, 1992,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firms, markets, and societies*. London: Sage.
- Wolfe, David A. and Meric S. Gertler, 2004, "Clusters from the Inside and Out: Local Dynamics and Global Linkages.", *Urban Studies*, Vol. 41, Nos 5/6(May), Pp.1071-1093.
- Woo-Cumings, M. 1999, "Introduction: Chalmers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Pp.1-31 i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edited by M. Woo-Cuming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Zheng, Y. (鄭永年), 2004,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中譯：郁建興、何子英 (2009), 《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Zhou, Xueguang. (周雪光),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5, No. 4. (Jan. 2000), Pp.1135-1174.
- Zweig, David, 2002,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